中国底层

访谈录

中　篇

廖亦武　著

目　录

老威在底层（代序）

90 年初，我的自杀冲动逐渐猛烈，几乎不能控制自己的手脚。为了给我治病，某社会福利机构采取了强制措施。尔后，我被迫从文学的名利场隐退，与世隔绝四年。开始很不自在，因为一个陌生的环境中没人把我当作诗人或作家来瞻仰，没人说“久闻大名，如雷贯耳”之类既中听又肉麻的恭维话。我发觉自己一旦不写字，就被社会遗弃得太快，像一截狗屎，刚拉在阳光灿烂的街头几分钟，就被踩得不像狗屎了。我甚至连话都不会说了，在许多经验和生活常识上，一个四肢抽筋的疯子都可以冒出来教训我一顿。

开头两年我想表现自己，却没任何机会，憋坏了。我老是与人打架。医生慈父在把我电疗得像一只呱呱蹦□的青蛙之后，劝我面对现实。我不得不学说人话，此前，我同目前国内众多先锋诗人、作家一样，只会说书上的话。曾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没书读，没音乐听，没高雅的话题可供思考、讨论，这绝对是一个人文知识分子所无法忍耐的，但我还来不及忍耐就扛过去了。我在与疯子们的朝夕相处中，精神病有了明显好转——“心静自然凉”，我通过学箫明白这个理。

海子和顾城都是因为“心热”而自杀，我与他们的区别是我在诗和女人之外有广泛的爱好。我无法在一种想法里跑一辈子马。我写诗写得太久，同朝秦暮楚的读者关系太近，再不发疯，就说明我是个卑鄙无耻的小人。九十年代，坚持写诗并混出人样来的，都是些精明的卑鄙小人。因为这是商业的天下，哪来的诗意?

这本《中国底层访谈录》缘起于我吹箫的经历。我师父姓司马，是个 83 岁的和尚，我很想知道他的一些故事，但我至今除了箫，对他的过去和将来都一无所知，他吹了 60 多年的洞箫，却什么也说不出口。中国民间还有多少这样的人物?

我陆陆续续与我所认定的江湖中人交往了七年，并无多少功利目的。由于过去养成的记者习惯，我总是把一些特别有意思的谈话私录下来。当然也不排除儿童式的猎奇冲动。我的朋友马松认为，

“这是本世纪前所未有的精神奇观”；而评论家唐晓渡认为，“这是中外新闻史上都不曾有过的采访。”

我不敢作非分之想，因为我怕名利心又会诱发疯病，而这本书中的每篇采访录都是治病的。空虚、压抑、失去人生的方向感；或者人生的方向感过于执着，乃至狂妄得不可一世的人，都可以把它当作医疗手册——我就是这么过来的，“老威”这个长期混迹底层的名字，我直到现在还在用。

从古至今，中国都有极深厚极成熟的“底层思想”，如果将这些东西编排成小说，绝不亚于高尔基的《人间三部曲》和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它们都是能流传后世的具有见证意义的作品。可惜，中国作家都耻于这样做，耻于向脚下的土地汲取养分，他们追踪世界文化热的同时，却自觉或不自觉地被同一种大文化背景所复制。当然，要凭这本书改变一种时尚几乎不可能，但它至少在世纪末提供了一条“回头是岸”的老路。

这个岸，不是大家熟知的“死人传统”，而是许多活生生的人生经历。我觉得从一个影子杀手（疯子）或一个碎尸犯的口中得到的叙述，也比大批当红作家的小说、散文精彩数倍。这些文人都是标新立异、著作等身，以猛攻诺贝尔文学奖而闻名于世的。就此打住。相信读者诸君自有判断。

10/23/2001

致本书作者的一封信

唐晓渡

老威：

你嘱我为你这本《底层采访录》写评，思之再三，感到无从下手。虽然你强调这仅仅是出版操作的需要，似乎我没有理由不站出来，给你一个比较公正的评断——在我看来，这种评断还为时太早太早。

说实话，无论是作为编辑、批评者或朋友，我都无法单独面对你的作品。从 80 年代到现在，值得清算的东西太多了，为你写评无疑是对我自己的清算。或许从理智上，从多年的知识训练上，我难于认同你的种种偏激，但是，强大的本能把我一次又一次推到你的面前，你在用你的肉体做镜子，直接把我灵魂深处的锐利和懦弱照得清清楚楚。亲爱的朋友，人总不能老是活在紧张的真实中，在真实的拷问之外，与朋友们轻轻松松地喝杯酒也不错，人类是群居动物呀，需要互相取暖呀。

是的，我儒雅、坚忍，这些可卑的优点注定了我总是为别人活着。我和这个时代的所有优秀诗人都有过较密切的交往，而现在，他们中不少人已远不满足我对其“保守”的评价——将近 20 年的朋友关系就因为我吝惜几个肉麻的字眼而毁于一旦，接着是表演和谎言。

这一切有什么意义？累死累活有什么意义？当我翻开你的《底层采访录》方从可笑可叹的人际纠缠中脱出身，不由自主地这样问自己：老威，你已经不是诗人了，从三卷本的巨著《活下去》到《沉沦的圣殿》到这种系列的底层采访，你已经由那个颠覆性的诗歌撒旦转化成一个时代的见证者，历史的还原者，或底层思想的挖掘者。你说 90 年代耻与诗人为伍，可我的内心却觉得真正的诗人就是你这样的。

没有谁做得比你更好，虽然十年来你没发表任何具有代表性的

作品。你在《天劫》里写道："生存如刀尖，他所能选择的只有下海、自杀、写作三种。"

你明明知道你选择的那种写作方式要很多年以后才能面世，可仍然在遗忘和喧嚣声中蛮干，了解种种你不为人知的经历之后，也许再客观的批评家也不能为之动容。你这本底层采访从一个碎尸犯开始，展现了一种疯狂而邪恶的天才力量，卢人标对普通夫妻间的理解嗤之以鼻，他说："理解？这世上最不好找的就是理解，于是我准备用菜刀来'理解'她。"

这也是你在某一阶段的环境危机吧？你和碎尸犯的区别仅仅是你的肢解社会和个人的冲动局限于纸上。这本名为"采访录"的个人语言风格因此形成，你是在利用"采访"这么一把菜刀"理解"书中所有的人物，包括朋友。所以谁读了都会产生淋漓尽致的生理、心理双重快感。马松的直觉不会错，即使没有任何人的评价，这种系列采访也会拥有相当可观的市场，因为在其"刀刀见肉"的本能化叙述的背后，有一种被这个时代的先锋作家忘却已久的催人泪下的悲悯。我不能说它很对我这类知识分子的胃口，可它的确是近年来中国人写的少有的奇书，说它是新闻史上不曾有过的采访也不为过，因为它最有价值的恰恰在于"反新闻性"——利用新闻体裁讲述亘古不变的人生经历。

让人上瘾的巫术力量！你可以拒绝接受，但不能否定它的存在。面对底层的某种悲剧，你却忍不住要笑——可这道德吗？符合知识分子的身份吗？无法评判。

我不能用好坏善恶，而只能用"真实"来概括这本书。它远离知识分子阶层，却是我们这个急功近利时代海底的最真实东西。它与新闻操作无缘，倒 接近于某种"精神审讯"。你是底层中的一员。因此你把这种私下的审讯推向了普通，使之产生了一种涵盖社会的意义。

其实，从 80 年代中期，《死城》之后，你都有意无意地在这样做，你涉猎过的诗歌、小说、自传、随笔、采访及其它对抗意识形态的体裁中，都贯穿着一条线，在被自己所唾弃的现实之上，重造

一个自生自灭的精神江湖，在这个可以上溯到屈原、荷马、荆轲、老庄的源远流长的江湖中，走动着瞎子、酒鬼、算命者、神医、民间艺人，他们虽然卑贱、自谑、蒙昧、甚至有些可笑，却忠于自己的人生理想，这种“人生理想”往往导向旁门左道，倒是暗合了艺术就是错误的生命哀歌的法则。

你曾不止一次说过：“从古至今，没有一部名著是名牌教授写出来的。”凭着这种在底层人物中逐步学习、修筑炼出来的豪迈，你可以不写诗而成为诗人。你已经不屑于像 80 年代那样，与做大师梦的诗疯子为伍了。在相当漫长的一段时间，世纪末的文坛试图摆脱一批你这样打着沉重烙印的写作者，如同摆脱一系列充满耻辱的往事。似乎从所有的出版物上抹去一些人的名字，我们今天的本土、人文讨论及知识分子“自律”才显得一点也不虚伪。

老威，原谅我这么草草收笔。其实你在写了这么多有份量的东西之后，朋友们的评价已远远不及万一。保持在路上的心态，向前走吧，这个时代的匆匆过客。扛着你的箫，去更多的地方，会更多的人，但愿你永远用脚而不是用脑子想问题！脚的回忆令人眷恋，因为它总是与越来越宽广的天空、大地相连，与生根、发芽、繁衍相连，就像这本“底层访谈”。我不知道“老威”还要采访多少人物，但我希望它不会就此完结。它应该是一部由多卷组成的永远读不完的亦正亦邪的人生大书，对于外国人，它或许只是一部了解中国历史、社会的另一面的资料集，但对于我们，它就是与我们血肉相凝的另一种不该忘却的事实。

你的朋友　唐晓渡

1999 年 4 月 21 日

33　被抄家者廖亦武

采访缘起：这是一篇自访。

我原以为借用谈话的体裁会使千头万绪的记忆得到梳理，可没想到，仍然遗漏了许多东西，例如 1968 年的一个冬夜，我妈妈曾被查户口的街道民兵当作逃亡地主带走，还顺便抄了家。当时我们在成都没有落脚之地，只好暂时租借九眼桥外红瓦寺的一处熟人房屋，仅九平方米。

旧事重提有何意义呢？在时间的长河里，不同朝代都有挨刀的人，出血了，越淌越淡，你能辨别出血与血的差别么？刀从伤口里抽出来，你能辨别十年前和十年后的凶手面孔么？

混淆了，生锈了，在此之上，新一轮的国家强暴理所当然地拉开幕布……

老威：最近又被抄家了？

廖亦武：12 月 18 日早晨六点多钟，天还漆黑一团，我刚入睡两个多小时吧，电话铃突然响了，并且不间歇地响了四、五分钟，接着，擂门声大作。宋玉惊得一弹而起，而我也相随着边提裤子边出卧室——这很像某部恐怖片里的镜头，电话铃和擂门声交织着，而室内主角如无头苍蝇乱转。

老威：你老婆没吓着？

廖亦武：她还算镇定。跟着我这种人，就得习惯和警察打交道。《古拉格群岛》的开篇，描述了若干捕人的场景。推而广之，宋玉见识过其中几种：例如回门婚宴之前，新郎眨眼间蒸发掉，只剩强装欢颜的新娘款待满座宾客；例如我明明与朋友相约烫火锅去了，却整夜不归；还有不胜枚举的神秘失踪……她唯一能做的就是给相关友人打电话探询丈夫下落，然后等待。所以，这次她很快恢复平静，对镜梳妆，准备上班。直到屋里站满了便衣警察，她方正面从带队的科长手里要过《传唤证》和《搜查令》，仔细验收，还笑眯

眯地说：

“《搜查令》也应该一式两份吧？”科长答：“就一份。”她质疑说：“咋会呢？商场买东西的凭条都一式两份，出了问题我好找你。”科长声色俱厉地说：“搜查不是逛商场，扣押的所有物证，我们都会依法给清单。”宋玉还要犟嘴，我急忙拦住，让她快去上班。临出门，她还把两颗感冒药放在桌上，叮嘱我别忘了吃。警察对她的评语是：“小小年纪这么厉害！”

下午 5 点多钟，由于没弄到他们需要的证据，我被释放了。宋玉说，她作为家属准备在明早去《传唤证》标明的“抚琴派出所”依法要人。稍后几天，我们多次探讨平常无暇涉及的大问题，如“这辈子咋办”？如康正果、刘晓波、王力雄等朋友有理想有抱负有知识品位，而我只是个啥都谈不上的饮食菩萨，等等。我竭力狡赖，于是，曾当过学生干部的我家主妇站在床前宣布了她深思熟虑的结论：“你这种人根本不适合结婚。”

老威：你居然笑得出来。

廖亦武：生存如此艰辛，再不笑口常开，苦瓜的命就注定了。哪怕笑容只是面具，也要时时挂脸上。小时候，你我围观过多起死囚五花大绑，游街示众的群众场面，过一阵，啥都忘了，可某个刀下鬼的当众粲然一笑往往会留下来，并长期成为街头巷尾小民的谈资。所以，抄就抄吧，八个便衣，分两批闯进来，又能怎样，我还得笑。电脑被抱走，里面存有几百万字的文稿，而我心里想，他妈的，不管情不情愿，我都是中国唯一的专门为警察而写作的文人，在一次次抄家中，他们拥有了 80 年代至今的我的所有作品，包括情书、便条、获奖证书、老照片，甚至有从便纸篓里翻出的臭哄哄的废稿。这一回，他们又荣幸地成为小说《活下去》第三次修改稿的首批读者，并且破译了《底层》和《冤案》的艰苦的成稿过程，重温了《死城》《安魂》《屠杀》和《古拉格情歌》，还能系统地研读相关的评论和新闻。

在这 60 多平方米的空间里，搜查有条不紊地进行了 3 个多小时，阳台、客厅、书房、卧室及不少卫生死角，都细细地梳理过了。

有两个小伙子呆在书房迟迟不露面，我心怀鬼胎地赶去充任书架向导："这是我姐姐，88 年死于车祸。"我客气地介绍完毕，就从他们手里抽回像框和其它照片。"我们不会要，"小伙子温柔地解释，并且补充一句："其实你姐姐非常漂亮。"

我趁势重点介绍照片、字画、洞箫及部分名著，有意无意地干扰便衣的视线，但明察秋毫的眼睛依旧相中了境外印刷精美的非法杂志《倾向》全套，共九本，《今天》一本，若干徐文立、魏京生、刘宾雁以及中国民主党的文字资料。黄翔的书拿起来翻了翻，又放下了；那份《告全国同胞书》，他们不知从哪个抽屉里找到的，日子一久，我就忘掉了来源，"寄来的？"他们激动地问，"信封在哪儿？"

我多年以来，就丧失了收藏信封的兴趣，所以感到对不住人民政府。我只好用不断的赞美来变相表达由衷的歉疚，我说时代变了，警察同志也一改几年前凶神恶煞的传统造型，变得平易、细致而有耐心，这从抄家中能看出来；我主动把大叠的违禁资料往虎口里送，盼望能从牙缝里剩些零星；当他们提出把满地狼籍替我收拾一下时，我连说"谢谢"，其实是担心再翻出什么来。我甚至厚颜无耻地吹捧：警察比我这种害人虫更适合成家，如果同志们把工作中的体贴入微用在家庭，天底下没有女人不为之倾倒。

警察大概被我感动了，出门前还叮嘱我锁好房门，警防小偷。我点点头，并且建议：我这种不爱国不爱家还总是制造麻烦的野狗最好是放出去咬外国人。

一伙好汉浩浩荡荡地下七楼，上了三辆警车，小区里所有的目光都注视着这儿。好在这年头，刑事案件太多，人们不会大惊小怪。进派出所后，警察就兵分两路，审人脑和电脑，结果电脑比人脑的问题大，各方面的专家要会诊、定罪。目前，我暂时是《中国冤案》网上连载和系列政治签名的嫌疑人，至于到底有多少网站转我的文章或"签名"，我一个网络盲哪里晓得？

老威：你刚才说时代变了，抄家的传统手法也有所变化是吗？

廖亦武：说来话就长了，古籍上记载的多如牛毛的"查抄家产"

的案例不用提，近代不用提，单就说“新社会”这几十年，在大小数百次的政治运动中，我国百分之八十的家庭恐怕都被抄过。巴金先生曾公开倡议建立“文革博物馆”，我以为范围过于狭窄，有那么一天，这块土地上会耸起一座政治运动博物馆，而文革只是它的一个分馆；人们还将树起一座“思想犯罪纪念碑”，以取代目前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

在诞生于未来的新的纪念碑上，将镌刻几千万个思想罪犯的名字，每个名字都用一滴水晶之泪包裹，远远望去，那不是一座碑，而是一匹用永恒泪珠堆垒起来的寒光闪射的山丘。但愿廖亦武的名字也在其中，你找不着没关系，他已融化在那段历史中了。

我还认定，在几十年后的政治运动博物馆里，抄家、监禁、批斗都该列为单独的学科，至少要有专门的课题，例如“抄家学”——如此浩若烟海的工程，其资料的收集、整理、分类、鉴别和研究，就将动用上千名教授及勤杂人员，其学术规模不会亚于北大。

老威：你这是由专制机器压榨出来的诗人想象，落不到实处。因为以此类推，中国将来会凭空竖起各种名目的博物馆和纪念碑，如“土改纪念碑”，“三反五反纪念碑”，“胡风案纪念碑”，反右、四清、大跃进、大饥荒纪念碑，更少不了文革、四五、自由化或六四纪念碑，你目前在搞民间冤案，是否也要弄个中国底层或冤案纪念碑？当然，法轮功、民主党、藏独、疆独，碑馆都不能缺。总之，欠一笔帐立一座碑，我党目前已一屁股烂帐，那要立多少碑？我们的子孙后代在碑林中还活不活？

廖亦武：你比我还有想象力，可惜，好了伤疤忘了痛是人的本能，你看我，被搜了没两天，案还没了结，却已经嬉皮笑脸与你站在这儿了。人们讨厌述苦，同样的苦水多倒几遍，人家心里就暗暗骂你是“祥林嫂”，老讲阿毛被狼吃了的故事。我家三代都被抄过家，我爷爷是个老地主，留给我的深刻印象就是吝啬。花生藏在柜里七、八年，都叫虫蛀成空壳了，还舍不得吃。一套衣裤，从夏天穿到冬天，极少见他换下来洗过。小时候，我在那颓败的地主院子住了两天，身上痒得厉害，想换衣服，却没有肥皂。最后是堂姐从

树上打了几片皂角替代。

爷爷从不坐车，80 多岁，还走几十里山路到父亲的乡村中学来，遇上太阳天，他就边走边牵开大裤裆捉拿虱子，一不留心，裤子就掉下脚背。我实在想不通，世上有如此艰苦朴素的地主。爸爸说，50 年土改，爷爷这倒霉蛋刚累死累活地挣够了 40 亩田产，上了政策线，就被工作组和乡亲们一致推选为地主。而同根同脉的三爷因抽鸦片败光了家产，却光荣地成为贫农。还领着大群人查抄了哥哥的家。

两头耕牛，五头大肥猪，几十只鸡鸭都充公，并重新分配给穷人；几口粮柜全敞开，平日舍不得吃的大米、白面舀空了；跟着，陈谷子、麦种、苞谷、豌豆统统装口袋扛走，两千多斤窖藏红苕也刨了出来。那天，李家坪的穷人像过节，密密麻麻地在爷爷家里进进出出，想拿啥就拿啥。开头，工作组长还捏着笔记本登记抄走的东西，后来，人太多太乱，就登记不过来了。

到了晚上，上百号人只有一两盏马灯，阴影中，连锅碗瓢盆都失踪了。当然，政策过场要走，在大家掘地三尺，挖出一盒金银首饰和两匹阴丹兰布时，工作组长就当众宣布没收。奶奶因窝藏这些东西，被游乡批斗。她的几个堂侄辈还用麻绳捆了她。

80 年代末，我随父回了趟老家，在祖坟前拍了照。爷爷刚去世，而奶奶 20 多年前死于饥荒。据说当时饿得摇摇晃晃的人们仍不忘阶级斗争，涌进老地主家搜粮食，灶前当柴禾的玉米芯子被捡了起来，一把一把搓碎填嘴里；连泡菜坛子也倒空，没菜，就把咸水你一勺我一勺地喝了。

奶奶死前爬到堂屋门前，坐在门坎上，一个劲地掉泪。田分了，这座祖辈留下的院子又搬进来了五户人。占了东西南北十几间屋，只把东南角的耳房留给爷爷奶奶。爸爸说，土改时他正在县城教书，老家有人带信来说“出事了”，他压根就没敢回去看看，他怕人告状，与剥削阶级家庭划不清界限。

风头过了，爸爸才悄悄回了趟李家坪，给爷爷一些钱，让他们度过难关。被抄家之后，昔日的地主家空荡荡的，连桌椅都没一张

完整的。

地契烧了，《土地证》重新颁发，妈妈当时刚生了姐姐飞飞，在风雨飘摇之中，作为国民党将军的四舅又逃到这儿，找到了妈妈。我不明白这一切如何收的场，只知道妈妈从此十分痛恨爸爸的故乡——盐亭，他们俩吵了一辈子，每一次，妈妈的开场白总是："狗日的盐亭乡巴佬，害了我一辈子。"

1999 年，我结婚没多久，四舅因脑溢血去世，整理遗物时，我意外地发现后来改嫁的四舅母陈挽礼于 1980 年 4 月 9 日写给他的信，称："50 年 5 月前后，新都派出所侯所长和一位姓杜的干部派人从我这里取走金壳手表一只，黄金四两，这几样东西系你送我的，表是在重庆用 100 块银元买的。

"取走以上物品的事，当时在新都派出所的干部中都可能知道。时日长远，也没有什么证明，好在你的事在新都派出所是立案的，我想不难追查吧。我仅提供以上情况，可以为你作证。"

老威：你四舅的家也被抄过了？

廖亦武：以他的身份，被抄家是必然的，但抄去的东西看来并没入库，而是落入私人腰包。30 年后，四舅母仍愿出面为作为释放战犯的四舅作证，可见对查抄家产的印象已深入骨髓。现在，我家老一辈子中，只剩下妈妈，我曾好多次提起早年抄家的话题，她都不搭理。

老威：一笔令人颤栗的糊涂账。

廖亦武：廖家幸好出了我这么个文人，能够在文字中捕捉些蛛丝马迹。到了文革，我七、八岁，就能记住事了。文革是精神革命，蔑视财产，所以查抄的主要对象，除了臭老九，就是古今中外的书。我爸爸被抄家是因为他教书教得太好，特别是讲授刘邓路线的第三号人物陶铸的名篇《松树的风格》，堪称一绝。于是，他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和黑帮份子，挨批斗，天天写认罪材料。爸爸当时月薪 50 多元，要养 4 个孩子，所以没任何积蓄，红卫兵抄家时，的确比解放初期的穷人和警察都廉洁，他们把家里搅了个底朝天，却只将爸爸的书本成筐成筐地朝外抬，其中包括大量教案和备课本。他

们在学校操场上，集中销毁封、资、修，一把火烧了近一个小时。接着，趁热打铁召开批判大会，爸爸被揪上台，与校长、主任和其它牛鬼蛇神一道，挂黑牌，弯腰九十度。而我一个瘦骨伶仃的孩子，木木地站在家门口，边吃指头边看几个红卫兵在墙上刷“打倒×××”的巨幅标语。

老威：类似的抄家在文革中相当普遍，毛泽东和鲁迅之外的东西，大约有90%属于禁书。在你编的《沉沦的圣殿》里，叙述了残疾收藏家赵一凡被逮捕并抄家的经过：“1975年1月28日，大批公安人员突然包围了赵家，并从‘罪犯’家中搜出大批‘文学罪证’，据若干当事者证明，这批‘罪证’内容庞杂，卷轶浩繁。包括解放前后的多种报刊；历次政治运动的学习资料；文革大字报、标语、红卫兵战报、演讲稿及各类文献；思想、文学通信；内部发行的黄皮书、灰皮书和白皮书；作为地下读物流传的政治小道消息、手抄本小说和诗歌……

其数量之巨，时间跨度之长，涉及领域之广，为世所罕见。

“目击者称，警察忙碌了一夜，才用三辆130型国产货车将那堆积如山的‘社会资料库’满载，然后远去。”

廖亦武：在这一厚本挖掘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人的书中，最令我心动的却是不写诗的赵一凡，他是近百年来，中国最杰出的收藏家，在那种政治高压下，一个残疾人，一点一滴搜集了那么多地下读物，他死之后，这一脉单传的香火就断了，没人再继续默默搜集这个时代的地下文化史料。可惜，这本书仍有缺憾，第一，最后一校没来得及，错别字多；第二，一些当事人的采访没有做。

1998年9月8日，十几名警车突袭了我在北京的暂住地，抄家之后，将我带到西城公安分局审问了一夜，并勒令我次日离京。

蒙赵一凡在天之灵保佑，我事先有预感，转移了编书的大量资料和采访录音，因此除了几本违禁书籍，几乎没受损失。我与赵一凡的罪名都是反革命，区别是他“传播禁书”，我“传播反动录音带”；他参加莫须有的反动组织“第四国际”，我拼凑了“《安魂》剧组”。

老威：还是回到你自己经历的抄家吧，否则几天几夜都谈不出结果。

廖亦武：其实在 89 之前，四川许多地下诗人的家都被抄过，那时地下诗刊发行渠道畅通，影响很广，因此，公安机关专门建立了地下诗人档案，象周伦右、石光华、万夏、宋炜等均列其中。87 年我在涪陵地区艺术馆当创作员，曾采用偷梁换柱的方式，把馆办刊物《巴国文风》弄成《巴蜀现代诗群》。我忙碌了两个月，天天跑印刷厂，亲自动手捡铅字、搬字盘，可在刊物出笼的当天，几十名警察突袭印刷厂。当时我正在二楼喜孜孜地审阅样书、监督装订，楼下警报呜呜响开了。眼看无路可逃，我急中生智，抓起一本还没装订的诗刊，推开窗就跳楼。幸好楼下是条土巷，我摔得浑身稀泥，却没受伤。我没命地狂奔，到了码头，才回头侦察有无追兵。

我乘船转车，一路颠簸逃到重庆北碚周忠陵家，他是当地打字作坊的老板，所以很轻松地把唯一的母本复印装订了几十套，快速分寄全国各地诗码头，内夹我十万火急的亲笔鸡毛信。结果，每位得到子本的黑道诗友均如获至宝，满怀悲壮地再掏腰包复印——于是更多的“孙子本”投寄出去，并呈几何数字无休无止地增长、传播，直到字迹模糊，众多诗歌高热份子仍不肯罢手。

我传奇英雄一般在外混吃混喝几个月，回到单位时，政治风向已转。但得知：

印刷厂于案发日被公安局踩平，厂长下课，两千本诗刊被拉回文化局，永远封存。我家也象征性地搜过，前妻说：领头的警官爱诗写诗，正暗地追我的星，因此带几个新警察入门在几间屋晃悠了一圈，就回去交差。

老威：虽然你的跳楼动作生猛，但只是虚惊一场，不算抄家吧。

廖亦武：我讲的这一段，跟我后来的东窗事发有直接关系，因为《大屠杀》写作和朗诵的现场证人，我的加拿大同案犯戴迈河正是偶然在刘晓波家里得到那本孙子代复印诗刊，才给我写信，并且千里迢迢找上门来的。此后两年，他经常在我家免费吃住，直到六四凌晨，我用他的录音机配乐，进行了声泪俱下的“犯罪”。

《大屠杀》的母带有两盘，我和他各一盘，分别在不同的地域传播着。90 年 3 月，我和一批同行拍摄了它的姐妹篇《安魂》，我是主演和原著者，16 日，国家安全部门袭击了我们，整个《安魂》剧组全军覆灭。

至此我方见识到无产阶级专政的真正威力，长达十几年的诗歌梦转眼破产。上午十点多钟，我背着《大屠杀》《安魂》等罪证，从重庆沙坪坝搭公共汽车至牛角沱，正要横穿马路，转车去火车站，却听见有人叫“廖亦武”。我本能地回头张望，却见一群穿军用雨衣的人从四面八方扑过来。

背包拿走了，我被反剪双臂上铐，然后塞进警车后座，一个特务在旁边咬牙切齿地揩鼻血，我下意识的挥拳击中了他。“你敢反抗！”他咆哮了几声，就抓住我的背铐狠捏，直到带齿的钢圈箍入我的肉里。前排副驾坐着个胖子，正用步话机喊道：“一号落网，押往松山。”

接下来的场景我在记实作品《证词》里写过，这一回，所有同案犯的家都被抄了。摄像曾磊是上尉军官，上过老山前线，时为三军医大电教中心的负责人。

16 号凌晨，他与导演万夏共同剪辑完成《安魂》，并让我审看了一遍，确定再无修改，方定稿，分配母带，熄灯睡觉。

象工兵探雷，几十名警察将电教中心和曾磊宿舍来回地筛。据说，临上车前，曾磊和万夏都用带铐的双手捧着一摞录相带和书，任摄影特务拍“犯罪照”。

两人目光呆滞，嘴角还有几星牙膏沫子。罪证装了满满一面包车，曾磊所有的摄像作品、资料带、书刊、信件、照片、化装油彩、服装道具在其中。

刘太亨、万夏、周忠陵、巴铁、苟明军、李亚伟、石光华等 20 余人分散在四川各地的家都先后被抄，无以数计的文学艺术类私人物品都充公，进了罪犯档案。周忠陵家藏书丰富，警察把两米多高的大书柜稀里哗啦掏空，搜查时就在几尺厚的书籍上踩来踩去。诗评家巴铁损失了多年搜集的所有先锋诗歌资料、笔记、书刊和文

人通信，在关押两年出狱后，遂心灰意冷，逃离了自己钟情了半辈子的文字。

我家和岳父母家都光顾过了。三天之内，我在地区艺术馆内的住宅被搜了三次，磁带、像册、阿霞日记、钢笔画、书籍、录音机、手稿均统统搬走，衣柜、书柜、沙发、床、桌子全被掀翻，用铁棍捅出窟窿。阿霞当时已身孕三个月，却被带走，关押在公安局看守所里达 40 多天，日日提讯，逼她揭发自己的丈夫。保释回家之际，她患上较严重的肺病，再也无法在家里呆下去。因为据邻居讲，毛贼已经翻墙入室多次，把警察挑剩的东西都卷走了——首饰、衣物、各种摆设与电器等等。穿衣镜和床砸得稀烂，还在卧室拉了一泡屎——这大概是贼嫌在我家收入不丰，泄愤所致。

老威：真是世态炎凉，你家邻居也不起来喊抓贼？

廖亦武：白天警察进进出出，晚上家中仍灯火通明，邻居们还以为有人在继续执行公务。阿霞吓坏了——这埋下了日后婚姻破裂的种子。四年后，我刑满开释，企图重操文字旧业，而阿霞一见我摸出小说草稿就惊悚不已，我试图解释几句，她竟双手抱住头，歇斯底里地尖叫起来。

老威：当年抄家时进行了登记么？有《扣押物品清单》么？

廖亦武：阿霞没提，并且说永远不要提起这事。出狱后不久我们就离婚了。刘太亨也离婚了。他出狱当天就急于破镜重圆，结果被他老婆严辞拒绝。

老威：你到底损失了多少东西？

廖亦武：也是一笔无头帐。我随身携带着 80 年代的全部手稿，多种录音录相带，袖珍录音机，相册，地下诗集，还有 1400 多元人民币，都没收了；接着押至歌乐山中的松山收审所，这是离白公馆不远的老牌囚笼，一进去，五个如狼似虎的劳改犯人就扑上来，把我浑身剥得精光。阳历三月的阴雨天，我妓女般赤条条地站在二楼过道里，双手捂着胯间，达好几分钟。而众犯熟练地又抖又捏，将兜里缝里所有的异物搜尽，并抽去腰带，用老虎钳夹掉金属衣扣和裤裆拉链。

接下来，我被众犯踩在地上剃光头。然后受命翘起臀部，为首的犯人用一支竹筷捅进去掏我的屁眼，还装模作样用手电照了照，确定没藏违禁品。

说实话，当时我的泪水都出来了，诗人的尊严被彻底摧毁。当我麻木地罩上衣裤，被锁进监舍时，我已经和里面多个刑事犯没啥区别：塌肩缩头，破鞋套赤脚，倒吸冷气，两手提着无法固定的裤腰。我想自己完蛋了，无可救药了。

老威：毕竟活了下来。

廖亦武：是啊，有时从梦中醒来，自己都感到奇怪，我居然还有脸活着！坐牢四年，查监、搜身是家常便饭，被侵犯的次数多了，就像妓女看待嫖客一样，认为人民警察的一切变态要求都挺正常，都属执法的一部分。终于熬到出狱，家破人亡，只能用一根箫挑一个空包回成都，与父母相依为命。但作为打上了烙印的政治犯，只要在国内一天，就无法摆脱传唤和抄家。95 年 6 月，因卷入刘晓波牵头的为六四讨说法的 56 人签名，被关押了 5 天，查抄了我在父母家的几平方的窝；95 年 10 月，因企图传递狱中政治犯致国际大赦的呼吁书，被拘留一天，监视居住 24 天，小说《活下去》的几十万字原稿，《底层》的原始资料以及大量书籍、信件被搜走；97 年 6 月，因创办民刊《知识分子》，被拘传留置一夜，抄家前，有不明身份的人通风报信，我的所有文字被老父亲转移，致使警察无功而返；98 年 9 月，因主编《沉沦的圣殿》，从事了“非法采访”，我在北京的暂住地被抄，次日，我被迫离京；99 年 2 月，因从事《底层访谈录》的资料搜集，惊动国安当局，我在回门婚宴举行的前两小时落入法网，与一位摘除了右肾的江油当地诗人一起，被羁押突审了 24 小时，随身携带的《底层》原始稿件 40 余篇和通讯录等被扣。

在若干回抄家和搜查事件中，我觉得社会还是在进步，警察的语言和动作一次比一次文明。其实我晓得，在一个思想犯罪的国家里，一个作家，如果天良未泯，如果试图表达更大范围的真实，那么，写作本身就是制造罪证。我的罪证已经多达几百万字，四川的

几代警察都研读过它们。

迄今为止，除了 12 封私人信件，警察没有退给我任何东西。当大群赳赳武夫闯进门，以法律的名义制服你，并把你的私人空间当作免费超级市场，随意乱钻乱翻，挑挑捡捡时，你唯一能做的，就是要求较完整的司法程序，开列扣押清单必须详细，虽然带走的一切几乎回不来了。

老威：哪清单有何价值？

廖亦武：作为物证留下，提醒自己，将来也提醒别人。另外，我喜欢在警察上门时向他们提要求，以取得一种语气上的优势。90 年入狱，那个叫“廖亦武”的诗人已经死了，现在，只剩一个证人站在这里，你搜查我，剥光我，掏我的屁眼，都没关系，我比你们任何警察都有脸面，因为我写着，记录着，反过去搜查着那些肮脏畸形的灵魂。如果有一天，我被剥夺得没法写了，我就吹箫、卖艺，直着嗓门哭和吼。从我的声音里，人们能听出对这个可耻时代的记录、诅咒和全部愤怒。当然，也包含孤独、自恋和忘我的爱——这是我活下去的最好的借口。

34　三陪林小姐

采访缘起：林小姐脸色苍白，不是做三陪的料，更为犯忌的是，她与我这个夜总会的不速之客在外面有了联络，并把这种危险的浪漫维持了相当长的时间。

我一个知识分子比她更像妓女，她还有纯情的梦，而我什么梦也没有，什么都能消化掉。1999 年 10 月 7 日傍晚的这堂道德课，是由一个三陪小姐给我上的。人人都渴望一种平等而正常的交流，这容易么？很容易，可几乎忘记了。久而久之，我们就失去了嘴巴，失去了说出内心想法的冲动。

老威：我没想到你真打传呼了。那晚上从夜总会出来，脑壳昏沉沉的，朋友们都笑我浪费资源，只动嘴不动手。

林小姐：你的那帮朋友，哼，别提了。不过，我的确第一次给客人留真传呼。这是犯忌的，感到奇怪么？

老威：不奇怪，我们彼此有好感。

林小姐：一见钟情？还不至于。一个月前，客人中有个算命的，是和尚，据说还是五台山下来的长老，西装领带眼镜手机配齐了，很有学问。他给在场的十个小姐都看相，轮到我，就看得特别仔细。脑袋和手臂捏遍了，还要我脱袜子，鼻子抵拢嗅我脚板心。连称“怪哉”。他说我从头到脚都是大富大贵的像，咋会沦落风尘呢？必是过路的，这行道的饭吃不久。开始我不太相信，以为是这花和尚变着戏法玩，后来他扯着我的两只耳朵，连称“佛耳”。

老威：扯蛋。和尚逛夜总会本来就够荒诞了，还算命？真是扯蛋加离奇。

林小姐：管他和尚、道士、给钱我们就接待，都是男人嘛。不过，他凑着我的耳根子说，我胸口有颗痣，必须拔掉，否则这颗娘胎里带来的钉子会钉死我。我听得肉都麻了。

老威：你胸口真有痣？

林小姐：不信你摸摸。

老威：不用了。

林小姐：和尚说，你会点化我，所以你摸一下不要紧。

老威：我的朋友中好像没有出家的。

林小姐：他形容了你的外貌，说你是“世俗中有佛性的人”。果然，你给我回了传呼，并且约我到家中做客，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客人干这种犯忌的傻事。你就不怕我打骚扰电话？

老威：邀朋友到家做客本来极其平常，你为啥要打骚扰电话？难道在行业之外，你就不需要别人相信你，把你当人么？

林小姐：你是个书呆子，简直是外星人，在这个人人都抢饭吃的骗子社会，你是咋个活的？哦，我晓得，你肯定有家庭背景，父母是当官的，你捅一个关系，把我跳出这个行道，到大公司工作好么？我答应做你的情人，和尚说这命好，谁娶我都会鸿运当头。现在流行婚外恋，情人比老婆也差不了多少。

老威：我的生活太简单，写书、吹牛，承担一定的家务劳动。我的父母都是退休教师，没任何背景。我喜欢你的坦率，像你这么有灵气的女孩子，是不愁找不到正当职业的，把你的简历告诉我。

林小姐：我是重庆石桥铺人，1979 年 6 月 16 号生，这是阴历，推八字方便。我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大一些。我读完初中就出来了，先做传呼小姐，一天嘴巴不停地叭叭，一个月才挣七百多块。我反应快，普通话漂亮，可天生贫血。你握我的手，像不像块冰？我一年四季都这样。我坚持干了一年，就撑不住了。还受了刺激。有一次，我传错了一个号，客户打电话进来破口大骂，婊子婊子的，我把电话掐断了，他又打进来打台长，要赔损失。我被扣了工资，那时我才 16 岁多，哭了几个小时也没人劝我半句。从传呼台出来，就跟着男朋友到酒店打工，第一天端盘子就砸了。当时已经 12 点过，可包间的醉酒汉还没离开的意思，我跑前跑后地照料，弦绷得很紧。最后，他们要了一个酸辣汤，我松了口气，总算要结束了，却不料一个大胖子站起来。厚着脸皮粘上我，那几层猪下巴几乎搁在我的肩膀上，我用倒肘撑住他，他哇地喷出来，幸好我闪得快。

这人整个就是大茅坑，可我还必须陪笑，做出关心的样子。这拨人不是好东西，贼溜溜的，耗几个小时，老是有意无意地揩油，说些挑逗的髒话。我的腰和大腿被揪青了几块，也不敢吭声。熬呀熬呀，眼看要送瘟神了，可当我端汤上桌时，一隻髒手竟偷偷摸了我屁股！一慌乱，汤泼了那狗日的一身。这下祸闯大了，一伙人大吵大嚷不买单，要我赔他上万元一件的名牌西装。酒店上至经理，下至厨师和小工来赔罪，并承诺他留下地扯，干洗了送上门。并赔偿必要的损失。那人不依，要我下跪一点点地擦，直到他满意为止。我的泪水一串串朝下坠，明明被流氓欺负了，可谁为我作主？连自己的男友都是缩头乌龟。我在汤汤水水的髒地上跪了一个多小时。浑身发抖，那流氓指裤裆要我擦，我拒绝，他就抓住我的手往那儿碰，周围又是口哨又是鼓掌，十几张丑恶的嘴脸快要把我埋了。我从来没听过那么多的髒话。就爬起来跑，可又被逮住按跪下，搞了几次，我气得咬了他一口，才跑脱。我在街上迷迷糊糊走到天亮真不想活了。但死了又不甘心，我刚 17 岁，为啥没有人疼我？男朋友不疼，父母也不疼。后来，酒店经理还派黑道杀手来找我。要我还钱，因为我把他的长期的熟客得罪了。幸好那杀手见我躺在床上发高烧，就动了恻隐之心。他给我一笔钱，望着我叹息说："这张脸蛋的确人见人爱，你这样的女孩，漂泊在异乡，如果没有可靠的男人保护你，今后的问题还多。干脆，你进夜总会吧，我牵线，找一个经常有大款出入的地方。你要利用自己的无形资产赚钱，免得被人白占便宜。"

我说我不出卖肉体，他说三陪不一定要卖身，你坐素台，陪那些无聊款爷喝酒、吹牛，唱歌，逢场作戏，一晚上至少能挣 200 元小费。况且妈咪和我都会保护你，没人敢强迫你出台。我已走投无路，就和青梅竹马的男友正式拜拜。去美领馆附近的一家夜总会上班。里面较固定也有几十个小姐，互相之间从不问底细，从不交朋友。我坚持坐了大半年素台，由于出台的人太多，我显得很孤立。

后来就遇上了你的那些书商朋友，妈咪悄悄鼓励我跟出去玩。她说这泼人过去是作家，知书识礼，不会出意外。的确，他们出手大方，从不强迫人。他们好酒如命，夜总会出来，人都飘了，还找

馆子喝。有时，一个馆子一个馆子地挨着喝。直到把通宵营业的地方喝个遍。太累人了，最后我只有泥菩萨一样坐着连眼睛也睁不开了。当时心里烦，过后一回味，还挺好笑的。特别是那姓马的，撒钱找罪受，经常醉在大街上，几个人拉不起来。有一回大家实在没办法，有人就掏出手机，冲着地上的死猪拨号。姓马的还有知觉呢，他扯出手机喂了一声，听说“马儿，起来发货，广州要十件”就立刻坐起来回答：“你是哪位！”把大家嘴都笑歪了。

老威：你就一直坐素台么？

林小姐：还没确定关系，你就吃醋啦？

老威：我担心你没法混下去。

林小姐：我不是好好地在你跟前么？

老威：你的确不适合做这行，我不晓得什么适合你。唉，你受的教育太少了，而环境好的正派公司一般都要求文化程度。

林小姐：我花钱买了一个大专文凭，骗那些附庸风雅的客人。你认为我是大学生就行。现在的社会，没几样是真实的。

老威：我总不能骗朋友吧？

林小姐：善良的欺骗嘛。

老威：这个，我说不过你。喂，你做过生意没有？或许，我能介绍些关系。

林小姐：我做小姐存了些钱，就在西延线二环路以外租了个铺面，做化妆品。累了一夜，白天还得早起，上美容美发店推销。现在搞推销的太多，我这模样，又显得可怜巴巴，容易引起人的误会。所以生意越做越不没信心。没奔头，就要赔钱。我正准备退些货，把铺面转租掉。

老威：我有朋友在一家大医药公司，我介绍你去咋样？先做医院代表，然后是小区主管、片区经理，一级一级朝上做，据说收入很可观。

林小姐：又搞推销？我都厌恶了。我的一个姐妹就搞药品，跑医院，同医生、院长、药剂师勾兑，竞争太激烈了，治任何病的药

都有好几十种。没关系人家凭啥在处方上开你的药？年轻女孩去同有家室的成年人勾兑，不就和夜总会卖笑差不多。更可怕是，一个秃头老色鬼与你单独约见，为了饭碗，你又不能不去。我的姐妹销了两年药，挣了些钱，但已伤痕累累，莫名其妙地打了两次胎。如今，她只有沿着这条道路下去，唉，明明是近视眼，可偏偏对着镜子练抛媚眼，何苦啊。你呀，还当作家，啥都不懂，从早到晚盲目乐观，说不定哪天被我这小女孩牵去卖到非洲做黑人黑户，你还掉过头帮助数钱。

老威：那我就无能为力了。

林小姐：和尚说，你能给我带来好运。你这么高深的作家，能把我当人看，听我诉苦，并且不使坏，我已非常感激。我想做你的情人，逗你笑，而不是难过。如果你有那么大的能耐，叫我不要去夜总会了，我马上就不会去。也许我又撒谎了，我晓得，你喜欢听这种谎话。这间屋让我很矛盾，可能一出门就好了，阳光灿烂，我会在马路上哼着歌。世道太乱，我已在成都生活了四年，想一想，还是有点自豪。当小姐也没啥，既然世界上只有男女，异性相吸，当小姐挣钱还要直接些。相对一个人四处碰壁，小姐安全得多，至少一切都发生在明处，夜总会有妈咪，有大量保安人员，混账一点的客人也不敢过分乱来。唉，老天爷，如果我是风尘路上的命，我认了，如果有段缘分等着，我就烧三柱香。

老威：你一直没出过台？

林小姐：到你这儿来，也叫出台，但我不会收你一分钱。好笑，我咋这样说话？给我烟，我已累了，我躺在沙发上，你不会介意吧？我入道一年多才出的台，你信不信？是个新手。他们带着我，在宾馆开了房。那些奇怪的人，进门就与我侃文学，问我懂不懂巴尔扎克。我当然不懂，就脱光了在床上等他。他焦急地在屋里兜圈子。质问我为啥一下子脱光，没一点情调？我为啥要与他有情调？这是个老妈子型的男人，接吻还叫亲爱的，逗得我扑哧一声笑了。折腾了个把小时，他也没做得成，就换了个高鼻梁的，这是老手，做了一次还要来，我没感觉，就拒绝，他迫不及待地提高价位，加到

800 元，我勉强答应。他正象狼狗在我身上舔来舔去，门啪啪响得格外恐怖。跳起来躲到卫生间，原来不是警察，是第一个客人，抓耳抠腮的猴子样。两个人要我一起上，我没能力挣这钱，就穿衣服准备离开。后来，两人争得打架，新手把老手掐在地下，差点把眼珠子抠爆了。我静静地等着，他们完事付钱。咋样？我是个合格的冷面小姐吧？你们男人都有窥阴癖，我晓得，不讲出最后这一段你不会满足。认清了我的本来面目。就各走各的路。

老威：不做情人了？

林小姐：我不愿意对你讲出台的事儿，你绕着弯子让我讲。你伤害了我。你和其他客人有啥两样？

老威：对不起，小林。你可以拒绝这种问题，可你还是回答了。明年是新世纪，我为你的将来打一卦，但愿一切从头开始吧。

35　反革命分子刘德

采访缘起：刘德这个名字，我最早听狱友李必丰说起，那是1992 年隆冬的某日黄昏，我与老李一块在大墙内兜圈暴走，不料他突然刹步发问："晓得刘德么？"我边摇头边继续赶路，他只好追着我叫道："此人是 1985 届反革命，因为一堂课，判了 7 年刑。"

我当时没在意，因为李必丰有没头没脑、独往独来的艺术家脾性，你若较真，他反而会前言不搭后语——直到 2002 年隆冬的某个夜晚，我再次听诗人雨田提到刘德，内心不由一震，赶紧打探，得到此人仍在绵阳本地做临时工的确切信息。

圣诞节前夕出了点事，我家受到警方突袭，散失了部分冤案资料，但我始终没停止追踪刘德。几经周折，我终于在 2002 年 2 月21 日下午从成都出发去绵阳，约见一位刘德的故交。经四处联络，方在天色黑尽时探明刘德的大致去向。

我们找了辆车，在城郊十几公里的路段来回跑了三趟，终于在一加油站旁边发现一鬼火闪烁的土路。车缓行几百米，在一派凄凉中抵达新华书店储运料仓库的门。叫门，无人应答。我们才注意到在车灯照射中的楹联："祥云普降意欲达；金光高照气如虹。"原来是座无殿无香火的弃庙。

我们继续高一声低一声地叫唤，到底感召了守门人。"刘德？"他将我们上下盯了好一会儿，方接过我朋友的小灵通，给一个双方共同的熟人打电话，得到不是匪类的担保后，就给了我们不确定的指点——跟着，我们就驶入了迷宫中的村庄，并迎着寒风探出头，撕心裂肺地叫"刘德"。犹如一个梦，所有的房屋都相似，脑袋一个接一个从二楼或三楼窗户探出来问："喊啥子？""这儿没刘德。"车再次撤退回来，载上守门人进村。我们停在一个路口，守门人下车，七拐八弯，消失了大约半个钟头。终于有一只手在黑暗中向我们招摇，跟着一个瘦小的身影从墙根蹦出来说："我是刘德，你们跟着我，绕过两根土埂和一个大坑，就到家了。"

老威：刘德先生，总算找到你了。

刘德：这荒郊野地，真有点难为你们了，没跌跤吧。

老威：我们从成都出发，坐了两个多小时的快车，抵绵阳天已快黑了。没顾上吃饭，就赶到新华书店宿舍，在大门收发室，××兄一个个联络与你沾点边的人，小灵通（一种类似手机的区域性通讯工具，因单向收费而备受用户青睐——老威注）都用得烫手了，才打听到你在这离城十几公里地租了间农舍。

刘德：农舍？太雅了。你当我是晋代陶渊明躲在这儿隐居么？

老威：你没电话，没呼机，也没有门牌号码，相当于隐居吧。

刘德：原准备安个电话，想想又算了，白交几十元话费，图个热闹，不好。热闹要惹祸。

老威：这房实在太简陋，还是毛糙的水泥墙面，连钢筋都露在外头。家徒四壁，你空荡荡的朝里一站，倒像个搞建筑的民工。

刘德：我就是民工，不过一般民工都这个地那个地的流动，我这个民工却几十年如一日地钉在新华书店库房里捆书、码书、装书、卸书，月工资 500 元左右，所以租不起城里的房子，只好跑这么远栖身。难啊，老婆是农村户口，一家三口的嘴都栓在我的裤腰带上。

老威：不容易。

刘德：像控诉旧社会的歌里唱的，星星满天就出门，走出一段村子里的黄泥路，去赶进城的头班公共汽车。我是临时工，饭碗没保障，所以不敢迟到。好在干体力活不费脑筋，人一累瘫就不会胡思乱想了。

老威：你一个四川大学的老牌高材生，曾经也算个风云人物吧，就如此安于现状？

刘德：这是命。

老威：那我们今晚就从你的命谈起吧，我已经从其他渠道了解到你的大致情况：出生于四川安岳乡村，1977 年就以优异的成绩考取四川大学中文系，不愧为天之骄子……

刘德：以我当时的成绩，可以上全国任何大学，但我出于乡土

观念，最终选择了川大。77 届，文革结束、恢复高考的首届大学生，多叫人羡慕呀！不仅全国，全世界都为之瞩目。我们中文系，102 位同学，大约 30％为高干子弟，另 60％有家庭背景及知识渊源，只有 6 位同学来自农村，我呢，就是这 6 位中年龄最小的。

老威：不简单。我晓得 77、78、79，连续三届高考的竞争都非常激烈，因 65 年后，由于“教育要革命”，致使高考中断，数以百万计的老三届初、高中生从学校涌入“广阔天地”，摸爬滚打，政治方面早熟了，可青春和学业却被耽误了。

刘德：老三届的特点是年龄偏大，自学能力强，思想活跃并超前，加之教材滞后，经常在课堂上，老师面对那一张张饱经风霜的脸，无所适从，无法照本宣科。因为稍不留意，就会受到诘难，下不了台。这可是积压了十几年的人才呀，当红卫兵，造反，武斗，上山下乡，什么场面没有经历过？要说辩论演说的口才，随便抓一个都比老师强。但是，历史的错位使他们成了学生，在当时，也只有通过考大学，才能在一夜之间鸡犬升天。回忆起来，我对课堂印象不深，激动人心的好时光都在课外，例如参加锦江文学社，写诗、小说和评论。伤痕文学很风行，文学社自筹资金创办的《锦江》文学杂志影响相当大，在校内发行一部份，我们就成群结伙，拿到校外去卖，春熙路、总府街、校门口、锦江宾馆周围都是发行点，一元钱一本，抢购一空，没买着的还不甘心地追着我们问这问那，场面火爆。那时，文学社最有名的才女是徐慧、龚巧明，一诗人，一作家，诗文的共同特点就是伤感，叫人读着读着，眼里不知不觉有点湿润。她们毕业后，都分配到作协，徐慧在《青年作家》编辑部干了一段，不久就出国了；龚巧明一腔热血进藏，写了不少好小说，却死于一次翻车，太可惜了。另外，评论界的名人王岳川，北师大教授，我在中央电视台还看见过，也是我的同班同学。

老威：解冻之后就是文学的繁荣期，毛死后的中国与斯大林死后的苏联有些相似吧，民间的各种压抑已久的情绪都想借文学发泄出来。好了，长话短说，你毕业后就分配到绵阳吗？

刘德：先准备到《四川日报》内江记者站，因名额被会拉关系

的一位同学占了，只好再分配到绵阳地区文教局。84 年，文教分家，我就到文化局所属的《剑南文学》杂志当编辑。现在这份杂志属文联，还在办，不过主要刊登中、小、学生的作品，发行渠道也主要是中小学。

老威：记得 80 年代，我还在《剑南文学》上发表过散文诗。

刘德：文学时代嘛，所有的杂志都火，名家稿子也多。绵阳地区不少作家都是通过《剑南文学》走出去的，赵敏，女诗人；郭同旭，气功大师严新的专职吹捧作家，一本书卖好几十万本；还有雨田，得过两岸很多奖的本地大诗人，过去跟我在同一张桌子编稿。绵阳是省会成都的卫星城，文学青年一浪接一浪，在学校，文学社团更是雨后春笋，密密麻麻地长势喜人。为适应社会，满足广大人民对文学的狂热追求，《剑南文学》的编辑或作家、诗人经常应邀去学校讲课。

老威：多少钱一课时？

刘德：完全免费。那年头在有一点上延续了毛泽东的经济计划时代：蔑视金钱，至少不重视金钱。特别是以普及文学为己任的文化人，一说钱，自己都觉得该煽自己两个嘴巴。我敢说，当时所有的杂志编辑都讲过课，而不像现在，编的编，写的写，分得很清，举手投足都要经济效益，所以就只有文学垃圾而没文学。

《剑南文学》小说编辑耕夫是我的朋友，他与本地各中专混得熟，几乎每个星期都有课讲，忙不过来，就摊派些“任务”给我。1985 年 5 月 17 日晚饭后，一辆大货车刹到我的住处，车上跳下一群绵阳工业学校的老师和学生，热情洋溢，不由分说，将我“请”上货车就一阵风驰电闪，驶向该校礼堂。

老威：这么说，全校师生都出动喽？

刘德：没有。开始礼堂内就 20 多个学生，因为那年头请校外文人讲课很风行，跟日常生活一样，我又不是名家。但是我年少气盛，心高气傲，觉得自己比许多名家更有名堂。果然，我的话匣子一旦打开，就滔滔不绝，妙语连珠；连续讲了三个小时，连水都顾不上喝。而听众也由稀稀拉拉的 20 多个增加到好几百，不仅座无

虚席，最后连过道、窗台、门口都挤得不透风。许多人挤不进来，就一堆堆地趴在窗外，我边讲边用眼角环视左右——连一人多高的护窗，甚至树上都有人。

老威：你也算超水平发挥了。

刘德：现在这副倒霉的小老头模样，你已经认不出当年的刘德了。《列宁在 1918》，记得吧？如果让我继续发挥，我能讲到天亮，那场面说不定比老电影“1918”中的领袖演说还要壮观。我的题目是《今天和今天的文学》，作为例证，我评论了众多当代作家及作品，比如李国文的《故土》、《花园街 5 号》。由于解放军作家李存葆反映中越边境战争的代表作《高山下的花环》受到官方推崇，风靡一时，我就拿它作为靶子，阐述了我与正统的“主旋律”相佐的观点。既然战争是国与国之间不得已采取的极端手段，那么作为一个正常人，就该反对一切战争，包括现在美国攻打伊拉克，我也反对。

老威：现在的所谓反战同你 80 年代的反战可不太一样。

刘德：总之，一将成名万骨枯，一个堪称战争英雄的将军，他的双手肯定沾满了鲜血，古往今来都如此。可《高山下的花环》却从正面肯定，喧染了非正义的战争，鼓励战士们去送死。

老威：这叫爱国主义。

刘德：中越、中朝过去都亲如兄弟，因为要并肩作战，打美国鬼子；后来美国鬼子跑了，人家要搞人家特色的社会主义了，要投靠苏联了，我们的脸面下不来，两兄弟马上反目为仇。先是老山的边界摩擦，然后投入野战部队，终于一口气打到越南重镇谅山。深入别人国土几百公里，还叫“自卫反击战”么？当然，这是国家行为，小人物奈何不得，但总可以发发议论吧？兄弟邻邦打来打去太没意思了，而文学对一段历史的评价应该有另一种比较私人的角度。

老威：《高山下的花环》我也读过，还拍成了电影。但是现在，我几乎全忘了。这种按中央文件打造的应命文学，虽然名噪一时，但留不下来。花环飘零后，花环下的累累白骨就再也引不起后人的兴趣。

刘德：我的话还没有你说得狠。

老威：我恍惚记得魏京生的罪名是出卖军事情报，也就是说，他在中越之战打响前夕，同一位西方记者聊到当时路人皆知的时局，并阐述了与你相似的反战观点。他因此坐了十几年牢。

刘德：我不晓得魏京生，但同老外侃国内敏感问题总有不妥。

老威：除了文事，你还涉及到哪些方面？

刘德：我谈到改革，中央雷声大，地方雨点小。比如绵阳，人事机构越改越多，越改越浮肿庞杂，编一份文学月刊，两三个人就够了，偏偏十几、二十个人，从科级到处级，占着茅坑不拉屎；我还谈到毛泽东晚年犯的错误，历史倒退，百姓遭殃；我还点评了“四项基本原则”，认为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相抵触。因为说到底，执政党只能代表人民的利益，否则合法性就值得怀疑。

老威：我感到奇怪，作为过来人，我觉得 1985 年的政治环境算比较宽松的。“清理精神污染”不得人心，也遭到党内开明派的抵制，在粉墨开场了一年之后，于 1984 年彻底破产。民间力量四处串连演讲，异常活跃，比如胡耀邦的儿子在武汉创办《青年论坛》，搜罗了一批立志改革的青年精英。我的友人卢从文，当时就读武汉大学，曾聆听过温元凯、胡平的公开演讲。胡平曾将四项基本原则写在大黑板上，逐条批驳，指出它们与现行法律相悖。在成都，民间组织也在官方纵容下成立了不少，如智协，如四川省青年诗人协会，都挂靠着四川省团委，发展会员，创办刊物，搞得轰轰烈烈。《大时代》上的作者，如高尔泰、墨哲兰、冯川、周伦佐等，都是在各大高校非常有号召力的右翼演讲高手。至于我自己，目睹了许多有关政治、文化、社会体制改革的通宵达旦的激烈辩论，由于 1983 年 1 月在《星星》诗刊上发表组诗《儿子们的年代》，成了精神污染的诗歌典型，受到批判，株连了《星星》，被贺敬之老婆在“重庆会议”上点了名。可到 1985 年，《星星》主编白航竟亲自撰文翻案，发表在《文学报》，嘲讽左派棍子们只懂整人不懂诗。

刘德：你讲得不错，胡耀邦当总书记不久，就有歌德和缺德之争，结果缺德派大获全胜，因为经历了文革，人们对歌舞升平说假

话的那一套已经烦了。我在编辑部，读南来北往的书刊，激烈的言论多如牛毛，左派臭极了。可绵阳，这派性根深蒂固的地方，仿佛从思想上与外省隔绝开来。你是盐亭人吧？在这儿，当官的 60％都是你的老乡，盐亭苦寒，出产匮乏，所以你的老乡们，打出娘胎，就懂得溜须拍马，削尖脑袋朝外地钻。结果老乡串老乡，大老乡提拔小老乡，官帽子就人人有份了。

老威：你在骂我？

刘德：我在发泄。因为整我的《剑南文学》主编谢某某，就是你们盐亭人；杨某某也是，做了四川省纪委书记，据说本人倒还廉洁，却收了大帮子贪官、奸商门生。我这人，愤世嫉俗，当然要吃这污秽世道的亏，可没想到，仅因为一堂课，就惹下了终生遗恨。

老威：在以言治罪方面，绵阳算独步中国了。

刘德：对。那晚快结束时，我突然发觉讲台前排新添了几张阴沉沉的面孔，不像在校师生。他们交头接耳了一会儿，其中一位就站起，走上台打断了我的话，提醒演讲超时了。后来我才晓得，此人乃本校的党委书记。

1985 年 5 月 26 日，也就是 9 天后，绵阳市公安局的便衣从宿舍将我带走，并实施拘留审讯，关押在市收容审查所。其实此前我就被严密监控了，公安局找到单位领导谢某某、刘某某，要他们稳住我，别忙“打草惊蛇”。收容所是关偷儿、赌徒、乞丐、妓女等社会闲杂的地方，人流量大，如牲口市场，我挤在蒸笼一般的号子里，天天大汗淋漓，还要应付审讯。我熬到 7 月份，就转至看守所，按程序，审讯人员由侦察换成了预审，态度要稍好些，不打不骂了。8 月 26 号，我入狱刚满 3 个月，检察院来人动检，跟着送达《起诉书》，这时，我才见到家里人请的辩护律师王剑。王律师 30 岁左右，见过世面，敢于在法庭上为我作无罪辩护，也算我的恩人。

11 月 6 日上午，我被提出监舍，带着手铐出庭。由于是公审，那天有千把人赶来旁听，把中院审判庭挤得满满的。公诉人竭力用文革语言丑化我，把我描绘成一个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腐蚀下的蜕化变质的坏分子，一个因个人私利而反党反社会的极端危险的阶

级敌人。作为例证，公诉人引用了四川大学校党委会所作的毕业政治鉴定，并指出：一个积极靠拢组织的好学生为什么在几年之间就堕落了？

老威：真他妈胡扯。

刘德：接着宣读了证词，即工业学校 50 多位师生写的揭发材料。我的脑袋嗡地大了，因为证词上的话我根本没有说过。

老威：比如哪些话？

刘德：就是《起诉书》《判决书》里引用的“我要看到共产党垮台”、“新的主义代替共产主义，新的政党代替共产党”之类。

老威：有证人出庭吗？

刘德：没任何证人露面。我当时情绪反应强烈，一再要求揭发者出来与我当众对质，都被法官喝断了。什么群众揭发？公安局和校领导往师生跟前一站，再启发、动员，谁还能不写？文革中批林批孔，把林彪和孔夫子弄成一家子，不是每个人都自愿写了批判文章吗？

老威：有演讲录音吗？

刘德：我的律师也质疑过，没录音，没证人，所谓证词也是学生们事后根据回忆提供的，这就不能排除诱供，受唆使作伪证的可能；甚至证词提供者是否在场都值得怀疑。公认人回答不上来，律师就趁势申明我无罪，并强调不能把过激的政治言论或政治错误与犯罪混为一谈。眼看公诉人招架不住，法官却赤膊上阵，连吼住口，并威胁要把律师赶出去。

老威：这幕闹剧太有意思了。

刘德：公诉人有法官撑腰，缓过劲来，又继续出示东拉西扯的证据，《剑南》负责人谢某某、刘某某创作的“我一贯对党不满”言论，连玩笑话也记录在册，什么“犯了毛病你要改，你不改，要劳改”等等。连我谈恋爱也被斥为“流氓罪”，警察还调查审讯了我的对象，与我保持通信的其它两人，指称耍流氓也同反革命有前后因果关系。我的律师气得脸都变色了。唉，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奈何？终于，法官看了看表，宣布休庭。整个过场走了一个多钟头，稍后接到《判决书》，徒刑 7 年，剥权 3 年，我不服上诉，被驳回。原来我的刑期早就定了，开不开庭都是一个结果。

老威：你咋晓得刑期内定了？

刘德：律师透露的，后来他就离开了这个行业，离开了绵阳。一般来说，重大的政治案不由公、检、法说了算，而要上报政法委员会。省里管政法的书记同时兼任政法委主任。

老威：我明白，政法委属于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机构，它既管法院，又管律师。不少案子，连当事人的律师及辩护口径都由政法委安排。

刘德：关于我的事，海外报道很多，香港的《文汇报》《大公报》都做了醒目的标题，如“共产党培养的反党大学生”，真是五花八门。据说四川方面把我作为反动典型报到中央，主管政法工作的乔石还签了字：“此案全国少有。”并把四川的刘德反党反人民与上海的杨巍投敌叛国相提并论，要杀一儆百。

老威：听李必丰讲过，你的案子曾经轰动一时。

刘德：铁案嘛，翻不了。随后去四川广元荣山煤矿投入劳改，编入掘井队，没日没夜地陷在几十米深的井下。不过，我的个头矮，腿软皮松，只能跟在打巷道的屁股后干些杂活，修修水沟，调调水泥。一年多后，时来运转，我上地面当起了教书先生，教文盲劳改犯识字，瞎混了四年余。

老威：你被整服了？

刘德：我申诉了五年，每年至少申诉 10 次以上，每次我都把《申诉状》同时抄写六份，中央、省、市各相关部门一份，同时投寄出去。

老威：有回音？

刘德：石沉大海。最后两年，大队长找我谈话，暗示只有停止申诉才能减刑，于是我照办，监狱就给我减了两次，让我提前一年半出狱。

老威：按常规，政治犯是很难减刑的，除非有特殊情况。

刘德：你指国际压力吧？我承认，自判刑以来，海外媒体一直关注这件事，西方各人权机构通过各种渠道，坚持追查我的下落。但是他们和我的立场、情感不一样，他们只会干扰我的生活，带来更大的麻烦。

老威：我不明白。

刘德：我出来后收到不少信、杂志、书以及贺卡，寄自英国、荷兰、挪威、美国，有普通的同情我的市民、学生；也有各个国际笔会中心，他们一直想帮助一个叫刘德的在狱作家。可惜劳改时，我蒙在鼓里，政府对内对外都封锁了消息。这是毛时代的传统，你施压越凶，他反弹得越厉害，就象大墙内的红衣主教龚品梅，关了 30 多年，西方年年都在呼吁，连罗马教廷和政府要员都数十次出面交涉，要求放人，可咋样，牌在我手里，想押多久就押多久。幸好我不够资格成为东西方冷战的一张牌。

老威：你这种心态有问题，你冤枉坐牢，别人关注还有错？

刘德：邀请信不少，挪威、德国、美国，组织和个人都请我去，人家把我当成历尽沧桑的作家。但是，人贵有自知之明，我不会外语，除了早年给《锦江》投了几篇幼稚习作，几乎没有进行过文学创作。所以，在所有的邀请中，我只选择性地给英国笔会中心回了一封信，大意为：1、我本人不是作家，因此不会接受对一个作家的邀请；2、我没有作品，因此没资格，也不会考虑成为国际作家笔会的会员；3、作为中国人，不管受了多大委屈，都应当爱国。当然，如果能去西方旅游观光，我很乐意，可是没钱没护照，去不了。

老威：你倒诚实。

刘德：老实人吃亏吧。鲁迅先生说：一个人说真话，就不被别人理解。

老威：被人理解是两方面的，这么多年，你也没有寻求别人理解你嘛。

刘德：啥意思？

老威：你先是被动坐牢，到后来，你不知不觉放弃了前半生那种闪光的青春冲动，自我封闭太久，灵魂就成监狱了。

刘德：一个人的命是有定数的。

老威：知识分子也信命？

刘德：我老家安岳乡下，出了个算命的，上通天文下晓地理，在方圆百里名气很大。

19 岁那年，这位先生根据我的生辰八字，以及腰间的一颗大红痣，就掐指算出我 22 岁要离乡外出，读书升学跳龙（农）门。当时没人信，因为 1974 年，老毛没死，文革还在搞，城里人出差还要单位的革命委员会开证明呢；一个农村娃离乡去升学，更是天方夜谈。于是我妈就请求作进一步解释，先生爱理不理地抛了句“天机不可泄露”。

果然，这天机就是唐山大地震，中国连死周恩来、朱德和毛泽东，接着粉碎四人帮，再接着恢复高考。我鬼使神差地考上了，那可是我老家几十年出的第一个状元。

老威：这么神？也许是撞上的。

刘德：更神的是 1985 年，我出事前的半个月，一向不太出门的妈妈到绵阳来，硬要拉我回家避祸。我年少不懂事，就嘲笑妈妈迷信。可老人家说：那神算先生推断我有牢狱之灾，要离开绵阳这是非之地，躲到一个清静的地方。先生还说：要老实，少说话，少动气，切忌跟人吵，这一劫要持续到 1987 年阴历 8 月间，不出事，方免。

我不信这一套，妈妈就一把鼻涕一把泪，千叮咛万嘱咐之后，总算回去了。唉，世上没有后悔药啊。

第三次是 1992 年，我新婚燕尔，就趁回门，把妻子的生辰八字给神算先生看。先生把我的八字重新翻出来，对照着，边掐算边念念有词地“合八字”。结果，脸色刷地变了，连命金也不收。我再三追问，他才吐出“不死则离”四个字。我象挨了一闷棍，晕乎乎地回到家中，没想到两年后的一天，我前妻真从二楼摔下来！当时她正搭凳子，垫脚往阳台上晾衣服，不料旋头风一刮，她就倒栽

下去，脑壳戳在铁桩上，头盖骨都稀烂了。

老威：你就整日生活在一种无休止的不祥预言里？太可怕了！

刘德：这位算命先生是我的隔房亲戚，前妻亡故时，他又对我说：再婚，改变个性，融入这个世道，学会巴结，讨好大家，哪怕一泡屎也要当饭吃了；要提醒自己，一天至少笑三次，开头不习惯，不自然，渐渐就习惯成自然了，笑得把啥子苦事都忘了。直到时来运转，突然变天，我平反了。

老威：你能做到么？

刘德：做不到，所以要慢慢磨。我是一颗灾星，从读书升学开始，就注定了劫数不断，还连累家人。妈妈死了，是被我气死的，她害有风湿心脏病。我坐牢，家里一直瞒着她，瞒了两年，到底露馅了。她喊着我的小名，突然就倒在地上抽搐，造孽啊。

我爸爸是老革命，1950 年在天灵山武工队剿匪，立过功，与他同时代的人，起码都当地委书记了。可他恋家乡，怕出这门，就留在村里当生产队长和会计，20 多年了，德高望重。可这一来，成了反革命的老子，威信一夜之间就扫地了。乡里乡邻指指戳戳，干部就当不成了。连两个弟弟也受到歧视，被迫退学。

老威：跟他们有啥关系？我坐牢时，我爸为了打探儿子的音讯，还养成收听“美国之音”的习惯呢。

刘德：大城市和乡下，一个天一个地。我两个弟弟读书都是第一名，升学没问题的，但是同学都不理他们。后来，老师找他们谈话，说为了不影响学校名声，你们自己离开吧。

老威：后来呢？

刘德：他们和妹妹都外出打工了，听说在新疆和浙江的啥地方。总之，已经多年不回家了，一个乡间的旺族就因我而衰败了。

老威：你没想过离开这地方？

刘德：到哪儿都这命。

老威：你一边在算命，一边在下意识地抗命。

刘德：那就到此为止吧。

36　地下天主教徒刘圣诗

采访缘起：认识刘圣诗是在十几年前，那时正闹文学革命，狂人辈出，而她作为××主义诗派的当家女将，风华正茂，一张利嘴所向披靡。但后来，她舍弃诗歌，投身天主教，从此过上颠沛流离的生活，红颜尽失。

我恍惚记得 89 年六四之后见过她一次，黑衣黑裙从墙根边闪出，吓我一跳。她说自己曾经去人民南路广场看望静坐示威的学生们，给饿晕的人灌糖水，“可怜极了，都是上帝的孩子啊。”

然后是 2001 年某个深秋下午，我与朋友在成都西门栅子巷的三一书店喝茶，天气晴朗，场地上人很多，当黑衣黑裙的她又突然出现在跟前时，我都傻了。她压低声音说：“你有门路么，老威？”不等回答，她又说：“我在国内呆不下去，我要逃跑。”

我打了个寒战，开始与她窃窃私语，不知为什么，她竟泣不成声了。同桌朋友诧异地盯我，好在进出三一书店的艺术家不少，见怪不怪。

最近一次见面是 2002 年大年初三，我约她在××露天茶园传教，在场的还有来自北京的××。“因为天天祷告，我平静了不少。”她说，接着不紧不慢地讲述了圣徒张神父的故事。

老威：三个多月前，我们第一次见面没多久，你就失踪了，咋回事？我起码给你打过十来个传呼。

刘圣诗：你真顽强，老威。

老威：你比我更顽强。不过你是信教的人，应该讲信用。

刘圣诗：三言两语无法跟你解释清楚。

老威：那就算了，我们还是接着上回的话头继续吧？

刘圣诗：我忘记了，你先提个线索。

老威：我凭印象说说你的家庭履历——刘圣诗，祖籍河北，家

庭成分革命干部。1950 年底，其父作为一名师部宣传队长，随人民解放军南下，摧毁了旧政权在大陆的最后一道防线，进入成都。大规模的本土战争结束，其父同许多浑身硝烟的军人一道转业，投入地方新政权的基本建设。受组织安排，其父参与遣散国民党所属之“三民主义共青团”，以共产党所属之“共产主义共青团”代之，并出任团市委秘书长。

刘母家庭成分工人，在公私合营的浪潮中认识了刘父，改造完资本家，作为纱厂女工中的首批党员，她与他的工作关系便顺理成章地发展为恋爱及家庭关系。1960 年春，刘圣诗呱呱坠地且茁壮成长，这太稀罕了，因为当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饿鬼遍川，中华民族的婴儿出生率几乎下降为一千多年来的最低水平……

刘圣诗：打住吧，老威，你适合干间谍，脑子和录音机一样，有用没用的乱录一大堆。不过，无意间你已提到了原罪，我与生俱来的原罪，我后来接受天主的安排，走上传播福音之路，大概也同我的家庭，我赎罪意识的苏醒有关。

老威：请继续讲。

刘圣诗：我是革命家庭的叛逆，与父母没任何共同语言。我一岁半就进托儿所、机关幼儿园，跟着接受填鸭式的共产教育，直至考上大学。我的父母热衷于工作，并把这种热情传染进家门，所以，他们与儿女的每次相聚都挺正式，像探监一般。后来他们离休了，党连余热也不需要他们发挥了，他们突然感到作为一个人，这辈子活得多么贫乏，业余爱好没有，连家庭生活也不会过，七十多岁的老俩口，整天吵个没完，毫无理智，把对方当敌人来攻击。

老威：他们的信仰呢？

刘圣诗：信仰顶个屁，共产党开了张空头支票，把几辈人都耍疯了。现在许多老干部迷上了法轮功，九条牛拖不回头，其原因就是心灰意冷，早年投入了青春、热血的支票缥缈得永远兑不了现。我父亲一提起江泽民就破口大骂，他们那批革命老人还在暗中串联，约定×年×月×日×时在天安门广场会师，着军装，戴勋章静坐，抗议现政权背叛革命传统，把军区和政府都骇坏了。前一晌天天派

人上门慰问、做工作，父亲犟着脖子与他们辩论，总算英雄有了一点用武之地。

老威：你们父女都成了政府的敌人。

刘圣诗：我错生在这样一个家庭，受洗时，我请求张神父取了现在这个名字，因为我在 80 年代写过现代诗，算颇有名气的××主义诗人。我结过婚，走过相当长的弯路，命运才开始出现转机，引领我找到了主。

老威：我与你的原夫是朋友。

刘圣诗：我晓得。我们住轮回巷时，你曾经来过。你忘了，我们还一起尝试过潜意识写作？灌得烂醉之后，就打开录音机，一伙人硬撑着，你来我往地胡言乱语，以为这样能诞生"杰出的诗歌"，结果就一句"酒里的红狼滴着口水"算过得去。到了 1986 年，诗歌流派最火时，我家里像客栈，一拨接一拨疯子进进出出，吃喝拉撒睡都在地上。我唯一的工作就是购买，各种酒，各种熟菜，再后来，我就在一个深夜把自己关在厨房，开煤气自杀。

老威：为什么？

刘圣诗：这些男男女女的，竟然在我家里群交！×××也躺在他们中间，丑恶极了，这就是他们艺术的目的和境界！我气得精神恍惚，出现了幻视幻听。唉，罢了，我不想再提这种事。

老威：好吧，回到信教的正题上。你是怎么找主的？

刘圣诗：六四之后，情绪极为消沉，与"诗人"们分道扬镳，与学校同事也没交流，于是我经常独自一人逛街。我既不化妆，也没购物习惯，只是无目的地乱逛。有个星期天上午，我路过走马街的天主教教堂，里面隐隐约约地传出歌声，出于好奇，我就穿过大门进去了。高而缥缈的教堂穹顶下，笼罩着大约几百人，整整齐齐地站着，跟随着台上的唱诗班吟诵圣歌，一曲终了，台角的管风琴就奏出下一曲的前奏，然后又是几百人的齐唱。我静静地站在最后一排，低着头，嘴唇不出声地蠕动，突然感觉有只手肘轻轻碰我，我侧目一看，是旁边的一个老婆婆，沟壑密布，皱纹比千年老树还多，她冲我微笑，边唱边示意我挺胸抬头，大胆出声——我太惭愧

了，30 岁之前我从没听过圣歌！没接触过如此圣洁、美好的天堂之音！我摇头，眼里充满了泪水，老婆婆把她的歌单递给我，挺着干瘪的胸脯，特别卖力地唱，她已经只剩一颗门牙。整个教堂只属于耶和华，没杂念，没杂音，明亮，洁净，我永远铭着首次望教时的圣诗：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上义路。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

你的杖，你的竿，都在安慰我……

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要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我一边流泪一边用心唱，仍不敢出声，怕影响了整体的和谐，那种感觉，就像迷途的孩子走上归途，我凝视着台上的十字架，架中挂着为人类受难的耶稣，我体内触电般涌起诗歌的激情，但是，我此刻已不是过去那个××主义诗人了。

老威：你描述的教堂我去过，门口似乎挂着“四川省天主教爱国会”的招牌。

刘圣诗：我不是冲招牌去的，但当时，我的确不知道除了三自爱国会外，还有地下教会。望过教，我走出教堂，找到爱国会主席，一个矮个子神父，向他咨询信教问题，我问怎样入教？每个月有哪些活动？能不能购买《圣经》？

神父却十分警惕地上下打量我，宣传了一番党的宗教政策和自养、自治、自传的三自爱国宗旨。我粗略了解点常识，就提到“梵蒂冈”，神父居然回答：“跟我们没关系。”然后又说：“你想入教，首先要持单位介绍信，经过会里审核，再报宗教管理局同意备案。”我觉得太离谱了，有些生气地说：“不是人人平等，信教自由么？”神父说：“当然自由，但手续还是要办的。这样吧，你先买本《圣经》回去看看、想想。”

我捧着《圣经》回家一翻，更加失望，原来是三自会编印的删节本，附页还有自办教会的组织结构：中共宗教局→三自会→中国天主教主教团→主教→神父→修士修女，一级管一级，顶头上司还是共产党！一气之下，我就找回去退货，不料“主席”外出，我却在大门口碰见白老师，她后来成为我的代母。

白老师对我说：“退什么货，这种伪劣产品，扔了！”然后把她的《旧约全书》送给我。白老师说：“如果您是上帝的孩子，以后就别上这种地方来，啥子三自会，魔鬼！地狱！”

白老师引我到她家，那儿正在举行家庭弥撒，快近尾声了，白老师对大家介绍说：“来了一位受难的新姐妹，大家一起为她祈祷吧。”于是十多位姐妹一起默祷“通功玫瑰经”。从此，遇上厄运，我就念“玫瑰经”，并约定许多教内姐妹在同一时刻于不同的地点一起念，直到九天，叫“九日敬礼”，我们可以没有公开的教堂，我们的教堂是超越时空的，整个中国，整个世界都是主的疆域。

老威：你现在还跟着代母么？

刘圣诗：没有。1993 年复活节我在西北××县××村的地下教堂朝圣时受洗，由富有传奇色彩的张刚毅神父施洗。张刚毅神父，当年 87 岁，我希望你永远记住这个名字。

老威：你的代母呢？

刘圣诗：被抓后，判了七年刑，罪名是从事非法的宗教活动。1993 年，成都的家庭聚会被搅了几次，敕封的神父都关起来了，据说与梵蒂冈的“遥控”有关，说来话长，我还是先讲讲张神父的故事吧。

老威：为什么？

刘圣诗：他是影响了我一生一世的圣徒。

老威：我晓得的唯一一位天主教圣徒是龚品梅。1991 秋天，我在监狱里学习《人民日报》，瞅见国际新闻版上有中共外交部的“严正声明”，抗议梵蒂冈干涉中国内政，宣布任命某某监狱的在押罪犯龚品梅为红衣主教。龚品梅 50 年代因传教被捕，关押了 30 多年，出狱不久就去世了。有人根据道听途说，还编了本《大墙内

的红衣主教》，摆在地摊上卖。

刘圣诗：这几十年，由于国家的压制、迫害，以身殉教而鲜为人知的圣徒较多，所以前不久，梵蒂冈举行封圣，向天下广为传扬一百多年以来在中国不幸死难的传教士。龚教主有幸上了《人民日报》，成为“反面教材”，这点与许多人通过《人民日报》认识了张神父及××村相似。

话说 70 年代末，党报上刊登了一篇提倡“破除迷信，移风易俗”的通讯，以陕西××村为例，论证封建迷信的危害。文章用嘲讽的笔调叙述道：××村流行一种传染病，许多人都染上了，于是坏人趁机在村民中散布谣言，胡说是“不信上帝的结果”。×月×日夜半，在被铲平的外籍传教士的墓地原址，突然浮现出巨大光圈，圈内有手握十字架的圣像，于是，一位自称神父的劳改释放犯召集少数落后群众蛊惑说:“主最后一次行圣迹，使愚昧的人迷途知返，皈依耶和华，否则世界末日真要降临了。”这个所谓的神父还以“使徒彼得”自居，并带头喝脚下阴沟里蝇虫衍生，散发着阵阵恶臭的污水。转眼间污水变清，阴沟蔓延成哗哗流淌的小溪，得病的人闻讯纷纷前来瞻仰“圣迹”，取水治病，结果立刻就痊愈，身体比患病前还好。如此一来，污水变小溪的骗术被越传越神，成了包医百病的良药，每天都吸引受骗群众涌进××村，可当记者也前往实地调查时，臭水沟还是臭水沟，什么“圣迹”也没发生。

文章借此告诫大家，要破除迷信，普及科学卫生常识，发现规模较大的传染病要及时向政府报告，通过医疗手段诊治；要警惕制造谣言的坏人，把他们绳之以法——张神父和××村就这样出名了，朝圣者手持党报，源源不断从省内省外赶来，直到 90 年代，张神父每年复活节仍要在当地教堂主持大弥撒。

老威：这算非法集会吧？张神父没被抓起来？

刘圣诗：他有些来历。大约在 1944 年，张神父作为神学院的特使，受派遣，在抗日烽火中穿越多重封锁线，从香港出境，绕道去梵蒂冈朝圣，报告在中国的传教情况。满世界都在打仗，所以他颠沛流离了好几个月，才进入意大利边境。当时的意国是个大兵营，

层层设卡，不管张神父如何乔装打扮，但中国人的黄面孔，人家一眼就能辨出。他被抓起来，投进靠近梵蒂冈的一个临时战俘营。在走过场的简短审讯时，他用流利的英语说："我是传教士，不是战俘。"可人家回答："你来自敌国，所以是战俘。"他争辩说："除了撒旦，天主无敌国。"人家笑道："目前战时状态，除了撒旦没别的，梵蒂冈已划为禁区。"

监狱人满为患，所以墨索里尼政府临时构筑了多座战俘营。大墙、铁丝网、报警器加探照灯，一个中国传教士挤在上千名英美联军战俘中间，那情景有点像拍二战电影。张神父不久就出名了。因为他不计较自己的屈辱处境，整日吟诵《圣经》，全身心地为大伙祷告、服务。他陪伴伤兵，任劳任怨，还每周在监舍主持弥撒，祈祷上帝让战争结束，让战俘归乡。据说连墨索里尼也对"中国神父"产生了兴趣，接见了他。总之，命运戏剧性地改变了，他被放出囚笼，成为整座战俘营的专职神父，主管在逆境中的人的灵魂问题。他可以自由地与任何囚犯交谈，让其暂时摆脱可怕的现实，接近天堂，接近纯精神的快乐。最后，连守卫都信任他，尊敬他，有时还把监舍的钥匙交给他。

终于在一个雨夜，上帝的雷车轰隆隆地压过云层，张神父在闪电中打开了牢门，对战俘说："你们是上帝的孩子，除了耶和华，任何人都无权剥夺你们的自由！跟我来吧，逃出这人间地狱，回家去与亲人团聚吧，众生平等，主与你们同在。"于是他率领战俘们依次缴了守卫的械，断掉电源，沿着事先勘查好的路线，成功越狱。

战俘们四散了，张神父换了一件当地妇女的袍裙，裹着花头巾，重新踏上朝圣之路。他终于越过边境进入梵蒂冈。通往罗马的列车早已停开，火车站一派萧条，张神父在封闭的铁轨上趴了半个时辰，确定没巡逻军队，方一跃而起，冲过站外的开阔地带，从后门闪入圣彼得教堂。他躲在廊柱后张望，刚巧一位助祭进来，他就偷偷跟在身后，穿过空荡荡的大厅。助祭昂首阔步，目不斜视，张神父却猫着腰，气喘吁吁。教堂与西斯廷、图书馆、寝宫等连成一片，内部犹如迷宫，所以助祭一拐入大厅旁边的廊道就消失了。张神父不禁张皇失措，正没主意，斜刺里一只人腿横扫过来，将他绊倒——

原来助祭早就发现自己被一位荡妇跟踪了，他不动声色地“诱敌深入”，却意外发现摔在地上的“荡妇”本色。他扯下他的花头巾不解地问：“难道东方的男人都戴这个？”

张神父却没有开玩笑的心情，他站起来，已热泪盈眶。他尽可能平静地用英语讲述自己的经历和使命，半个小时后，助祭也热泪盈眶了。他们拥抱了很久，他将他妥善安置在紧邻圣彼得广场的营房里，让他沐浴、更衣、用膳，而自己却匆匆去禀报教皇。

当天晚上，教皇庇护十二世正式召见了张刚毅神父，并与他促膝交谈至深夜。教皇也热泪盈眶了一回，良久，方抚着张神父的肩说：“张，您就留下来侍奉主吧。”

张神父起立向教皇致礼，然后说：“感谢教皇的赐恩，但是张的使命只完成了一半，请您允许张回到祖国，向蒙昧中的同胞宣扬主的福音。”

教皇说：“杰出的张！在梵蒂冈服务也是使命啊。”

张神父回答：“那我就尊从圣命到战争结束，我会日以继夜地学习。而我最终得回去，梵蒂冈不仅仅是一个城池，它的精神疆域遍及西方和东方。传教士走到哪儿，圣迹就会出现在哪儿。”

张神父谢绝了教皇的几番挽留，在世界大战正式结束的当月，即收拾行囊准备回国。教皇亲自敕封他为七品神父，地位相当于司祭，并赠与大量的经卷和藏书。岂料刚抵达梵、意国界，意大利的战后政府早已派车迎接，由于他在战争中义释战俘们的壮举，张神父被意政府授予了“国家一级英雄勋章”，他还被邀请到罗马市中心大教堂作了一场弥撒，为在战争中死去的不同肤色的人们祈祷、安魂。

1947 年初，张神父载誉而归，受到国民政府和宗教界的欢迎，一番热闹之后，他仍旧回到××神学院，潜心从事学术研究。直到 1949 年岁末，内战将息，国民党败局已定，流亡台湾。张神父谢绝多方去台或去欧美的游说，在兵荒马乱中同一批神职人员一道留在了祖国。他说：“我的内心充满狂喜，因为我感到自己是被选中的。天父为多灾多难的汉民族，为这个看不见尽头的乱世，选中了

我。”

1950 年，在改朝换代的首次镇反运动中，“被选中的”张神父落入法网，锒铛入狱；1953 年 6 月，××法院以间谍罪判他无期徒刑。直到 1978 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复出，国内对宗教活动的限制有所松动，张神父才在改革开放的大气候下得以释放。

他回到原籍陕西××村，意外地收到梵蒂冈和意大利政府的信函，原来在漫漫几十年中，教皇始终在关注和查找他的下落。意中建交后，更是通过外交渠道致函中方，均未得到具体答复。随着毛泽东逝世和大批传教士的暗中探寻，梵蒂冈终于得到张神父被秘密关押在××监狱的信息。

曾留学西方的邓小平不仅承诺开释张神父，而且亲自批准他前往梵蒂冈朝圣。1979 年冬天，失去自由 28 年的张神父踏上已阔别 35 年的梵蒂冈城领土，朝圣者络绎不绝，与二战时期与世隔离的萧条形成对照，物存人非，曾与他朝夕相处的庇护十二世已驾鹤西去，而新教皇登位不久，日理万机，仿佛是为了考验对上帝的忠诚，老态龙钟且风尘仆仆的张神父并没有受到特别召见。他挤在人流中，三天三夜，司祭才出宫领他到秘室进行试探性谈话。司祭说：“我全权代表教皇，张，这几十年您受难了。”

张神父缄默着。

司祭接着说：“但您的处境马上会改善，会越来越好，我们早就听说中国有独立于教廷之外的‘三自’爱国会，您完全可以加入，并且为它服务。”

张神父困惑地抬起头问：“这是教皇的意思？”

司祭点头说：“邓小平主政后，红色中国的宗教活动合法公开了，所以您应该属于自己民族的教会，一个中共领导下的爱国教会。”

张神父再次追问：“这是新教皇的意思？”

司祭又点点头：“约翰 •保罗教宗是波兰人，而不是意大利人。”

张神父倏地站起，拍案大骂：“假教宗！”

司祭大吃一惊："您骂谁？"

张神父一字一顿说："我骂这个波兰人是假教宗！您去告诉他，教皇可以是波兰或其它国籍，但教廷只有一个，并且只能在梵蒂冈！全世界天主教徒的精神之首都只能在梵蒂冈！"

司祭愣住了，旋即拥抱了张神父："我向您道歉！并代表教皇欢迎您回家！"

张神父老泪纵横之际，保罗教皇召见了他，并坦率地说："张，我们以为您被共产主义洗脑了，没想到呵！"

张神父以《圣经》中的耶稣箴言作答："为我增添荣耀的人，我必将荣耀赐与他。"

"教皇召见中国神父"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使张神父再次成为社会名流。但此时的他，年届古稀，内心澄明，在对梵蒂冈和意大利进行短期访问后，他再次谢绝了宗教和世俗首脑的盛情挽留，毅然踏上归程，走上了在大陆仍被视为异端的传教之路。回到××村的头等大事，就是利用意大利政府对"战时国家英雄"的金钱补偿，修筑教堂和道路。张神父的宗教活动引发了一系列的事端。党报也著文要"破除迷信"了，然而，曾在法国留学的邓小平为了改革开放的大局，指令地方政府"必须宽容"。

80 年代初，被禁绝多年的"帝国主义精神鸦片"的天主教可以公开活动了，当时在上海某某大教堂，全国 300 多名主教和神父举行首次瞻礼日会议。然而，此会始终在中共宗教局的直接领导之下，"宗教自由"的前提是爱国主义，连梵蒂冈指派观察员的外交要求也被大会拒绝。张神父在愤怒之余，为了捍卫传统天主教的纯洁性，竟不避危险，向主席团提出"在梵蒂冈城国的教皇是全世界，也包括全中国各教区天主教徒的身体、精神之领袖，是耶和华无上权威的体现，任何世俗政权不得以任何世俗的借口予以改变。"

此案一出，满堂哗然，张神父成为众矢之的，大家纷纷发言，指责张神父为"祖国的叛徒"，要把中国天主教引入邪途，教堂成了文革式的批判会场。

张神父手持《旧约》，反驳众人为"撒旦附体"，他引用《提摩

太前书》说：

“上帝在肉身里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纳在荣耀里——宗教局的官员们懂其中的含义吗？他们连《圣经》都没读过，他们，也包括你们，不知道篡改主的教义是怎样不可饶恕的弥天大罪！”

由于张神父的“国际背景”，大会没将他革除教籍扫地出门，还就其议案进行集体表决。当大会主席念出“赞成梵蒂冈教皇是中国全体天主教徒之唯一精神首脑的请举手”时，全场鸦雀无声。只见一条孤零零的手臂举起来，袍袖自手腕滑落，犹如死海里的孤帆，在没有一丝风的空寂里降下。那手臂，那青筋徒露的桅杆就这样一直高举着；它被“351 对 1”的绝对优势迅速否决，主席宣布进入下一个议题，但它还是高举着；接下来，大会开了四个小时，那条手臂就举了四个小时。

老威：这会还能开下去吗？

刘圣诗：既然张神父没被警察抓走，会就必须开下去，这是强权下的游戏规则。你可以对张神父的手臂视而不见，以此应证自己的罪孽、恐慌和虚伪。

老威：后来呢？

刘圣诗：张神父是举着手臂走出教堂的，天已黑尽，满目尘世繁华，他仰天叫了声“主”，就昏倒在台阶上。

老威：圣人啊！相比之下，我这种怀疑论者显得猪狗不如。好吧，您下次去××村朝圣时约上我，让我也瞻仰一回圣迹。

刘圣诗：张神父已在前年去世，终年 93 岁。他曾公开谴责六四大屠杀，并且在上千人的弥撒中，为死难者祈祷、安魂。1997 年，他在××村召集地下 12 主教秘密会议，被当局抓捕，囚禁 42 天，健康受到了极大摧残。

老威：您在张神父身上受到了什么启示呢？

刘圣诗：一言难尽。

老威：您愿意象他那样历经磨难而坚持传教？

刘圣诗：我尝试过，我知道，我永远达不到他那种境界，这是天意。我下过农村，去过矿区，甚至在漆黑一团的矿井底传播过《圣母福音》，矿坑坍塌，险些就出不来了。我在坟前为夭折的农民孩子祈祷，还没完，警察就撵来抓人。我坐了几次牢，最长一次，8个月。狱警让同监女犯盯死我，不让祷告，连喃喃自语也不行，否则就扑过来上刑。

老威：女人也互相摧残么？

刘圣诗：许多肉刑我根本讲不出口，例如用筷子夹奶头。总之，出狱那天，我一下子跪在太阳地里哭了。我忏悔说："主啊，饶恕一个普通传教者的软弱！我动摇了，我怕得要死，我不能死在中国！"

老威：您有门路？

刘圣诗：我的门路就是祷告，关在家里，与两个姐妹一道念《玫瑰经》，一日三次。我相信九十天后，我能如愿以偿地摆脱恐惧，抵达上帝恩宠的国度。我还买了一本韩国人写的《千万别学英语》，照书上写的七个步骤，反复听，反复练习，凭本能抓突然涌入脑海的单词。我的理想就是去西方教堂里打义工，侍奉主。

老威：我想不出您用何种渠道出国，办护照没问题吧？或者通过中外婚姻？

刘圣诗：不知道。

老威：我由衷地祝您顺利、幸福。

37　筑路人刘世昌

采访缘起：2003 年 10 月 27 日，因迫于某种现实压力，我从成都出走到云南丽江，一下子被古城的明媚阳光和风土人情所迷惑，安顿下来，不觉在此逗留了 40 天。

我于万古楼旁找了一家纳西族的民居，客房高高在上，既能鸟瞰波涛一般无尽起伏的古城瓦脊，又能遥望纯银一般永远闪耀的玉龙雪山。依着习惯，我天天在仙境中与房东夫妇东拉西扯，混得烂熟。我不仅了解到房东的阙姓祖先于清朝乾隆年间，改土归流之际，从江西吉安迁入此地，并且数代单传，至今人丁不旺；而且搞清了今日花 30 元才得入内参观的木姓土司府邸，文革之前还是公安局和看守所，高墙电网，不少人进去之后就再也出不来了。

11 月 28 日下午，阙家大嫂读完了《底层》，向我慎重引见一个“很惨很惨”的老人，他就是本文的主角，修过滇缅铁路、公路以及太多路的老工程师刘世昌。

从古城绕到新城刘家，大约要走 20 多分钟。太好的阳光，太多的游客，令人觉得这世界不存在一丝丑恶。但是一扇门开了，我看见枯坐在阳台边的老者，他生于 1914 年 5 月，几十天前中过风，半边身子已不能动了。

这是一部转瞬即逝的道路史，它穿过了两个朝代及无数现实和精神的战乱，伴着泥泞和血，渐渐湮灭在永恒的昏暗之中……。

在随后的数天里，我贴在老人的耳畔，边听边笔记这最后的气若游丝的诉说。我不禁在阳光下哆嗦，我一再颤抖着嗓音，感谢老人对我的信任。

“路有阶级性么？”刘世昌一再用云南话问，“国民党的车跑得，共产党的车就跑不得？”

我用四川话答非所问：“天老爷晓得。”

老威：刘爷爷您好。

刘世昌：嗯。

老威：我是写过许多底层人物的老威，从四川成都来古城丽江，已在万古楼旁边住了一个多月。

刘世昌：你是新闻记者？

老威：新闻记者有体制，有单位，而我啥都没有。另外，记者以追踪当下各种热点为业，比如纳西古乐队又有某个老艺人去世，宣科先生与崔健的摇滚较上劲，丽江妈妈胡曼丽侵吞孤儿捐款，等等。他们可能没功夫光顾您这样的旧闻人物，而我感兴趣的正是旧闻，是随着旧闻被淡忘掉的寻常人的命运。

刘世昌：哦，你是作家。

老威：一个写书匠，当不起家，也没权势改变您的处境。但我的长处是用心听，用心记录您的话，一次不行，再来一次；一两天不行，就耗它个七八天，直到把这一点一滴汇集、整理成一篇比较完整的东西……90 年，这不容易呀！如果再过 90 年，人们能通过查阅我的书，知道"刘世昌"这个名字；并通过这个人物索引，了解一点滇西北的道路史，我也就十分知足了。

刘世昌：我 90 岁了，没两天活头了。原想人太老了不死，就学点养生之道，尽可能健康一点，不拖累别人，但没办法，心静不下来。于是我每天早起，慢跑，跑跑走走歇歇，一两个钟头。运动的好处，就是转移注意力，逐渐平息往事在心里搅起的波澜。唉，这台机械不听话了，三个多月前，我跑着跑着，就倒在地上，中风了，行人把我抬起来。送医院，抢救，结果就这样，左边身子不听使唤。你已看见了一个修了一辈子路的人，一个四海为家好动成性的人，却只能坐着，从早到晚，吃饭要人端碗，屙屎要人解裤带，想看一眼太阳，还得憋足劲儿，把这发硬的颈项拧过去。

老威：您的头脑还很清楚。

刘世昌：儿子、儿媳都孝顺，我拖累了他们，心里不好受。有时候，我挣扎半天，终于把住窗台，站起来，坚持一会儿，浑身汗水。我太老了，您看这桌子上全是我的各种荣誉证书，还有十几年前的剪报，称我为元老，新中国的开路先锋。可顶屁用。冤没伸，

反没平，工资一分没补，好话说得再多，也顶屁用。

老威：慢慢说，从头说，刘爷爷，您千万莫动气。

刘世昌：1914 年 5 月，我出生在云南省文山州西畴县老海地村一个富裕之家，父亲刘永臣，母亲刘李氏，子女十个，我排行老七。那时我父亲种大烟和三七，兼做贩运生意，逐渐发财，成为当地有些影响的大户。记得我家还被土匪抢过，最小的妹妹被匪帮开枪打死。我父亲没啥文化，但家底殷实后，他就从外头请来万世师表孔夫子的牌位，供上神龛，让家里的男娃都读私塾。按封建习俗，男读女不读，所以我的母亲和五个姐妹都是文盲。我入私塾念到九岁，有了一定旧学基础，家里就选送我去县城，直接上小学三年级。三年后小学毕业，我顺利地考取了刚成立的云南省立开化师范学校，地址在文山，离老家西畴县几十公里。我在文山读书四年，虽然为父母长了脸，但花钱太多，成了家里的沉重包袱，于是父亲反对我继续深造。当时我一个血气方刚的少年郎，感到父亲目光短浅，一赌气，就自己逃到昆明，进补习学校。稍后考取了云南省高级职工学校，这在乡巴佬看来，相当于中举了。乡邻们敲锣打鼓吹喇叭，往家里送红贴，讨喜酒喝。父母见木已成舟，只好召开家庭会议，让在家的子女分工，除了加紧耕作、生意，还纺纱织布，日以继夜，如此才勉强供得上省城高昂的学费。

老威：一大家子就您一个跳龙门，不简单。

刘世昌：还有四哥。不过他当兵拿饷，不拖累家里。后来他考取了化学兵团，随部队从昆明开拔，抗战初期时抵达南京。他参加过台儿庄战役，立过功，接着就泥牛入海了。直到云南解放前夕，某一天，兄弟俩突然在大街上碰面了。可又能怎样呢？兵荒马乱，前途渺茫，只能互道珍重，各奔前程。听说他大半年后就落网了，进了劳改队。刑满释放后，孤苦一人发配到蒙自，没多久就病死了。我父亲也于 1950 年土地改革时被划为大地主，挨打挨斗，受尽摧残，终于被人民政府镇压，彻底解脱了。

老威：在 1949 年之前，家庭是您求学求知的经济支撑……转眼之间，它就成为您卸不掉的沉重包袱。

刘世昌：解放了，像我这类旧时代甩过来的旧技术人员，思想改造是头等大事。通过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认识提高了。我在各种群众大会上都公开表态，坚决与剥削阶级家庭划清界限，坚持拥护共产党镇压恶霸父亲；我为自己吸贫下中农的血汗而真诚悔罪，我流着泪发誓永不回家。果然，后半辈子，直到现在，我再没回过西畴县。至于父亲死后，家产的去向，母亲及兄弟姐妹的命运，我不想知道，也不敢知道。

老威：那就搁下这话题，接着讲求学？

刘世昌：没啥好讲的。1938 年职校毕业后，我被对口分配到在云县的滇缅铁路局十四总段当练习生，中间又去西祥公路工程处实习，经过两年的野外考核，我于 1941 年 11 月就任滇缅铁路第一工程处工务佐理员。

从此我的全部人生就与公路、铁路、飞机场缠上了，穿山越岭，东奔西颠，至 1949 年，我逐渐从普通员工提升为工务段总工程师兼代理段长。我亲自参与了滇缅、川滇、滇黔等铁路；云南境内百分之九十的公路、大型河桥，以及昆明、保山、思茅和四川成都凤凰山等军用机场的勘测、设计与施工。八年抗战，我作为政府工程队中一员，赴印度参加铺设由加尔各答至昆明的战时输油管道。滇缅铁路最初也是美国人投资，中方动员了十几万人力，日夜抢修。我们技术人员也受爱国热情的鼓舞，天当被地当床，几十天不刮胡子，不换衣衫，连吃饭也数秒，终于历尽艰辛把路基铺入缅甸。不料小日本还是比我们抢先登陆。他们以密支那为大本营，几天就扩散到缅甸全境。蒋介石急了，冒死飞临祥云视察鼓劲，没用，铁路工人不是军队。滇缅铁路被修了炸，炸了修，几年下来，铁轨七零八落，终于半途而废了。我们在印缅边界拉锯一般撤退，日本飞机每天在头上盘旋，一旦盯准目标，就一个俯冲，机关炮在人群中射出一条槽。工程队被打散了，在滇缅公路上，逃难的败兵如洪水一般，路旁随时有浓烟腾起，带不走的战备物资就这样被烧掉，令人心痛。唉，战争，无可奈何的浪费！如果把这些浪费兑换成钱，恐怕够上百万饥民吃几年吧。

开头技术人员还受优待，乘了一段汽车，后来就没油了。加上日本飞机日夜追撵，汽车目标大，只好放火烧毁。不晓得步行了多久，拢了畹町，边防哨拦住盘查，有意刁难。我们只好掏腰包行贿，才入了关，汇入了滇缅公路上一望无际的伤兵队伍。我们也“入乡随俗”，捡些血纱布把自己裹成伤兵，一拐一拐向前挪动，许多人的脚都拐变形了。

老威：何必如此？

刘世昌：不如此，肯定会被乱兵轰抢。有个同事叫瞧出破绽，乱兵就拿枪逼着，搜光了他身上的钱财，甚至连制服上的镀银扣子都扭下。当时的逃难人流中，还混入了一些汉奸，他们都藏着一面小圆镜，窝在手心，乘乱就向上瞄太阳，把光点往人密处晃。日机有了靶子，就怪叫着栽下来扫射、投弹，眼睁睁地把人打飞起来，那胳膊，那腿，那喊爹叫娘声，不晓得谁是谁。一轮炸过后，人们站起来拍土，冲天大骂，心里却暗自庆幸肉和骨头还在身上。

经过畹町到祥云，这一个多月的地狱之旅，整个工程局减员百分之七十，剩下的 20 多个残兵败将，受命搞完铁路决算，就暂时集中在蒋介石的军事工程委员会名下。

老威：滇缅铁路也泡汤了。

刘世昌：日寇投降后，它的战略价值就不大了。内战时期也修修停停，解放后就干脆放弃了。

老威：请继续讲。

刘世昌：我们在祥云休整了两三个月，我就被派往下辖云贵桂三省的第四公路局（当时全国划分为五个公路局），一直干到 1949 年 7 月。

老威：您没想过逃跑？

刘世昌：我是总工程师兼段长，若要逃，从芒市一伸腿就入缅甸，可技术人员嘛，哪个朝代都能发挥作用。况且，我也痛恨国民党的腐败，向往一种崭新生活。

老威：所以您就留下来了。

刘世昌：不是被动留下，而是起义。7 月份，时局凶险莫测，先是云南边纵第七支队和平解放丽江，派代表朱家碧与我接头；稍后，接第四公路局集体起义的电报，称：共产党中央命令段内一切物资要严加妥善保护，违者重处。而在边境一面，由土匪、败兵、少数民族武装纠集起来的保山共革盟，上万之众，攻破龙陵县，杀人放火，搅得天昏地暗。芒市与保山近在咫尺，种种屠城谣言甚嚣尘上，闹得人们纷纷弃城逃难。我夹在两股势力之间，审时度势，决定弃暗投明。

段里几十人，有不少国民党骨干，他们主张把库存的汽油、钢铁、水泥、经纬仪、水平仪及电台偷运到缅甸卖钱，然后分赃，各奔前程。我断然回绝，并严令追查已分散偷运的物资，发动下属一件件地找回来。我怀着对新政府有个交待的心理，熬到 12 月，卢汉宣布云南全境起义，芒市的土司衙门仓皇出逃。我终于完成任务，把物资库顺利移交给惠通桥抢修队，然后敲锣打鼓，去迎解放军。

老威：您算是为党为国立了一功。

刘世昌：在护厂护库斗争中有突出表现的人都受到奖励，我也于 1951 年被省交通厅授予三等劳模。

老威：日子有盼头了？

刘世昌：那时人人都觉得有盼头。特别是我们这类搞技术的，打心眼里想以一技之长为新生政权服务。因为路是没有阶级性的，同一条路，国民党的车跑过，共产党的车也跑，同一个工程师，国民党能用，共产党为啥就不能用？

老威：您的底气挺足的。

刘世昌：党的确在用我的一技之长。我的人生就好比一把铁锹，不断在碎石路上磨损，直到废掉，被丢弃在一边。

老威：我看过您申请退休的简历，从 50 年 1 月直到文革前，您一直在计统股长的任上。

刘世昌：对，股长兼总工程师，负责过南大、丽中、中乡、中德、德盐等几十条公路的测量、预算和具体施工。一年中，我恐怕有 265 天在路段现场，这同民国时期没啥区别；而另外 100 天，我

作为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在运动现场，要么写认罪检查，要么挨斗。可总的说来，斗争方式还比较文明，低头站台上，不管群众情绪有多激烈，逆来顺受就过去了。况且，革命要搞，路也要修，一派往工地上，我的气就顺了。与工人一道，泥里滚，风里穿，长期一天干十几个小时，直至累倒，一觉到天亮。拍拍脑袋，还好好在那儿呢。

老威：您挺乐观。

刘世昌：是麻木。但文革爆发了，想麻木也不行了。我爱人比我先受到冲击，她被戴上逃亡漏划地主的帽子……

老威：岂有此理！土改都过去多少年了，还有“漏划”一说？刘爷爷，您的老伴是什么样的人？

刘世昌：一个普通的女人，没招谁惹谁，却与我同命，这辈子写了数不清的检讨。我背一下她的简历：初升娴，彝族，原籍云南楚雄迤拉么村，家庭成分地主。1936 年以前在家乡读小学，1936 年以后在姚安县城读简易师范学校，1939 年又回家乡当小学教师。1940 年结婚后，一直做机关家属，随丈夫东奔西颠，充当临时杂工。1960 年的饥荒中因“盗窃托儿所食物”判刑 10 年，送往宾川农场改造，后经查证系冤案，法院于 1962 年裁定撤销原判，教育释放。回家后，更加死心塌地随夫，公路修到哪儿就跟到哪儿，直到 1966 年 8 月 26 日。

老威：8 月 26 日？有纪念意义吗？

刘世昌：这一天上午，工作队副队长王书基把我叫去说：“大姚县四清工作团党委通知，要你爱人回去一转，证实一些历史遗留问题。作为丈夫，你有意见吗？”我哪敢有意见！只好回答：“组织上的决定，我没二话。”接着又请示该带多少粮票，需要多长时间？王队长笑着说：“多少都可以嘛，不过最好多带些，吃不完再揣回来。”

我急匆匆地通知了初升娴，她有顾虑，我就安慰说：“可能就是解放初你偷跑回去看你的地主妈，并领她到祥云工地住了十几天的事儿。多少年的旧帐，你去理清楚，表示个立场就完。”当时下

暴雨，没买到车票。工作队老是催着上路，我只好冒雨跑了几趟车站，好不容易买到 30 号的票，段上又派医生赵宁极陪初升娴“出差”，明为“顺道”，暗为“押送”。三天后，总段开会，造反派头头突然宣布“初升娴是万恶的逃亡漏划地主”，已被公安人员押回原籍，交贫下中农监督改造。

老威：您在现场有何反应？

刘世昌：我被喊出去接工作电话，刚放下话筒，“打倒漏网地主初升娴”的口号已震天响了。我一下子懵了，浑身筛糠一般发抖。我爱人一拢家就叫武装民兵接管了，没让证实历史问题，也没宣布新的罪状，只命令她与地主妹妹同挤一屋，并立即下地，每天劳动十几小时，夜里还和地、富、反、坏一道，接受批斗。可怜我爱人，为了与剥削家庭决裂，多年不回老家，这次昏头昏脑被骗回去，受累挨斗，还不敢追问原因。这头称是丽江公路总段发配回去的坏分子，那头道是公社党组织要过来的地主婆，把我俩口夹在中间，不沾天，不沾地。为了破镜重圆，我们两头都打报告，请组织核查。于是工作队长王书基又叫我去，提醒说：“37 年，你老婆收过租、逼过债；还虐待过长工，牵走佃农的耕牛；还私设黑牢，关押贫农。50 年土改期间，公然潜回家带地主母亲，携金银首饰出逃，躲避阶级斗争。”

我两眼一抹黑，只能喊天哪，因为初升娴 1937 年还没满 18 岁，况且她在师范学校，受的是西式教育，讲的是人人平等，咋可能与此罪状挂上钩？我们为此写了上百份申诉材料。但没用，只要组织上口头一宣布，就成铁案。

到了 1968 年，一场有预谋的迫害开始了。先是派往公路十团（文革中丽江公路运输总段的改称——老威注）的军代表刘政委宣布，根据群众意见和政审结果，决定给初升娴平反。于是我喜出望外地拿着平反通知，风尘仆仆地往返几天，接回爱人，不料却上不了户口。原因是我单位领导又打电话告知公安局，要入户，光有大姚县人武部支左委员会的户口、粮食迁移证明不行，还得凭公路系统的《平反证》。那年头，黑人黑户的待遇和逃犯差不多。初升娴

去也不是，留也不能。一直熬到 11 月 13 号晚上，一伙造反派把她五花大绑揪进团机关，挂上“没有改造好的地主分子”的 20 多斤重的黑铁牌，游行批斗，并锁入单人囚室。

与此同时，我也被揪出来，三次定为“罪恶累累的反动学术权威，国民党残渣余孽，反动防奸组骨干，历史反革命”。斗争每天都在升级，直到 12 月份，我俩口子被宣布为“工农民主党”的首恶，而初升娴被团司法部第二次戴上“逃亡漏划地主”的帽子，第二次押送回原籍“管制改造”。

老威：这人玩人的游戏太残酷了……

刘世昌：我连十分之一的残酷都没讲出来，人老了，脑子乱了。

老威：莫急，刘爷爷，记不起来没关系，晚上想一想，明天再接着讲。

刘世昌：万一睡过去醒不了呢？

老威：您肯定醒得了。

刘世昌：难说。

老威：这历史也是一条路，再艰难，您也要修完。这样吧，您按照时间顺序，从前往后推……

刘世昌：我想一想。

老威：您在文革中被抄过家么？

刘世昌：数不清了。第一次是 1968 年 11 月 15 日晚上，造反派头头宋某某以监视地主婆为名，命令初升娴高举双手，走出家门立正，不准动。姓宋的满嘴酒气，晃着电筒，撞入我家乱翻，书架、桌子、壁橱全砸倒不说，还挺着匕首，象演练格斗，狂戳墙壁，撬开许多大洞。他打手电往洞内照射，检查夹壁里藏没藏变天帐和金砖之类，结果只有老鼠窜出来。姓宋的还砸散了床，甚至用竿子顶了瓦缝，方提着两大包“罪证”扬长而去。

我俩口子被分开关押在机关宿舍受审。5 天后，宣布对我实行专政。我和爱人又被造反派绑回家，站在门口，举手投降，引来几百人围观。他们当众翻箱倒柜，大抄特抄，将我家财产装走一大车。

次日，又在囚牢里勒令我交出家中所有钥匙，大约有几十把，声称要“打扫战场。”后来听说，他们查抄家产后，就押送到总段机关召开群众大会，办“无产阶级专政成果展览。”直到 1971 年 9 月 20 号，工宣队落实政策，才把我从猪圈带到家门外，扯掉封条，拿出一串钥匙塞给我说：“物归原主了”。我急性摇手说：“我是专政对象，老婆孩子还下落不明，这钥匙这房不能接。”

“什么，你不接？！”工宣队见牛鬼蛇神居然要态度，就日妈操娘地吼开了，“反了你个的国民党！给脸不要脸。老子们代表人民群众，代表无产阶级专政机关勒令你立即收下钥匙，滚蛋！”

围观的几百群众，也一起为工宣队呐喊助威，我只好捡起钥匙，折腾半天才打开已封了三年多的家。臭气满屋，那股子霉味几乎要把人冲昏。仔细翻捡，没有一件东西可用，连早年的书籍、图纸、照片也被虫蛀了，被浸起来的地下水污给糟蹋了。我一下子软在门坎上，抱头痛哭失声，我好歹还算个知识分子，一辈子的家当，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就这么毁了。但铁蹄之下，遭此劫难又不止我一人。只好强咽悲愤，把一屋子垃圾统统扫出去，留出一片空荡荡。

老威：您有被抄走的物品清单么？

刘世昌：除掉被砸被腐蚀的家具、书刊，我凭记忆整理了一份清单，分文件、文具、衣物、金银首饰、药品和食品几大类。其中有《历代宗亲家史》、《历代祖先画像》、《道路测量学》、《铁路手册》、《铁路、公路、桥梁计算式》、《吊桥设计》、《公路手册》、《铁路测量学》、《铁路、公路标准图》《民国时期云南省公路局半圆、全圆拱桥图》、《本草纲目》25 卷等等；还有德国造绘图仪、计算尺、不同半径曲线扳、三角板；美国造指南针、三圆罗盘、有柄放大镜等等；存折和现金几千元、粮票几十斤也“失踪”，金银首饰“失踪”的大略有金银手镯、宝石戒指、玉片玉坠、金银耳环、项链、金锭、银元（含唐圆 30 枚、龙圆 20 枚、袁大头 25 枚、孙头 30 枚）等等。

老威：您可以持清单去要。

刘世昌：文革后，我已要了 20 几年，如今 90 岁了，还叫儿子

接着去要。大约永远讨不回来了。

老威：您对抄家这种事没有预感？

刘世昌：啥意思？

老威：前几天，我曾访问了白地东巴（祭司）第十二代传人和利军，据他讲，文革也波及到他家所在的不通公路的村庄，这么个骑大半天马才进得去的偏僻之地，也有贫下中农造反派。他们责令和利军的爷爷交出"搞封建迷信"所用的东巴文经书，可这位老东巴连夜在屋里挖个深坑，埋手抄经书近一千卷，盖土后，在上面垒个火塘，并叫齐一家数口，架柴围塘烤火，等着造反派来搜。当然，搜了一整天，墙都被掀倒了，谁也没发现这些从古到今传抄下来的"四旧"的下落。

刘世昌：农村山高皇帝远，岂能和城里相比？况且，抄家之前，我和爱人都被控制起来。连我几岁的儿子流落街头，饥寒交迫，要回家拿点柴米油盐、旧衣雨具等等，也要打领条，请求专案组批准，然后才在专案人员的监护下前往。

我和爱人每天都被吊在房梁上，审问一句，抽几下，一天要打折好几捆竹条。晚上放下来。让四肢回一回血，吃口饭，再接着吊审。直至深夜，放回囚室睡觉……

老威：讲不下去就别讲了……

刘世昌：我要讲！过一天就少一天，万一我一会儿气不来，就没人知道了！这些王八蛋，现在还活得好好的，当官做生意，摇身一变，又成正人君子，好像从来没有干过缺德事。他们一次次对我俩口棍棒相加，打得我们到处乱跑，群众追着围观。初升娴几乎是被抬上车押回老家的。伤势太重了，长期不能下地劳动，最后不得已，进了赵家店医院。公社医院条件有限，治不了，就出具证明，逼初升娴出院，回丽江找丈夫治病……

老威：这几年，您的儿女咋生活的？

刘世昌：不知道。儿子大了，怕我难受，始终不肯说。儿女是娘的心头肉，有一次，初升娴在难中感到自己熬不了多久，就悄悄告诉儿子和女儿，老床的草垫子枕心里，夹着一个宝石戒指，两点

药（大烟土），如果你们爸妈被整死了，你们就拿去变卖了，走得远远的。可俩孩子害怕，为了“立功赎罪”，竟向专案组报告，领着人去取出上交了。

老威：后来呢？

刘世昌：我爱人在老家硬撑了两年，感觉不行了，才拖着病体回到丽江。当时我每月只发给 30 元的生活费。莫提治病，连吃饭也勉强。可人落到这地步，还招人忌恨。1971 年 12 月 10 日，造反派宋某某、解某某率十几人闯进我家，质问初升娴何时回来的？请了多长的假？为何长住不走？是否想永远赖在丽江当黑人黑户？我爱人一时答不上来，宋某某就迎面一拳头，同时起脚踢去。一伙人蜂拥而上，把我爱人打得满地乱抓乱爬，口喷鲜血，下身也流血不止，连几层裤子都浸透了。他们还抄起凳子打砸，把家里变成硝烟弥漫的战场。宋的老婆揪住初升娴的头发，往地下磕，还骂：“你个女流氓，敢扯我男人的下身！”眼看出人命，我只好大喊“打死人”，惊动四邻。共产党员朱尚珍分开观众，进屋制止，并叫人把一伙凶手劝出门外。围观者还在呼口号：“打倒地主婆！”“叫公安局整死她！”朱尚珍是个坚持原则的好同志，他始终挡在门口，隔开人群。

当晚，我向公路十团党委书记汇报，我爱人由儿子搀扶进医院，仍吐血不止。接下来的几年，我一边寻求民间偏方，为初升娴治内伤；一边打报告，请求解决她的户口和粮食关系。其间，她又被抬回老家几次，但对方不接手，说：“人都整瘫了，万一死在乡下咋办？”就这样，她在黑人黑户和漏划地主的双重帽子下，伤病一天天恶化，拖到 1977 年 10 月 29 号，竟含冤去世！

老威：1977 年？文革不是结束了么？她还没摘帽平反？

刘世昌：我们一直希望通过党组织解决问题，写了上百份报告，可直到 1976 年 2 月，总段落实政策办公室才给了个《审查结论》：“经复查核实，亲自收租、打骂长工、分散财，贫下中农有意见，一致要求应划为地主分子。但根据政务院划分阶级成分之规定，初升娴 1940 年至 1949 解放时止，跟刘世昌居住、生活，不应划为地

主分子，本人成分审定为学生。”

老威：留了一条剥削尾巴。

刘世昌：初升娴把结论翻来覆去地看，大颗大颗地掉泪，当晚她又写了上万字的《伸诉》，吐血数斗，腰都直不起来了。她说：“刘世昌啊刘世昌！我这辈子为啥要嫁给你啊？”我也哭了，使劲抽自己耳光，骂自己是个只晓得修路的窝囊废。

老威：可叹可叹。

刘世昌：她没有撑到摘帽那一天。

老威：您呢？

刘世昌：我被专政了五年，除了审查、关押、挨打、坐喷气式飞机，就是养猪放牛牧马，挑粪种地。后来降级留用，设计公路和大研镇的街道。三中全会后，省交通厅发文件恢复为公路工程师，79 年 1 月 23 日，总段党委出具《残废证明书》，承认我受林彪、四人帮的迫害，被打伤致残，成“颈椎压缩性病性改变。”1984 年，我申请退休，被国家授予“少数民族地区有杰出贡献的科技工作者”的称号。

老威：工资补发了吗？

刘世昌：工资没补，抄走的家产没退，我是公路局的起义人员，本该算离休，也一笔抹煞了。解放前，我每月领 180 块现大洋，解放后调整为一百多万新币（相当于后来的 109 元人民币）；1956 年，套成技术八级工程师，拿 110 元；后来除改革开放全国普调一级，再也没涨过。

老威：您被搞得家破人亡，应该通过法律索赔的。

刘世昌：我写了 20 多年的告状材料，直到中风前还在写。材料都由中央、省、地区一级级批示，然后转下来，又落到原单位的头头手里。这些头头，不少是文革造反派，如今摇身一变，又做了官，给我平反补钱，就等于戳了他们的旧伤疤。党委书记某某某曾到家中，送 200 元钱，并劝我：“忘掉过去，放眼未来。”200 元钱就要买我的记忆？太廉价了吧。

38　戍边女子刘思湘

采访缘起：两年前，我去河北某市的石油公司总部拜访一位旧友，其父在设宴款待我时说："老威您听说过新疆军垦老兵的故事么？"我摇头，这位出身西北的前副总经理接着说："有机会，我安排您去南疆看看，那儿还有些王震的兵，50 年进疆，就死扎在戈壁滩，如今七、八十岁了，连火车都没见过。"

酒桌上的话不算数，两年中，我与河北旧友通电话数次，可从未听说他的爸爸准备兑现承诺。直到 2001 年 12 月 18 号，我在成都巧遇十多年前的熟人刘思湘，我与他同代同龄且同行，却不晓得他有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母亲。

"两年前的话题总算有了个开头。"我感叹。

"几十场悲剧中，也可能有一场喜剧，"刘思湘边在我家喝茶边对我说："所以我妈的拉郎配结局还算圆满。"

老威：大约两年前，我去河北××市拜访一位老朋友，无意间了解到 20 万人民解放军西征新疆，并扎根戍边的一些故事，当时说不出啥滋味，嗯，百感交集吧。

刘思湘：您的朋友多大岁数？

老威：你我的同代人，40 来岁，也写诗，在石油部门做党务工作。

刘思湘：他能知道什么？

老威：他的父亲是一位厅局级离休干部，80 年代中期，从新疆克拉玛依油田调回河北老家。老人家 50 年进疆，一扎就是 36 年，可以称得上是南疆通了，故事一筐接一筐，倒不完。我与他一见如故，在饭桌上聊了一下午，可惜我酒量太小，老人的话匣子才刚刚打开，我已醉得迷迷糊糊了。我感觉他似乎在几丈开外有一搭没一搭地诉说，18 岁投军，一门心思地打日寇，打反动派，入疆时升到副营长，都 25 了，还没讨老婆。清一色的硬梆梆的光棍汉，

乘着敞篷大卡车，浩浩荡荡往西挺进、挺进。戈壁的风象刀子，明晃晃的，哪怕军大衣裹得只剩鼻子尖和嘴，可还是叫割出一道道血口子。后来公路没了，就下车步行，累垮的人骑骆驼。到了焉耆县，部队休整一天，又继续行军，过了库尔勒，沿塔里木河，还不能停。千里戈壁滩，一浪一浪起伏的沙丘，骆驼偶尔悲鸣一声，撕心裂肺。幸好都是革命军人，有理想，不悲观，依靠铁的纪律终于抵达目的地。白手起家修水库，放下枪杆握锄头，战争军人全部转为农垦军工，多数西征的老战士就永远留在异乡了。行路难，绿洲周围全是漫漫黄沙，他们像劳改犯一样，开荒种地，过几乎与世隔绝的兵营化集体生活。日子一久，人最大的欲望肯定是讨老婆，解决性问题。

刘思湘：你讲的这些，我早就知道，我爸当时就是二军六师的一个营长。大约三年前，我陪他最后一次回南疆，探望农场的老战友、老部下，死了大半，埋在大西海水库周围；剩下的寥寥无几，七、八十岁的老爷爷，几十年没出过百十里地，有的连火车都没见过，真叫人哭笑不得。

有些忠心耿耿的退役老兵，还长期穿戴当年的戎装，胸前挂两三排军功章，走不动了，就拄着拐，坐在门坎上边晒太阳，边等候着某一天王震将军突然降临，安排他们回故乡，或回延安，回 359 旅垦过荒的南泥湾看一眼。他们唱了一辈子“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我爸爸和他们灌了一夜酒，唱了一夜，心脏病都闹翻了。他们的妻室儿女看上去有当地蒙古族牧民血统，脸蛋红扑扑的，小孩连汉话都说不利落，却一律会唱“向前！向前！向前！”

老威：王震将军接见过他们么？

刘思湘：王震已去世了，报纸也登了，但这些老兵，没啥文化，活得稀里糊涂。我爸爸也不忍心提醒他们，人没盼头，就象庄稼没阳光，蔫巴巴的。我想既使有人告诉王震死了，他们也不信，惹翻了，非提着棍子追着打你个报丧星。

老威：你有牧民血统？

刘思湘：没有，我妈妈是湖南人。

老威：湖南人？作战部队里有女兵？

刘思湘：说来话就长了，俗话说："千里姻缘一线牵。"在那个年代，只有党组织才有这个能力。我收集了不少资料，将来准备写个长篇。王震在解放军中以垦荒将军著称，抗日战争，就在南泥湾开荒，南疆比南泥湾大几百倍，需要往里填多少人？光男人不行，光棍对光棍，环境又恶劣，长此下去非撞出火来，兵就会变成匪，变成狼。王震当年肯定也是这样想的，怎么办？革命军队纪律严明，当然不可能有随军妓女，于是王震作为镇守边关的统军司令，亲自充当头号红娘，给他的老战友——湖南省省长王首道、省委书记黄克诚、军区司令员肖劲光、副省长袁任远等人写信，并派出二军六师政委熊晃作为"军婚特使"，先赴京拜望朱德总司令，借汇报新疆军区的工作，取得了尚方宝剑，然后下湖南遍访各军政高层码头，商定操办细节。

王震在致王首道、黄克诚的信中写道："在湖南招收大量女兵，十八九岁以上的未婚女青年，有一定文化的女学生，不论家庭出身好坏，一律欢迎，要她们来新疆纺纱织布，生儿育女……"

紧接着，一场国家性质的骗婚案就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新疆军区招聘团"抵湘期间，长沙所有的报纸天天出特大号外：解放军征招女兵！参军去新疆！那儿紧邻社会主义的老大哥苏联，到处是俄文学校。新兵们可以选择学俄文，去苏联深造；也可以选择进工厂学技术，进文工队当文艺兵；还可以选择进苏式集体农庄，在绿油油的广阔田野上驾驶拖拉机……总之，按照人间天堂的构想，吹得天花乱坠。那时全国刚解放，人们渴望新生活，对苏联更是心驰神往。整个 50 年代，学苏联都是潮流，它的政治、经济模式，它的文学和歌曲，它的服装、交谊舞，深入到千家万户；特别是它的语言，成了中国人的第一外语。所以，这场骗局可谓是对症下药，女孩子心里想什么，我就说什么；你哪儿痒痒，我就下手搔哪儿。于是，全社会迅速达成了共识：名额有限，得抓住机会！只要当上兵，去了新疆，所有的理想瞬间就成现实，出国也指日可待。

老威：太离谱了吧，人们还真相信？

刘思湘：你不知道那时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威信有多高！你是党员干部，你是军人，那么你的言行、衣着，甚至发型和眼神，都是年轻人效仿的对象，这相当于目前新新人类对明星的崇拜。特别是地主、资本家、旧军阀等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女孩，找工作受歧视，在人前头也不敢抬，却突然间听说可以参军，学俄文，去苏联！脱胎换骨的良机啊！

老威：你的感触这么深？

刘思湘：我妈妈讲的。她出身于小资本家，当时在一所女子中学念书。她们班上有 30 多人报名，结果只录取了 5 人，大伙还挺羡慕。妈妈只有 17 岁，就虚报了 1 岁。她说：连续半个月，我外公天天起早，走两里路，去报馆抢购各种报纸，稍晚一点，“征兵号外”就卖光了。街坊邻里三五成群，袖着手，聚在街沿上议论纷纷。她怕家里反对，就先报名，后通报，谁知父母都很支持。我外公还摸着她的脑袋，心疼地责备：挤坏了吧？我已去过招聘团办事处，人山人海，排队报名的女娃儿拐了一里多路呢！你怎么不先给家里打个招呼？我妈说：新社会讲民主，自己的事自己办。我外公叹气说：我的成分不好，帮不上忙，但替你排个队总还行嘛。

妈妈她虽报了名，也没报太大希望，可过了十来天，学校接到通知，她被录取了！接着是非常简单的体检，她就算正式入伍了。临行前夜，一家四口都舍不得睡觉，就围着火炉扯家常。我外婆不断线地掉眼泪，外公却高兴地用小锡壶烫酒喝，还让年仅几岁的舅舅呷了两口。外公说：珍儿光荣入伍，我家就成革命军属了，看来，新社会男女平等，共产党、毛主席说话算数。我这样的小资本，只要加紧思想改造，出路会越走越宽。我妈妈忙点头称是，又安慰外婆说：过一晌，我会请假回来看你。外公严肃地叮嘱：当了兵，就要守纪律，有志向！刻苦学习俄语，力争出类拔萃，早成大器，切莫重小家之情而轻国家大义！

老威：你外公像个党的政工干部。

刘思湘：向组织靠拢是时代风气，所有家庭都一个样。你的父母还能例外？

老威：开个玩笑。请你继续讲吧。

刘思湘：1951 年 3 月，经过两个月集训的 3600 多名湖南女孩子穿戴着崭新的军装，在父老乡亲的依依惜别中，在震耳欲聋的欢送锣鼓中，从长沙登火车西行。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风尚，因为在中国几千年的传统里，都习惯了"好男儿志在四方"，而女孩命中注定走不出故乡水土。"打破了封建传统，妇女彻底解放了！"各报纸都借此大做文章。

而一向门庭冷落的外公家转瞬热闹非常，贺客进进出出，宛如出了新科状元。大家天不见亮就到火车站送行。妈妈她胸戴大红花，与同班的其它小女生一道挤出窗口，拼命挥手告别。车轮启动了，不过分把钟，她们这辈子就再也望不见自己的亲人。

抵达西安后就没有火车了，女兵们换乘敞蓬大卡车，继续向西；过了兰州，再向西，在一派荒凉中颠簸。一辆车坐 40 多人，都把背包垫在自己的屁股下。那灰头土脸的情景，与今日离开乡村外出谋生的打工妹没啥区别。

老威：这些女孩子没感觉到不对劲？

刘思湘：过了兰州就感觉到了，因为沿途停车休整时，地方部队首长都出面接待，并讲话，大谈革命和恋爱、婚姻的辨证关系，还一反惯常的严肃，扯些男女关系的笑话。开头女孩们懵懵懂懂，红红脸就过去了；后来讲的次数多了，就对组织产生了怀疑。妈妈说，到了新疆后，恐怖的气氛笼罩着每个人，这时她们才从革命的狂热中醒悟：为什么一个大军区的招聘团只收女兵？为什么征兵号外中反复渲染的"俄文学校"、"苏式农场"、"工厂"、"拖拉机"等等连影子也没有？越想越可怕，连汗毛都竖了起来。因为周围全是荒漠，没有退路。既使有退路，你也不能当逃兵。部队有纪律，逃兵一律视为敌人，就地正法。

女兵们找到领队，有的还提出要面见招聘团团长熊晃政委。谁知领队铁板着脸，一口一个军事秘密。女兵们直截了当地问：组织上会强迫我们嫁人吗？

领队回答：不会。又问：去哪儿？苏联吗？答：不知道。再问：

去干什么？答：军事秘密。

在乌鲁木齐稍事休整，不准上街，不准单独行动。紧接着，一头雾水的女兵们就在组织上的精心安排下各奔东西，分散到天山南北，进入清一色的男性聚居的农场。据我了解，这是按部队连以上未婚干部的人数平均分配的。我妈妈所在的塔里木××场，离焉耆还有好几百里，是塔里木河下游的一块绿洲。

一个整团扎在这里，光棍汉少说有 1000 以上，而按名额分配去的女兵不足 20 个。

老威：这咋分啊？

刘思湘：妈妈她们被接到场部后，被安置在一排平房里，暂不与普通官兵见面。与此同时，新疆军区专门下发了一个文件，规定“有十年军龄，八年党龄的才能谈恋爱”，没这个条件，不准擅自找对象，否则就犯错误，不但不批准结婚，还要受到纪律处分。这个文件在全体官兵大会上公开传达了两次，就把绝大多数与妈妈她们年纪相当、精力充沛的年轻人卡在了门外。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自由恋爱是绝对行不通的，否则一个场 200 个女的也不够分。

老威：可是有《婚姻法》啊，我记得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根据地就公布了有关“自由恋爱”，反对“包办婚姻”的法律。

刘思湘：在新疆，部队是个特殊的环境，与地方区别很大。比如生产建设兵团与自治区政府是同级的，都直接受中央管辖，互不干涉。那么地方讲法律，而在部队，命令高于法律，只能执行。你想想，几个弱不禁风的女子落入男人堆里，都按自己的心愿去自由恋爱，那不乱套了。所以，还得组织出面。

一开头，个别懵懂女兵还等待着分配革命工作，很快，局势就明朗化，她们唯一的革命工作就是见男人。先是座谈会，连、营以上的干部才有资格参加，师参谋长讲话，向姑娘们介绍手下的爱将：“王××！”立即有个虎背熊腰的汉子从前排坐位啪地起立答“到”。“脱衣服！”“是！”

转瞬间，半尊铜塔凸现，累累弹痕触目惊心。参谋长大踏步走下来，把住王××的肩头旋了一圈，详细介绍了每处弹痕的来历，

“这就是你们的团长！

共和国的功臣！如果按封建社会那一套，论功行赏，他早就该衣锦还乡，回到湖南老家。不知道有多少湘妹子会爱上这样的男子汉……是啊是啊，我们这样的戍边军人，如果有一点私心杂念的话，早就个个有老婆喽！但是，参谋长提高嗓门强调，“为了全中国人民的解放，为了建设新疆，我们的青春被战火一次次洗礼，脸变黑了，心却明亮，在座有许多像王团长这样的革命英雄，恋爱和婚姻都被耽搁和拖延了。姑娘们，你们爱这样的人吗？”

几十对喷着烈火的眼睛一齐转向蜷缩一块的女兵们，据妈妈讲，她们全被镇住了，浑身不停地哆嗦，旁边的曼云埋着脑袋，泪水一个劲往下掉。首长再一次发问：“你们爱这样的人吗？”

在虎视眈眈中，女兵们轻声回答：“爱。”

“大点声！”

“爱！”

参谋长哈哈大笑说：“我们这农场好久没听见过这么甜的声音！吓破胆啦，姑娘们！虽然在座的个个都是战场上的虎将，可在你们跟前温顺得像小猫似的，不信就试一试嘛。”

一场哄堂大笑中，新疆维吾尔舞曲响起了，参谋长亲自走到一个叫方菲的漂亮女孩跟前，两手一摊。方菲红着脸站起来，与首长一进一退舞了两回，王团长见大伙都楞着，就挥手发命令：“同志们，上啊！”于是哗啦一声响，在荒原上焦渴坏了的狼们瞄准事先瞅定的小羊，扑了过去。女孩们来不及躲避，已落入壮汉们的怀中。军官们多数出身农村，文化低，在战场之外，见的世面太少，所以对跳舞这种新鲜玩意，过去一直认为是“资产阶级”，现在既然有首长领头，大伙就磕磕绊绊地跟进。聪明点的，就搂着姑娘依样画瓢，互相踩几回脚，也能跳出个模样来；狠一点的，就箍着女的不吭声，直到都气喘如牛；还有的干脆把人家兜屁股抱起来，在场子里跑来跑去碰撞。我妈妈说，爸爸算是最笨的，他把住妈妈的腰，腿动不了，脖子却拧过去喊：“报告首长！怎么跳啊？”

首长把方菲让给团长，就过来做示范，然后猛拍爸爸的背：“想

咋跳就咋跳，总之要先动起来!”

舞跳到夜里十点，军官们还搂住姑娘不放。参谋长却停了舞曲，宣布散会。团部警卫员进来取下汽灯，并护送女兵回房间。走过空地时，她们能感觉到周围营房内众多热辣辣的目光，不禁加快脚步。洗漱躺下后，她们就头碰头地埋在被窝里，拉起了悄悄话。曼云是妈妈同班同学，生性活泼，喜欢梦想，所以她先开口：“不行，一点浪漫都没有！跟我跳舞的刘连长，都 26 岁了！我才 18 岁哩。”妈妈说：“对，我们参军来新疆是干革命的，不是来找叔叔伯伯辈的。再说这么早就谈恋爱，家里也不会同意。”邻床的李小宛附和说：“对，要找也要找个年龄相当，懂点礼貌的，哪能上手就死抱着？”曼云说：“我们要向组织反映，培养感情有个过程，不能刚到就谈婚论嫁。”妈妈说：“那我们一起要求上俄文学校。”方菲噘着嘴说：“别做梦啦，党叫嫁就嫁吧。”曼云说：“英雄团长看上了你嘛，虽然他已一大把岁数，能做你的爸爸了。”方菲哇地气哭了。妈妈说：“大家都是落难姐妹，曼云你咋这样说话？”曼云也哭了，大家蒙头哭成一团，还不敢声张，只好各自咬着手背。方菲抽着气说：“革命就是这样干的？还不如死了干净。”李小宛说：“你死了，我们咋办？你在长沙的男朋友李××咋办？”

她们说着哭着，天就朦朦亮了，兵营的晨号哒哒一吹响，临时班长蒋碧春就敲门唤起大家。早餐毕，又到礼堂开座谈会。团政委简单讲了几句话，就让大家“自由交往”。由于是大白天，军官们拘束了许多，只是嘿嘿傻笑，没人主动到姑娘堆里来。又不能再跳舞，怕动静闹大了，引起战士们的反感。所以，不管领导如何动员，场子依旧冷清。有一次，×营长挑头走到姑娘这边，人家却挤得紧紧的，连针也插不进。×营长是东北人，臊得骂了句“妈那个巴子”，就在大家的起哄中败下阵。

自由交往行不通，一对一的政治思想工作就全面开展了。军官们先把相中的对象汇报给组织，然后按级别，师长给团长找，团长给营长找，以此类推。

如果几个人同时看中一个，那就下级服从上级，同级则比军龄

和党龄，绝不含糊。

弱女子们被“包办”下来。所谓谈心，就是熟悉未来丈夫的情况，媒人们全捡光明面，吹得天花乱坠。一天两天，五天七天地磨，一些姑娘的耳根子终于软下来，叹口气，提出与对象见面。也有心眼死的，车轮战术也攻不下来，就干脆下“最后通牒”：这是革命的需要，不嫁，就是阶级立场、感情问题！

可怕的是对象年龄太大，或相貌偏丑，怕你见着不乐意，就干脆躲着，直到组织上代办了《结婚证》，布置好新房，把两个人朝里一推，反锁房门。一拨汉子挤在窗外听动静，乒乒乓乓，坛坛罐罐全砸稀烂，还有哭闹、叫骂、寻死觅活，直到呼哧呼哧地干出响来，大伙方捂着嘴笑，知道生米已煮成熟饭啦。

老威：这叫强暴啊。

刘思湘：这叫“先结婚，后恋爱”，或“党叫干啥就干啥”。时间长了，在荒漠里呆久了，新婚之夜这点创伤不知不觉就弥合了，特别是生了几个孩子，就踏踏实实过日子吧。

老威：没弄出点意外来？

刘思湘：3600 多个女的，不可能个个都顺利。也有逃婚，被追回来，关几天，到头来还得嫁人。在××农场，还有新郎把枪亮出来，搁桌上吓唬人的事。可新娘子不信邪，还闹，枪啪地就响了，把窗外的人骇了一跳，急忙开锁进屋，见新娘子傻在哪儿，下身光溜溜的，地上一滩尿。新郎还张牙舞爪的，团长命令缴了他的械，押回禁闭室反省清楚了再成亲。还好，只擦破了新娘的耳朵，没出大事。

老威：后来呢？

刘思湘：后来新娘的脑子出了点问题，一见新郎就筛糠，就小便失禁，不过，都是一时的，过一年半载，肚皮整出了怀，记忆就淡了。

最不幸的要数妈妈的同窗李小宛，对象是营长，骑兵出身。新婚之夜，她才发现新郎的脸上和胸上都有刀疤，一激动，就鲜红鲜红的，在灯光下显得特别狰狞。李小宛万念俱灰，听凭他吹灯上床。

新郎凑过来接吻，她一偏头，那边嘴落空，就火了，竟卡住她脖子一顿乱咬！李小宛逃不了，躲不开，大喊救命！新郎却使枕头盖住灭口，用力过猛，她就昏死了。

还好没出人命，第二天，她从新房跳窗逃出，找团政委汇报情况，营长因此被降级留用。而李小宛在农场也呆不下去了，只好转到别处草草嫁人了事。

老威：你妈妈还顺吧？

刘思湘：她的运气不坏，遇上了我爸，人老实，没有强迫她。新婚之夜，爸爸坐了半宿，让妈妈考虑能否跟他过一辈子？接着，爸爸又扛了两三晚上，妈妈的心肠就软了，觉得他像个革命军人的样子。爸爸比妈妈大十几岁，所以吵架时总能让着她。文革期间，农场也造反，妈妈被查出家庭成分不好，就挨斗。还是爸爸把她从黑屋里救出来，连夜驾车去库尔勒，躲进军区老战友的家里，才免了一劫。

老威：现在他们还好吗？

刘思湘：爸爸去年已去世了，剩下妈妈和妹妹一家住在乌鲁木齐。妹妹是学医的，从军区医院出来后，自己开了家门诊，生意还不错。我写东西，最受妈妈疼爱，总给我唠叨些过去的事。本来我以为人老了会落叶归根，就陪妈妈回了趟长沙，可老家已经没人了，四处打听，也没结果。我估计已死于“三年自然灾害”，或因出身不好，死于文革。街道也变了样，老地方彻底蒸发了。不知妈妈50年代回去过没有？那时我还小，没记忆。

老威：你的哥哥姐姐呢？

刘思湘：他们一个在自治区当官，一个去了深圳。妈妈说，连个熟人都找不到，故乡就成了虚幻。当年一道进疆的姐妹，都退休了，大半留在乌鲁木齐。妈妈在那儿熟人多，关系网宽，不那么孤独。

39　老红卫兵刘卫东

采访缘起：算起来，老刘也属于中国最早的一批红卫兵，造过反，串过连，下过乡，那个时代的时髦都赶过。可惜地处边缘，这辈子注定进入不了主流社会。

而今，老刘面临下岗，“这又是一趟时髦！”他冲我苦笑。

老刘的愤世嫉俗源于历史的刻痕，他对毛主席有深厚的感情，由此我担心“文化大革命”在中国民间仍有群众基础。虽然知识分子们为否定十年浩劫至今不遗余力。

这次采访是2000年6月30日下午在我家进行的，当时老刘通过熟人介绍，找我打听自己适合干什么“第二职业”？

老威：关于“文革”的历史，现在出了很多种书，您怎么看？

刘卫东：我根本没看。书价太贵，买不起。即使买得起，也没时间、没心情去看。这几年，我们厂大半职工都陆陆续续地下岗，每人每月拿两百来块钱。我在劳资科，没下岗，但也一天不如一天。听说某个私人老板正在与厂里谈判，要廉价收购，铲平那片几十年的老厂区，盖商品房，说不定明天早上醒来，我也会接到通知：永远下岗。根据土政策，像我这种78年进厂的老资格，能一次性地拿到3万5到4万。这点钱，我与老婆一点都不敢挥霍，得存起来给刚上高中的儿子，他一年读书的费用就要1万多。万一考上大学……算了，不敢往下想，这辈子就这样洗白了。49岁的人，在修理厂的岗位又是车工，要重新开始？太难了。

老威：是很难，但付出代价的又不是你一个人。

刘卫东：是啊，经历过“文革”的这批人，现在大多数都上有老、下有小，被生活的重担压得喘不过气，哪来读书的闲情？80年代初，伤痕文学盛行，还要买杂志看，以后，再也没买过啥书，偶尔路过街边的书报亭，就停下来顺手翻翻，由于心里没想到买，也就不敢翻久了，怕遭人家白眼。我老婆倒慷慨，可都是买儿子瞎

要的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改编成电视剧，实在没啥看头，连保尔都假得厉害，可儿子一吵，老婆就背着我给他买小说看。她说我们是夹缝里长大的，吃时代的亏，不能让下一代也在缝里扁着长。唉，一本老小说换个包装，就几十块钱，老婆卖小百货，这几十块就是她两三天的利润。

老威：您能给我谈谈“文革”中的经历么？

刘卫东：经历太复杂了，不晓得从何说起。

老威：您是什么时候参加红卫兵组织的？

刘卫东：1966 年夏天吧，具体的日子记不清了。

老威：当时四川有名的红卫兵组织有川大八、二六、红卫兵成都部队；还有重庆反到底、重大八、一五，您属于哪一派？

刘卫东：我参加的是二四革命造反军。您可能不晓得，因为这是个县级造反组织，它的观点与川大八。二六一致。

老威：好像书里没有记载。

刘卫东：书上记载的都是大地方，像北京、上海、广州，一有响动，具有全国性的影响。成都也有影响，但属于野史外传。再往下，造反组织多如牛毛，就有点闹农民起义的味道。不过二。四造反军在当时名声还算响的，我敢说，除了中江县的保守组织继光兵团（兵团司令为抗美援朝壮烈牺牲的英雄黄继光的母亲），就数盐亭县的二四军了。

老威：二四军有对立面么？

刘卫东：东方红兵团，这是个先保皇后造反的投机派别，后来被红卫兵成都部队收编。

老威：什么叫“先保皇后造反”？

刘卫东：“文革”初期，学校里刚有不安分的苗头，刘邓路线的工作组就进来了。工作组驻校，依靠的是党团组织，对蠢蠢欲动、串连造反的老师和学生实行审查，其中也包括反右、四清等历次运动中的专政物件。当时我 16 岁，也被审查，现在看起来都是鸡毛蒜皮的事：不守纪律、顶撞师长、与家庭成分不好的女生划不清界

线等等。本来派工作组蹲点整风是我们党从延安时期延续下来的一贯方式，非常灵验，几乎都能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在中学生中也搞人人过关，就过分了。还有什么“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谁要革命就跟着毛主席，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就更过分，血统论，骂娘，大约就是从这儿开始的。

老威：据史料记载，中央派工作组进驻大、中学校，其本意还是平息乱子，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因为从历史与现实的经验来看，社会动乱最初的导火索往往是学校。

刘卫东：在当时人们的意识里，工作组就象征着政治运动，一搞运动，专政的物件，牛鬼蛇神都纷纷出笼。今天咱俩是同志，说不定明天就“你死我活”，人民内部矛盾随时可转化为敌我矛盾。工作组是钦差大臣，想宰谁就宰，而根正苗红的学生干部也大大发挥作用，成天帮助这个帮助那个，其实就是没事找事，挽个套让你钻。只要你向党交心，吐露真言，刀把子就握在别人手里。在五七年反右中，这叫阳谋，“引蛇出洞”，后来的大小运动，“引蛇出洞”就成模式了——反党定时炸弹就这样培养出来的。对此，大伙都心有余悸。像我们这代人，营养不良，身体发育晚，可政治上却成熟得早，父母经常用亲身经历的血的教训来敲警钟：这辈子只能一颗红心，向党靠拢，否则死路一条。

老威：工作组就是党？

刘卫东：绝对是，几十年一贯制，天大的委屈也只能咽下去，所以蹲点审查（叫党领导下的文化大革命）没多久，学生中的坏头头一揪出来，学校就恢复上课了。学校间的“煽风点火”也中断了，贴出的大字报也都是保皇观点。这咋行？于是毛主席亲自发动文化大革命。

老威：你赞成“文革”？

刘卫东：赞成就是开历史倒车，这点常识我懂。但有人把“文革”的根源归罪于个人崇拜，我觉得片面。我们为啥崇拜毛主席？因为他老人家这次站在工作组的对立面，他在《炮打司令部》中数落的“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威风，

灭无产阶级志气”等快语，完全说到受排挤、压制、甚至专政的学生们的心里去了。既然有毛主席撑腰，就反他娘的。工作组、党、团领导整人整成了官僚，就是这批基层官僚，一贯瞒上欺下，动不动就上纲上线，六一、二年，明明成片饿死人，还向上虚报成绩，称形势一片大好。唉，你太小，不晓得那时人们对工作组，对官僚主义都憋着一肚子火，毛主席在发动“文革”前，到各地考察，可能也意识到党的改造迫在眉睫。

文革一夜之间就满山红遍，工作组被撵跑，斗争的矛头直指党委，二四革命造反军领风气之先，与之对立，过去围着党委转的学生干部也弄了个“东方红兵团”，装模作样地造反。嘿，各单位都在成立组织，审查机关早瘫痪了，所以用不着登记、批准，只要聚几个人，开个会，刻个章，把红袖章一戴，扯一面红旗上街，就登场了。盐亭小小的一个县，可能几天就成立了上百组织。太热闹了，过节一样。

老威：这么多组织谁来管理？

刘卫东：没人管理，县委已经被攻占了，书记县长被捉拿。万人斗争大会那天，盐中的操场山呼海啸，每个组织的红旗都在招展。县委一班人，文教局一班人，盐中的白校长，还有几十个地富反坏右、军警宪特、牛鬼蛇神都戴高帽、挂黑牌，被押上审判台，批斗了一上午，下午又接着游街。围观群众呼口号，吐口水，扔石块，打得走资派满脸淌血，还有些娃娃用竹竿追着抽，大伙都疯狂，把对毛主席的爱与对敌人的恨结合在一块了。你想，县长县委书记，平常谁能见上一面？高高在上的父母官啊，但现在，有毛主席为群众打气，就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了。

老威：整人就这么令你们兴奋？

刘卫东：不仅兴奋，而且高烧。这是历次政治运动栽培出来的。不同的是，过去大家是在组织的监督下背靠背地揭发，当运动员，可现在却倒过来，群起整过去运动大家的当权派，打死打伤不负责。就像在街上捉住小偷，不管丢没丢东西，你都想上去施展拳脚。法不治众，越狠越能逞英雄。我当时站在台上，负责揪斗白校长，大

家一呼口号，我就与另一个红卫兵一起把那颗白发苍苍的头朝下按。白校长戴的高帽中，还加了铁丝与铅块，帽檐都陷进头皮了，我们还感觉不解恨。没几天，白校长就感觉受不了，整夜呻吟不止。有个半夜，他去解手，我守在厕所外，20 多分钟仍不见动静，就进去查看，没人。我慌了手脚，忙报告总部。大批人马把茅坑搅了个底朝天，刚刚排除了自杀的可能，准备出通辑令时，有人报告，水井里有情况。我们用带钩的扯水竿子鼓捣了个把钟头，没结果。司令就派我下去“将功补过”。

我沿井壁下溜十多米，用手电筒一照，死人脸朝下泡在水中，我的毛根子汪地炸了，满耳朵都是狗叫，我急忙把铁钩搭上那衣领，自己吼着先上。不料刚把死人吊到一半，衣领豁了。那东西轰地栽回去，像深水炸弹。我只好再次下井，拿绳胡乱绕了好多道，弄扎实了。白校长终于露面，浑身青一块紫一块，脖子勒着根裤带。人家是几代书香门第，就他背叛了家庭，在上大学时参加了地下党。毕业后被指派回乡，利用教书先生的职业作掩护为革命工作，解放后，他一直勤勤恳恳地当中学校长，埋头教学，错过了许多升迁机会。

这是一桩轰动一时的谜案，谁也说不清他是咋瞒过监管人员溜出厕所。况且上吊与投井，人只能选择其中一种自杀方式。有人谋害？可当时的白校长已成过街老鼠，谁会去悄悄谋害他？

老威：白校长是在你的眼皮下失踪的，公安局没调查你？

刘卫东：我的确说不清。不过“文革”的大形势这样，我写个材料，上面就定性为“畏罪自杀”。“文革”嘛，就是学生打老师，群众打领导的运动。连小学生都动员起来，剃女老师的阴阳头，所以某个单位的走资派一旦死了，就白死。某个区的中学校长原是农业专家，一年四季领导学生们半农半读，把校园变成了花果山。被县文教局评为走五。七道路的典型，年年都有参观团上那儿去，不愧为世外桃源。不料“文革”一起，学生们摔了粪桶造反，把勤劳勇敢的走资派校长从果园揪出来，天天斗，每个学生都上台控诉。然后，红卫兵头头就天天押着校长沿田埂跑步，不管刮风下雨出太

阳，都喊着“一二三四”的军训口令，一直持续了将近半年。终于有一天，校长一头栽进稻田，就再也没爬起来。走资派这么快就见阎王，学生们感到遗憾，就把尸体支起来，开了个全校批判大会，再向上汇报。那时公安局从半瘫痪到全瘫痪，都是泥菩萨，谁为走资派立案调查，就是阶级立场问题。那年月，大伙一有机会就发泄积怨，就连小娃娃也经常扛着红缨枪，在街上拦着行人背《毛主席语录》，一旦有谁背错个把字，娃娃们就用枪头戳着你，勒令再背十条，若再错，就是对伟大领袖的感情立场问题，我在红卫兵总部，经常处理被娃娃们押送来的罪人，记下单位，勒令写检查，如果抵赖，说不定还要吃耳光，挨皮带，自己写检讨张贴出去，最后才通知你单位的造反组织来领人。

老威：这种红卫兵运动有点类似纳粹排犹或史达林的大清洗运动。

刘卫东：你有点危言耸听，其实斗走资派到后来也没劲了，人家啥罪都认，啥事都交待，很快就成了靠边站的死老虎。倒是东方红的势力不小，保皇卖乖，两头都占，还与二。四争夺胜利果实。两大派从文斗到武斗，最后升级到真枪真炮。不过东方红在人民群众中的名声臭，最终还是“失道寡助”，被二。四从盐亭县境彻底清洗出去。

活人斗垮了，红卫兵就响应领袖号召，“破四旧，立四新”，把红旗插向散布封建迷信的庙宇，盐亭虽是小县，但大大小小的庙太多，刻在石头上的菩萨更数不过来。庙好办，几钢钎把泥胎捣了，或直接把佛头敲下来，再乱砸一气，这比抄家工作量大，但比抄家简单，用不着登记反动书籍、信件、日记，作为被抄者的罪证。

刻在悬崖上的菩萨不好破，就从上面吊绳子拴人下去打，或用凿子，或绑炸药，弄完后，再刷上超级大标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最新鲜的是一所大庙里的和尚也造反，揪斗方丈和住持。红卫兵派了几十个战士到场助阵。小和尚们扯下封建主义的袈裟，也弄了身军装穿上，可惜没军帽，光着脑壳，呲牙裂嘴，像山上的棒老

二。他们拽下老和尚的念珠，挂上黑牌，挨个声讨老和尚不准他们革命，只准念经学佛的罪行。一个小沙弥下山请了张毛主席像，要挂在大殿中，方丈更是不准，还说毛主席是俗人的神。小沙弥说到激愤处，竟挽起袖子扇了他师父一耳光，振臂高呼：“打倒刘少奇的孝子贤孙张和尚！刘尼姑是刘邓路线的小老婆！消灭封建迷信释迦牟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老威：这叫造反？公报私仇嘛，乱七八糟。

刘卫东：我们还必须绷着脸，想笑，用咳嗽掩护过去就完了。

老威：革命已经发展得如此荒唐，您就没怀疑过？

刘卫东：像我这种平民子弟，能在风口浪尖上这么威风，连感激都来不及，林副统帅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

老威：毛主席也没说让小和尚造老和尚的反。

刘卫东：造反是时代最强音，“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老威：不愧是红卫兵，“最高指示”张口就来。

刘卫东：我的青春、梦想、狂热与浪漫，都与“文革”有关。不管您怎么看，至少在“文革”初期的一到两年里，人民是享有充分的自由，甚至绝对的自由。不自由的，受压的是走资派，是高干子弟，是特权阶层，他们平时高高在上，漠视民间的疾苦，今天，与以往任何政治运动都相反，世界翻过来，让他们也尝尝专政的滋味。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八次接见上百万的红卫兵，这在世界共运史上都史无前例。我也在红海洋里，跟着大伙一起欢呼、流泪，我们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挥着帽子，喊：“人民万岁！”真是人民与领袖心灵相通的时代，我们整整欢呼了几个小时，不停地跳，不停地挥红宝书，要是在平常，早晕倒了，然而此时此刻，连身体最弱的女同学都一直兴奋着，嗓子都喊哑了，冒烟了。过后，许多人好几天说不出话来，真的，嗓子出不了一点声。可多幸福，大家早晨起床，互相点头，微笑，心有默契地继续串连，像一群口含蜜糖的哑巴。也许，我们一生，就是为了那一天，那一刻而活着。

老威：现在还有圣徒的感觉么？

刘卫东：我为啥要否定自己的过去？否定那段历史？

老威：请别误会。

刘卫东：我这辈子没剩下什么，除了“文革”，值得回忆的还有啥子？

老威：我理解，您继续回忆，我在听。

刘卫东：我参加大串连就两个目的，一个是搜集毛主席像章，一个是亲眼见毛主席。我们组成一个红卫兵长征队，先到成都，住接待站，凭介绍信，免费吃住，还按人头分发毛主席像章。为了多要像章，我们就虚报人数，多跑接待站，然后到成都剧场门外。那儿成天人山人海，既是观点不同的造反派别的辩论阵地，又是交换毛主席像章的集贸市场，什么样式都有，我们在里面泡了个把星期，开了眼界，结识了不少新战友。因为串连的长征队铺天盖地，各接待站招架不住，连电影院剧院的舞台都腾出来了。那年头，人民币几乎都作废了，凭介绍信，完全能跑遍全国。

我们等了若干天上京列车，太挤，根本上不去。最后，只好约了大群新老战友，一顿冲锋，终于从车窗进去了。这哪是装人的，纯粹就是装鱼的罐头，人人背贴背，连出气都困难。但熬也要熬到北京！已经 9 月了，老是听说毛主席最后一次接见红卫兵，再晚就彻底没希望。

火车跑跑停停，也没个到站时间，像开着玩。每停一站，都要经受一次考验，人肉是软的，挤一挤，靠一靠，能多装就尽量多装。他妈我要是石头就好了，占了地盘就纹丝不动，没弹性，挤不坏。尽量少喝水，因为厕所绝对上不了。女同志怎么方便我不清楚，总之男同胞憋急了就掏家伙对窗外扫射，还得事先招呼领座关窗，以免“飞尿伤人”。有个娃娃脸的红卫兵憋不住大便，钻了半个钟头也到不了厕所，只好向靠窗的战友一个接一个行军礼，于是很多人道主义手臂托住他，让他站上茶桌，把不争气的屁股塞出窗外，拉了一泡极丢脸的屎。

大伙轰笑着，女战士们忙把脸转开。非常时期，都是革命战友，

谁也不会取笑谁。

也许您不相信，现在两天的上京路，那时要走五六天。我一天一顿饭，憋屎憋尿，拢北京时，膀胱都出毛病了，胀得要命，可站在便槽老半天，就不出尿。经过一番挣扎，那儿象藏了根烧红的针，出尿时滋滋地响，浑身都湿透了。

接见那天，我们半夜 3 点就起床，出发去天安门，但就这样也晚了，四点多钟，长安街两头就封住，根本进不去，我们绕道前门，听从指挥，随大流从纪念碑右侧进入广场，月儿高挂，与华灯辉映，一望无垠的绿军装与红旗……我相信，在场的每个人都为能生在毛泽东时代而骄傲。

后来的情景我刚才讲了。人是应该有种信仰的，信仰使人变得纯洁，勇于献身。

老威：所以有了规模空前的武斗，两派热血战士都为了信仰而拼得你死我活，有的父子、夫妻也因派性而反目，兵戎相见。

刘卫东：总比现在为了一点钱而拼得你死我活强。少女为了钱，可以去当三陪；贪官为了钱，不惜以身试法，用老百姓的社保基金去作私人交易；儿子为了钱，甚至可以勒死老母亲。有信仰的乱跟没信仰的乱是两回事。两派武斗，部队支左，全国开锅了，谁平息得了？毛主席一声号令，哪个敢不交枪？盐亭是全川第一个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县，成立大会那天，县城有 83 万人马，你想象得到一个总人口不足十万的小城，能装下这么多人？可咋样？就装下了，生活照常运转，因为有五湖四海的支援。我记得毛主席发表“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那阵，我们正在挖断通往富驿的公路，埋地雷，以防东方红借红卫兵成都部队的兵力卷土重来。但最高指示一下，我们马上填平深坑，撤掉路障，放下了武器。

老威：据我所知，许多当年的造反派头目都在利用各方面的老关系，做大生意，像川大八.二六政委江某某，工人造反兵团司令邓某某，重庆反到底的邹某某，重庆八一五的黄某某，当年都是省革委常委，受过江青的接见，即使坐牢也效忠四人帮。可出狱没几年，就彻底改头换面，融入经济大潮了。他们中生意做得最火的，

要数红成司令蔡某某，盖了整幢大楼，据说是本市最高的建筑物，还开了一所民办大学。

刘卫东：他们发财跟我有啥相干？

老威：向您提供一点资讯，仅此而已。老刘，您晓得作家张承志么？

刘卫东：不晓得。

老威：联动呢？

刘卫东：晓得，北京的贵族红卫兵嘛。

老威：红卫兵这个称呼据说是张承志发明的。

刘卫东：你晓得的还不少，可惜有些势利，眼皮朝上不朝下。说好红卫兵最终的目标是传播毛泽东思想，解放全人类，可这些风云人物，发达了，连广大落难的老红卫兵兄弟也不来解放，我三四万元了结一生，说惨也不惨。老红卫兵都当知青去了，据说现在还有许多没返城的，陷在农村，被社会遗忘了。前段时间的电视里，还播了某个茶场的知青扎根至今的现状，破屋烂衣狗食，比叫化子不如。他们最大的愿望是回到故乡，拿城市户口，吃商品粮。

40　流浪儿

采访缘起：我在《家教博览》杂志社做记者时，曾同失学儿童打过不少交道，应该说，大多数都不是坏孩子。孩子社会不过是成人社会的一个走样的复制品。

1998 年 1 月 16 日中午，我在成都九眼桥附近碰见了这个 14 岁的流浪儿，令我想起高尔基的童年。

我不敢对教育提什么意见，也不敢称那出书挣钱的教育专家是饭桶，因为我被这个小流浪儿反教育了一顿，我得承认他的生存能力比在学校里读书的同龄人强得多。

他在解构教育的意义，这也是大学的后现代学者们刻苦钻研的话题。

老威：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家住哪儿？大冷天的，你穿这么单薄，冻出病怎么办？

流浪儿：我不告诉你。

老威：那我把你交给警察叔叔。

流浪儿：我已经从派出所逃了两次，还有两次被爸爸领回家了，可我又跑出来。

老威：你这孩子真淘气。

流浪儿：我还上过电视，春节前，警察叔叔在火车站的铁路那边抓盲流，就顺便把我抓了。后来警察给我饭吃，给我衣穿，并在旁边议论把我朝哪儿送。电视台把这些都拍下来了。

老威：这不是光荣的事。

流浪儿：咋不光荣？我上了电视，你都没上。

老威：你流窜在外，父母急坏了吧？

流浪儿：他们不急。

老威：你咋晓得？

流浪儿：我不读书了。

老威：这就更不对了，你这么大的孩子，不读书，在外面会学坏的。

流浪儿：我没钱上学，爸爸妈妈都下岗了。

老威：全国那么多下岗职工的孩子都在上学，你爸爸妈妈还不老吧？完全可以另外找事做。

流浪儿：我爸爸妈妈是皮鞋厂的，厂里发不起工资，就发皮鞋抵工资，他们领了一大堆回家，自己不好意思出面，就让我和弟弟在路边摆摊卖，38 元一双。我们起劲地喊人卖鞋，爸爸躲在暗处，有时候，戴红袖套的城管撵过来，其它摆摊的用塑料布把东西一兜，驼在背上就跑。我们人小跑不动，就被逮住，要没收皮鞋。我们又哭又闹也没用，那些凶神恶煞的大人根本不理，就一个劲地问："大人呢？大人滚出来！咋个唆使娃儿干这个？"一直到最后关头，爸爸才出来，把我和弟弟一手拧一个，往城管怀里推，还拍打着胸口说："好，无照经营又咋个嘛？你把我的两个娃儿都抓去！厂里头破产了，这皮鞋就是我们一家的下岗工资，做、把工资给我们没收了，我们就跟你要吃！"

城管还不依，骂我的爸爸是无赖，爸爸就让我们去抱腿，红袖套才吓跑的。

老威：你还是很懂事。你应该回家，利用课余时间帮家里的忙。这样，既晓得父母生活的艰辛，又不误了学习文化。

流浪儿：我永远不去上学了。

老威：为什么？

流浪儿：有一次，爸爸又从厂里领了些运动鞋回来，就让我到学校门口去卖。爸爸说运动鞋适合中学生穿。我犟着不去，因为同一个班的同学如果看我在卖鞋，肯定会讥笑。可爸爸说："这不正好向你的同学推销产品，熟人更好卖。况且谋生有啥好笑的？"爸爸下岗后；常喝酒，火气特别大，我明知扭不过他，就只好持上鞋包出门。我不敢在学校门口卖，找了个僻静的地方，刚扯开摊子蹲下去，爸爸就赶到了，把我提起来就是两耳光，骂我不听话。我不

服，就顶嘴说：“你们大人讲面子，我们娃儿也有面子！为了卖鞋，我连学都上不成了。”说着说着，我就哭了。爸爸太伤我的心了。他不晓得学校也同社会上一样，有钱啥都能办到，像我这种下岗职工的娃儿，越穷越遭人欺负，连老师都偏心，喜欢又有钱又聪明的学生。

爸爸见我哭，就不耐烦地说：“好了好了，你不去，我去卖。顺便也找找你的老师，看学校能不能帮你减免一部分学费。现在大报小报都在谈‘再就业工程’，就让他们来关心一下你吧。”这时候，我妈也撵来了，把爸爸骂了一顿。她刚去人才市场招聘了，交了押金，领了一箱“粉刺霜”回来，她抚着我的脑袋说：“娃儿，这粉刺霜很适合女中学生搽，刚进人花季的女孩，脸上的青春痘肯定给她们增添了不少无言烦恼，你揣几瓶到你班上去给女同学们看一看，让她们一个人挖一点试试，效果不错的。”我推开我妈，气得说不出话。妈又得寸进尺说：“你不好意思去，妈晚上去登门拜访。你开一个女同学的名单，把他们的地址和电话号码写详细。妈这也是没办法。人才市场兴旺得很，上百家招聘单位，可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销产品。二三十岁的大学生都招不过来，像你妈这种四十出头的下岗女工，能够上试用就不错了。”我转身就跑，从此再也不想回家。

老威：学校晓得你的情况吗？

流浪儿：我都上了电视，学校咋不晓得我的情况？装耳朵聋装眼睛瞎吧。我讨厌我的班主任，只与有钱的家长打得火热，对我这种穷学生却一副冷面孔。

老威：假如有人发善心，愿意资助你读书呢。

流浪儿：我也不读，我害怕大家用那种目光看我。

老威：你这算啥？看过《高玉宝》吗？人家起三更睡半夜地替地主扛活，还一心想着读书。

流浪儿：我读过《半夜鸡叫》，老皇历啦。现在社会上的老板，没文化的多的是，一样呼风唤雨。

老威：好啦，这方面我说不过你。可我现在也看不出你有多大

出息。

流浪儿：我从家里跑出来时，身上只有几块钱，我已混了好几个月了。别说娃儿，就是大人也不一定行。

老威：你在外面游荡，以什么为生？拾破烂？当叫化子？

流浪儿：我打工。

老威：你才十四岁，法律不允许未成年人

流浪儿：我在餐馆端了大半年盘子，老板娘也下过岗，对我特别好，包吃包住，一个月给 200 元。后来老板娘让我拜她为干妈，并经常带着我到歌厅玩。有个歌厅小姐还没我大。我喜欢进迪吧，一堆年轻人挤着蹦迪，痛快得把啥都忘了，迪吧里中学生也不少，大伙都是港台追星族。

老威：你干妈对你不错。

流浪儿：嗯，她还给我灌酒，还要我和她睡。开头还一人一床被子，等我睡熟了，她就把手伸过来摸我，还摸我的雀雀。好几回，我都忍不住流水了。一流了水，我就想离干妈远一点，可她干脆抱住我不放。我怕和她睡觉，我只有逃跑。在火车站碰上另一个失学娃儿，叫谢敏，与我同岁，他是石棉人，爸爸是石棉矿的下岗工人，一家人穷得连多余的裤子也没有，他就跑出来了。我与他结拜为兄弟，一起混车到重庆去投奔黑社会。到了重庆，也不晓得黑社会在哪儿，只好成天在车站、码头游荡、打听，都快饿死了。只好主动到公安局自首，这是谢敏的主意。警察给了我们吃的，就要我们说出家里的地址和电话督以便把我们送回去。谢敏说："我们是小偷，来自首的。"警察叔叔笑了："这一带的小偷我都很熟悉，啷个没听说过你？"谢敏说："我从成都一路偷过来的，准备到重庆找黑社会。"警察叔叔生气了："娃儿家，莫乱说，你们这样跑出来，家里有多着急。"我说："叔叔你把我们关起来嘛。"警察说："又没犯罪，凭啥关你们。"我说："犯了罪的，我们偷了好几百元钱。"警察问：啷个偷的？"我说："摸包包嘛。"警察又问："上揣还是下揣？用没用片子？"我和谢敏都不懂，就反问："叔叔你说啥子？"警察哈哈大笑："连贼娃子的术语都不懂，还要摸包包？好了，今晚你

们就住值班室，明天送你们回成都，转给那边的警察叔叔处理。”我和谢敏都齐声说：“我们坚决不回家！”警察气得拍桌子：“两个小坏蛋！该打屁股！”就不再理我们了。

我和谢敏咬耳朵商量，觉得还是自己回成都好，就主动向警察承认错误。第二天，他们把我们送到火车站，打了招呼，我们就免费上车了回到成都，突然想家，就悄悄回去了一趟，还没拢屋，就听见爸妈在里面吵架，还乒乒乒乓地砸东西，太没意思了。我在大街上走了一夜，才在南门汽车站找到谢敏，他正与七八个小要饭的打得火热。见着我，高兴得跳起来说：“找不到黑让会，我们自己就创立一个！叫黑龙帮。你最大，当帮主，我们都叫你大哥。”我问：“为啥叫黑龙帮？”谢敏说：“我们都好多天没洗澡了，一脱衣裳，大家都是‘黑龙’。”小要饭们一听，全笑了，围住我就作揖。

老威：你们这么多流浪儿在一块，怎么生活？

流浪儿：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老威：录像里看来的吧？

流浪儿：我最崇拜成龙和元彪，谢敏崇拜李连杰。

老威：你们怎么挣饭钱？

流浪儿：打家劫舍，做梁山好汉。

老威：讲来听听。

流浪儿：我是在九眼桥附近读的小学，过去，我被大娃儿抢过好几次，他们几角、几块钱都要，有时还把书包抖在地上，慢慢翻，看有没有值钱的东西。有天下午，我和几个同学去川大的操场踢足球，突然，不知从什么地方跑出几个中学生，一个个都把衣裳敞开，像录像里黑社会的打手。他们慢慢围上来，揪住我们要钱，我们说没有，他们按倒几个同学就拳打脚踢。打够了，歇手的时候，他们中的老大走出来，把我们的 T 恤衫全剥下，笑着说：“这些衣裳借我们穿穿。”我说：“不行。”他就扇了我一耳光。他又问：“你们是哪个学校？”李冬说：“××小学。”他又问：“是哪个年级的，认识罗大明不。”刘清说：“六年级一班，罗大明是我们班。”他嘿嘿

冷笑说:“罗大明都向我们交保护费，一个月 30 元，他如果受了气，我们就帮他出头打回来。今后你们也必须交保护费，不交，我们就定期上门去收。”这时，另外几个中学生把我们书包里的文具盒全搜出来，装进一个帆布背包。他们还叫我们齐唱国歌，不唱要挨揍，声音小也要挨揍。接着，又让我们排队，当粧子，一人挨二十飞腿，挨完，又叫我们跑步进女厕所。当时，我真想与这帮坏家伙拼了，但他们手里都舞着刀。最后，他们就在厕所里，把我们的衣裳裤子全剥了，只剩条内裤。这件事，给我的印象太恐怖了。学校教务主任领着我们去派出所报案，你猜派出所咋说？“没办法，我们警力不够，只有派一个人到学校附近巡查几天，能不能抓到很难说；即使抓到了，也只能依法办事。都是娃儿，那么小就送去劳教也不对头，学得更坏。”我当时质问他：“假如你的孩子被抢了，你也这样处理？”所长苦笑说：“我也只有报警啊。”

老威：这跟做梁山好汉没关系啊？

流浪儿：我被别人抢过，现在，我是黑龙帮大哥，要把过去的抢回来。有些学生，仗着父母有钱，就耀武扬威的，我现在也经常向他们“借”钱用，让他们也尝尝受欺负的滋味。有一次，西北中学的一个软蛋撞上我们，没钱。我们搜了半天，连几角也没有，就火了，要揍他。他连叫饶命，说这会儿正好父母不在，他宁愿领我们去他家捞一把。我说，你家我们不去，你愿不愿参加“黑龙帮”？他说“愿意”，我说那就每个月 15 号交 100 元的会费。他说我又不挣钱。我说你爸妈挣钱，你爸还是局长。他说局长也是拿工资吃饭，而且他爸爸是清官，从不收别人的礼。谢敏一听就火了，说这年头哪来的清官？哄鬼！我也说，就是你爸这种装模作样的“清官”太多了，才搞得我爸妈下岗。于是弟兄们上前，一顿暴打。这东西第二天就交来了 100 元会费。

老威：你们这样做是犯罪呀。

流浪儿：我才 14 岁，你能把我咋样？

老威：送工读学校或少管所。两年前，我在《家教博览》杂志做编辑，曾收到许多被抢劫小学生的来信，我没想到强盗就是你们

这伙人。

流浪儿：全成都市像我们这种人多的是，有在校生，也有离家出走的，如果全抓起来，再建十个工读学校也不够。况且，工读学校有啥不好？有饭吃有衣穿，还强迫你读书，不交学费，不给老师送礼，也没有其它乱收费现象。我现在正努力创造条件，争取进工读学校，大不了进少管所，可以交许多朋友。录像里的英雄好汉，大半都是坐过牢的；没坐牢，在兄弟伙中就没威信。我和谢敏都说好了，争取十五六岁进去一趟，出来十八九岁，成熟了。

我们和其它乱抢钱的中学生不同，我们有理想，不抢下岗职工的子女，专门盯住大款子女，派人分头跟踪。他们老是被大人护着，要找单独行动的，还不太容易。可一旦撞准机会，就大捞一把。我们曾经把一个浑身名牌的小学生剥了个精光，然后照他屁股蛋踢一脚，可他不滚，嚷着要一件内裤遮羞。我们把他按在一个泥坑里就跑开了。

老威：你们简直是一群小希特勒！

流浪儿：希特勒？我太佩服了！我哪里赶得上他？

老威：你们认识成都 51 中的陈明志吗？

流浪儿：不认识。

老威：他就是被你这类梁山好汉给逼死的。

流浪儿：咋个啦？

老威：有人在校门口抢了他的球鞋，还逼他每月交保护费，他不堪侮辱，跳楼自杀了。

流浪儿：没出息。

老威：咋个没出息？

流浪儿：别人抢了他，他就应该抢回来，保护费嘛，交不起就明说。

老威：咋说得通？像你，人家说不说都一样抢。

流浪儿：说不通，就拿刀出来说嘛。

老威：出了血案咋办？

流浪儿：不会，我最佩服英雄好汉。

老威：你小小年纪，就一点心肝也没有。

流浪儿：没有心肝？啥意思？难道跳楼自杀就有心肝？难道向老师向家民告状就有心肝？娃儿之间发生的事，用不着告诉大人。大人的事也不告诉我们嘛。

老威：你还没学会明辨是非。

流浪儿：我爸爸也这样说，可他就晓得让我上街卖鞋。

老威：你现在就靠抢劫维持生活？

流浪儿：我们有好久没去各个学校晃了。那样目标太大，也容易引起公愤。我们现在人手多，定期向人收保护费就够了。

老威：定期敲诈？

流浪儿：人家可是自觉自愿交的，政府都收税，学校也收费，我们也可以收嘛。收了之后，人家如果被人欺负了，就会找我们帮忙打架。我们一个月要打好几架。过去，学校收了我们那么多钱，一旦被人打了抢了，也只好同家长联系，让我们自己注意安全，起不了作用。我们比学校负责得多，要找一个人，想方设法都要找到。

老威：这些也是跟港台录像里学的？

流浪儿：对。我最喜欢看黑社会的录像，四川联大后面，一条街全是茶馆录像，两元钱一座，我是娃儿，又是老顾客，一元钱也看得成。

老威：社会上开展了好多次净化校园环境的运动，报纸的宣传力度也很大，这没影响你的饭碗？

流浪儿：中国的事儿，一阵风就过去了。

老威：你这娃儿还晓得“中国的事儿”？

流浪儿：大人常这么说，坐茶馆，耳朵都听起茧子了。

老威：你现在还想家吗？

流浪儿：他们都不想我，叫我咋回去？等将来爸妈都找到正式工作了，不下岗了，我还是要回去看看。

老威：想读书吗？

流浪儿：跟你说过不想读书。不过，如果你要收我做干儿子，我就跟你回去读书。

老威：万一明早你就跑了呢？

流浪儿：跑了还会回来嘛。我们都是自由人，谁也管不了谁。

41　碎尸犯卢人标

采访缘起：1990 年 8 月 31 日，太阳把山城重庆烤得象一块焦黑的馒头，我的歇斯底里症初愈，便得一机会，去重庆某看守所拜访了 28 岁的杀人碎尸犯卢人标。

经过两道岗哨，我随律师抵达预审科大楼，找了一间提讯室。随后，我见着已镣铐加身的卢人标，他黑脸膛，身高仅 1.58 米，象未发育成熟的大孩子。接着我们开始交谈，虽天气酷热，但我听得冷汁淋漓。律师始终呆在门外，他表示不敢再重温那毛骨悚然的故事。大约一个星期以后，卢人标就被执行了枪决。据说在绑赴刑场前夜，他坐在刑床上连看了三部以琼瑶小说改编的言情录像，还意犹未尽。午夜，值班警察巡查，提醒他写份遗嘱，他充耳不闻，正如《水浒》里鲁智深所唱：“赤条条，来去无牵挂。”

老威：请抽烟。

卢人标：还是箭牌？多给我几支，我带回监舍。

老威：房中不准吸烟，你就在这儿过足瘾吧。

卢人标：这样连着抽，会醉的。

老威：不急，有的是时间。我和你的律师是朋友，是他带我进的看守所。他在门外。我明确告诉你，我是个好奇心极强的文化人，我想和你聊聊。

卢人标：无所谓了，反正再过十几天，我的复核期满，就要绑赴刑场上西天去。我的案子谁都知道。

老威：是吗？犯人在监舍里都互相交流案情吗？

卢人标：里面太难熬，为了打发时间什么都谈。除了外面的花花世界，有时也探讨怎么个死法。像我这种人当然不得好死。

老威：你的个头这么小，瘦骨伶仃，真有力气干那种事？

卢人标：是没力气，平常我连杀只鸡都手抖。我的爸爸去得早，是我妈把我拉扯大的。我对女性很崇拜，加之个头小，人就很自卑。

我读过不少书，羡慕白马王子和灰姑娘的故事，结婚之前，我认为男女之间就应该那样花前月下地浪漫一辈子。为了把书本化为现实，我和妈妈起早贪黑地开杂货店，攒了一笔钱。我对女孩子没啥要求，只要不讨厌我就行。后来经人介绍，我认识了李淑之，再后来她成为我的老婆。

老威：你说慢一点，我记不过来了。

卢人标：慢的在后头，前面开场白没啥趣儿，我就尽可能地简略，你想把我的事儿写进书里吧？

老威：我是做研究的，当然要顾及事件的每一细节，这对治疗心理疾病有用。我不写通俗的凶杀案小说。

卢人标：你做研究？我可是没病的人。

倘若有病，经法医鉴定属实，就不会负刑事责任。我们房里有个山里的樵夫，把老婆当柴劈了，还背着那捆血淋淋的“柴禾”翻山越岭去乡政府报案，后来通过县、地、市三级鉴定，此人患有狂躁性精神病，就送医院了。

老威：严格地说，我们都存在某种心理缺陷，当某种外力恰好击中了这种缺陷，每个人都有可能在瞬间丧失理智，沦为疯子，所谓人格力量，就是对自我心理缺陷的克服。现在，你继续讲你的事儿。

卢人标：我的老婆比我高半个脑袋，很丰满。新婚之夜就骚得不行，把房事搞得象打仗一样，分第一战役、第二和第三战役，全没有新娘子的羞涩感。他妈的，即使不是处女你也要装一装嘛，可这娘们不，把门一扣，就迫不及待地自己脱了个精光，象头狼搂住我就啃，她喜欢在上面干事，第一战役还没打光，就把我浑身弄得伤痕累累。于是，她叫我“伤病员”，一把从床上兜起我，到卫生间洗鸳鸯澡，我完全在她的把握之中，全没有爷们儿的制空权。有一回，我说我不行了，你快把我压散架了，还是让我上来吧。可那娘们象暴君一般勃然大怒，将我翻转身子，轮圆巴掌就打屁股，她还把尿撒在我的脸上。

老威：男人做到这一步，不过性生活也罢。

卢人标：不过不行。我老婆一天到晚就想着这事儿。她说从小家穷，四口人住九平方米的小屋，虽然隔了布帘，但自己是在父母的交欢声中成长起来的，十二岁的时候，就习惯在半夜随着旧床的嘎嘎破响有节奏地向上挺身子。她已经有过好几个男人，怎样分手的我当然不敢过问。后来我阳萎了，成了名符其实的武大郎。

老威：你老婆是潘金莲么？人都死了，你可不能这样败坏她。

卢人标：比潘金莲还过火。潘金莲是被王婆拉下水的，她好歹只偷了西门庆一个男人，就落得千古骂名，可李淑之把我弄阳萎后，就公然把野汉子带到家里来，并把我关在卧室门外。王八蛋做到这步田地，你说好笑还是好气？偏偏我这代表男性尊严的棒槌只有到这步田地才啪地弹起！

老威：你应该找你老婆评理，如果她屡教不改，就离婚！唉，你们结婚前也太不了解对方了。

卢人标：你这是九十年代的语言，可李淑之嫁我的时候三十四岁，已赶过了趟，她只能把家庭作为幌子。她不言离婚，我也不敢开口，谁叫我那方面不行呢？剧作家魏明伦为潘金莲鸣冤，认为她和武大郎不配，才同西门庆乱来，这我赞成。

老威：你开始还说羡慕白马王子和灰姑娘呢，怎么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你应该到法庭提出离婚，再找个理解你的女子，你不该放弃你的感情理想。

卢人标："理解"？这世上最不好找的东西就是理解，于是我准备用菜刀来"理解"她。

老威：你还算条"汉子"啊？

卢人标：我在她偷汉的空隙里与她上床，天气酷热，大家都剥得赤条条的，电扇呼拉拉疯转，把屋内的摆设都卷得摇摇晃晃。李淑之从汗渍中爬起来，冲个凉，放了盘邓丽君的歌带，第一首歌是《夜留下一片寂寞》。此时已是夜里 11 点，李淑之还嘀咕着要拉张席子到外面阶沿睡，因为在小巷内，整个夏天都铺满了露天纳凉的人，不分男女老幼。我劝住她，我说我们好好谈谈。她古里古怪地笑了，我见她笑，心一颤抖，差点哭了出来。我想在邓丽君的歌里

忘却一切，与老婆重归于好，于是伸手摸她的奶子。不料她一下打开我，咬牙切齿地骑上来干。我说你慢一点，温柔一点，别把性别弄颠倒了。她说怪你自己没本事。还捉住我的小鸡鸡，又搓又拔，我急出一身冷汗，她却嘲笑："你祖上三代都是太监吧？"这下我真火了，就趁她伏下身啃我脖子时，猛一铁头功，撞中她的前额，她还以为我开玩笑呢，捂住双眼直骂娘，我弓腰摸起事先放在床下的菜刀，双手握住刀把砍过去！

老威：当时想什么了？

卢人标：想个逑。我嗡地一声头大了，那刀片子却稳稳地陷入李淑之的前额，把那大脸分作两瓣。她嘎地坐直了，眼睛和嘴都张成山洞，要把我吞下去。她自己动手朝外拔刀，在床上使不了劲，她又下床把身子抵住墙，摇那刀把。血象眼泪一般淌了下来，她终于发出了尖叫。我冲过去堵她的嘴，与她夺刀。刀拔出来了，跟着，从那口子冲出一股血。好狠的娘们，她居然还有力气从地下捡刀，并把我从里屋追到外屋，再追到厨房。情急中，我操起剁排骨的斧子一挡，刀片子飞了。现在我到底翻身了。我骑在她身上，一斧接一斧地朝下砍，我听见了她的呻吟，既温柔又遥远，书里这么写过，只有女人在性交高潮时，才会情不自禁地发出这种哼哼声。我的棒槌变得又粗又大，从娘肚子里生出来，我还从没见过它这么威风凛凛。为了把这种快感，这种征服持续得更久，我就先挑肉厚的、不太致命的部位砍。手臂、小腿、大腿、屁股。但我舍不得弄破那乳房。这女人的肉太多了，一斧下去，开一条槽，她身上就多了条阴道。这世界，这屋子都是阴道！这种联想使我亢奋极了，我就丢下斧子，去舔她的血，还一口接一口地咬她的乳头。现在我是想做什么就什么。李淑之咽气时脑袋略略向上抬了抬，我急忙与她接了个吻。接着，我夫妻俩痛痛快快洗了个鸳鸯澡，以前，都是她主动伺候我，动作粗得象个屠夫，而这时，她变温柔了，害羞了，软绵绵的，这才是个新娘子，这才有女人味！我翻来覆去替她洗了两个多小时，感到她变得有点僵了，就将她抱回床上。她到处都开着缝！这才够刺激！我与她交配了八次，人都累瘫了，可还意犹未尽。于是我就拣肉嫩的地方啃，我把乳头、阴唇和腋肉都生吃了。

老威：我真想呕吐。

卢人标：我当时就吐了出来，其实生肉不好吃。于是我烧了一大锅水，把李淑之的心肺掏出，煮了十分钟，再切成片，蘸姜、蒜和酱油当下酒菜，我吃了二两心片，就觉得很饱。趁着醉意，我下手割肉，并把一块块上等精肉装进五个塑料袋，冻入冰箱；骨架子和脑袋砸散之后，就地掩埋。我还把双手和双乳挂在床头，欣赏了一夜。

老威：你把杀人、烹调和性交全混在一块了。你清楚自己的行为么？

卢人标：律师也曾这样问，我说比平常更清楚一百倍！我从娘肚子出来已三十载，一直被社会瞧不起，而在那一刹那我自由了。哦，忘了，我在埋葬李淑之的骨架前，还熬了半锅肉粥，我把她的脑袋割下，端放在桌边，我给她喂粥，夹菜，我俩口子进了最后一顿晚餐，还痛哭。唉，我的灰姑娘，我喃喃唤道，李淑之的形象一下子变了，她果真穿著水晶鞋在半空中跳舞，也许我的前半生是在丹麦安徒生的童话里，我到中国是投胎投错了。

老威：你压根就不该生出来。

卢人标：这可不像心理医生说的话。其实人生有许多门坎，你没迈过去的时候，感到深不可测，于是退缩。如果一个人一辈子没翻过门坎，那即使活到 100 岁，也没意思。李淑之是老天硬摊派给我的克星，我对她恐惧，但也渴望战胜恐惧，因为她那长期压迫我的肉体是相当性感的。

我越阳萎，越想操她，我已在梦里把她搞得服服帖帖，我甚至已把她的皮剥下来，用鸡巴戳出一个洞。而当我真杀了人，我才觉得杀人有什么了不起？性交也是杀人，男人与女人本来就是刀与鞘的关系。

老威：你的意思是人人都该杀人，把刀入鞘？

卢人标：天晓得。我们是在隔着生死门坎谈话呢，而当我肢解李淑之时，全神贯注，每根神经都像接着电源，通过一阵阵酥麻和心灵内的光，使她的局部活转来，我在那些心肝、毛发、碎肉上，

看见了她的笑容，她性交后的满足，她毫无重量地瘫在我的怀中，她就是我了。瞧你这幅相貌堂堂的公子哥儿样，是不可能铭心刻骨地爱某个女人的，你是爱自己胜过爱别人，我没你这种个头和气质，只好用全部身心去为情赌博。

老威：你又把自己想象成现代《奥塞罗》了，可人家在错杀苔丝狄梦娜之后，幡然有悟，以死谢罪，算得了顶天立地的大丈夫。

卢人标：我与莎士比亚“英雄所见略同”，杀了她，然后去爱她。

老威：一个屠夫就是这样理解世界文学经典的？

卢人标：你倒提醒了我，好作家都是潜在的杀人犯，不过，他们都把这种冲动发泄到纸上，于是就有了世代流传的悲欢离合的故事。我从小受这些故事的骗，在现实里，在女人问题上碰壁。当我的一腔怒气被李淑之激发出来，我就把作家发泄到纸上的冲动发泄到她身上了。我在创作对吗？

老威：你是艺术家？见鬼。

卢人标：成不成家倒无所谓，干任何事都要有灵感。二战期间，有个纳粹军医曾经用少女乳房剥下来的皮做了个灯罩，那可真是举世罕见的艺术品。你想想，女孩的胸多细多嫩，而光透过针眼一般的毛孔，扩撒开去该多么的温馨！

老威：你是怎样被发现的？

卢人标：我妈回来了。本来自结婚以后，老人家就一直住在杂货店料理生意，李淑之口碑太差，我妈就有意躲着她。已经过了一个多星期，我把冰箱里的冻肉快吃完了。我妈却回来了。她一进门就发觉气味不对头，我忙着熬稀饭、炒菜、可刚上桌，我妈就从稀饭里挑出一个指甲盖。

她哇地吐了。接着，老人家一声惊叫，就冲出门，我拔脚就撵。在街上，我拦腰抱住我妈朝屋里拖，她死活不进去，我急了，竟咬她的耳朵一口。我被街坊邻居扭送派出所，我妈出卖了我。也许再过两天，我把冻肉吃光，把战场里里外外打扫一遍就没事了，偏偏这个骨节眼上……

老威：你家里少了个大活人，谁都会发现的。

卢人标：她离家出走了，现在外出打工，很平常。

老威：你还挺有心计，不过你吃人好像上瘾了，拿不准你还会去杀人来吃。

卢人标：没有能超过李淑之带给我的快感，我这辈子全给她了。你是港台的恐怖片看多了吧？谁会杀跟自己没关系的人？

老威：入狱后日子难过么？

卢人标：等死当然难过，但现在如果宣布无罪释放，我也活不下去。我碎尸吃人，大家不会再与我交往，活在世上而没人理你，也同坐牢差不多。里面就不一样了，都是罪犯，非奸即盗即杀，都好不了哪儿去。我的邻铺是个强奸杀人犯，这东西竟把被害者卸了丢进公共厕所，太可恶了。

老威：这段日子你胃口怎么样？

卢人标：我天天都想吃荤，原来我以为判了死罪的人会茶饭不思，不料比猪还饿得快，睡得足，脚镣手铐不碍事，心静自然凉嘛。但愿挨枪子时遇上个好天气，有点阳光，我好与李淑之天堂约会。不知行刑的法警枪崩一批脑壳要休息多久？会不会做恶梦？

老威：如果让我马上枪崩了你的话，我是不会做恶梦的。外国电影里，常有罪犯临刑前良心发现，向神父进行忏悔的，你呢？

卢人标：你是神父吗？那么好吧，神父，请再给我买一包烟。

42　专访民刊主编罗吉

采访缘起：罗吉居然混成人物了，并且是北京文化圈里举足轻重的人物，这是我做梦都想不到的。

十几年前，我们一起办过民刊，那时，大家很文学，很穷酸，乃至愤世嫉俗，后来年龄一天天大了，成名成家就顺理成章。现在，我已记不清楚罗吉到底写过什么作品，但他却办过十几种民刊，并且没有停止的迹象。

1996 年 4 月 28 日下午 4 点，太阳天却刮着阵阵冷风，我应约在北京亚运村安惠里的一幢拔地而起的公寓楼里，拜访了故交罗吉。人过中年，乍一相逢，彼此险些没认得出来。好在罗吉没有大师幻觉，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但愿这篇采访不会败坏“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胃口。

老威：我找罗吉。

罗吉：你是谁？

老威：我是老威。

罗吉：老威？怎么成光头了？你的毛呢？你原来可是大名鼎鼎的大胡子诗人呵。

老威：全变样了，隐居四年，这世上的风水不知转到哪儿去了。听说你还在办《汉语贵族》？

罗吉：感觉如何？

老威：我读过一两本，感觉不太好。上面发表的东西，在公开刊物也能发表，这样，就失去了民刊的真正意义。记得 80 年代初期么？那时我们多年轻、多纯洁。我们写诗、写小说，一次次投稿，一次次被退稿，由于石沉大海的回数越来越多，我们变得愤世嫉俗，开始自己编印自己的作品集，然后投寄出去。我们就是这样认识的。几个月，我们通了几十封谈诗的信。后来你千里迢迢地跑到成都，带来一大包稿子，都是些陌生的作者。我们的第一本民刊就这样诞

生了，印了一百本。取名为《弃儿》。其实，这种被抛弃的感觉正是民刊闪光的地方。包括文革当中的大量手抄本小说、诗歌及“黄色歌曲”，都是被当时的社会主流所拒绝和抛弃的。这是一条源远流长的在野文化之河，它甚至可以上溯到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前，以及百家争鸣时期。那时候，在官方正统的标准之外，民间自有标准，这种在野的文化力量甚至能够反作用于朝廷。

罗吉：从文化的本源讲，是这样。可惜老威，你已经落伍了。我呢，很矛盾，我既有与你相通的一面，也有特别世故的一面。你想想，80 年代，我们办了多少民刊？从最初印数一百本的油印集到最后印数三千多本的铅印集，还发起了那么多诗歌流派和运动，结果又怎样？我们自以为是人物了，全国各地的大杂志也逐步接受并隆重推出我们的作品了，评论家也跟着凑热闹了，结果呢，轰轰烈烈一场，到头来什么都没捞着。你现在连个工作也没有，我呢，与你一样没工作，可比你混得好。

老威：你凭什么比我混得好？

罗吉：凭办民刊。我这《汉语贵族》，自己又不掏腰包，但我可以借这个说事，掏那些附庸风雅的大款的腰包。你可能知道，现在办公司发财的这帮人中，有不少 80 年代的诗人和作家，或至少是文学爱好者，后来，由于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拳打脚踢也没混出名堂，只好含泪投笔下海。

现在，拔他们九牛一毛也是给他们一个弃恶从善，重温旧梦的机会。另外你想不到的是，这些民刊赞助人中也包括洋大款，组织、个人都有，关键是找对门道。其实在国外，赞助办刊已经非常普遍了，大学里刊登短篇小说、纯诗的小刊物，印数几百上千，卖不了钱，只能供市场外的免费交流。这种赔本买卖一般只能靠大公司赞助。美国最著名的华文杂志《知识分子》，一年出四厚本，装帧非常精美，就是金融杀手索罗斯长期资助的，后来索罗斯认为这份杂志太缺人间烟火，就卡断经费，《知识分子》也就无疾而终。

老威：你一年能拉多少赞助？

罗吉：请原谅，我不能透露。

老威：但我还是能参悟一二。递一本杂志过来。你看你这个编辑委员会，全是国际国内文学艺术界的当红名流，他们也在上面发表作品……好些还是旧作，十几年前写的，也拿在这上面重发……这首十四行诗，有一个比诗长得多的注，注里面还有注："见我的某篇散文……"还有这篇小说："一只金丝雀死了，全镇的人都去为它送葬，连镇长也参加了……"这类童话也叫非官方文学？为啥不发在《儿童文艺》上？其实，这帮名流根本不愁发表，只愁社交活动太多，把写作时间挤没了。你这种办刊风格使我想起《南方周末》上的一篇娱乐通讯，叫《话剧、时装和大雪》，几百字的行文，在朝和在野的名人达几十位。罗吉，你这不是绑票吗？

罗吉：我绑谁的票？

老威：绑这些名流的票，然后用这把票去换赞助。

罗吉：这也叫"绑票"？那我巴不得天天有人绑我，多绑几回，诺贝尔奖的候选人也好有我一份。老威，你是嫉妒了吧？拿点作品，我推你一把。唉，无响无臭地熬了这么些年，也够可怜的。

老威：我嫉妒个逑。改日我自己印个刊物不就成了。

罗吉：还蒙在鼓里？老兄，再象 80 年代那样胡闹不行。从前，你我都嘲笑过大使馆诗人和 party 诗人，他们成天冒着风雪，抱着私印诗集在使馆区转悠，见着有什么二秘、三秘或文化参赞偕夫人出现，就拼着老命朝人家怀里塞诗。在这一惊天动地的过程中，还得伴以浑身哆嗦和莹莹泪光。多凄惨的一幅地下诗人形象！至于 party，纯粹就是展示诗外功夫的战场，你不要怕表演得过火，因为在洋人眼里，中国人都一幅熊样——你我都嘲笑过类以闹剧，我们是艺术豪杰，要坚守书桌呕心沥血，然后自产自销。

老威：对，销不了就自己放着，安慰自己的灵魂。

罗吉：那你怎样糊口呢？

老威：可以用一半时间谋生，做与写作无关的事。

罗吉：那你为什么写作呢？

老威：为了使自己活得高尚。史铁生说，他是为了不致于自杀

而写作。

罗吉：谁知道你活得高尚呢？

老威：自己知道。

罗吉：这能维持多久？人是软弱的动物，需要互相依偎，互相取暖，这种取暖不光是肉体，而且是精神。你不可能老是自言自语："我写作，我高尚；我写作，我高尚……"你写作的目的是要让别人知道你高尚，并且为你这种高尚感动、付钱。中国人民太势利，感动他们不如感动老外。

老威：汉语和其它语种的隔阂你是知道的。我的朋友戴迈河告诉我，在他的家乡加拿大，人们把汉学家叫做"外星人"，你能感动外星人吗？

罗吉：能。89 年 4 月，我列席过《今天》派的聚会，主题是把第一届《今天》诗歌奖授予朦胧诗元老多多。北岛从国外赶回来做主持人。那真是一个中外盛会，地点是在一家豪华的咖啡厅……我至今无法说清内心的感受……大伙依次发言，给多多以相当高的评价。我想，他默默写作了很多年，为什么没被历史忘记（即使暂时忘记了，也要在一个有众多老外参加的时机被隆重挖掘出来）？这是因为他是 70 年代地下诗歌的元老，在他的写作背景上，有思想解放运动，有《今天》，有朦胧诗的一大群人。

这群人已被或正在被世界文坛所接纳，而国际社会对中国艺术家的首肯至今夹杂着强烈的意识形态成分。所以，即使多多的诗比瓦雷里还纯，"地下诗人"也当定了。海子就没这么幸运了，也许他和多多同样优秀，但他没办过民刊，只出过个人诗集，一个缺乏背景的纯诗人的自杀，在当时不可能引起多大的关注。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诗人下场对我震动很大，海子自命为太阳王，比你高尚吧？可他为什么活不下去？因为别人并不承认他高尚，逼得他以死证明。而多多，不用自己开口，人人都觉得他高尚。一刹那，我似乎什么都悟透了。办了十年民刊，爬了十年格子，他妈还是一张白纸！于是，我开始从头学做"大使馆诗人"和 party 诗人，比自己曾经嘲笑过的那些"前辈"更疯，也更有耐心。与 70 年代和 80 年代不同，

90 年代的诗和小说已经被抽空了，什么也没有了，只有靠操作，借助民刊这种形式，借助艺术家在水深火热中的形象才能捞取一些现实的好处。

老威：我曾在国外许多中文报刊上，看到列举的中国大陆“地下诗人”和“地下诗刊”，其中你和你的《汉语贵族》位置非常突出。我想问你到底印了多少本？出了多少期？为什么在国内文学圈里几乎见不到？

罗吉：我首先要满足国外市场。各大使馆，著名学府以及知名汉学家，然后才是国内赞助人、各界名流和研究机构，至于文学圈里的同行，送不送无所谓。能不送尽量不送，免得被人看破机关，群起效仿，竞争对手就多了。

老威：你是机关算尽，供销对路。

罗吉：送谁不送谁是一门学问，这关系到下一步的国际知名度。唉，你我 80 年代，一年要写 100 多首诗吧？除了偶尔发表混点稿费之外，还得赔钱办民刊，我从来没做过出国梦。而现在，我一年只写十几首诗，却已经跑了十几个国家，参加了五个诗歌节，得了三次国际奖，当了两回访问学者，自己没掏一分钱腰包，还白赚一个美籍台湾老婆。不错吧，老威？现在我是两岸四地跑，大陆、美国、台湾、香港。人生就象玩牌，在大陆时，我玩美国牌，玩欧洲牌，访问学者、什么鸡巴奖的得主，谁谁谁的评价等等，唬得人一愣一愣的。我已经出了几本诗歌、散文集，还搞过签名售书，上过中央电视台的读书节目，此外，我一年之中要做无数次文化晚会的特约嘉宾。而在美国，我玩中国牌，异见诗人，受官方压制，不能发表作品的诗人，民刊编辑者，地下文化火种的传递者，民主自由战士等等，也唬得人一愣一愣的。国际文化基金会、写作计划、文学讲坛总拉不下我；可在台湾和香港，我就大陆牌和美国牌一起打，时而爱国时而反共，时而夹杂两句“yes”“no”。他妈的，我终于迎来了骑着民刊“作威作福”这一天！

老威：怎么，你把民刊当作马骑？

罗吉：不错，人一旦被公认高尚，你想不高尚也不行。我这刊

物上名流如云，我就骑他们，我什么私货也不发，我白给他们办刊。只要马屁拍得快活，你要我给你发专集、配大幅照片、规格搞得同大师并肩我都干。混到这份上，人就应该宽容，理解，积点口碑。

老威：我觉得不少官办杂志都比你这类以诗歌为主的民刊更激进，比如《天涯》《东方》《收获》《方法》《读书》《花城》，甚至大众化的《南方周末》。这些报刊也面向海外，并且还上了国际互联网。

罗吉：你的意思是老外会把官办杂志与民刊放在一块进行比较？

老威：对，他们应该有自己的判断。绝大部分民刊上的绝大部分作品（甚至百分之百）能通过官办杂志发表，除非艺术质量存在问题。中国作家有极强的双栖性，黑白两道的好处全不放过。罗吉，你玩这种民刊魔术，就没穿过帮吗？

罗吉：民刊是一种形式，同一个作品，在民刊发表和在公开刊物发表完全是两回事。公开刊物是社会机构内部的一种常规文化操作，即使作品出了问题，也是经过审查制度的，属正常批评范畴；而民刊本身就象征着一种反常规的自由表达。这两者的区别，西方人是很看重的。有的时候，由于几十年意识形态思维的惯性，他们乐意把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看成是一个，比如前苏联和中国。苏联一解体，对付它的一整套方法就挪向中国，包括传统政治背景下的文化对抗，而民刊正是文化对抗的产物。在前苏联，帕斯切尔纳克、茨维塔耶娃、曼杰尔斯塔姆、布尔加科夫、阿赫玛托娃、索尔仁尼琴以及布罗茨基等人的大量优秀作品，都曾经只有以“地下”形式保存和流传。《古拉格群岛》被作者分藏了若干个地点，最后才辗转偷运出国，公开发表引起世界震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布罗茨基因写诗和游手好闲的罪名，被判几年苦役，他一生只在前苏联的官办杂志上发表过四首翻译诗，而大量的作品都通过地下杂志流传到国外。当美国和欧洲出版他的诗集，好评如潮时，他正在劳改地孤独苦闷得要死——西方人乐意把这一切意识形态笼罩下的艺术家劫难图照搬到中国。他们忽略了改革开放 20 年来，上述苏联异端

作家、诗人的生平和作品已为中国文化界所熟知。翻译出版界做了大量工作，《日瓦戈医生》《古拉格群岛》等对抗文学的代表作，在80年代和90年代都有好几种版本。

有了这种参照，民刊的重要性不言自明——除了反人道的制度的苦难凌驾于个人自由之上，西方人对中国当代文化的批评就缺乏基本尺度，就处于普遍失语。于是，悟性极强的先锋诗人们，其次是先锋作家们，群起投机。由于汉语的隔阂，造成中国作家在西方成名难，但谁要说他是中国的帕斯切尔纳克、中国的阿赫玛托娃、中国的米沃什、以及中国的布罗茨基，成名肯定要顺畅得多，这至少为吃汉语饭的汉学家们提供了一种研究套用方向。而这些中国特色的“前苏联作家”是应该受迫害、受压制，只能在民刊上发表作品的。

形式比内容更重要，姿态比作品更重要。一个广告泛滥的后现代社会，是不认可“十年寒窗苦”的。唐代诗人贾岛的名言是“十年磨一剑”，现在的人马上会问：“你磨来干啥？有磨剑的功夫，不如去研究信息爆炸。

研究定位。”再优秀的作家，没有定位，就没法包装和炒作。比如我的定位就是民刊主编，我能造出一批接一批的民刊诗人，大伙利益均沾，绑在了一块，就通过互相吹捧的文章结成“大师同盟”，凡进入这个圈的都是大师。动不动就搞中外对话，如答皮特教授几十问之类。其实“皮特教授”说不定就是他老婆、舅子。

老威：罗吉，你倒是一个明白人，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罗吉：我想每个人在成名操作之初，都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一旦骗术得逞，出国去泡几趟，就真以为是那么回事了。比如有人写关于卡夫卡的诗，初衷或许很简单，崇敬、追思、怀念之类，可后来因操作得当，不小心去了奥地利，说不定就会觉得卡夫卡的魂儿缠上身，一路打着大师摆子回国，最终就是中国卡夫卡了——这很占便宜，中外人民不动脑筋就记住他了。

老威：模仿大师还有这好处？

罗吉：当然。例如我向某某机构或某某人推荐你参加明年的荷

兰诗歌节，或柏林庇护作家写作计划，我连比带划解释半天，对方也搞不懂你为何许人，所谓辉煌之作的重大意义。可只要我说："他是中国的卡夫卡，写的是中国社会的《城堡》，对方马上就会 OK，OK 地翘大拇指。这就是他妈的东西方文学交流！

老威：你说到这儿，我倒想起三年前的北京"中国魂诗歌朗诵会"，那次，中国的帕斯切尔纳克某某作为特邀主持人上台，向观众频频颔首致意。这小子在深秋天气里，裹了一件帕氏的长风衣，并且给十来岁的儿子也裹了一件，就是在莫斯科郊外别墅幽居时，老帕常穿的那种式样。当这一大一小两种型号的"帕斯切尔纳克"大步流星地提前退场时，欢众席传出阵阵赞叹。可没料到，我的一个朋友不识趣，竟自称是中国的波德莱尔，拦住中国的帕斯切尔纳克，请求他引荐自己上台朗诵中国的《恶之花》。

中国老帕勃然大怒，指着他的鼻子大骂："太无耻了！竟敢亵渎大师！"

中国老波不服，顶撞说："你都可以，我为什么不可以？"中国老帕说："你没有资格！"中国老波一拳过去："这就是资格！"于是会场秩序大乱，椅子腿横飞。中国老帕经常出国，有贵族风范，自然不屑于和无赖纠缠，就捂着一嘴血撤退了。——其实模仿大师又不是某个人的专利，我当时不明白他为啥发火。

罗吉：模仿的人多了，大师就不值钱了。其实这个中国帕氏，在国外打工几年，也够苦的，还曾为了偷打国际长途被房东赶出门，不知为什么变成这样。

老威：还不是你的民刊把这些人宠坏的。今年他还刚从你这儿捞了一个奖，仪式搞得和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差不多。

罗吉：不过是文字功夫而已，又得不到一分钱。好啦，老威，今天的话，哪儿说哪儿丢。你一定要捅出去，我也拦不住你。不过别用我的真名，否则我不认账。

老威：好吧。

43　拆迁户罗月霞

采访缘起：60 出头的罗月霞从市中区的黄金地段迁到化成小区已好几年了，仍然很难适应拥挤、嘈杂的环境。“人太多，都是过路的，”她说，“过去那种几代人的邻里关系已找不回来了。”城市要现代、道路要扩张，所以拆迁每年都必要。随着大量老化而贫穷的居民搬出去，我们这座古城正迅速失去历史，失去怀旧而感伤的歌谣。整齐划一的灰色楼群崛起着，人口膨胀着，我只好安慰罗伯母：“还是搬到郊外好，熟人少些，心要静些。”从罗家出来，正是 1996 年 3 月 9 日傍晚。街灰蒙蒙的，夕阳烧得像哮喘病人的肺，违章占道的菜农们叫卖得猖狂。

老威：罗伯母，您是从哪儿拆迁过来的？

罗月霞：线香街 78 号。

老威：在啥位置？

罗月霞：靠近玉带桥。一出线香街口子，就能望见“陈麻婆豆腐”的招牌。那是上百年的老店，成都人都晓得。在我的印象中，陈麻婆天天生意兴隆，许多人占不着堂里的座位，就在堂外阶沿蹲着、站着吃。还有把豆腐碗搁在地上，呷口小酒的。真是三教九流，口味不分等级。

老威：陈麻婆还在原地么？

罗月霞：还在原地，可是麻婆已经不是麻婆了。品种少，口味差，堂子弄得花里胡哨，不晓得里头是卖几毛钱一碗的豆腐呢，还是卖其它啥子稀奇。过去那一带全是平房，公馆不少，都是青石板路，经常有娃娃在街边打弹子，跳橡皮筋。还有拉黄包车的，叫卖丁丁糖和豆腐脑的，管这一段的巡官（相当于现在的户籍警）一身黑警服，都扎着白绑腿，夹根哨棒走来走去，这家那家打招呼。有时闲得磨皮擦痒，也会当街抄手一站，看娃娃玩，或者加入小孩阵营，在地上蹭来蹭去打弹子玩。唉，算了，眨眼之间，这些都不见

了。上次我回去，居然在玉带桥迷了路。骡马市一座天桥，没走几步，就是座大立交桥，周围高楼大厦，都贴着大广告，桥下是迪厅与商店。那个闹！那个挤！汽车、自行车、人都不让路，密密麻麻的。才没多少年，人就像从地缝里一茬接一茬朝上冒。我一问线香街，都不晓得，嘿，活见鬼了！多少代的老街，转眼就消失了！幸好“陈麻婆”三个字我还认识，往门口一站，心才踏实了。

老威：天上一日，人间百年嘛。罗伯母，您才 60 多岁，应该多出门走走，适应新形势、新路段，因为这十几年，不单成都，全国每座城市都在变，拆老街，建新街。

罗月霞：新形势就是富人朝城里搬，穷人朝城外搬，现在我们都搬到茶店子以外了，还有些老街坊，听说去了九里堤，还有东郊跳蹬河。过去那儿全是农田，郊游也跑不了这么远，抗战时期，日本鬼子 108 架飞机炸成都，为疏散人口，开了五条火巷子，可人也没跑出环城四十八，穿城九里三。

老威：过去的线香街是啥样子？

罗月霞：铺板门一家挨一家，都做单一小生意。成都人天性闲散，懒觉睡到九点多钟才起，汲着拖鞋，打着哈欠开门，或摆摊，不求富裕，只求温饱。烟摊、糖饼、麻饼摊、锅魁、包子、小面、干杂、酱醋，店多客少，要啥有啥。解放后公私合营，不做小生意的懒虫许多进了厂，上下班当职工了。78 号里多半是职工，类似的大杂院，街面上还有好几处，都是双扇黑大门，门坎高，两岁娃娃只能横着翻。

老威：夜里还关门么？

罗月霞：解放前夕，市面上太乱，一会儿兵匪一会儿游行，所以大门夜夜都关。兵匪还撞过门，把门鼻子大铜环也撬了一只。白天平安无事，学生的游行只经过玉带桥，拐不进线香街。许多巡官跑出街口，包括管我们段的，嘟嘟地吹哨子。邻里百姓都堵过去看热闹，有的还挥胳膊，跟着喊反饥饿反镇压反贪污腐败反涨价的口号。巡官吹哨子，撵大家回去。我们也掏出泥哨跟着吹，气得巡官不撵大人了，专对付娃娃。那时我没满 10 岁，腿短跑不快，经常

被逮。巡官一只手捞起我，另一只手高高举起哨棒，然后轻轻落向屁股。我惊风火扯地放开大嗓门，又嚎又抓，巡官没法，就发一颗水果糖，作为没收泥哨的价钱。我凯旋而归，嘴里还吧吧吮着甜头，继续追游行队伍。有时队伍太长，尾巴还在玉带桥，头已到了皇城坝，甚至少城公园。娃娃们要跟小半边城，直到听完几轮演讲，才捡几张传单回家。解放后，游行都由政府组织，除喊口号，敲锣打鼓，还扭秧歌。当然，逮我的巡官倒了霉，听说发生抢米风潮时，他与其他巡官被派去守米铺，挥哨棒打伤了不少人脑壳。都鸣枪了，饥民还一浪接一浪朝里涌，终于掀翻柜台，抢空了米仓。巡官被挤在旯旮里，抱着头，差点就逃不出来。改朝换代，他因这事成了群众的冤家对头，开过大会，定为反革命军、警、宪、特，后来被镇压了。

老威：怎么判的？

罗月霞：解放军进城不久，阶级斗争形势复杂，只要群众检举，军管会核准就执行了。唉，咋不垮？官匪一家，物价飞涨，号召爱国市民用金银硬通货去换金元券、法币，最后一贬值，厚厚一沓钞票，换回来几斤米，这和抢有啥区别？好在 78 号院里还和睦，都是几十年的老邻居，知根知底，就互相挪着借着过吧。送走旧社会，精神面貌也就变了。军管会挨家挨户登记户口，成立街委会。在进大门的水井旁边，挂了块牌子，大门也就不用关了，直到文革搞武斗之前，大门 20 多年没关过。那时人人都爱解放军，我们 78 号院里有位租房的女学生，与街委会的上级，一位南下干部谈起恋爱，结果结婚了两、三年，才被清查出来，她是官僚资本家的公馆小姐，读过成都女中。南下干部气坏了，自己老婆成了剥削阶级埋在床头的定时炸弹，官肯定升不上去，婚也不能说离就离，犹为恶劣的是，她还伪装进步，涂改成分骗婚！于是俩口子三天两头打，南下干部是东北人，性子暴，一沾了点酒，就解下皮裤带，把老婆从屋里抽到院里，滚得全身泥，也没人敢上去劝。60 年代生活紧张，南下干部带上两孩子，住进单位吃集体伙食，才个把月不回来，他老婆就饿死在床上。不愧公馆小姐，死也讲究。阴丹蓝对襟扣罩衣，脚登老式锈花鞋，头发梳得光光滑滑，后面挽了个髻。脸都饿塌了，

还搽胭脂点口红。她的门反扣，帐子罩得严实，个多星期了，屋里没个动静，邻居就报告了。派出所撩开帐子，大伙才敢进屋。人都硬了，还好，冬天的死人不臭。南下干部赶回来，跺了跺脚，就骂："什么鸟终归是什么鸟！"

老威：人死了还骂？

罗月霞：北方人就这脾气，况且，亲不亲，路线分，时代风气就这样。文革分派，一家人经常搞得势不两立，78 号几十户人家，动不动就爆发大辨论，后来发展到动刀动枪，比南下干部饿死老婆还过分。我们家七口人，61 年饿死了两口，还剩五口，分四派。我跑公交车，当售票员，随大流加入了正宗的造反派"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丈夫刘永刚在川棉厂当炊事员，也随大流加入了正宗的保皇派——"产业军"，爸死了，妈无职无业，自然是逍遥派，弟弟是老三届高中生，参加了"红卫兵成都部队"。这下热闹了，大家都在捍卫毛主席，都以为家里的其他人图谋不轨。比如刘永刚，一个炊事员，文化又低，若不遇生活紧张，填肚子第一，我一个漂亮大姑娘会嫁他？真是笨人有笨福，他自己也长期唯老娘的眼色是从。这样久了，俩口子就真拆不散了。可是文革把啥拆不散？老刘他是铁杆老产，还执迷不悟，我和弟弟要撵他，这老保就真搬出去住了。

线香街离西南局、成都军区、省市委都近，所以整夜都能听见围攻这些单位的高音喇叭，战歌反反复复地唱："万炮齐轰西南局，烈火猛烧省市委，坚决打倒李井泉，彻底解放大西南！"公交车被借出去了一半，红卫兵站在车顶，舞红旗，举话筒喊话，下面人山人海地鼓掌。老刘一辈子就这一回，与我拧着干，结果倒了血霉。"三军一旗"大游行没多久，就被中央文革小组宣布为保皇组织，勒令解散。川棉厂是产业军的老窝，被造反派围得水泄不通，那时军队还没支左，所以基本凭原始肉搏战。我对老刘又恨又担心，万一把这条保皇狗的腿打断，我还得服侍他。弟弟参加了一线战斗，搭十几米的竹梯攻楼，结果一波接一波的红卫兵被石灰水浇下来，还有的进窗口就被逮住，直接抛出来的，有些学生娃娃在摔下来的过程中还高喊："毛主席万岁！"这样一来一往好几天，双方都杀红

了眼，就朝死里整了。川棉厂被攻占，弟弟挂着彩回家，一沾床就睡着了。我摇醒他，问见着他姐夫没有？他摇摇头，又睡了。两天两夜没醒。等终于醒来，他又拿起钢钎，跟大部队去攻打文殊院产业军第五军军部。保皇派大势已去，这仗只打了半夜，就胜利凯旋。快天亮时，有人敲门，一打开，是老刘，满脑壳纱布，浑身臭泥。我赶紧给他烧水洗澡，扶他躺下。解开纱布一看，右前额凹进去一条槽！我差点吓晕了，老刘说他守在文殊院后殿，红卫兵攻进来，边喊"缴枪不杀"，边拿钢钎迎面戳来，他头一偏，矛尖就嚓地擦了过去。他们都举手投降，红卫兵的前线卫生员才过来替他包扎，然后准备验明身份，集中关押。出殿时，他趁人不注意，拔腿就逃。

四面都在喊杀，没办法，他只好钻阴沟了。我说："活该！"他说："月霞呀，我们有 5 个月没见面了，形势发展得这么快，我是工人阶级，咋会反对毛主席呢？一定是他们蒙蔽了中央文革小组。"我说："还顽固？把你交给红卫兵算了。"他说："再顽固也是你男人，如果死在外头，你再革命也一样守寡。"我细细一想，是这个道理，就可怜起他来。

不料这头才按平，那头又翘起，产业军一垮，红成与兵团、八二六又分裂成两派，打起来，解放军参加支左，有人暗中打开军火库，引诱学生娃娃去抢。我们俩口子与弟弟为了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反目成仇，他把枪都拖回来了，还是邻居拦住。武斗升级，真枪真炮干了一年多，线香街上经常能拾到大把子弹壳，娃娃们在院里赢子弹壳玩，我儿子把装小人书的木箱也腾出来，装得满满的，甚至还有没打响的整子弹，用钳子夹开，将炸药倒掉，弹头就不会意外炸了。

78 号还死过红卫兵的司令，前院张姆姆的儿子，没满 20 岁，到中江与继光兵团作战，牺牲在郊外的凤凰山。继光兵团司令是抗美援朝烈士黄继光的妈妈，据说背双枪，八面威风。红卫兵司令在半坡挨了一梭子弹，立即成蜂窝了。他被运回来，平板车，身上覆盖着红卫兵的战旗。护驾的大小车有 20 多辆，堵住两边街口，然后整条街都成了灵堂，花圈、挽联、祭帐、白花、白绸，从头到尾，铺天盖地。78 号的大门前，还搭了两根大柱子，撑起"为有牺牲

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超大型挽联。灵柩放在门里，从早到晚，吊唁的人不断线。这么多年过去，这种规格的丧事我再也没见过了。

老威：伯母的记忆力不错，心也挺年轻的。

罗月霞：那年头的稀奇事太多，只能记个大概。

老威：其实不同朝代风尚也不同，不可能一成不变地延续下来。

罗月霞：我有点文化，晓得城市、街道变不变由不得小百姓。比如皇城坝，明朝的蜀王府，清朝改为贡院，68 年城墙内还有明远楼、至公堂，可轰隆一声，成平地，只因为皇城门楼像北京天安门，连御河与御河桥都一样。这还了得，除了北京，就成都有这种皇帝风格的建筑，李井泉把四川搞成反毛主席的独立王国，这就是另立中央的铁证。

老威：太可惜了。

罗月霞：每个老成都都感到可惜，因为穿过三个门洞，里面早没皇帝。解放前，皇城坝成了扯谎坝，住着不少看相、卖唱、拉条皮、贩毒与野鸡，相当于现在的三无人员。毛主席说："不破不立。"拆了皇城坝，在废墟上又敬建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展览馆。这是省革委成立时，献给毛主席的礼物。听说坐飞机朝下看，完全是个"忠"字，检阅台正中的主席像，就是"心"字中的一点。主席像基座高 7.1 米，象征党的生日；主席像高 12.26 米，暗喻领袖诞辰。非洲人民送给他老人家的芒果，转赠过来，就拿玻璃匣子供在里面的东方红展厅，让亿万人民瞻仰。我看到的是个蜡制芒果，金灿灿的，我没去过热带，因此与许多群众一样，第一次见到这么珍奇的神果。

老威：水果咋能瞻仰？放太久就烂了。

罗月霞：这是精神寄托，谁会想到吃它？你晓得人民南路的毛主席招手像原来准备垒多高？

老威：不知道。

罗月霞：比现在的像高十倍，或者二十倍。总之，要让全市人民从各个角落都能望见。

所以运“忠字石”的车辆尽夜不停朝城里开，若遇特别好的巨大石头，还要挂红布，敲锣打鼓。也许是忠心表过头了就劳民伤财，也许是垒那么高的塑像技术不过关，反正轰轰烈烈的计划停了下来，修改成目前的“万岁展览馆”。改革开放后，大楼顶上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不知不觉地消失了，换成各色广告，万岁展览馆又变成广告展览馆。绕皇城一圈的东西御河，在中苏珍宝岛边境之战中，响应“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领袖号召，抽干水，建成防修正主义原子弹的防空洞。那年头经常响空袭警报，政府大力宣传空防知识，但洞子一次也没使用过，后来就适应经济形势，改防空洞为地下商城，直到现在，这也是全国最大的地下商城。可惜，已关门好几年了。

老威：这算文革中最大规模的城市改造吧？

罗月霞：应该算。

老威：皇城坝消失了，许多与它相关的掌故、习惯、文化也随之褪色。但时代潮流不可抗拒，我想年轻人还是喜欢变化的，改善居住环境正是造福于民啊。

罗月霞：你说的也许有道理，但我在线香街住了大半辈子，不想动。太熟悉了。现在我住在这五楼，三室一厅，九十多平方米，电视、电话、沙发，煮饭烧天然气，应该说比过去方便。可我住在这儿，想的全是线香街的事儿。这楼房，也没个邻居，儿子媳妇一走，门一关，就老俩口在家，像坟墓一样。还有这防护栏，与其说防盗，不如说把监狱的铁栅搬回来了。老刘退休没事，整日在家练书法，耳朵不灵，与人说话不方便，就干脆装聋卖哑。他一天最多下一次楼，20 多分钟。上个月我回线香街寻古，不过大半天，老刘就出事了。他下面吃，一不留神，面汤就泼到手背上。我晚上回去，发现他在被窝里，自己用烂棉花蘸酒精裹手，我赶快通知儿媳，送他上医院，医手，顺带查病。除高血压，还有自闭症。医生建议他上老年大学，与人交往，如果性格一时改变不了，练练气功也可以。

现在啥都要花钱，老刘节约，加上厂里不景气，老是拖欠退休

工资，更别提报医药费了。他穷担心的事多，连降压药都舍不得吃。我俩口的退休工资加起来，不到 500 块，得计划才行。米面油盐先买齐，吃菜就简单了。只要不生病，生活不是主要问题，恼火的是楼里没个邻里关系，一关门，独家独户，哪个习惯得了？一单元的陈大爷，住在七楼上，死了一个多月，都没人晓得。等到他孙儿出差回家，打开门，苍蝇嗡地就扑出来，满床都堆着蛆，把人的肉也看麻了。郊区不比城里，贼娃子牵线线，贫民窟没啥钱，就啥子都拿。自行车、电视、肉，甚至猪油，并且一偷就是好多家。你要养狗防盗呢，狂犬病办公室又收狗税来了，真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老威：你这附近有居委会嘛，把大家组织起来，开展活动，重新建立邻里关系。

罗月霞：人与人除了钱，就没关系了。居委会开麻将馆，还不是图个桌子钱。居委会主任是个贪官，光垃圾费，他一年就贪污 6 万多。本来环卫局规定每户每月的垃圾清运费为 4 元，他翻番，收 8 元。原先大家都没在意，是他自己在发廊搞按摩，黄色了一盘，在兴头上告诉小姐的。小姐还算有点人味，气不过，就揭发了。

老威：居委会主任也能贪污？太稀罕了。

罗月霞：社会风气如此，再低等的交椅，只要坐上了，不贪污就不正常。有权不谋私，就是瓜娃子。78 号好啊，几十家在一个院里，像大家庭，磕磕绊绊的，有许多想头。多少年了，每户就一把挂锁，有粗心的，出差顺手把门带上，三五天不回来，也不会丢东西。夏天晚上，都把篾席扯出来，铺在大院里，边乘凉边吹老龙门阵。星期天，大部分人没事干，或约起逛春熙路，或听收音机。唱川戏，拉二胡，各逞所能。廖家七妹是唱清音的，四十几岁，嗓子还又脆又尖，能唱整段《毛主席去安源》。我家老张啥也不会，就混在娃娃堆里，单腿斗鸡，跳拱，拍纸烟盒。老张有几百张纸烟盒，老刀、中华、蓝牡丹、红炮台，尽是老牌子，一张起码值五十万。娃娃们老想赢他的老烟盒。可老张厉害，趴在地下瞄一瞄，张开手掌，虎口向下一扇，起码翻六、七张。他的烟盒越积越多，几乎集中了全院百分之六十的老烟盒。于是，他每逢心情好，就坐在

床上数烟盒，一万两万，十万八万，四十万五十万，超过二千多万了。有一回，李家三娃偷了他的红炮台，他就叉腰站在门口吼：“哪个贼儿偷了我五十万？！”

老威：烟盒这么值钱？

罗月霞：现在叫“收藏”吧，还有存糖纸、火柴票，在娃娃们看来，老烟盒肯定比钱值价。唉，穷开心的岁月，一去不回了。

老威：当时拆迁的情况咋样？

罗月霞：一两年前，我们就晓得要拆迁了，还以为要等很久，直到某天上午，居委会开会，宣读了拆迁通知，大大的拆字从玉带桥拐弯，一直刷进来，大门也“拆”，围墙也“拆”。大家才手忙脚乱收拾东西，办理搬迁手续。我家原住面积 41.5 平方米，国家照还，多出的面积，就得出钱买。拆迁房修得简陋，位置又在二环路以外，所以价格算便宜，500 多一平米。整个算起来，这次拆迁我们家花了 4 万多元，还没装修。

搬家那天，来了几个老外，要买老窗框、门柱和门楣。，上面描的金都黑了，但老外喜癫癫的，说就要这种民俗效果。三百元，我全部卖，包括梳妆台、水缸。传了三辈人的东西，一搬，就散架了。老外要了搬家公司的车，东撬西敲，恨不得把整座院子都抬走。

我一步三回头，眼泪都出来了，这是住了多少代的家，搬走了，心还在这儿。邻里互相告别，留地址，约定以后还要串门。穷人永远都是朝城外搬的命，不管哪朝哪代，都一样。

44 居委会主任米大喜

采访缘起：金光村是成都市最老的贫民窟之一，由于地盘偏狭，位于城建死角，所以至今没有折迁响动。我曾随母亲回去了几次，旧屋和旧邻都还在，我在这儿渡过了整个少年时期。

73 岁的米主任是少年老威心中响当当的人物，虽时过境迁，但昔日雄姿犹存。当我在桌边整理这篇文字时，那个时代的马车轰隆隆地从脑海中碾过。

车辙碾得再深，终有一天，还是会被时间的尘土湮灭。可米主任这一代毕竟是存在过的，并构成一个社会最初的基础。

请世纪之交的健忘的读者记住这次访谈的日期——1996 年 11 月 4 日下午 2 点。

老威：我找居委会的米主任。

米大喜：老的还是小的？

老威：老米主任。

米大喜：我就是，不过已退居二线了，今天是暂时在这儿替女儿执班。请问同志您贵姓？您的单位介绍信和有效身份证件呢？

老威：我不联系工作，我是二幢廖老师家的二毛。

米大喜：二毛？！长变了长变了，认不出来了。这些年，你在哪儿发财？咋不回老街坊打一头？你们家的房子可是好久没人住，房管局下来调查几盘了。

老威：我妈每个月都按时交房租。我家地势低，墙角浸水，啥都发霉了，没法住人。

米大喜：你妈绝对高傲，不与居民上打照面，你这做儿子的，也该常联系。

老威：我是想常联系，可这一带下点雨，就同水牢差不多。今天我拐了无数道弯，人都转晕了，才找到居委会。我记得原来的居

委会在正街上，好风光哟，您老人家每天早晨都在门口举行挂旗仪式。

米大喜：你不愧文人，一翻就是老皇历。我刚当居委会主任才40 多岁，因工伤右手残了，就从齿轮厂病退到街道。当时想不通，因为 60 年代，工人阶级是最吃香的，可转眼之间，人废了，还与东家长西家短的婆婆大娘们为伍。各级领导都来做工作，还把我选为区人大代表。你说的米家大院，就是派出所的汪所长和我们一起去征用的。原来住了个大资本家，开纱厂的，几个儿女都跑海外去了，就剩两个老的，乡土观念重，不愿背井离乡。公私合营后，他的厂子归国家，有劳动人民当家做主，他就没事可干，整日闲赋在家了。65 年下半年，虽然文革还没正式开张，但火药味已闻得见了，所以我们一去，老家伙就晓得咋回事，马上顺水推舟说他解放前剥削工人弟兄，罪孽深重，经过这十几年的阶级斗争教育，已脱胎换骨，洗心革面，早就想把这座祖传的剥削阶级的袱袱卸下来，奉献给国家，只苦于一旦奉献了，就要露宿街头。汪所长倒爽快，马上开了证明，叫人拿到房管所，给老俩口换了当街一间九平方米的屋。

老威：你们这是违法。

米大喜：那个时代，革命就是最高的法。再说，两个老人住那么一座十来间屋的大宅院，整天也提心吊胆的。周围全是贫民，平均每人的住房面积才几平方，就你资本家特殊，真不怕闹鬼？真不怕被群众的口水淹死？告诉你，把资本家的大院改成居委会，是全体人民都赞成的好事，要不，文革闹起来，造反派不一把火烧了才怪。

老威：后来呢？

米大喜：后来街道也造反了，居委会又改作某某派的临时军部，直到 68 年省革筹成立，张梁刘张当了政，市面上才初步有了点秩序。接着又是红卫兵上山下乡，所有的组织逐步解散，居委会又开始办公。

老威：办公？居委会是政府？

米大喜：居委会是政府的基层群众组织，算是最低的一级吧。街道办事处和派出所才是正儿八经的政府机构，具体管我们这段的只有一个户藉警，而办事处经常与我们打交道的是群工科。

老威：你领工资么？

米大喜：能领一点固定的补助，叫不叫“工资”？至今没个说法。我是共产党员，区人大代表，能计较报酬么？这芝麻官是世界上最累的活儿，党的各项方针政策都要通过这儿向下传达，群众有啥反映，也要通过这儿向上汇报，当然啦，各个时期的重点是不同的。我们这段，鸡鸣狗盗之徒多如牛毛，如果没有居委会这级组织配合政府进行整治，早翻天了。

老威：米主任，您还没说居委会是如何搬出朱家大院的。

米大喜：老头的两个儿子从美国回来了，不愧是洋教授，很会说话。他们一进屋先鞠三个躬，感谢党和国家，以及街道的人民群众按政策替他家照看房产，说本应付清这些年的看家费，但考虑到居委会同志们的无产阶级觉悟高，金钱反而会损害大家的感情和形象，所以，特送“海内一家，叶落归根”的锦旗一面。

老威：这么说，他们要回来为国效力？

米大喜：你信他这套资产阶级的鬼话。我们前脚搬，他们后脚就开始拍卖房产。那是 1985 年，国家还没开放到这种无法收拾的田地，大伙基本都靠工资，打着灯笼也找不出几个特别有钱的人，所以，那院子没人要。你猜他咋办？他回过头找政府，喊出 30 万的天价要卖给政府，歹毒啊。换了毛主席时代，群众个个都会站出来扇他嘴巴，可现在风向转了，资本家吃香，资本家兼有海外关系的洋教授更是香上加香。政府仁慈，想借此安抚海外游子受创伤的心灵，吸引他们回来参加四个现代化，然而，这种人已被美帝国主义彻底俘虏了，拿了钱，马上走人，还说自己的家产已脏得象垃圾场。

老威：现在那种规模的宅院得卖 200 万吧？

米大喜：拆了。太可惜。我不是为院子可惜，我是为政府的钱可惜，当时的 30 万现在值多少？建 10 所希望小学也用不完。前面

那条街正处在干道上，全拆了。这儿是死角，开发商来看了，地盘窄，又不当街又不当路，而且是穷人窝，没啥赚头。唉，拆迁全凭运气，有运气的都迁了，迁不了的，哪怕到了世界末日也迁不走。很多人不明事理，按多年习惯，啥事都找居委会。我们又变不出房子来。

老威：您老人家是群众的主心骨。

米大喜：哪个又是我的主心骨呢？

老威：您可不能悲观，现在虽说不讲阶级斗争了，但外来人口多，形势复杂，缺了您这一角儿，派出所和街道办的人下来，都两眼一抹黑，他们找谁了解情况？您就是政府的眼睛、鼻子和耳朵啊。那家聚赌，那家租房，那家来人没报临时户口，那家非法同居，您都一清二楚嘛。记得小时候，街坊上的二流子都特别怕您，因为公安局要送谁去劳教，也得征求您的意见。

米大喜：现在也要征求我的意见，不过商品经济，大多数还是罚款。前一晌，我女儿领着派出所的同志挨家挨户查《暂住证》，抓了十几个来历不明的人，都送城郊的多宝寺收容所了。按他们的罪，送劳教绰绰有余，但都只关了几天，只要有人替交罚金，就放。

老威：他们犯了啥子罪？

米大喜：聚赌、嫖宿、看黄碟、不办《暂住证》或《暂住证》到期不续签。

老威：这好像不是罪吧？这叫生活作风有问题。

米大喜：你的脑壳才有问题。过去，莫说这样明目张胆地看黄碟、嫖宿，就是偷看手抄本也够劳教资格。你家隔壁的西皮娃，传播《少女之心》被人捡举，我领派出所去查抄，人赃俱获。于是挂黑牌，游街示众，还送劳教三年。罪名就是“传抄《少女之心》犯”。

老威：都是邻居，您何必断送人家的前程呢？

米大喜：好人坏人，我一眼就能看出来。以前有部朝鲜电影叫《看不见的战线》，我连看了几遍，感触很深。就由居委会出钱，把联防队员、积极分子、义务交通员和居民小组长都请到电影院受

教育，我也在看不见的战线上，唯一的法宝当然只有依靠群众，80 年代以前虽挨家挨户查户口，在查之前，都由居委会到派出所反映敌情，因此表面上是普查，暗地里早有重点可疑对象。

老威： 75 年，我舅舅刚作为最后一批战犯特赦回来，就被您老人家查过，弄到派出所去泡过一夜。

米大喜： 你舅舅是国民党，行迹可疑，容易引起误会。不过，几十年了，让我撞上的误会就这么一次。唉，过去的事了，而现在，打击犯罪的力度要大得多，一年要来好几次拉网清剿，公安、武警在全区、全市统一行动，连派出所也只起配合作用，居委会呢，也跟着跑，但同过去相比，只算得上敲边鼓。

老威： 这样好不好？

米大喜： 倒是痛快，可这样一来，群众的积极性就挫伤了。

老威： 现在不是打人民战争的年代，依法治国，群众靠不住。当然你们这代人除外。

米大喜： 二毛同志，你咋能站到群众的对立面呢？

老威： 我不站到群众的对立面，今天就不来找您了。这块地盘，过去是成都市无业人员最集中的地方，而今，这里除了小商小贩就是小偷小摸。我们的老屋被撬了好几回，没损失啥值钱的东西，不过是几瓶老酒，一台冰箱，一台破电视机。我没报案，掉这么点东西就报案，会笑掉人的大牙。米主任，您明白是咋回事，前天猫毛俩兄弟打架，老二捅了老大一刀，幸好没出人命，也私了，没报案。这地盘，就这么个传统，您不会不晓得吧？

米大喜： 我晓得，要相信政府有魄力解决治安问题。唉，你着急，政府比你还急。去年夏天由居委会出头，在这门口开了个茶馆，天天爆满。我原先设想，形势变了，过去那种通过喇叭吼一声，大家就端个小板凳来开会的作法行不通了，开个茶馆，你不通知他自己就来。我们利用这个场所，既卖了茶水，又宣传了党的政策，还可解决几个闲杂人员的就业问题。一举几得。那晓得，莫说在茶馆里读文件，就是读报纸也没人听。不但不听，还要起哄。我女儿劝我灵活点，报纸没人听，就改打川剧围鼓，这是传统文化，弘扬忠

孝仁义和社会主义并不冲突。这一来，老年人欢迎，年轻人捣乱，夜里一开场，就有人告到电视台，要求派记者来采访“噪音污染”。众口难调，我这个居委会主任也没主意。嘿，你没主意，群众自己有主意，打麻将，一摆就是六、七桌，还闹桌子不够。于是大伙也不请示你了，就各从各的家里抬桌子板凳，一会儿就摆了一坝，还拐弯，又有人过来接电线，牵电灯，这叫啥话，居委会变成大众赌场了。还有人建议我按桌子收钱，说：“茶喝不喝没关系，只要有麻将打就行了。”

老威：这叫财神爷进门，你拦都拦不住。

米大喜：我一个受党多年培养的干部，咋能把大家引向邪途呢？

老威：麻将也叫邪途？那成都市全体人民都入邪途了。没有一家茶馆不赌。

米大喜：不少人赖在茶馆打通宵麻将，赢了就吃喝嫖耍，输了就偷鸡摸狗。

我后悔，想关门大吉也来不及了，连女儿也劝我听之任之。然而，我是居委会主任，我要为这段的治安负责。有一回，五幢的驼背打麻将输了一万多，疯了，回去就喝滴滴畏，幸好他老婆发现得早。事已至此，我只好主动到派出所投案，报警抓赌，等于自己封自己的门。很多人都在背底里咒我骂我，因为这件事，我辞职了，派出所决定，由我女儿接任。

老威：好像还是您说了算。

米大喜：我女儿 50 出头，气功啦秧歌啦，专追热门，她的性格更适合与群众打成一片。

老威：茶馆垮了，您又如何开展工作？

米大喜：我让人在房顶安了一个高音喇叭，早、中、晚广播三次，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本来这是居委会坚持了几十年的做法，过去，居民家里没电视，个人也没订报的习惯，所以，这广播还挺受欢迎。80 年代以前，我手下有专职的播音员，平时读文件和报纸，还播放音乐。搞得和中央台差不多，有时就干脆转播中央台的节目，

偶尔也有街道新闻。可后来，电视渐渐普及，这广播就有点跟不上形势。

老威：让我看看您的广播室。

米大喜：就在那旮旯里，让我把电灯扯燃，否则黑咕弄冬，你摸不清楚。公家的电，能节约就节约。

老威：这么黑，平常咋办公嘛。

米大喜：我的办公桌在门口，闲人也没必要朝里面打望。

老威：嘿，完全有必要。灯亮了，这四壁上的荣誉才显得辉煌！这么多锦旗奖状！几面墙都挂不下了。哦，马恩列斯毛的大照！我记得小时候就有？

米大喜：居委会搬了三盘家，房子越搬越小，锦旗和奖状，还有大半柜子，挂不出来，特别委屈的是这五张领袖像，并排挤不下，转角又不好看，只得边角压边角。这是 60 年代我刚下街道时买的，纸张和印刷都特别巴适，以后的领袖像，质量就要差些，颜色也淡。

老威：看上去的确古香古色。

米大喜：30 多年了。

老威：算文物了。可惜太挤了，这面墙宽，咋不把伟人请过来？

米大喜：供领袖像是有规矩的，只能在进门的正面。

老威：哪就错开一点嘛。

米大喜：你以为是贴明星照？上下左右歪着倒着都没关系？马恩列斯毛都一样伟大，只能在一条水平线上。否则会犯错误。

老威：米主任，您令我太怀旧了。这是一个博物馆，时间在里面完全停顿了，我还会抽空来，一面一面地读墙上的锦旗。

米大喜：毛主席说："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只可惜，这些荣誉没有传人了。居委会的工作也越来越难开展。你看，这是带话筒的收录机，这套调音设备，还是 80 年评先进居委会时得的奖，由区委书记亲自颁发的。现在没有年轻人愿意干这个，只好由几个老年人轮流担任播音员。眼花口吃，经常出错。从前，光读报纸、文件就要三个小时，而今，时间只有缩短，早晨 6 点半到 7 点半，

中午 12 点到 1 点，晚上 8 点到 9 点。除了阅读和播放音乐，还有天气预报，以及个人口头发表的观点。

老威：啥观点？

米大喜：比如早晨播完开场的《东方红》（有时是《春天的故事》），就是提醒上班的同志，交通拥挤，骑车、走路注意安全；早饭不能马虎，防止低血糖；退休老人不能贪睡，起床的注意事项；下岗的青年同志要勤劳，莫自暴自弃。中午转播中央电视台的国内外新闻；晚上要发安民告示，提醒关门窗、关煤气、防火防盗、早睡早起；不要聚众赌博，注意陌生人。还要播火警、匪警、障碍台的电话号码，有时还播性卫生知识，老年人起夜注意要点。

老威：真是社会主义温暖的大家庭。

米大喜：一进这间屋，处在荣誉之间，就觉得自己又在焕发青春。虽然许多青年同志不理解，找上门提意见，说高音喇叭是噪音，骚扰居民。我反驳说，这也叫骚扰？那卡拉 OK、黄色舞会、通宵达旦的滥酒划拳叫不叫骚扰？你多听听我的广播，多了解了解国家的经济、政治形势，心灵就净化了，档次就提高了，就有追求了。电视台来采访，也被我说服。开玩笑，我是长期做基层群众工作的人，党和国家的精神就是通过我们这类人深入到千家万户的。

老威：人心不古。想起居委会当年的风光，真令我感慨。

米大喜：我知足了，现在没几家居委会在正常运转，一般都是把办公地点腾出来开麻将馆。

老威：据说您这会址也是临时的？

米大喜：已经“临时”了十多年。房主陈银在你小时候就疯了，有一次，他把煤油炉子点燃，放在他爸的床下；还有一次，他把他爸卡得翻白眼。总之，他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的老子。陈老汉被折磨死后，陈银没人管，到处追女娃子。

于是由居委会出面，将他送进精神病院。这样，我们临时代管他的房产。

老威：疯子回家了咋办？

米大喜：五花大绑又送回去，医院才是他真正的家。

老威：病好了也送回去？

米大喜：送回去，总比流落街头强。

老威：万一这一带拆迁了呢？

米大喜：就把疯子的户头换成居委会。作为集体的遗产，它永远属于全体居民。

老威：它永远属于以您为核心的全体居民。

45　死刑犯牟大路

采访缘起：1999 年 12 月 10 日上午，我在重庆市某看守所探望了 27 岁的死刑犯牟大路。这已经不是第一次随律师接解死刑犯了，因此显得比较放松。

牟大路更放松，他用戴土铐的手揩着鼻涕说："我命中只该活这么大。"

他局外人一般谈论着别人的死。我晓得，如果给予第二次生命，他选择的仍然是犯罪。

老威：昨天律师把你的案子给我谈了，我感到很惋惜，因为你才 27 岁。

牟大路：律师，法官、公诉人都这么说，我都听烦了。27 岁又啷个？我命中只该活这么大。这世上比我命短的还多，同舍的三个死犯，小的那个刚满 18，一上了镣，就哭趴在炕上，像只乌龟。你猜他干了啥？他赶公共汽车，不肯给孕妇让座，人家就骂了声"傻农民"。他气不过，竟拔出水果刀，把孕妇的肚子捅漏了。送医院抢救，那肠子已淌了一大捧，两个人都搂不住。剖腹取出胎儿，母子都没气了，据说那软塌塌的小脑壳只有拳头大，还留了点刀印。这是我晓得的最小的短命鬼。

老威：你想得开就好。这烟你随便抽，法律无情，我即使想帮你，也只有说几句空话的能耐。

牟大路：能出来透透气也不错。我的律师在哪儿？我的上诉有希望吧？

老威：应该有希望吧。唐律师过一会儿到，他这几天正马不停蹄地跑高院。

牟大路：今天正好星期五，刚才提人，我还以为要上路了。大清早，电动铁栅门就从一房响过来，二、三、四，五房六房没开，跳过去了，接着七、八、九，我是十房。同舍的三个活死人都提前

换成白衬衣、蓝裤子，候在门口。老犯孙鸭儿与我打赌，赢中午的肉钵，他说今天十房没人上路，用不着换新的行头，隆重得像去出席国宴。嘿，真让这臭嘴戳准了。

老威：你中午吃不成肉了。

牟大路：不行，一个星期两次肉钵，一钵莲花白里只有指甲盖那么大几砣，他妈咋能让？！虽说没上路，但是老子的白血球已经被杀死了一大半，中午正好补回来。你不晓得，铁栅门一动，外门一开，三个活死人的血都不流了。都朝人背后躲。这时值班干事喊："牟大路。"特别温柔。平常提讯的声音都凶歹歹的："牟大路！"只有勾魂的声音才软绵绵的，我的脑袋轰地炸了，空白了几分钟，才活转来。

老威：人落到这一步，太可怜了。

牟大路：没觉得。原以为判了死的人，会茶饭不思，没想到我的胃口几天就大了，一天到晚都饿，可能是南瓜汤灌的，甜腻腻的"红军汤"，我们已经灌了三个月。

老威：啥子"红军汤"？

牟大路：我家里有盘摇滚革命老歌，特火爆，带中有一首景岗山唱的红军歌谣："红米饭，南瓜汤，秋茄子，米好香。"我听得烂熟，没想到，我也喝上这红军汤了。老前辈们打江山真不容易。

老威：你还很幽默。

牟大路：我判死半个月，就肥成这样，再不幽默，就只有苦着脸等着上杀场了。

老威：在里面怎么打发时间呢？

牟大路：折纸盒，装头痛粉的，你看我双手铐着，一天干十几个小时，也能弄三千个。一直折下去，脑壳就麻木了，免得儿女情长想法多。如果这样心头还难受，就把这难受说出来。比如枪毙，我们讨论了几次，一直没弄清楚打哪个部位，后心呢，还是后脑？后脑报销得快，但不太雅观，遇上开花子弹，天灵盖没了，那脑髓起码溅几尺远。法警也是人，就不怕脑浆溅一身？我觉得不会用开

花弹，人家经常射人，早练成神枪手了，绝对后脑一个眼进，前额一个眼出。有人问需不需要补枪？万一没打死的话。有人回答没死当然要补，如果不补，就折根树枝，插进枪眼里搅几下，只要一见脑花泡泡咕嘟咕嘟冒出来，就完事。我估计，除了法医，没人有胆量去搅。这些都是芝麻细节，包括跪着毙还是站着毙，人前挖不挖个坑，好让你一头栽下去。屁股朝天了，即使没咽气，你除了啃两嘴土，也捣不了乱。还想回个头刺激射手，根本没门。

根本分歧还是后心和后脑，人一五花大扎，两根姆指就叉在后心部位，照准一射，直中心脏。这样差不多是个全尸，把眼儿一堵，人还是完整的。但死得没那么快，因为脑死才真叫死。

老威：这种问题没啥结论。

牟大路：所以年年争，月月争，天天争。有时脸红脖子粗，还打架。我被电捧烙了好几盘，回房还打，死都死了的人，能出多大声响算多大声响，免得哪天突然上路，不给人留点想头。我刚进房没几天，刘黑娃就上路了。春节还没过，那天早晨他正蹲在炕角角吃早餐，门外门就一齐响。值班政府特别温柔地喊："刘忠达，出来一会儿呐？"那口气有点像村长找村民商量事情。当时刘黑娃正吞了口稀饭，把馒头塞了半截在嘴巴，一听勾魂腔，立马就懵了。值班政府又喊了一声，好像连喊了三声，最后就进来站在铁栅栏前。刘黑娃咣当一下坐在炕板上，支着屁股朝后退，政府笑嘻嘻地一招手，两个红毛就上炕，搭个手轿把黑娃一舀，死狗就仰面朝天瘫起了。他嘴巴还堵着半截馒头呢，看来到阴间都饿不死。

老威：他犯了啥罪？

牟大路：杀人罪。黑道上的老板见他扛着根棒棒在朝天门找活路，就问他干不干大买卖？他当然要干。老板就甩给他 5000 元钱，要他去把冤家的鼻子割下来。这蠢牛，不但割了鼻子，还把大片砍刀直接从嘴巴硬生生地切下去，那人就鼓起眼睛咽气了。

刘黑娃一脑壳血去交差，老板吓惨了，后悔不该雇民工，因为职业杀手指哪儿割哪儿，从不过火。刘黑娃说他被咬了一口，冒火了。

老威：恐怖恐怖。

牟大路：其实他在房里很温顺，彬彬有礼。紧接着他上路的是个采花大盗，鸡巴不行了就拿酒瓶子朝三陪小姐的下身捅，结果大出血。那天下午花盗盘在炕上折纸盒，还在和我比赛。门外一喊，他“哎”了一声，又“到”了一声，就急匆匆地窜下去，一溜小跑出门了。铁栅栏快关时，我才想起，马上下炕捡起他的鞋去撵。撵不拢了，眨眼之间，他就光着脚板入鬼门关。我隔着栏杆把他的鞋扔出房，打在外门，又当地弹回天井。这是性子最急的一个鬼。不行，轮到我上路，一定不能急，但也不会像刘黑娃，拖泥带水，一喊我，就响亮地答到，然后哼两句歌，与大家道个别才走。

老威：你刚才道过别么？

牟大路：忘了。

老威：哦。

牟大路：你哦个逑！轮到你也差不多。

老威：还没轮到我头皮就麻了。歇把火吧，换个轻松话题。

牟大路：轻松？屙屎轻松，我给你讲一段屙屎。前一晌我们房涨进来个大贪污犯，叫老蒋，40 多岁，周身名牌，一看就晓得是社会上吃香喝辣的公子哥儿。珍稀动物毛病多，吃喝拉撒不习惯。但他最大的毛病是当着人不屙屎。

老威：这是有教养的表现。

牟大路：要么入乡随俗，要么憋死。教养顶个屁用。牢里的茅坑是敞开的，正对大炕和后窗，你一蹲下去，就必须面对一屋苦难大众。聪明一点的，就鸡公屙屎，速战速决，屁眼儿一挤就提裤子。读过两天书的，要慢功出细货，你就看张《人民日报》，转移注意力。实在难看，你就干脆闭上眼睛挣，丑陋的面孔就彻底消失了。这老蒋，所有的妙方都试过，屁眼儿就是紧。他憋了 10 来天，脑壳长毒疮，眼角起大砣眼屎，可就是下不来。每次他都愁眉苦脸一阵，然后运气提肛，感觉来电了，就朝坑上冲，可一蹲，翻两下白眼，卜卜两个臭屁就完了。有时候，他连屁都不放，像个癞蛤蟆，嘎嘎地叫。把大家的注意力都吸引了，就一齐围上去，堵着他耳门

喊“加油！”有一回，他又来鼻血又来眼泪，大家就七手八脚地安慰他，堵鼻孔的，摸他的头叫“慢慢屙”的，老犯孙大鸟，都 50 多岁了，还和年轻人一道凑热闹，说：“老蒋，生头胎都这样，慢慢生。”死犯锁了镣子，手脚不灵便，就蹲在炕沿上拍手，而上面还有一层嘻皮笑脸的脑壳。坐牢太单调，除了折纸盒，连唱歌也只能在喉管里打转，所以，老蒋就是我们的开心果。开始没觉得有啥了不起，因为刚进来的，或多或少都有点身体不适。但老蒋便秘到第八天，大家就预感到看守所的吉尼斯记录要产生了，如果这时老蒋不争气，下了包袱，就辜负了群众的期望。

老威：你们觉得这样挺快活？

牟大路：当然。老蒋往茅坑一冲，房里就像过节一样，大家丢开手上的活路，摩拳擦掌就过去了。有的还陪着老蒋蹲在炕沿上屙假屎，老蒋一用劲，这边就“哎嗨哎嗨”。老蒋瞪着大家，没法，就提裤子起身，没几分钟，又上坑，连放几个屁，把满房臭了个底朝天。如果是往常，大伙肯定捂着鼻孔就躲，因为便秘的屁最臭，你想，陈年老屎在肚皮里发酵，那屁的浓度，点根火柴肯定燃，说不定一壶水都烧得开。但是，今天非同小可，因为老蒋打的不是闷屁，不是干臭屁，而是夹屎屁！再难闻，也要冒着炮火给他堵回去。于是孙大鸟和叶鸭儿，又是摸脸又是捶背，连叫“老蒋生娃儿辛苦。”老蒋拖起哭腔说：“你们到底要干啥子嘛？！”大家也拖起哭腔回答：“你下了包袱我们就不好耍嘛。”老蒋说：“屎尿有啥好耍嘛？！”大家回答：“你的屁眼儿连着我们的心嘛。”老蒋说：“狼心狗肺嘛。”大家回答：“不要侮辱我们的人格嘛。”

这个滑头的老蒋，趁大家高兴，放松了警惕，竟突然转身下蹲，把他嫩白白的两瓣大脸向着我们！这太不叫话！刚才是玩笑，这回他可真在侮辱我们的人格了！叶鸭儿是菜农，一辈子低三下四，受尽了别人的气，可也受不了这个。他抡圆巴掌，啪啪就两下。茅坑空间狭窄，挤不下太多人，所以多数同志在外干着急。老蒋两手把住铁管，任打任挨，死活不掉头，眼看几颗花生米一样的羊粪夹着血当当坠下坑，孙大鸟急出一头汗，竟与叶鸭儿一左一右，硬扳老蒋的肩，老蒋几乎被抬起来了。他尖起嗓子叫：“不，不，不要！

要，要要出来了！”孙大鸟喝声：“转！”这一来，老蒋哭得像个婊子，边提裤子边说：“不屙了！这辈子不屙了，反正是死，不憋死，就枪崩死！”

老威：你们真是一群……

牟大路：流氓，恶棍，下三滥，滚刀肉。我替你骂了。

老威：都落到这步田地，为啥还要互相折磨？

牟大路：不管落到哪步田地，人和人都互相折磨。社会上天地宽，分得开，所以磨擦要少些，在牢里，一间房关十几个人，严打的时候，经常涨到二十来个，人和人挤得这么亲密无间，不寻开心咋办？今天是老蒋，明天轮到其它人，难说。总之，老蒋历经挫折，最后肯定屙屎了——并且天天屙，一天屙六、七盘。

因为正在 12 天头上，老蒋不得不把一条裤子罩起屙，却被路过后窗的警察发现，以为他要自杀，就喝令他“站起”。老蒋气得打抖，将裤子扯下脑壳，伸手从胯下一抹，抓出一大把鲜血示威说：“你看这个！”

警察开门唤他出去，让狱医连开三帖泻药灌下去，从此一通一百通。老蒋拉得上气不接下气，连世界观都拉改变了，过去，对糙米饭、南瓜汤，甚至肉钵都不屑一顾，莲花白叶子他要夹起对着光照，稍微有几颗虫眼也不吃，若是发现了猪儿虫，更要惊爪爪地叫唤。而今，公子哥儿一跟斗栽成灾民，一天到晚就想吃，一碗南瓜汤，他仰起脸一倒，嚼都不嚼就下肚了。他前两个月没人送钱，即使送了钱，每个月只能买 12 元钱副食，还不够他填牙缝。渐渐，他拉的屎也和南瓜汤差不多，金黄色，像黄河母亲的奶。大伙担心他拉出问题，就暗中轮班上茅坑，连文盲叶鸭儿也在坑上装斯文，看报纸。老蒋像匹笼中的瘦老虎，提着裤子来回跑，可总是插不进针。他哀求占坑者让一让，几乎要下跪了，并且一再闹屎滚裤裆的小儿笑话。有一回，我都瞅出情况危急，让叶鸭儿赶紧闪，那傻农民还在看报，没提防老蒋跨上坑，一转，一屁股就直朝叶鸭儿坐下去，淋了那杂种一头屎。官司打到值班政府那里，把警察都逗笑了。你也笑了？

老威：我能不笑么？这笑料太没心没肺了。

牟大路：嘿嘿，你说这老蒋和叶鸭儿，一个在天一个地在，如果在外头，恐怕永远碰不上，可偏偏在牢里狭路相逢，成了冤家对头。老蒋被气得案子都忘了，然而叶鸭儿菜农嘴脸，一天到晚没事找事，上个月卖副食，除了一人配一个午餐肉罐筒，就是重庆特产怪味胡豆。凡是折子上有钱的，都要了几大包。老蒋的钱还没送到，啥都要不成，只有欣赏大家一齐嚼又辣又麻又脆又香的胡豆，唏里喳啦的。叶鸭儿故意贴着老蒋的腮帮子嚼，还说："老蒋，你不是几百万家产么？咋连买胡豆的钱都莫得？你这款爷分明是伪劣产品嘛。"老蒋已正常了个把星期，自我感觉元气恢复得可以，因此吞了满嘴的清口水，顶撞说："老子的钱把你淹得死！"鸭儿说："嘴硬顶个逑用，你叫我声爹，我赊给你一大把。"老蒋气得哆嗦，刀背脸上浮起几丝胭脂红，可没料到他还能忍，并且说："大家都听见了？今天我就不要老脸，认叶鸭儿为爹。爹，我要亲自抓一大把胡豆，以后，爹还要管我的吃喝。"叶鸭儿万万想不到款爷比他更能降格，要反悔，又怕激起公愤，只好装可怜说："我是所里有名的大肚皮，你忍心？"话还没完，老蒋就接了过去："你那大肚皮是假的，我比你装得。"叶鸭儿鼻子哼了一声，老蒋说："你那山猪鼻子哼个臭逼！今天我们就拼个分晓。"我问："你拿啥子拼？"

老蒋说："我的钱马上就到，买一屋子的怪味胡豆不成问题。叶鸭儿，你敢不敢把四包胡豆全部拿来赌了？"叶鸭儿说："咋赌？"老蒋说："一人吃两包，你赢了，我倒赔你四包，你输了就抹平。"叶鸭儿说："等你钱来了再赌。"老蒋说："你虚了？我就先抓一大把吃。"

这种好戏，千年都逢不到一回，满舍房兴奋惨了，都冲着叶鸭儿说："你这回不雄起，就扒你狗日的皮！"还说："农民始终是满脑壳红苕屎，关键时刻，连胡豆也输不起。"老蒋趁机去扯鸭儿的食品袋，还煽动说："傻棒棒，想挨打嗦？"

叶鸭儿又怕挨打又心疼胡豆，只有应战："这是我老叶的强项，胀死你娃该背时。"老蒋扭了几圈腰，做了热身运动，然后露出比

鸡翅膀还瘦的膀子："想农村包围城市？做你妈的苞谷梦。"孙大鸟绑了个红布在头上，充裁判，死犯用鼻音奏《运动员进行曲》，选手上场，打盘脚，面对面，眼珠子都要恨出来了。

裁判检查了四包一斤装的胡豆，在一人跟前码了两包，然后把手隔在中间，喊：

"预备——开始！"

选手扯开口袋，一把接一把朝口头填，腮帮子鼓得像大蕃茄。开头两人的动作差不多，都是一手捏一把胡豆，像公鸡打鸣一样伸脖子，咽下去，再填一把。

后来，老蒋的手上明显不如叶鸭儿，再加上嘴小些，所以速度跟不上。半个钟头后，两人都嚼了一嘴大血泡，灌了些水，那黑浆浆就顺着嘴角流了两条槽。大冷天，头上还热腾腾地冒汗。我和另一个死犯，一张接一张往他们脑壳顶放草纸，一秒钟就湿一张，揭起来再放，又浸湿。我们放了七、八张草纸，那汗都没汲干，不仅没汲干，还变稠了，纸一下去，就成纸浆，咋也揭不起来。两个人都填了一包多，脸都紫了。叶鸭儿肚皮占有先天优势，老蒋排骨伸缩性再大也赶不上，眼看不行，老蒋就站起来活动手脚，再坐下来。两个人头抵头，咔咔喳喳又疯吃了一盘，端起瓷碗喝了水，就把抹嘴的血浆搽在对方脖子上。叶鸭儿咽下一口翻上来的胡豆渣渣，叽咕说："老蒋，你不行，投降算了。"老蒋怪叫一声，就翻下炕。想一会儿，拍拍脸，他突然埋头直接啃炕板上的东西，这办法果然灵，他三下五除二就超过去了。唉，这老蒋眼都直了，孙大鸟拿手指头在他鼻子尖晃了三回，他都没反应，只一个劲地嚼，嚼。叶鸭儿见了，也学这一招，两个人并排跪在地上啃炕板，吭哧吭哧，把大家笑得打滚、碰墙，连哨兵也觉得稀奇，在楼上观战。叶鸭儿跪了一会儿，死肚皮在地上颠，觉得眼冒金花。马上站起来，坐回炕上，一把填进去才一秒钟，嘀嘀哒哒地回出来大半把，大嘴变成了不断挤屎的鸡屁股。可老蒋越战越勇，埋头啃，像个机器，根本不看对手一眼。两人都满脸胡豆渣渣，翻了无数回，都停顿，抹胸，一点点夺下去，叶鸭儿到底不行了，最后一把没填完，全部汤汤水水地

回出来，他还想再填，裁判把他的手逮住，宣布战绩：“一斤八两一钱！”

老蒋已经听不见看不见，一路猛啃，我贴倒在耳门吼：“你赢了！”他从胡豆渣渣里瞟了我一眼，还要啃。孙大鸟伸出两手，站在炕沿猛下腰，把这条疯狗往上提。他浑身软沓沓的像没有脚。大家都来搀扶冠军，孙大鸟把红布给他拴在头上。老蒋还在叭叭嗒嗒地咬空气，渐渐，才扶墙站定，推开了我们。他埋起脑壳哑了几分钟，突然向前一弹，射向厕所。叶鸭儿还蹲在坑边抠舌根，又没来得及闪，就被老蒋搂在怀中。老蒋一口喷出两米远，厕所的三面墙统统开花。两个选手一上一下地乱呕，成龟孙子了。热闹大了。这是舍房里最快活的一天；虽然大家都挨了电棒，还是快活惨了，龙门阵摆了好多天。

老威：老蒋现在没出毛病吧？

牟大路：呕了几天血，躺了几天，现在已经彻底没事了。

老威：肯定有后遗症。

牟大路：他已经上路五天了。估计已经到了阎王爷跟前，那是个专治后遗症的地方，隔一晌我也会去。

老威：你还没谈你自己呢。

牟大路：入了班房，就四海之内皆王八，谈他也就是谈我。好了，哥们儿，抽支烟告个别吧。

46　戒毒者木邸

采访缘起：至 2003 年 12 月 6 日，我已在云南丽江古城呆了 40 余天，除了与外来的和本地的流浪人群厮混，还意外地做了两三篇有些价值的访问。

我倚在太阳底下，翻弄着《易经》，盘算着行程，心中充满人生无常的文人的迷惘，却不料有个人已悄无声息地上了二楼阳台，站在我的身后——他就是本文的主角木邸，住在离这儿 300 米开外的另一纳西民居里。

在纳西族中，木姓因世袭土司而门第高贵，可木邸却说，民国以后，木氏就衰落了，连土司府也曾改为公安局和看守所。所谓的高贵血统，就剩下对大麻的嗜好和耐药性啦。

木邸还说，他的爷爷和爸爸都有过吸毒史，后来戒了，没留下后遗症；而他今年 35 岁，已吸毒十几年，戒毒 100 多次，并因此两度被劳动教养。

我见他恳切，就为之占了一卦，为"萃"之初六。大致吉利。他的脸上泛出古铜色的健康笑容："我刚死里逃生，当然吉利了。"

木邸：你能给我打一卦么？

老威：没问题。不过，无论卦象好坏，你都不必当真，游戏嘛。我又不是算命先生。

木邸：好的。

老威：你双手合十，闭眼默祷约一分钟，将意念灌注在一件事情上。注意，只能想一件事。然后，把掌中的三枚硬币向上抛出，连抛六次，卦就出来了。

木邸：这样就行了？我不用把心里想的告诉你？

老威：再次申明，我不算命。我只把卦辞或爻辞念了，把字面意思解释清楚。当然，我的水平有限，不一定就把《易经》这部古今奇书搞清楚了，歧义太多，书中的同一段话，甚至同一个字，不

同的人都有不同的理解，再掺上五行、四柱、季节、流年这些因素，就更扑朔迷离了。好，我尽力吧，心诚则灵。

木邸：心诚则灵？心诚则灵……

老威：好，卦成了，为“萃”，这是你命中注定的本卦。这下卦为“坤”，是大地，是母性，是归宿；上卦为“兑”，是顺从，是喜悦，是口舌。序卦传说：“物相遇而后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这意思是，你的本命是能够安居乐业，并且聚集四方人气，做成一番事业的，但有个前提，必须把“坤”卦赋予你的诚信、厚道坚守到底，不能一味沉迷于“兑”卦的口舌之乐。你看这初六变爻，“有孚不终，乃乱乃萃”……。“象曰：‘乃乱乃萃’，其志乱也。”你有诚信，并一次次下决心坚守，却因为过于顺从，贪图感官享乐，胡乱结交朋友，改变初衷，乃至于人生方向迷失，不能自拔……。

木邸：不可救药了？

老威：这一卦，主体是“吉”，但“荟萃”须择友，否则就是狼狈为奸了。

木邸：谢谢老威的忠告。其实我已在楼下观察你好几天了，见你每天起床，都泡一盅茶，然后坐在太阳下看书，很少东张西望，显得有来头，有定力。刚才我鼓足勇气，上来和你搭话。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

老威：你是房东大嫂的侄儿。

木邸：我吸毒十几年，戒毒 100 多次，今年 5 月才从华坪放出来。

老威：啥地方？

木邸：云南华坪劳教所，与四川接壤，大约翻两座山，就到攀枝花了。这也是一条买卖毒品的黄金线路，从全国最大的海洛因集散地下关，经过大理、丽江、永胜，过华坪，就进入四川地界攀枝花，全程 400 多公里，汽车一天就到了。而后转火车去成都，去任何想去的地方。

老威：你看上去精神焕发，一点不像吸毒的。

木邸：按理，我的人生还算平顺，在丽江读完小学、中学和职业高中，然后进了商业局。那年头，这是人人羡慕的单位，没关系是进不去的。小时候，我染过伤寒，眼看没救了，一个当地的老中医却主动到我家，开了三帖偏方，吃完就好了，而且一直都好，20岁以前，没得过病，连感冒也没有。

老威：你的福分不浅嘛。

木邸：人年轻，兜里也有钱，加之长得帅气，就容易受诱惑。人家几句吹捧你的话，就跟着到社会上去了。歌舞厅、车站、麻将桌，一玩一个通宵，第二天，照常上班，不觉得累。我第一次落网大约是 91 或 92 年，记不太清了。我根本不懂得吸毒，也要规规矩矩地认罪，否则就出不来。因为当时搞严打运动，公安和联防拉网清剿，只要在舞厅或其他旮旯里逮住一个吸毒人员，带回去过堂，暴揍两顿，也会牵出来一长串。

老威：这也算数？

木邸：当然，人被打急了，就会乱咬，凡是平时一道玩过的，管他吸没吸毒，犯没犯案，都"坦白交待"。公安人员有句审案行话，叫"竹筒倒豆子，稀里哗啦"，至于倒出来的豆子哪颗有问题，哪颗没问题，就不管啦，先抓再说。许多人跟我一样，稀里糊涂就栽进去。派出所关不了，就直接用闷罐车朝戒毒所送。我指给你看，顺着这些瓦房顶望过去，对面山顶亮晃晃的，是东山寺。喇嘛教的寺庙，外墙是白的，太阳一烤，就晃眼睛。从东山寺垂直往下溜，城边山坳处，有一些房子……看见了？那就是丽江县戒毒所。现在规模大了，设施也改善了，可当时就两排水泥笼子，一楼一底。一间 20 来平方米的屋，关 100 多人，挤得腾腾冒烟。

老威：吸不吸毒，应该一查便知。

木邸：96 年以前，都没有检测方式，只要有人咬你，只要你在社会上与各类闲杂人员混过，就脱不了干系。你没吸毒？总做过其它不光彩的事，赌博，盗窃，嫖娼，走私。什么也没做？总到过舞厅吧？总在"四川帮"或"湖南帮"里出入过吧？不可能是清白的。幸好我爸爸是个老干部，解放初期的丽江地下党。家里托人把

我保了出来。

老威：如果不保你，会是啥结果？

木邸：不管青红皂白，一律强制"戒毒"，完了，直接判劳教，一至三年。

老威：挺省事的。

木邸：对，劳教又不走法律过场，派出所和戒毒所都可以直接送劳教。单子就在他们的抽屉里，一大叠，瞧你不顺眼，就抽出一张。上头早已盖好公章和公安局长的私章，几秒钟，刷刷一填，你的一生就被葬送掉了。所以，十天半月，一阵风，几百上千的在押人员就处理完毕。

我在人前抬不起头，因为二十几就栽了，别人难免不指指戳戳。丽江原来是个小城，旅游者很少，不开化。我上班时感觉压抑，回家又被父母看管着，像做了贼一般，这样日子一久，再开朗的人也会变的。我悄悄与社会上的三教九流又有了来往，感到在他们中间要自在些，至少人和人不会互相歧视。我第一次吸毒是 92 年，人家指点我把药（指海洛因——老威注）裹在烟卷里，抽一口，憋住不出气，否则就浪费了。我连抽两口，没憋住，烟一从口鼻漏出，旁边的人赶紧凑过来，四下追着吞那残烟。我吸了小半支就不行了，趴在床沿上呕吐，和醉酒差不多。不过，酒醉了很难受，老半天缓不过劲；可尝药吐了比较舒服，人软绵绵的，骨架子都散开了。

我先天耐药性强，断断续续，吸了半年才上瘾，开始经济状况好，手散，觉得不行了，就一个电话，最多十几分钟，人家就把整方的药送上门。渐渐，经济吃紧，就只要得起零包。整方批发要便宜得多，但一次给好几千，越着急越凑不齐。古城这地方，不仅是入川进藏，去香格里拉的中转地，也是鸦片和海洛因的中转地。据说在以前，狮子山周围，到处都长着野生大麻，罂粟花鲜艳极了，纳西人采来当药用，家家户户都有麻袋装的大麻籽，炒熟了当瓜子嗑，当调味的佐料。后来，野生大麻被政府铲掉了，可适宜种毒品的地理，吃药的肯定比别的地方多。旅游开发之前，大研镇人口不足两万，吃药的估计上千，我知道的熟脸就有几百。那时，院子门

一开，随时都能见到蜷在墙根的人，瘾发了，在那儿哆嗦。你稍不留意，他就会突然跳起来，边哀求边搜你的兜。

纳西族生性朴实，讲传统的伦理道德，什么“守孝三年”，“圣人不言商”之类，所以能经商赚钱的，一般都是外来人。毒品市场也一样，由“四川帮”和“湖南帮”控制。他们从下关或格里坪进药，转一道手，利润就翻几倍。毒品买卖也分几级批发，因风险太大，都单线联系，极少跳槽越级。一般人只能在四、五级批发以下拿药，我拿的是三级批发。

遇上严打，全城“熄灯”的时候，日子就难熬了。所谓“熄灯”，就是地面干净，寻不出一颗药。原因是吃死人啦，帮派之间争地盘火拼啦，总之，公安一查案，几级批发都在一夜之间蒸发了。贩药的都跑光了，吃药的怎么办？又要熬瘾又要躲，日子不是人过的。

有一次遇熄灯，我缺药心慌，就雇了辆摩托，从丽江连夜狂奔 400 公里，去格里坪拿药。那时，路况很差，没柏油，没高速。坑坑洼洼的石子路，我俩个玩命一般，摩托一会儿蹦起来，一会儿跌下去，轮子擦得咔咔直冒火星星。我像一条癞皮狗，紧紧地粘在骑手背上。我不怕死，我已成为家里的累赘，摔死就一了百了。我们居然 4 个小时就到了。拿了药，买瓶矿泉水兑了打进去，精神马上就振作。也不腾云驾雾了，生命也显得有意义了。

老威：4 小时 400 公里，还是石子路？真够玄的。

木邸：所以说纳西小伙子厉害。

老威：听说刚打了药不能马上走动，至少得躺一会儿。

木邸：因人而异，有的人吃药要躺，半小时，一小时，还要出现幻觉。我不用躺，药一吃，劲头马上就来了，随便走，干什么都可以。特别是抬头看太阳，深呼吸，特爽。

老威：你出现过幻觉么？

木邸：极少。吃过药，我喜欢劳动，喜欢抬东西，打扫卫生，帮别人干体力活，像活雷锋。只有一次，大概用药过量，我一时没爬得起床，心跳像落石头，又缓又沉，能感觉到血管的收缩。接下来，我变得特别大，手和脚都特别大，像一匹骆驼，不，一匹山。

我曲了一下腿，就轰地打一声雷。而窗户啦，屋子啦，其他人啦都特别小，只齐我的指甲盖。

老威：你太能折腾了。

木邸：1996 年 2 月 3 号下午，丽江大地震，死了 100 多人，古城房屋塌了一大半。当时，我正与中学同学聚会，打麻将，玩得高兴。突然，我的心律加快，嘴唇发紫，一溜虚汗从背脊直爬上来，最后满头都是汗了。我明白瘾要发了，就借故告辞大家，赶紧躲到背静处，撩起衣袖扎一针，精神立马就复原了。去单位也没什么事，就出门买了份凉拌猪耳朵，和大家一道，边吃耳朵边看电视。猛地一下，我觉得电视和背后的墙都晃起来，我第一反应是瘾又发了，可自己吃药还不到半小时……

老威：打一针能管多久？

木邸：开始一天打两针就够了，随着瘾的加深，间隔时间也越来越短，厉害的时候，一两小时都管不了。大地震那天，我下午 1 点才扎过，4 点就扛不住了。电视又摇又抖，咔的一声，自动熄火。旁边的一位女同事扑到怀里，我没稳住，就与她一道连滚带爬，被抛到左边窗下，而耳朵盘子不由自主从窗口飞往大街。直到第二天，还摆在街中心。

后来听说，我们打麻将的地方也成废墟了。这瘾发作得真是时候，因为我若不走，麻将会就不散，一伙人正在兴头上，哇哧一声天崩地裂……变鬼也糊里糊涂。

老威：你还成救世主了？

木邸：见笑了。

老威：不瞒你说，我也是通过地震报道才知道丽江的。

木邸：地震一闹，人心惶惶，这儿就成了死城一座，外地人纷纷离开，连毒贩子也逃之夭夭。第二天，我走在街上，瘾发心慌，却寻不着一家开门的店铺，买不到矿泉水或蒸馏水。我被逼上梁山，舀井水来兑药，抽入针管，自己扎了。结果，瘾倒是缓解了，整条胳膊却肿起来，渐渐像小腿一般粗，连衣袖都脱不下来了。去看医生，用剪刀裁开，一检查，确诊为血管炎。马上就给家里下《病危

通知书》，施行抢救。我的命真大，一天一夜昏迷，危险期过了，居然没有并发症。

原来，这看上去十分清澈的井水也不干净，一地震，地心里就泛上来大量的硫磺，哪怕一头种牛饮一口这呛鼻的毒水也完蛋了，可我瘾一上，嗅觉麻痹，居然就……唉，人命真够贱的。

老威：这毒瘾真是无底深渊啊。

木邸：生理毒瘾其实能戒，十天半月，一个人关在屋里硬挺硬熬，就过去了。只是心里空落落的，就如转眼间断奶的婴儿，找不到方向。整日无精打采，连吃饭都懒得下床，正当此时，莫说自己沾药，就是看见，甚至嗅着别人吃药，两眼也会立即放光。

至今为止，我劳教了两回，而进戒毒所的次数，我也记不住了。很多时候，都是我主动去的，我希望能被隔离，与“旧病复发”的老环境一刀两断；我希望能在政府的帮助下重新做人。但是，我在戒毒所总是碰见社会上的熟人，在外面是毒友，里面没药吃，就整夜整夜交流体会，过嘴巴瘾。什么戒毒所，狗屁，你想想，把一堆淫棍关几个月，几年，一旦放出去，嫖瘾不更足了？

戒毒所所长换了几届，都是贪官。你想进来，奉送几条好烟，塞点钱，就搞定了。若要出去，也送烟，塞更多的钱，他马上就签字：尿样呈阴性，过关。这个社会，有钱有势走遍天下，戒毒药也用最好的。

老威：你戒一次毒要花多少钱？

木邸：自己闷屋里戒不花钱。进戒毒所，自带伙食费，住房用药也根据经济情况。丽江有两处戒毒所，东山寺下的是老的，条件比较差；看守所旁边，是地区公安处戒毒所，设施好，有专门的医院。戒毒药很多种，下关生产的六二六较普及；而目前最先进的，是英国进口的“美萨通”（译音）。一个星期左右，就能戒掉毒瘾。可后遗症明显，你会形成对戒毒药的依赖，上瘾的程度轻于鸦片，和杜冷丁相似。

我花在戒毒上的钱有好几十万，把家里都拖垮了，还是不行；第一次劳教两年，还是不行。我对自己太绝望了。我自杀过三次，

我想人死了，毒也就戒彻底了。太阳刚落山，我就钻进狮子山的林子，找个背静处躺下。从手背到胳膊，密密匝匝的针眼，再扎，已不出血了，因为血管大概都萎缩了。大腿根也扎遍了，连小肚子都千疮百孔。我这个人，真废掉了，没孝敬一天父母，没出过一回远门，就被这药给圈定。

我在半个月中，超量注射三次，第一次 1 克，第二次 1.5 克，第三次 1.5 克，是正常药量的 5 到 10 倍。大象也被毒死了，何况一个人！朝大腿根一针扎下，猛推，还来不及拔，就晕厥了。我以为清账了，没料到下半夜居然醒转来，冻得牙齿咔咔抖。我拔了腿上的针管，扔得远远的，然后跌跌撞撞地下山。我在灌木丛中鬼魂一般晃悠，那晚的月亮我记得，红红的，脚盆那么大。

我几乎是滚下山的，进屋一照镜子，满脸满身是血，两眼直的，那凶光连我自己也害怕。我瘫了一会儿，又爬起来，对着墙，一下又一下地撞。我撞了个把钟头，山上的广播响了，是中央台的《新闻联播》，六点半了。夏天的六点半，天已大亮，我听见楼梯响，妈妈起来了。我的脑袋是木的，没一点痛感。

老威：惊心动魄。

木邸：惭愧。

老威：我写过吸毒者，也读过大量这方面的宣传报道，似乎与你的讲述不太一样。

木邸：是吗？

老威：毒瘾摧毁人的生命，而你却特别顽强。

木邸：我们被当作渣滓，比猪狗不如。我家里还有几个钱折腾，可周围大多数都是穷人，抓进戒毒所，没钱用药，只有锁起来强戒，太惨了。

老威：什么惨？你自己不也强戒过么？

木邸：我是城里人，营养充足，身体底子打得好，经得住熬；可大量吃药的是农民，连骨头都榨干了，一强戒，肯定垮。云南德宏州与缅甸、金三角接壤，那地方什么都贵，就毒品便宜，许多当

地人砸锅卖铁，甚至拆房子揭瓦也要贪那一口。最后，家当吃完了，人也像狗一样东游西荡，想躺了，就不管身下是露天、屋檐、树下，或茅坑边，一坠就下去了。远看还以为是一堆腐肉，因为苍蝇嗡嗡地叮着。

德宏州的人，在所里一眼就能认出，那种黑，那种瘦！锅灰抹过的皮肤，二指宽的肋骨如钢筋捆在身上。我问过他们，都成这样了还有钱吃药？他们说，药要比米，比菜便宜，便宜到后来，根本不要钱，只要你替人家翻多少地，或者翻够几个小时，就能换到药吃。

唉，在人间是饿鬼，活得像个影子，有一点药吊着，兴许还不会死。可政府抓来一强戒，完了，两三天就死一个。特别是冬天，个把月就报销几十，那些人连折腾、撞墙的力气都没有，只把脖子一伸一伸地咽口水，喉包像个鸡蛋上下滑几下，然后脑袋一耷，出窍了。叫人来，将就他身下的破床单一裹，把这瘟狗抬走。

老威：家属不来认领尸体？

木邸：吸毒者无家属无朋友无祖国，是彻头彻尾的三无人员加国际主义死狗。

老威：你倒挺幽默。

木邸：自己把自己踩到底，别人就不屑于再踏上一只脚了。如果家里没门路，戒过毒后就直接送劳教，蛮干两到三年，看能否脱胎换骨。

我第一次劳教是在丽江范围内，家里有关系，罩得住，没吃什么苦头；第二次判三年，送几百公里以外的华坪，才尝到地狱的滋味。那是在山沟里，地盘太大，我也说不清到底关了多少人。我所在的大队就有 300 多，戒完毒的占百分之八十；下辖分队就是清一色的药案了。

我们的主业是开矿。几架山都是石灰，在大太阳底下，从这坡望那坡，白茫茫的一片，晃得人睁不开眼。天还没亮，吹哨起床，开饭，再集合出发。爬到半山腰，太阳刚刚把它的帽檐露出来，空气还凉滋滋的。犯人们分成几路下坑。这坑是长年累月掏出来的，

足有月亮，不，小半个足球场那么大，而深达十多米。我们把一架接一架的山“开肠破肚”，而肚子里的气温，起码比外面高四、五度，华坪是有名的高温地区，冬天还好，一入夏，我们就经常在摄氏 40 度左右的高温下刨矿。光着膀子，粉尘飞扬，一米外都辨不清人。汗水不断线，在白灰上碾下一条条汗槽，不少人刨着刨着就歪倒了，马上拖出坑去透气，冲脸泼一桶水，方能认出是谁。

老威：这活路哪是人干的！

木邸：畜牲也不干，牛马骡子一嗅那种呛味，也撒蹄就跑。特别是放炮，真叫玩命啊！一吹炸山哨，犯人都撤到对面，一人端起一辆翻斗车，全神贯注，准备冲刺。然后数秒，一、二、三！小红旗一下，轰隆！一大块山体粉碎了。拳头大、篮球大、桌面大的矿石被呼地抛起来，如雨点一般，从几十米的高处下落。说时迟，那时快，炮一响，犯人们就等不及了，一个个冒着暴风般刮来的烟雾，推着车，叮铃哐当朝上奔，争先恐后捡刚落地的热石头，装满车，而后往下俯冲一两百米，直接倒入一字形排在坡下的雾气腾腾的石灰窑。

那个场面太壮观了，十几米宽的坡，70 多个犯人发了疯一样，上下牵着线狂奔。如卓别林的黑白片，镜头比正常速度快一两倍，每个人的屁股都装有发条，扭紧了一松，就失控了。每天 90 车，一两百米的来回，你算一算，卓别林也要累吐血。但这是强制改造，不完成定额，就是反改造典型，背铐，关小间，挨捆挨打，甚至加教，那就没盼头了。

老威：这种搞法肯定要出事。

木邸：经常出事。比如炸山，铺天盖地的石头还没落定，腿快的已经冲进去了，结果被砸了。有的连人带车，被砸翻几个滚，车把人扣在下面，那翻斗就硬生生切进腰里。我们去拖人时，还没咽气，鼻孔、嘴、眼睛都咕嘟嘟地淌血，腰下一条槽。我们赶紧抬起跑，才几分钟，就完球了。

我们分队，每年被石头砸死的有三分之一，旧人去了，总有新人补充进来，所以坐牢的铺位永远不空缺。我的脑子灵光，眼看人

命不如狗，就写信叫家里带钱来勾兑关系，千辛万苦才混上个教书的活儿。

老威：死了这么多犯人就没个交待？

木邸：据说劳改和劳教都有个非正常死亡的法定比例，百分之四还是五？不清楚。但华坪的管教认钱不认人，砸死、呛死、窑下事故而死的冤鬼，统统被认定为“毒发身亡”，谁叫你的毒瘾潜伏得这么深。

老威：戒毒所有检测鉴定嘛。

木邸：这扯皮的事没个完。况且上级部门只要一个“合法解释”。狗日的警察可捞肥了，小小一个分队长，月工资就 5000 多块，年终奖金一发就是一两万，还不算平时的油水。这人肉石灰的利润太高了。今年 5 月，我上下使了银子，提前几个月解教，捡了一条命。

老威：掐指一算，你已经正常了大半年。

木邸：这华坪劳教所才是个戒药的好去处。不能再进去了，你说呢？

47　同性恋者倪冬雪

采访缘起：1998 年 6 月 19 日夜，我几经周折，终于在两位底层摇滚乐手的引荐下，结识了同性恋群落中的先锋派人物倪冬雪。倪 34 岁，学历为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硕士，公开或半公开的同性恋史达 10 年以上。

在成都磨子桥一带，各类娱乐场所密密匝匝，其中有一座内部环境清幽的酒吧，为同性恋者不定期聚会的“天堂”。倪冬雪经常浓妆艳抹地出没其间，被圈内朋友称为“俏女人”和“理论家”。

老威：我这是第一次走进同性恋者的群落，也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刺激。在这个酒吧里，灯光挺暗，酒客也挺安静，音乐，是喜多郎的《天界》吧，若有若无的。这种氛围适合谈心，超越现实的谈心。我想，你，我，虽然是经朋友介绍在这儿见面，但是……

倪冬雪：似曾相识？

老威：不，两个匆匆过客。在这里见面之后，你留在这儿，我走开，回到自己熟悉的世界。我不是记者，我虽然带有录音机，可我不会让媒体炒作这件事。这个俱乐部让我挺受感动。

倪冬雪：请你不要用“俱乐部”这个词。中国还没有欧美国家那种公开的同恋者的俱乐部，我们只有一些经常聚会的场所。在这里，我们感到放松，当然我们也欢迎新朋友加入进来。

老威：可我不是同性恋者。

倪冬雪：这没关系。现在，你把手放在我的手心上，把眼睛抬起来看着我。不要回避，你不是个男子汉吗？男子汉就别回避任何东西。我在追求你，我的心里很疼，充满柔情的那种疼。我是个女人，可我母亲把我的外形错生作男人。不，我的外形也不象男人，特别是现在，我没感觉到我身上有男人的器官。

老威：你在触电？在触电中改变自己？

倪冬雪：我在颤抖，请你抓紧我的手。我不会投入你的怀抱，

那样会彼此伤害。这是公众场所，我不会忘记这是第一次，不知是否还有进一步的幽会？你在怜悯我吗？

老威：我怜悯你。

倪冬雪：男女之爱不是怜悯，是互相占有，这世界上的绝大部分人，在结婚之前都山盟海誓，结果又怎样？家庭、孩子、财产，然后是坟墓……

老威：不是坟墓，是人类围绕世代繁衍建立的秩序。

倪冬雪：请别打断我！男女之爱首先是交配，生存法则就是建立在交配之上！而同性恋首先是怜悯，我们都是弱者，都是羔羊，我们需要从精神上依偎在一起取暖。这是一种宗教。我想在出生之前，我们就是不知不觉地依偎在一起，后来，又不情愿地来到世上。我被定性成男孩，传统和社会要求男孩勇敢、坚定，做顶天立地的大丈夫，我做不了，我的本能在反抗这要求。我从小羡慕女孩子们手挽手地逛大街，可我试图挽着男孩子的手走路时，却被甩开了。身体发育到一定阶段，我为下身那东西莫名其妙地勃起而羞愧。为遗精，我悄悄哭了许多次。后来，我开始对女性的器官发生兴趣，我抑制不住冲动，就窥视女厕所，女浴室，还偷别人晾在太阳底下的女内裤和衬衫，我一次次被痛打，被关派出所的黑屋，最后终于以流氓罪被判了三年徒刑。不知为什么，我下意识地渴望挨打，被踩在地上，胁骨痛得钻心，我却感到一种虚脱的快感。那时候，不，几乎是童年和青少年时期，我的同性恋意识还没觉醒，我心甘情愿地承认自己是流氓。在劳改队那个真正的流氓成堆的地方，我原以为活不出来。不料，却得到意外的照顾。犯人组长是个大学生，喜欢研究弗洛伊德，我从他那里，才知道我有严重的身心缺陷。

我这叫“身心缺陷”吗？许多犯人喜欢看我，摸我，特别是在公共浴室，大伙都傻傻地瞅我细皮嫩肉的裸体，夸我的臀部又圆又大。我拒绝了数不清的私下求爱，自卑的同时感到满足。当然，求爱的劳改犯中，也不乏浅薄、势利之徒，有的家伙直接提出与我发生肉体关系，报酬只是一份肉或一双解放牌胶鞋，我的回答是指着伙房附近的猪圈：“找老母猪去吧！”

其实我偷偷地爱着犯人组长，可他同你一样，不是同性恋，他讨厌我的女气，我就强压着那股柔情，他的刑期是八年，我真愿意自己也判八年，厮守在他身边，为他洗衣裳，听他训话。他为人正派，小组会上的开场白常常是："大伙业余时间可以多看看书，学习知识，争取早日回归社会，不要闲得无聊，就围着人家倪冬雪转。"听着这话，我激动得热泪盈眶，大家不围着我转，我不成了他一个人的？

有天我往工地送饭，两个同行的犯人在半路上抱住我……就这样我被鸡奸了。许多报刊都登载过猎奇文章，认为同性恋就是鸡奸的代名词，这是很混蛋的。我一点也没感到鸡奸的快乐，除非两情相悦。我从小懦弱，憎恨男人式的暴力，所以一旦被人强迫鸡奸，肯定不惜一切反抗。这一招，把不少只对我肉体感兴趣的男人搞懵了，他们一厢情愿地认为我会快活得象畜牲那样嗷嗷叫。

我提前半年出狱，想到要和组长永诀，内心充满无法填满的虚空。临别之际，他将弗洛伊德的《释梦》送我，叮嘱我学习上进。我永远记着他的话，他是我的初恋，这么多年，我一直记着他，常给他写信寄东西，直到有一天，所有的邮件被原封不动地退回，梦成了泡影。我痛定思痛，开始自学，三年后，直接考取了心理学研究生，方从创伤中自救出来。？

老威：你的故事很动人，我在逐渐被你俘虏。说实话，我以前没想到同性恋会这样，直到读了已故作家王小波和李银河合著的一本同性恋者研究，方部分纠正了对同性恋的偏见。我算个知识分子，从理性上，我几年前就接受你们了，但从生理上，我依旧排斥。我同大多数男人一样，性别意识太强，占有，霸权，你批评得对。前一晌，你肯定知道轰动一时的"人妖事件"，他们模仿泰国的人妖，在不少城市的夜总会走穴，载歌载舞倒也罢了，让人不能接受的是掏出假乳房示众。

倪冬雪：这当然加深了公众对同性恋者的偏见和敌意，可人妖不等于同性恋。人妖首先是商业的产物，"他们"一心想利用通过药物刺激而在自己身上凸现的女性特征赚钞票，这同明星走穴哗众

取宠没什么两样。希望你不要用扫兴的话题来影响我们之间的气氛。

老威：对不起，请你继续讲。

倪冬雪：中国几千年都是异性恋社会。当然在志怪或市井传奇里，常有同性恋的描写，可都被当作恶习，痛加鞭笞和嘲讽。因此，我很珍惜今天这种较自由的空间，这也是商业带来的好处，谁也用不着多管谁的闲事。你看左边那一对，年近不惑，都离过婚，蓄胡须的是画家，小巧玲珑的是下岗工人，按世俗的观念，他们绝对走不到一块；前面的一对，门当户对，都是工程师，都搞建筑设计，却都没离婚，看那促膝谈心的火候，早把孩子老婆抛到脑后了；其他人要年轻一点，由于各种公开和潜在的压力，同性恋史一般不太长，一两年、三四年、几个月不等，极少有超过五年的。当然，朝三暮四的也不少，可同性恋圈子太狭窄，伴侣不可能三天两头换。我是同性恋中的"先锋派"，我认为每个人都有潜在的同性恋倾向。

老威：我有同性恋倾向吗？

倪冬雪：我们有非常良好的开头。现在你看着我，不管你心里怎么想，不管你把我看作什么，一个朋友，一个陌生人。你得承认，你很久没进行过这种谈话。而我，把你当作一次艳遇，两个挺弱的男人或女人，两条狗互相依偎、怜悯、嗅着对方身上熟熟悉的汗味。当然，这是酒吧，下次，我们最好找个野外，凉风习习，我们相互拥抱着，我会背诵惠特曼的《草叶集》给你听。

老威：惠特曼将提醒我做个充满生物欲望的男人，"粗壮、肥胖、多欲，快乐地吃着喝着直到死去。"

倪冬雪：那有什么关系呢？你做男人，我就做你的女人，在你这一生中遭遇过的若干女人中最特殊的女人。看你的眼睛，你没有一直刚强下去的意志，你在躲闪从我这儿开始，一道门将意想不到地开启，你走下去，你还会遇见形形色色的同性恋者，你没有一直刚强下去的意志，说不定到一定火候，你的心理会改变，你会要求变换角色，做一回女人，体验一下柔情之美，乳房和子宫的生长之美，造就你的环境终将会彻底翻过来，再没人强迫你做男人，做丈夫，承担你承担不了的社会责任。你的眼泪会多起来，对风、对云、

对草、对水中的落叶流泪，像林黛玉和贾宝玉的结合体。多愁善感不合时宜，但在同性恋的圈内，你就尽管不合时宜吧。

老威：你结过婚吗？

倪冬雪：你指的是现实婚姻还是精神婚姻？现实的婚姻有过一次，是我导师的女儿。新婚之夜，我顺从生理反应，勉强行事，也没书上介绍的快感和高潮，她却怀孕了，这使我感到有罪。坐牢时我没犯罪感，但让老婆怀孕令我深感罪孽，后来我们平静分手了。

老威：在北京，纪录片制作人吴文光家里，我曾见过由男变女的舞蹈家金星，她在 1995 年经历了三次痛不欲生的大手术，已彻底变性。当时，我没敢唐突与她搭话，因为我不知道该对她说什么。她同你一样，从小就有成为女孩的潜在愿望，可最终使其斩断男缘的是舞蹈，舞蹈属于女性，要像邓肯那样跳到老跳到死就必须成为女性。不知你对这种极端荣誉感怎么看？你是否想过做变性手术？

倪冬雪：我在《南方周末》上，读到过有关金星的报道，从肉体上变性，无异于下地狱，但赫拉克利特说："向下的路也是向上的路"，在但丁的《神曲》里，穿过地狱和炼狱就是天堂。金星是同性恋中的英雄，她站在天堂般的舞台，接受观众的眼泪和欢呼，而现实生活呢？现实生活是否是地狱？金星说穿了还是男人，因为只有男人才把艺术、荣誉看得至高无上。而"女人是水做的骨肉"，将顺从自己的天性向前淌。我这辈子吃的苦或许比金星多几倍，而且完全没有回报，可我将顺从天性。我的母亲，母亲的母亲都是这样，从地上淌过去，没人会记住她们。你看，我的眼泪又上来了，有时候，我真想哭，不为什么，就像个真正的女孩子，站在风里，月亮里，情人的面前，无缘无故就哭了。同性恋的世界不是通过舞蹈能够表达的，因为现代的舞蹈不像远古，可以一个人、一群人、裹着兽皮在旷野里跳到天亮，可以不要观众，尽兴地想怎么跳就怎么跳。现代的舞蹈首先是舞台和观众，这是功利社会的一个缩影。而同性恋，是私下的，一对一的。我为什么要做变性手术呢？

老威：假如将来有个男人想娶你呢？

倪冬雪：如果你想要我，我有可能做。但那要很多钱，我想，

即使我俩倾家荡产，也花不起这钱。我不明白，为什么男人不可以娶男人呢？欧美某些国家已有相关法律，中国早晚也会正视同性恋问题。你会提出组建家庭吗？我不反对，我还能在圈内为我们找到证婚人，甚至还可以领养孩子。

老威：两个男人长期同居会打架的。

倪冬雪：我不会还手，我乐意你打我。

老威：而且还将失去彼此的吸引力，到最后无话可说，这种“婚姻”是对精神的伤害。你的肉体对我没引诱力，但我喜欢听你谈话，喜欢你的坦率和真诚。你说我是广义的同性恋者，我不反对；可我过不了那个关口，男人与男人亲吻太……可怕。

倪冬雪：我是女人，我要为你变成女人。

老威：我有女朋友，年底要结婚。

倪冬雪：我要充当第三者。

老威：这是徒劳的，即使你有钱做手术变性。我不是一个怕惹麻烦的人，现在，我已习惯了这酒吧的氛围，让我们回到开头，两个陌生人“一见钟情”式的对话。

倪冬雪：我注定是悲剧人物。再过十年二十年，人老了，就没人与我“一见钟情”了。你看我的掌纹，一团涡流，找不到出路。但是，我会，我会珍藏每一段记忆，我爱过你，我不会恨，学也学不会恨……我的嗓子眼都被泪水堵住了，你却无动于衷，可见你有多么残忍，残忍，你怜悯我吗？

老威：怜悯。

倪冬雪：你爱我吗？

老威：是的……爱你。

倪冬雪：你却不敢承担责任，你怕社会偏见，阮玲玉就是被舆论杀死的。

老威：你冷静一点。

倪冬雪：你怜悯我吗？

老威：怜悯。

倪冬雪：上帝式的怜悯，又高又冷。你爱我吗？

老威：爱你。

倪冬雪：居高临下的爱，你吐露这个字眼时，象站在悬崖边向深渊吐一颗枣核。你对多少人说过"爱你"？

老威：不下一百人。你觉得这种谈话，还有必要进行下去吗？

倪冬雪：有必要永远进行下去，象惠特曼漫无边际的诗歌："女性与一切属于女性的，生自女人的男人，子宫，乳房，乳头，乳汁，眼泪，欢笑，哭泣，爱的表情，爱的不安和兴奋，声音，姿势，话语，低诉，大叫，食物，饮水，脉搏，消化，汗液，睡眠，散步，游泳，臀部的平衡，跳跃，斜倚，拥抱，手臂的弯曲和伸张，嘴的不停的动作和变化，两眼周围的不断的动作和变化，皮肤，晒黑的颜色，雀斑，头发，一个人用手抚摸着肉体裸露着的肉时所引起的奇异的感觉，血液的循环和呼吸的出入，腰肢的美，屁股的美，往下直到膝盖的美，在你的身体中或我的身体中稀薄的鲜红的液汁，骨头和骨髓……"

老威：这是《我歌唱带电的肉体》！冬雪，你的声音真不错，有一种催眠的魔力……现在，想起你乞求着的爱，我有一种想流泪的感觉，也许走出这个酒吧，我就没这种感觉了。这个社会，这茫茫沙漠一般的人群，没有怜悯，惠特曼就是怜悯……他太阳般的慈爱无所不在……原谅我，真的，你对我太好了。

倪冬雪：我可以吻你吗？

老威：好吧……就这一次。

倪冬雪：最后一次。

48　命在旦夕的蒲勇

2002 年 10 月 21 日下午，天空阴冷有雨，蜷缩在家中的我突然接到六四政治犯蒲勇之胞弟熊伟先生打来的长途电话，他说："我哥哥因胃癌晚期，生命垂危。"震撼之际，我立即致电四川省南江县城的蒲家，躺在病床上的蒲勇已气若游丝，可神志尚清醒。悲从中来，我喉头梗阻，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因为我的父亲十几天前也因肺癌晚期过世。我清楚对于正被癌魔一点点撕碎的临终者，任何世俗的安慰均无济于事。

然而蒲勇却反过来劝我："廖胡子，你别难过。"接着时断时续地讲述自己的病情，"肚子一天比一天大，"他说："不是怀孕，是腹水。"我问："能为你做点啥？"他答："不需要。"我问："你的判决呢？"他答："存在公安局档案里。你去查 1989 年 10 至 11 月的《四川日报》，上面登有我的反革命罪行。"

这种蒲勇式的黑色幽默，我在牢里早已领教。当每日傍晚放风时，我和难友李必丰总是习惯在监区空地兜圈儿暴走，而蒲勇不止一次横插过来问："去哪儿？"

我说："想去哪儿就去哪儿。"蒲勇说："那就上山打游击。"李必丰说："书生打个屁的游击。"蒲勇笑道："那就上美国念书吧？闭上眼睛，走着走着就到了。"于是我们心领神会地兜着圈儿笑，警察在二楼露台上远远地注视着这三个人。

幸福的日子一去不返，而今，兜圈儿的三人，一个命在旦夕，一个于 1998 年 3 月"二进宫"，再次判刑 7 年，投入四川省雅安监狱改造。大约一个月前，他来信说："身体每况日下，已做过一次手术……指甲盖莫名其妙地渗血出来，一滴接一滴，不容易止住……我怀疑得了什么绝症，还能熬多久呢？"

还能熬多久！也许最后我会剩下来，因为我的刑期最短，胃口最好，也就最健康。至少目前我还坐在桌子旁，一边咀嚼有关蒲勇的材料，一边写字，尝试着在一个赢家通吃的时代介绍一个已被人淡忘（或压根就没人记起的）失败的政治犯——

蒲勇，四川南江县人，20 来岁即出任副乡长，原本极有政治前途，却因在 1989 年六四惨案之后散发、张贴传单，谴责政府的屠杀暴行而被重判 10 年有期徒刑。在狱内被分配到翻砂车间，于砂尘弥漫中从事重体力劳动，患上严重胃病，却得不到治疗。1999 年 10 月，蒲勇刑满出狱，心气浮躁，曾跑过大江南北，与难友侯多蜀、廖亦武、许万平以及许多民运中人联络，均失望而归。记得有一次，蒲勇来我家打听因“中国民主党案”而偷渡去泰国的杨伟的消息，我察言观色，不得已将美国驻泰使馆把要求避难的杨伟扫地出门的真相告之。蒲勇铁青着脸，半晌方道：“那以后，我们这些无名的人咋办？”

我无言以对。从我的沉默中蒲勇终于醒悟：谁也靠不住，只有靠自己的顽强先活下去！再次见面时，他已是成都中医药大学的一名学员了，“虽然岁数大了点，”他笑道，“但学几年，我就能开一个小诊所，凭真本事过上正常的生活。”

他大约一两个月登一次门，寡言少语地坐上一会儿，我们共同的话题是监狱和牢友的音讯，他叹道：“佘万宝、李必丰、许万平进去了，剩下的，除了你有固定的地址，其他都在江湖上飘着。”我安慰说：“你也快过上正常日子了。”他摇头道：“外表正常了，心里却过不去，除非六四有个说法，我啥都不要，只要一个说法。”

写到这里，脑子一片空白。蒲勇，亲爱的兄弟，我知道每时每刻你都很疼，钻心，钻骨头地疼，我知道越到后来，杜冷丁那样的毒品已不能缓解你的疼。我祈祷上苍，让你早日解脱，离开这个不公正的精英主宰的世界。天堂很棒，地狱也不赖，总之都比人间好，去吧，兄弟，我会记住你，像记住我喘不过气的父亲，我曾忍住泪水，在“放弃抢救”下面签上廖亦武三个字，我曾用颤抖的手为他抚上双眼……虽然这种生离死别的回忆是有毒的，会损害人的健康，但我将让这种幸福的毒素占据灵魂，直到某一天怀旧的病灶转瞬癌变，毁掉我，那么，我所为之珍藏和捍卫的这么一点可怜的真相也将随之葬入坟墓。

2002 年 10 月 23 日成都

附一、熊伟来信

廖亦武先生：你好！

非常感谢你的热心，我哥哥现在的这种状况我们作为亲属的实在是痛心疾首，心中苦不堪言，命运对他太不公平了，这些跟狱中的待遇着实有着非常的关系。

我们怀疑政府是否在这些年里，在对待政治犯和民主人士采取了暗害的策略，会不会在一些食物、生活用品或者周围环境放置了致癌物质，表面上不打击民主人士，但暗地里使他们患上绝症，在出狱后慢慢生病而死去。但我们这只是猜测，没有证据，因此，我们想建议，如果有这么一个组织，可以来调查这些，统计一下出狱的民主人士现在的健康状况，也许能说明一些问题。

我哥哥现在的状况是一天比一天差，癌症是个绝症，我们都知道哥哥最后的归属，我们作为亲人的非常不愿看到这一天的来临，但我们却毫无一点办法，我们现在都非常的无奈，束手无策。父亲现在每天皱着眉头无奈的痛惜和痛心，母亲更是伤痛欲绝，以泪洗面，作为同根生的胞弟，血浓于水的情谊，更是一种十指连心的痛楚。

蒲勇的联系方式，电话：0827-8226284，手机：13981652531

另附简历一份，照片 2 张，照片中是已经病重的蒲勇，均摄于 2002 年 10 月 3 日，背景为南江县县城。

拜托你了！

“蒲勇的简历和患病经过”和照片两张请见附件！

注：你收后回信一封，我好确认你收到了。

熊伟（我现改名为“熊柏渊”）

电话：010-68222172（办公室）

手机：13611371355

2002 年 10 月 22 日

附二、蒲勇简历

蒲勇，男，生于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日，四川南江县人，于1989年10月11日因“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四川南江县公安局拘传，10月12日被四川南江县公安局拘留，10月22日被四川南江县公安局逮捕，捕前为四川省南江县下两区凉水乡副乡长。

1989年“六四事件”后，蒲勇因同情学生的遭遇、向往民主制度，于1989年10月国庆戒严期间，在四川省南江县县城散发揭露“六四事件”真相、抨击专制体制、建立民主制度的宣传传单。事发后，惊动了县、地、省以及中央各级政府和党委，被国家公安部、四川省公安厅定为“特大反革命”案件，限期侦破。

蒲勇于1989年10月11日被四川省南江县公安局拘传，10月12日被四川省南江县公安局拘留，10月22日经南江县检察院批准，被四川南江县公安局逮捕，于1990年3月20日被四川省达县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为“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并判处有期徒刑10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刑事判决书》达地刑字（1990）第1号）。先后关押在四川省南江县看守所、四川省蓬安监狱（九一厂）、四川省第三监狱（四川省大竹县），于1999年10月11日刑满释放。

服刑期间，蒲勇先后与民主人士廖亦武、侯多蜀、雷凤云、杨伟等被关押在一起，并参加了在狱中组织的各种人权、民主要求签名、呼吁活动。

蒲勇于2002年7月18日在四川省人民医院因“胃溃疡”手术时，发现已经是晚期胃癌（大网膜型，腺癌，病理诊断证实），并伴有淋巴结转移。并于7月29日、9月15日在华西医科大学附一院生物肿瘤治疗中心进行生物化疗两次，但治疗效果不明显，病情继续加重，身体消瘦，进食梗阻，疼痛，每天需注射“杜冷丁”。10月15日左右在上述症状的基础上出现腹水、黄疸、肝功能损害、疼痛加剧，现每天都必须要注射两支“杜冷丁”，B超提示：肝转移。

附三、蒲勇患病经过

哥哥以前的身体很好，没有听说有好多看病吃药的事发生，至从入狱后，大约从 92 年以后，我们家人到狱中探视的时候，都要带一些治疗胃病的药物，因为蒲勇的来信中说到他在狱中胃不太好，经常犯胃痛，消化不好。因此我们常带的药物大都是“三九胃泰冲剂”、“吗丁林”、“多酶片”等，由于蒲勇是被关押，因此懂医的我们既使在探视的时候也无能为力，只能是带一些常用治疗胃病的药物，根本不可能仔细检查和诊断。至从 1999 年 10 月份出狱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和在生活上的保养，蒲勇的胃病有所缓解。2000 年 9 月份，蒲勇在成都中医药大学读书，当年底，蒲勇的胃病复发，上腹部经常疼痛，身体消瘦，食欲不佳，体质逐渐下降，曾在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就诊，经过胃镜检查，诊断为“胃溃疡”，此后在长达一年半的时间里，多次在省人民医院、华西医科大学挂专家号就诊，经过胃镜检查和活检，仍诊断为“胃溃疡”，前后服用过“西咪替丁”、“雷尼替丁”等治疗胃病的药物，但病情时好时坏，很不稳定。时至 2002 年 1 月底，蒲勇放寒假回家，我们家人才发现他形体消瘦，精神萎顿，胃痛伴解黑大便，血色素检查结果为 6 克/100ml，医院诊断为：“胃溃疡、胃出血、贫血”，病情已经加重。经过一个寒假的治疗胃溃疡、止血、静脉补充营养、在生活上加强营养和休息等措施，病情好转，身体明显恢复。开学的时候就去了成都。

2002 年 5 月黄金假期间，我（熊伟）到成都出差，伴同我一起到成都还有我的爱人，我到达成都是 5 月 6 日，我们看望了在成都中医药大学学习的哥哥，他看起来很清瘦，但精神很好，我们哥俩很久都没有见面了，在一起的时候挺亲热，有说有笑，跟他平时在校的少言不一样。我们去过他的宿舍，他的床铺很整洁，井井有条，然后一起去吃饭，逛商场，一块玩耍。晚上我住在华西医大招待所，他回到自己的宿舍，第二天一早天上下起了雨，雨较大一直不停，因为我还要去办事，就冒雨出门了。晚上回到住的房间，看见桌上有一把雨伞、一瓶蜂蜜和我昨天遗忘在哥哥宿舍里的牙刷，一问服务员，原来是哥哥来过，他看到天上下雨，想到我们今天还

要出门办事，于是一早就冒雨送给我们雨具。后来再见面时他说他的胃不好，医生说不能吃甜的，因此就把蜂蜜带给我们。后来这一大罐蜂蜜，在我们回北京的时候也就一路带了过来，至今还在我们的家中摆着。

在成都的时候，他谈到这学期开学后，回到成都，他又在华西医大附一院、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门诊挂专家号，作胃镜检查和活检，仍然诊断为“胃溃疡、贫血”，胃痛仍然时常发生，饮食上只能吃柔软、清淡的一些食物，还不能过饱、过饿，也不能过冷、过热，这对于一个在外求学的学生来说，所处的条件有限，在生活上非常的不好调理。他当时按照医生的医嘱，坚持服用“洛赛克”和其它一些治疗胃溃疡的药物。5 月 10 日晚，我和我的爱人乘坐当天的 K118 次返回北京，哥哥一直送我们到火车站台，并送我们上了车。

回到北京，我们时常有电话联系，他也一直说他的胃病时好时坏，反劝我们不要在意，他会好的。时间过得很快，转眼七月份就来了，哥哥的学习也进入了实习阶段，他分配到了四川省阆中县中医院实习，就在他到达阆中县中医院报到后，他的病情突然加重了，他感觉在以前的一些症状基础上，出现了腹部胀，吃东西后更加严重，根本就吃不了东西，而且伴随呕吐，胃痛加剧，人很消瘦，于是他很快请假回到南江。

蒲勇于 7 月 5 日回到南江后，我父亲看见他目前的情况，一种职业的敏感，让他感觉到哥哥的病情恶化了，马上 B 超检查腹部，发现右上腹部有新生包块，胃幽门部有新生物；经胃镜检查证实，幽门部有新生物、幽门梗阻。初部结果出来后，立即于 7 月 8 日动身到成都，在华西医大就诊，经专家检查，结果同前，需要立即手术治疗，由于华西医大床位紧张，入住院困难，立刻转到四川省人民医院外科住院，很快做好了手术的准备，于 7 月 18 日上午手术，在手术中，主刀医师发现胃部病变组织已经恶变，并且发生转移，腹腔内淋巴结肿大，大网膜有转移。当即医生通知在手术室外等候的亲属（母亲熊金梅、妹妹蒲俐和妹夫谢汉），说明了情况，并表示手术不能进行，病变组织不能切除，疾病不能根治，目前唯一能

做的是在梗阻的区域改道，把幽门部切开，将胃的上部与空肠连接，绕过梗阻的幽门，使进食的梗阻症状改善，但这样做并没有治疗意义，仅仅是“扬汤止沸”，只是让蒲勇在短期里好受一点。

治疗手术就这样成了改道手术，并且在继续中，我们家人得知这样的结果如晴天霹雳，妹妹在手术室外忍不住痛哭起来，在打给我的电话接通后哭声依然止不住。这天我也在北京焦急等待着手术的结果，当我接到电话时，听见电话那头妹妹的哭声，我的心一下子就揪住了，我知道哥哥的病情不妙了，果然那头传过来的消息仍是如此噩耗。

手术结束后，我们立即打听下一步的治疗，于是找到了华西医大附一院生物肿瘤治疗中心的负责人魏于全教授，魏教授毕业于华西医大，后到日本留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在生物治疗肿瘤方面在世界上的这个领域具有权威地位，大概是在 95 年回国，仍然回到了华西，在华西医大建立了生物化疗的实验室，当时他 40 岁不到，已经是教授、博士生导师。因他也是南江人，所以我在华西读书的时候就比较熟悉。这次我们首先想到了他，哥哥手术折线后便出院，立即于 7 月 29 日转到了魏教授的生物肿瘤治疗中心，在这里给于了生物化疗一个疗程（七天），这种治疗魏教授介绍到是每月做一个疗程。我在北京也亲自打电话给魏教授，他谈到我哥哥的病情时介绍到，这种治疗方法对于肿瘤本身，在早诊断和彻底手术切除后，它的效果比传统的放化疗疗效好，术后的五年或者十年存活率也较高，但我哥哥的病情一来是胃癌晚期并发转移，二来癌变组织在手术时根本就没有切除，所以治疗效果很难保证，目前的生物化疗的治疗目的主要是延长患者的生命。

在八月份的生物化疗这个疗程结束后，我哥哥回到了南江休养，母亲亲自照料他的生活。由于手术将梗阻的部位绕过去了，所以哥哥回到家中，身体比较轻松，能吃饭，精神也较好，他的心情很高兴，但我们却要强装笑颜，因为我们还没有将真实的病情告诉他。

时间到了九月份，手术已经过去了一个月，哥哥的整体情况还不错，但腹部的包块却没有停止生长，他感觉到上腹部变硬，有一

些胀满，吃东西不能太多，否则就在心口上堵得慌，而且腹部出现了癌性疼痛，好在我们为他办理了癌症病人专用的“杜冷丁注射卡”，他每天都要打上一针“杜冷丁”，不然的话晚上就痛得睡不了觉。

在九月中旬的时候，哥哥蒲勇于 9 月 15 日又来到了成都华西医大生物肿瘤治疗中心，做第二疗程的生物化疗。化疗第二疗程的七天结束了，哥哥回到南江。我也在十月国庆期间得以返家看望哥哥。我是在 10 月 1 日晚回到家中，看到哥哥的时候，他很消瘦，精神不太好，但对于我的回家，看得出来他非常的高兴，他时常坐在一把椅子上，弯曲着上身，用手扶着腹部，表情很痛苦，我知道癌症的疼痛又在发着了。他的旁边摆放着很多零食，但我看很多都没有开封，他已经没有口味来品尝这些美肴了。对于吃饭他能做的仅仅是在桌上陪着我们，他当时味口已经很小了，而且闻着油晕就恶心想吐，吃得下的东西仅仅是一些很清淡的稀粥和泡咸菜。

我回家的第三天我想陪他出去走走，于是我们来到了位于南江县城南边的公山，公山大约高 400 米，我们延着蜿延崎岖的山路慢慢地往上爬，他走得很辛苦，走一段要停一会，面对很陡峭的石梯，他爬得更慢了。最后，我们爬上了公山，公山位于县城南边，公山的北边很徒峭，是悬崖，在这上修建了一个可以歇脚的亭子，站在亭子边的悬崖上，就能俯瞰整个南江县城，你可以感觉到整个南江县城就在你的脚下。（10 月 3 日的照片上就是此地）

我们在这上面待到了近中午，才下山而去回到家中。他一回到家中，就显得疲倦不堪，吃了很少一点稀饭就上床休息了。到下午的时候，腹疼又开始了，开始还能忍着，后来就忍不住了，很惨的样子。

每二天，我们一家人坐车去了距离县城 5 公里的农家乐“桂花苑”玩，到达农家乐后，哥哥显得很疲惫，精神萎顿，近中午的时候，他有一点坚持不住了，我们就此结束了这次出游，匆匆回到家中。此后我在家的几天里，哥就没有出门，我也就在家陪着他。

10 月 7 日我假满返京，10 月 15 日左右，哥哥的病情每况愈下，疼痛加重，人更加消瘦，进食量更少了，并且出现腹水、黄疸、肝

功能损伤。B 超发现已经肝转移。听我妹妹说，有一天他疼痛难忍，在一天内打了五支“杜冷丁”，妹妹都急哭了，说到这东西不能打这么多，再者这药物医院控制得很严，有“癌症卡”的病人，医生每天最多也只能开两支，而且还要保留空瓶退还医院，想多用根本就没有办法搞。其实，这些时候已经在学医的哥哥对自己的病情已经开始怀疑了。记得我回京的时候在那天晚上，他对我说起，他说从 7 月份手术后，原以为经过养养很快就会没事的，但现在看来病情并没有减轻。随后，他连说了两句，“不对”、“不对”，就不再说话了。面对这些我只能默默无语，眼中的泪水差点就流了出来，可怜的哥哥呀，我们现在还悄悄瞒着你，不敢告诉你实情，而在这不久后你就将离永远我们而去。

在随后的几天里，妹妹把他的病情以一种“轻描谈写”的语气告诉了哥哥，最后说，只要我们积极治疗，这种病的存活期是五到十年。哥哥知道了这些，我想大概也就证实了他心中不断揣测的东西，或许他心中早就有准备了，所以听妹妹说，他显得很镇静，也比较沉默，并没有说太多的话，在治疗上还积极的配合我们。

现在哥哥在我们家中的诊所里接受治疗，或者说是在等待死亡。他现在神志很清楚，但病魔却不断折磨和摧残他的身体，他的身体已经很消瘦，基本上吃不了多少东西，全是静脉给输一些营养药物，腹水已使他的腹部膨隆，隔上一、两天就要从他的腹腔内抽出近 1000 毫升的腹水，全身已经黄疸，精神比较萎顿和疲惫，有时有一些烦躁，其它时候就更加的沉默了。

做为医生的我们，曾经面对过很多的死亡，对于癌症患者在临终前的景象，我们心里非常的清楚，那一种灾难，带给病人的是身体上的折磨和意志上的摧残，对于家人更是心灵上永不能磨去的酸楚和那一场撕心裂肺的痛心，我们都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附四、2002 年 10 月 24 日，蒲勇病情最新情况

昨天（2002 年 10 月 23 日）蒲勇的病情再度恶化，蒲勇全身的黄疸已经明显加深，身体很消瘦，并出现血尿，尿中带有血块，尿的颜色呈粉红色，下肢已出现水肿，今天第三次抽取腹水，有 800 毫升。随着病情的发展，蒲勇疼痛更加剧烈，疼痛时烦躁不安，前两天每天都必须注射五支“杜冷丁”，现在“杜冷丁”已经起不了多大的作用，就在今天（2002 年 10 月 24 日）已经准备好了“吗啡针”，如果今晚“杜冷丁”止痛不起作用，就改用“吗啡”止痛。蒲勇本人精神更加萎靡，但神智却很清楚，说话的声音很清晰，我打电话给他，他仍然说“没啥”。爸爸告诉我这些时声音非常低沉，他说蒲勇是在用意志支撑着。（熊伟）

49　乞丐王

采访缘起：在中国任何一个城市的车站附近和城乡结合地区，都栖聚着大量乞丐。他们乞讨的伎俩五花八门，我在成都外来人口最为稠密的五块石遇见的这个 40 多岁的黑脸汉子，堪称乞丐社会中的一绝。

他有头脑，梦想有一天能在省会扎下根来。这是 1996 年的清明节，我和宋玉到五块石办事，归途中遭遇堵车，我们在恶臭熏天的立交桥处下来，准备穿过人行桥洞，旁边闪出一“残废军人讨口饭”的招牌。我生性好奇，就不顾宋玉劝阻，趋近观赏。不料玩笑成真，做了采访。

乞丐王：兄弟行行好，可怜可怜我这残废军人吧！可怜可怜这两个无辜的娃儿吧！这条胳膊是打越南的时候负伤锯掉的，肚子还挨了一枪，你看，这个疤，里头尿泡都穿了，一喝水就流小便。这是一级残废证明，这是军功章，我该死，不该出来给首长和战友丢脸，可实在没办法。娃儿的妈跑了，被人贩子卖到西北了，扔下两个娃儿，咋办哟！呜呜，我死又死不了。兄弟，看你是个善人，只要您肯把这两个娃儿领去，为你煮个饭，提个鞋，我这辈子没了牵挂，我今晚上就去跳府南河！桂娃子、二娃子，快给你善人伯伯磕头！

老威：叫孩子先莫忙抱腿，我看看你的证件。嘿，你这国防部的公章是自己雕的吧？你是哪个部队的？认不认识老威？

乞丐王：我是某某军某某团的，在老山守了一年多猫耳洞，还参加过攻打谅山。你说的老啥子威是啥单位？很耳熟，可部队那么大，我记不起来。

老威：你连老威都不晓得？可见是骗子！在这儿损害我人民解放军的形象。走，跟我到派出所去。你这条断胳膊也有问题，是捆在身上的吧？难不难受？

乞丐王：我，我，啥时候说过我是残废军人？这证件是我捡的。

老威：你转眼就不认账了？

乞丐王：兄弟，得饶人处且饶人，我也是没有办法才出来讨口饭。哪个朝代都有叫化子嘛。

老威：你要饭就要饭，为啥胡编故事？

乞丐王：讨好你嘛，激起你的同情嘛，人心都是肉长的，如果你舍不得钱，走你的路。我又没有拦路抢劫。

老威：你是哪里人？叫啥名字？做这买卖几年了？

乞丐王：你又不是查户口的，问那么详细干啥嘛。实话告诉你，今天我就算栽了，被你揪进派出所，你前脚出门，我后腿就跟着出门。警察也不会问我的来历。这年头，叫化子太多了，要关，起码还要修几千座监狱，法官也要增加五到十倍。现在健全法制，关一个人没过去那么容易。况且，讨饭不犯法，警察抓我还要管吃管住，即使收容遣送，也是一大批，不会为我开专列。你是记者吧？你去调查贪官嘛，和我们计较有啥意思？

老威：假如我一定要计较呢？

乞丐王：你这是找虱子往自己身上爬。你看街边上睡的那一窝娃儿，黑咕隆咚，像不像耗子？我一声招呼，他们就会过来，吊你的手，抱你的腿，喊你老汉，跟你要吃要喝，加上我这两个娃儿，你呼啦一下子，就成了九个娃儿的爸了。这是要饭，不是抢劫。但是你可能要把身上所有的东西留下来，才走得脱路。

老威：你哪来这么多娃儿？

乞丐王：街上捡，要多少有多少，我还给他们捡过三个大妈，两个二妈。

老威：叫化婆？好，好，我给钱。交个朋友吧？

乞丐王：一元钱？不行，太少了。

老威：这叫什么话！你有行乞的自由，我有给多给少的自由嘛。

乞丐王：刚才是这样，你给不给都无所谓；现在情况变化了，你这人太不地道。

老威：你想要多少。

乞丐王：你不是说要和我交朋友么？“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今天我在落难之中，朋友你就看着办。我是九个娃儿的爸，再加上三个大老婆，两个二老婆，一共 15 口人，你最起码得一人赏一块钱吧？

老威：小意思。这是 50 块钱，零头别找啦。

乞丐王：好，今天遇上人爷了！娃儿们都过来磕头！

老威：慢！朋友，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如果你把要饭的都唤来，我就当场撕这这票子。

乞丐王：千万不要撕！钱、钱、钱，命相连啊！

老威：这就够意思了。拿去。你对着太阳照个屁！不是假票子。

乞丐王：朋友莫非要让我们帮你办事？哪这点钱就不够。

老威：办啥子事？

乞丐王：你家若有哪个娃儿不争气，学习成绩不好，逃学，又怕回家挨打，就出走了，你尽管放心大胆地找我。把年龄、口音、相貌、穿戴说细一点，我在乞丐圈里为你打听。如果我都找不到，成都街面上就没有这个人。

老威：这不是大海捞针么？遇上这种事，我不会拨 110？

乞丐王：人是活动的，110 在街上巡逻，不可能把每座桥、每个洞、每个坎、每条巷都跑到，更别说我们的总部。光是五块石这一片，你抬脑壳望一望，这边，靠铁路边儿上，你数一数，多少个小要饭？脸都是一样黑，身上都是一股味儿，就是你的娃儿在里面，你也不一定能认出来。

老威：你咋这么肯定我的娃儿会当叫化子？他挺有志气，宁愿饿死也不要饭。

乞丐王：十来岁的娃儿一上街，两眼一抹黑，志气顶个屁。现在不是 50 年代，没有雷锋叔叔送他回家。你不信？前段时间，有个几岁的娃儿在鱼池边玩，不小心栽下去了，旁边那么多喝茶的叔叔阿姨，都装着没看见。后来，娃儿他妈急匆匆地找过来，才发现

小孩在水里，哭得没命，哪个理她了？娃儿死了，她妈抱着尸体坐在鱼池边，那池子其实只有一米多深。唉，我都不会见死不救。我捡的那些娃儿，说不定其中就有离家出走的。现在小娃儿看武打片，看科幻片打电子游戏，啥稀奇想法没有？可离开爹妈就不灵了。我这儿算给他们的人生第一课。我叫这些宝贝疙瘩自己挣伙食，先从舔盘子开始，嘴巴甜的，会演戏的，就拉路讨口；不会这一套的，就火车站、汽车站、农贸市场去顺手偷点拿点；再不会，就到城北的大垃圾场，刨点捡点，也够糊嘴巴的。现在的孩子比我们小时候聪明多了，我的临时老婆训练他们磕头、抱腿，不到半小时，全会了。这是从河南人那里学来的，他们曾经一拨十几个，老少都有，把火车站扫荡遍了。现在候车室安了空调，叫化子混不进去，他们就去扫荡城北汽车站、荷花池。差点就进入五块石了，我联络了一帮朋友，把他们打一顿，撵出去。我认识许多彝胞，去年，这还是他们的地盘，在桥头那边的劳务市场挨个蹲着，每个人把查尔瓦一罩，就下去了，像一群密密麻麻的乌鸦。你说怪不怪，他们能够在路边一蹲就是一天，吃饭、睡觉都蹲着，连屙屎都不挪窝。彝胞不要饭，可到了晚上，就到处转，能进嘴的，能上身的，风都要抓一把。这一带居民被偷惨了，集体告状到上面，电视曝了光，警察才出动，一网打尽，连钻阴沟的也要撬开石板拖出来，遣送回去。我估计过一响，他们又会卷土重来。我是叫化子，我都嫌他们臭。

老威：你的眼界挺开阔的，好吧，我的娃儿离家出走了，你帮我找吧，有重金酬谢。

乞丐王：你说说娃儿的特征，不过，你先得付我满城转的路费。

老威：我的娃儿叫陈器，13 岁，在资阳某某小学上二年级。于 1997 年 11 月 31 日离家出走，已历半年，至今杳无音讯。我娃生得浓眉大眼，平头，下巴右边有颗黑痣，出走时穿天蓝色夹克和黑色长裤，脚蹬白色运动鞋。他喜欢看武侠连环画，因此学习成绩差，专爱模仿武侠人物打班上同学，由于受家长和老师的联合严厉批评，赌气离家出走，留言要“上少林寺学中国功夫”。

乞丐王：你这娃儿的照片我见过，在火车站出口墙边贴着呢。

朋友，我是干啥的？所有车站类似的寻人启事我都背得滚瓜烂熟，你拿我开玩笑？

老威：这个，这个……

乞丐王：你到底有啥事？

老威：这个……

乞丐王：不好说？我猜到了。肯定你是失恋了，要报复你的女朋友。这好办，你再出 100 元，给顿饭钱。把那女人的地址告诉我。我带上这十来个小要饭到那儿去候着。等她一出门，特别是跟她现在的男朋友一出门，我就让娃儿们扑过去，扯住她又哭又闹地喊妈，霉得她这辈子抬不起头。

老威：亏你想得出来！

乞丐王：成交了？给钱吧。

老威：成你妈个鸟！

乞丐王：莫急嘛，朋友，办法有的是。若是你生意上的对头，我们就天天去封他的门。要不，半夜三更抬桶大粪灌他娘！

老威：公司有保安。

乞丐王：我们这么多人，一拨把看门狗引开，一拨趁机灌粪、砸窗户。

老威：你？！他妈倒是“侠肝义胆”！

乞丐王：嘿嘿，学洪七公嘛。丐帮弟子哪个不是侠肝义胆？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像我，走遍大江南北，挽救了多少失足青少年！朋友有啥难事尽管开口，我能帮则帮，不能帮，说几句安慰话暖暖心窝子也行嘛。话又说回来，事莫做绝，朋友，哪怕是你的冤家对头，你也不要买杀手。钱花得没有底底不说，那是犯法哟，事干得不利落把你抖出来了，倒运这段时间你完全可以打翻身仗了。怎么样？花钱不多。

老威：承蒙你的关照了，我和你一样，吃百家饭穿百家衣交百家朋友，哪来的冤家对头？

乞丐王：除了叫化子，只有记者才吃百家饭，到处找新闻嘛。

老威：我不是记者。你看好，我没有照相机，也不带笔记本。其实，报上登的丐帮的事太多了，比你更新鲜更刺激。我还到过西藏拉萨，那儿的小乞丐能把你跟上几条街，你照像、买东西、甚至上厕所都甩不开，除非你出点血，否则他就把那小破琴一直弹下去。那是我见到的世界上最有耐心的乞丐。

乞丐王：你不是记者？其实也没关系。只要不照相，不暴露我的姓名，你尽管写好了，不过，你总不能白写嘛。你挣稿费总有我们的劳动嘛

老威：再给你一张 50，不过，要等我们聊完了付。

乞丐王：聊？哪个会和叫化子聊天？今天真稀奇，虱子拱翻了铺盖，太阳从粪坑里冒出来。

老威：听您的口音是隆昌人吧？出来几年了？怎么在成都站稳的？

乞丐王：我出来有十个年头了。先是打工、建筑、装卸都干过，还拉过一段时间边三轮，没办法，累死累活一个月不到 200 块。还要受气，还要担惊受怕。这年头，劳动人民不再当家作主了，风水倒转回去了，反正下力的都贱，不如一步贱到位，改革开放嘛，我看就是男的讨饭，女的做娼，这样才能脱贫致富。

老威：你倒坦率。其实做乞丐致富又不是中国的发明，日本的叫化子骑着摩托要钱。埃及是文明古国，却有世界上最大的乞丐王国。在首都开罗，最闻名的乞丐王都是百万富翁，他们都是像你这样倒绑着一只手，披一件臭气熏天的毡子，肩上扛一个比猫还瘦的小孩，在闹市区来回挤着乞讨。这一老一小配合默契，又讨又偷，快活得跟神仙一样。您呢，生在中国，完全不能同洋叫化子比，看您那只破碗里几张脏兮兮的角票……现在的人都被骗精了，哪怕信佛的老太太，也没几个在乎您这一套。我看您还是装瞎子算命吧，到文殊院算命一条街去。

乞丐王：你太小看人了。我们村下广东的女娃子，稍有点颜色的，“打工”一年两年，就回家起幢房子，我没起房子，是因为乡下没发展。难道我堂堂男儿汉，还不如村里那些十八九岁的女娃？

告诉你，这上街要饭只是第一职业。能够在五块石一带长期讨口，已经不容易了。这行道也有竞争。至于说外国叫化子，都是书报上吹的，我没见过，估计你也没见过。文人的笔上生花嘛。

老威：这么说你还有第二、第三职业？也就不过是“得人钱财，替人消灾”带着一帮小乞丐到处出人的丑吧？

乞丐王：我在叫化子圈里，也算叫得出名的人物，没有两刷子，能混到今天？不瞒你说，我在附近有一个公司。

老威：你别吓唬我，老板。

乞丐王：当然没有挂牌注册。前段时间，报上登过垃圾猪的事，你肯定有印象吧？我叫人写的匿名信，记者欢天喜地就跑来了，还采访了我。

老威：你是吹牛的吧？反正哄死人不偿命。

乞丐王：那养垃圾结的原来也捡破烂，废纸，塑料袋，空瓶子，还有肉骨头，啥都回收，变废为宝,发了点小财。有一天，这杂种突发奇想，买了几只猪崽敞放在垃圾山上，这一下子就发大财了，一年之后，几只猪一下变成了两百多条肥猪！他一颗饲料也没喂，连猪圈也不搭，只在人住的棚子隔壁，随地圈了块猪的棚子，棚顶扯了几张塑料布。每天大清早把猪轰上山，天一黑，把猪吆下山就完事了。垃圾里啥没存？潲水、油荤、骨头，还有工业废料，说不记还有放射性物质。所有这些东西搅在一堆，比刘永好的饲料还催肥。猪每天拱吃这些营养，把胃都吊高了，你就是喂它饲料也不吃。

老威：这垃圾猪和你有哈关系？

乞丐王：我曾经放了几条猪崽在那堆垃圾上，也被吆进那杂种的棚里，幸好我在猪胯下打了记号。为这事，我领着一帮弟兄和他们打了一架，输了。那些地头蛇和当地串通一气，管垃圾的、倒垃圾的、处理垃圾的，都买他们的帐。加上他们是供销一条龙，大家都能从垃圾猪身上得好处。所以我们只好撤退。临走时，我的娃儿们气不过，就刷了大堆硫酸瓶子、农药瓶子，满山泼了。你想，普通家猪哪受得了这种剧毒？可没事，那杂种一条猪也没损失；于是我的兄弟伙又悄悄去连下两回毒，照样没事。他妈的，这哪是猪，

简直是一群眼镜蛇！不晓得吃的啥，也不晓得这猪肚子起了啥化学反应，反正大家都说垃圾猪肉嫩，养人。

我依法炮制，在这附近的垃圾山养了几头猪，现在才三个多月，就长到百把斤了，估计让它们自由交配，年底至少发展到百把头。不花饲养钱，这肉白捡，最多到后年，我就准备用这肉钱买一套商品房。

老威：您现在住哪儿？

乞丐王：我现在也住商品房，偶尔过过别墅瘾，不过是好几年都没卖出去的，到处都有没卖出去的房子，有的周围已长出半人高的草了。猪也住、鸡鸭也住。叫化子总部设在里面。

老威：我还以为你睡桥洞呢。

乞丐王：老皇历了。

50　人贩子钱贵宝

采访缘起：拐卖人口是一项历史悠久的罪恶行业，在旧中国，这种能赚大钱的买卖都由黑社会操纵，把骗到手的良家妇女高价转给发达城市的妓馆。

没想到，新社会铲除了黑帮，拐卖犯罪却由钱贵宝这种大山里的乡巴佬继承，特别是在现代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

1992 年 4 月 30 日上午，我在重庆市某看守所探望了钱贵宝，进行了两个小时的谈话。由于不准带任何录音器材，我只能在此时此刻凭记忆追述。

人贩子自有一套上不得法庭的歪理，可怕的是，他居然把这套歪理升华成一种“信念”。

但愿这篇采访能为犯罪心理学提供某种参考。

老威：我看你这付样子老实巴交，不像个人贩子。

钱贵宝：我的确不是人贩子，我正儿八经做生意。

老威：做人肉生意吧？

钱贵宝：同志，你这样说就不对了，妓院才做人肉生意，我不开妓院。

老威：你没干过逼良为娼的勾当么？

钱贵宝：资格的良家妇女，无论你咋个逼，她也成不了娼。比如我老婆，至今还守在穷山沟里，我都成这样了，她也没改嫁，没偷人。而天下大多数女的，也同男的一样，喜欢外面的花花世界。喜欢占便宜。报上经常登某某某如何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我捉摸，这个人生价值，不外乎就是花一分力气，占十分便宜；就像歌星，张张嘴儿，唱个歌玩儿，票子就哗哗朝兜里淌，所以人人都羡慕歌星、模特，因为他们张张嘴儿，扭扭胯就能赚。我是农民，为啥没人崇拜农民？就因为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花十分力气也占不了一分便宜。

你出了汗，种了粮食，可城里人吃着粮食还嫌你汗臭。因此，我干这个行当，是顺应了时代潮流，投其所好。不错，我干了五年卖了 20 多个人，可这些人都是自觉自愿跟我走的，我又没拿枪逼着她们，我又不是劫匪，绑了肉票换钱。

老威：你欺骗引诱，毁了人家的一生。

钱贵宝：我承认我欺骗引诱，但这世道，有几个人不欺骗引诱！恐怕只有吃糠的猪最老实，凡吃米的东西都不老实。我说我是老山里的傻农民，肯定没人愿意跟我跑；我把衣裳穿整齐点，说是广东某公司的经理，虽然样子可疑，可人家想都不想就套近乎来了。好多女娃子，都是见面熟，不用你勾搭，她也来劲。并且，怕说自己是小地方的。我发觉自己还有点魅力，刚出道时不自信，以后熟能生巧，舌头象在青油里泡过，滑刷得很，七仙女也能哄下凡。嘿，本来信不信由你，不信，你当我放屁；偏偏有那么多婆娘把我的屁当肉包子吞了，当香水搽了，活该。

老威：你是咋个奔上这条路的？

钱贵宝：这类事报上登得比较多，没啥子稀奇。我是平武县小河沟的农民，平武你可能晓得，出熊猫的地方。过去，林子和箭竹都密，我们靠山吃山，捡伐木厂剩下的木头去卖，也够糊口，另外，山上的物产也丰富。可后来，老林子砍得差不多了，伐木厂也撤了，地在坡上，不好种，我们那地方你没去过，光靠种地，养不活人。28 岁以前，我超生了三个女娃子，连裤子也没多余的。村里家家户户都差不多，男人捆草裤下地，把布裤子省下来，走亲戚、见外人时穿。冬天，姑娘媳妇都光着，挤在内屋火铺里做手工活路。这样熬到 92 年，村里几个壮劳力一碰头，决定把存放多年的一些件皮货拿到县城去换车票钱，然后搭伙出外打工。先是在县上盖房，以后就跟包工头到成都，到甘肃，长了见识，就不干那累死牛的重体力活了。兰州的回民对人义气，我跟他们混熟了，一起去走村窜乡，北方的地盘太大了，就是戈壁多，逑毛都不长，并且吃水也不容易，冬天的雪化在一口窖里，要喝大半年。但是，这里男人对人实在，死心踏地跟着婆娘转。因为女的太缺了，男的就攒呀攒呀，

攒十来年的钱，血汗钱，一下子就用在接婆娘上。在四川，我们那地方够穷的，也没见有多少光棍，可这儿，男人见了婆娘就瓜了，恨不得马上骑上去就日。你晓得四川女娃子勤快，好看，肯伺候人，外省都特别欢迎四川婆娘。我脑壳一转，嘿，该发财了。

老威：你第一次卖人是啥感觉？

钱贵宝：我第一次没卖人，我把两个女儿嫁过去了，把赔钱货变成了赚钱货。我的亲家在当地还算不错，那地方离铁路线才十几里，不算太偏僻。我把两个女儿嫁在同一个村，得了 600 元钱、8 只羊。羊卖给车站了，50 元一只，这样，我就有了 1000 元，发了大财，人都高兴快疯了。但是没过几天，我女儿告诉我，她们村里的四川婆娘不少，都是人贩子倒过来的，一个人的价钱最低也要 2000 元。我这亲家还是做亏本了。

老威：你大老远把女儿嫁给一个陌生人，他们合不来么？你得了钱，你女儿的退路就没有了。

钱贵宝：农民的女娃子，又不是金枝玉叶，有啥合不来？除非男人不长鸡巴婆娘不长逼。女人是越日越好看，当然，生了一两个娃儿，就没啥看头了。

俗话说："下崽前是金奶奶，下崽后是狗奶奶。"

老威：你是咋个扩大业务范围的？

钱贵宝：最先我还老实巴交的，给家乡人牵红线。可任务太艰巨了，我费心费力，磨破了嘴皮子，成功率就是不高。山里的女娃子，一辈子从来没出过县境，你要她一下离乡背井，跑几千里以外去嫁人？嘿，死她个舅妈都不干。

没办法，我只有骗，说在北方开馆子，招服务员，管吃管住还拿工资。这一招不灵，就干脆刻公章，造证件，开皮包服务公司，招工人。吹北方牛羊多，毛便宜，适合开纺织厂，生产毛衣、地毯，想起啥吹啥。渐渐，我的骗胆越来越大，与兰州的孙大个子，银川的刘螃蟹，河南新乡的刁二娃都有了业务联系。

我负责把招来的"货"运到约好的地方，交他们的"公司"就行了。

老威：还是个跨省的人贩子团伙呢。喂，你这么卖力地为家乡人民做“好事”，就不怕遭报应？

钱贵宝：报应？哄鬼，封建主义那一套。当然，我们是乡巴佬，做媒的方式有时不太文明，比如，事先没征求女方的意见。但是乡下的旧风俗，也是成婚之前男女不见面，只有进了洞房，揭了盖头，才晓得对方是巫婆还是天仙。

我父母那代人就这样过来的。

老威：啥子进洞房？据我了解，纯粹是上刑场，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你倒爽快、数了票子，把人往那火坑一推就脱手了。许多女娃子当即就被几个人按住手脚，让“新郎”强奸。还有被捆绑，被毒打得通体鳞伤的。你的新婚之夜也是强奸老婆么？

钱贵宝：强奸老婆？你咋有这种怪想法？当然罗，你是城里人，夜总会、舞厅，甚至车站、码头，都能认识女娃子，如果脸皮薄，出不了众，还可以上官办的婚姻介绍所，在报纸上打征婚广告，这回不行有下一回。乡下就差远了，很多人，一辈子只能在山沟里钻，结婚生孩子，多穷多累，有啥出息？邓小平提倡改革开放，可离县城几百公里的夹皮沟，谁去投资？恐怕本钱都收不回来。连机耕路都不通，鸡肠小道一走大半天。中国还有不少这种地方吧？财神爷请不进去，就得自已走出来，欢迎改革开放。大山里水土好，女娃子不打扮都白里透红，而北方最缺的就是这种水分多的货。那里的光棍太多了，我把这千里姻缘一线牵，两方都找到了归宿。虽然开头不那么温柔，逃跑啦、寻死啦，喊爹叫娘啦，可这一关过了，嫁鸡随鸡，日子也就越过越红火。至于捆啊打啊，农村就这样，汉子不打老婆不算好汉子。除非老了，撵不动了。有一回，我和老婆掰包谷回家，我就想日她。她说来那个了，即使我想日，也要等到天黑。我不干，非要白天日逼，她说累了，死活不准脱裤子。我毛了，就摸根顶门杠要出脱她，她拔腿跳跑，我跟倒撵，她呼地一下子投堰塘自尽。嘿，你猜咋样？她非但没沉下去，反正坐在水头哇哇嚎丧。原来那塘水只能淹到肚皮。

我带到北方的女娃子，命都比我老婆好，常言道："不捆绑不成夫妻嘛。"我是在帮国家解决困难，一个地方，光棍多，气候又不好，肯定容易出事，弄些女娃子去，阴阳就调和了。城里的婚姻介绍所还兴收介绍费，我与他们同行，也该收。其实除去车船费，沿途伙食费，鞍前马后跑路费，我也剩不了几个钱。有时，与那边"公司"把价讲好，人去了，男方却变卦，出不起那么多钱，也只有便宜卖，我们从不敢在人家村里闹事。

老威：四川警方组织了好多次解救被拐卖妇女的行动，群众都拍手称快，想必你已看过电视了吧？

钱贵宝：当然，你们城头人是拍手称快，山里人就不晓得了。其实这边的女娃子到那边住过一年半载，习惯了，总会想法与家里通消息的，"失踪"只是一种说法罢了。从男方家里逃跑的只是个别人，而多数人是不会同自己的丈夫分开的。

老威：什么丈夫？没办法律手续，就叫非法同居。

钱贵宝：民间的规矩，吹吹打打，公开请了客就算夫妻了。

老威：你是法盲还是装糊涂？

钱贵宝：乡下人千百年都这样，背太阳过山，和尚的脑壳——无法。有法也用不着。

老威：这回用着了，你拐卖人口，应该判死吧？

钱贵宝：我主动坦白，从轻判了无期。

老威：在狱中学法吗？

钱贵宝：学。这只耳朵进，那只耳朵出。我情愿多劳动，我祖祖辈辈都劳动人民，懂的是祖宗的家法，至于国家的法，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后来又包产到户，再后来改革开放，经济建设。总之，一个天子一个法，我一个土老坎，恐怕懂不过来劳改几年，天天都要学报纸，我增长了不少知识，也认罪服法。可说我是啥子"社会公害"，我不服气。我给政府增了麻烦，要出动那么多警察和车辆，去偏僻的地方找人，而且找到之后，还要费不少功夫，才能把婆娘从男方家里接出来。我晓得，精灵点的婆娘早

就藏了，不会让警察找到，因为回家的日子也不好过。乡下不比城里，婆娘不比小娃娃，一见亲人，马上抱头痛哭，失散了多年嘛。可婆娘回到大山沟干啥？从晓得你被卖出去，哪怕老光棍骚得裤裆起火，也不会要那烂逼。北方比南方野，从电视里都看得出来。前几天晚上，四川台重播了一个打拐节目，那些村，穷得不长一根草，警察的车一开进村头，就被围住了，那些北方棒老二，像从土里拱出来一样多，硬是把婆娘接不走。后来是县委书记、公安局长都来了，鸣了枪，车才开动的。哪个愿意人财两空呢？那可是血汗钱买的媳妇啊。我的眼泪都看出来了，早晓得这么惨，我就不卖人了。我得的是昧心钱。可话说回来，我干这行当也不是一天两天，人人都晓得，为啥子还要饿痨饿虾地接我手上的货？

那么多村，那么多乡都不懂法？我又不是在外国卖人。我敢打赌，被警察解救出来的农村婆娘，多数还是要跑回婆家，一夜夫妻恩嘛。当然，也有打得太凶，同男方搞不好的，北方这方面风俗太坏，手重，不象四川，小打小闹，不伤和气。

老威：别把自己形容得比佛爷还慈悲，你这种营生，历朝历代都属打击对象。不过，今天你能把心里话说出来，也算有了进步。你们这个人贩子集团很兴旺吧？

钱贵宝：有十几个人，这座牢里关了七、八个，北方的就在当地坐牢。领头的两个已毙了，我是演文戏的，没动过粗，所以排在第四被告。

老威：你们还强奸被拐骗的妇女？

钱贵宝：我没有。我还劝过周黑娃，北方人保守，是原装货，出多少血人家都干，一破了处，价钱就垮了下来。可那两个挨刀的，年轻火气旺，睡倒坐倒都想搞。周黑娃长得标致，骗打工妹有一整套，经常是把人家日出感情来，再牵绵羊一般弄到约定地点交货。

老威：你们不光是在农村作案吧？

钱贵宝：现在的农村地少人多，况且种地不来钱，所以外出打工的特别多。有一年春节后，我在成都火车站整整打一个星期的野铺，还没弄到票。我一见人山人海就来劲儿，这是钱哪，南来北往

的，又都准备到外地，前途说不准，心里都空捞捞，所以，这种场合，一旦出现一个啥都晓得的热心肠，大家都抢着向你问这问那。看准了，想骗就骗，你吹屁股拉金子，也有人信。

老威：罪过罪过，你骗这些可怜的人！

钱贵宝：我也哄过大学生，还哄过一位研究生。

老威：就凭你这张老脸？

钱贵宝：不错，我天生老成，遇见这些知识分子，绝不能说招工啦，经商啦，社队企业家之类，那样，三言两语就识破了。我啥都不装，我是农民。但是我们那里条件不错，有花果山，有水帘洞，有原始森林，完全是没被开发出来的世外桃园。吹农村的物产丰富增是我的本行，凭我这条舌头，不怕这些读死书的女娃子不动心。然后，我才向她们虚心求教，表示我们那世外桃园缺的就是知识，是人才。我曾邀请那个研究生一起在天水下火车，去参观考察，有了第一印象后，回去好给我们引进些人才。我们一律高薪聘并请来去自由。无论是大学生还是研究生，就是博士，也会被我的诚心打动。可惜，这种文化高的婆娘，闹的花样也多，有个女娃子被压在地窖里一个月，也不屈服。

老威：如果我是法官，我就先割你的舌头。

钱贵宝：该割，该割。我哄人哄成习惯了，但愿坐牢能戒掉这种毒瘾。

老威：你们的团伙有女骗子么？

钱贵宝：你说放飞鸽？那是前几年，现在行不通了。“鸽子”放入男方，过一段时间能逃回来算没事，万一没逃出来，或者被发现了，漏子就捅大了，弄不好会出人命。放飞鸽那些人已经激起公愤，我们要做，就正正经经地做。

有信誉才有钱赚，出了事，人家才会掩护你。

老威：谁掩护你了？

钱贵宝：当然不能说。况且，我犯罪，我坐牢，与别人没关系。

51　写手茜茜

采访缘起：新世纪的风水一次又一次朝有利于女人的方向转，《绝对隐私》之后是《还珠格格》，美国伟哥刚刚登陆中国，《上海宝贝》就应运而生，以下三路的器官思维火透大江南北。

对此茜茜很不服气，因为她那操练了多年的笔力绝不在“美女作家”之下。“红颜薄命的古语早就失效了”，2000 年 4 月 27 日晚上，在北京东四十条附近的一家日式茶道馆里，没丝毫红颜的茜茜对我叹息，“假如我能凭色相的话，早卖疯了。”

我不赞成她的愤世嫉俗，但能理解她的处境。她已做了五年多写手，二渠道兴旺发达时，为了按期交货，她曾连续奋战，每天写一万多字。据说像茜茜这样的写手，全国各大城市都不少，特别是北京郊县，分散居住着好几百。遇着风声紧，二渠道不景气，写手们就主动出击，什么业务都做，甚至包括博士论文、职称申报材料、记者的采访稿、领导讲稿、策划方案等等。

茜茜说：“女人比男人的社会风险更大，从写手到作家，一步之遥；从《还珠格格》里的公主到三陪小姐，一步之遥；从家庭主妇到另类宝贝，也是一步之遥。”

茜茜还透露：“以培养作家闻名的鲁迅文学院近年来沦为写手的主要温床。”

老威：茜茜，我们聊聊天？

茜茜：我累了，况且没啥好聊的，你不是书商，跟我没有供求关系。

老威：这样说就没劲了，我只是你男人的朋友嘛。

茜茜：你小声点，这是公共场所，周围都是耳朵。

老威：我晓得你要做业务，可也犯不着那么贱。

茜茜：我贱？

老威：别装了。你哪是写手，纯粹就是陪酒女郎，硬要吊人家的膀子，刚才酒桌上的八个人起码有四个摸你的屁股。

茜茜：12 亿人民都摸我的屁股又咋样？

老威：明星屁股。

茜茜：我看你有点变态，今天到此为止，再见不送。

老威：你男人到北京找你来了，他托我先给你打个招呼。

茜茜：他在哪儿？！好吧，楼上有座，我们上去谈。

老威：听你的吩咐。

茜茜：过奖了，我是受了你的挟持，才上来欣赏窗外的夜景。可这样一来，楼下的书商就不会买单了。人家还以为我们有一腿。

老威：我请客，包括下一曲《春江花月夜》，那弹筝小姐的日本和服真不错。明天就约在这儿，你和老邓聚聚咋样？即使做不成夫妻了，也要好合好散嘛。

茜茜：求你了，老威，改改管闲事的臭毛病，千万别让他找到我。

老威：你是卖稿子，又不是卖人。

茜茜：只要不见邓大佑，你让我干啥都成。

老威：人家千里迢迢从四川起来，在京城疯找了你半个月……

茜茜：半年里他已来过两三次。这东西别的本事没有，认起路来赛过狼狗。上回他查到我的行踪，就让一个陌生人冒充书商给我打传呼，说要编一本《党的战士司马南》，我在电话里讨价还价了半天，敲定每千字 40 元，资料由对方提供。接着，我应邀留了地址。

老威：第一次通电话就留地址，你的胆子还不小。

茜茜：我一个穷写手，长相也不勾人，怕啥况且，我留的是住处附近四川饭馆的地址。到了约定见面的第二天中午，我还拉了合租房的两个女孩一道。饭馆很火爆，我们预订了个靠窗的包厢，隔着玻璃就能看清楚大马路上的一切。北京这城市，大得毫无道理，我住在昌平的西三旗，靠五环了。我们三个女孩耐着性子坐等，谁

也没怨言。因为对方说住西客站，从那边绕过来，即使不塞车，都得耗两小时在路上，相当于从一个小国到另一个小国。肚子早咕咕叫，我们就先点两个小菜，聊天充饥。玻璃外的出租车不断有人下，司马南的人头却始终没浮现。

老威：假书商也叫司马南？

茜茜：接头暗号。因为初次见面，就在电话里约定：对方一拢馆子门，就高举某某彩报，上面头版登载篮球大小的司马南头，通栏标题为《正义战胜伪科学》。

老威：还很有诗意嘛。

茜茜：我老公就是写诗出身。80 年代，还是师专诗社的负责人，后来发配到镇上教中学，他又把整班学生都发展成诗人。那时我年轻，崇拜他，死追着嫁给了他。我私下觉得，他更适合演电影，由于怀才不遇，他才经常在现实生活中来点电影情节。我没料到，这次他玩起悬念来了。他后来告诉我，他凌晨 5 点就出门，从西客站步行到地铁口，又在积水潭转了一趟车。拢这儿还不到 8 点。他见太阳明晃晃的，就躲到路边麦地里，躺着喝了一瓶啤酒。借着酒兴迷糊了一会儿，想着海子生前就住在昌平，也经常大清晨睡在麦地里喝啤酒。难怪诗人、画家和写手在这儿租房的多，恐怕都想沾点死人的灵气。他就这样心潮澎湃地给他老婆设套，成心丢人现眼到底。10 点过，他钻出麦地，在街上晃荡了近 4 个小时，据说好几次，他就站在玻璃外与我对视，两人相距还不到三尺远。

老威：你连自己的丈夫都认不出来？

茜茜：邓大佑也这么说。可直到他进了包间我才认清楚。原来他没把司马南举在手上，而是直接蒙在脑壳上。不光我们，许多人都注意到了这个怪物，谁也没想到同自己有关，因为昌平住过几拨搞行为艺术的。当时已近下午两点，我们实在熬不下去了，才在服务员的催促下磨磨蹭蹭地点菜。这个可恶的邓大佑，他居然把司马南的眼珠子抠掉，并透过那洞贼溜溜地观察了我两分钟，才扯下纸面罩煽风，夸我血色好。我当然血色好，我差点就气成脑溢血了。想走，又被另外两女孩扯住，人家已经陪了我两个多小时，这客只

有我请。点了满桌菜，我一点胃口都没有。邓大佑的全部行李，就是从路边拣的塑料袋，内装两瓶啤酒（一瓶空的）、一条内裤、一本《严新功法研究》。可他一点不自卑。我晓得，他哪怕成了叫化子也从不自卑。他说："我是专程从四川赶来，与你一边挣钱，一边夫妻双修，这本研究严新的书，是我吃素 7 年，呕心沥血之作，肯定能卖大价钱。"

老威：你丈夫适合在北京混，他这把行为艺术把许多人都盖了。

茜茜：老威你心态不正常吧？寻开心是不是？

老威：不，邓大佑比我们都清醒，他这一系列行为里贯彻着非常自觉的消解现实的观念，他以编有关司马南的歪书着手约会，然后在海子故居的麦地里模拟自杀前的思考，死而复生走出麦地回到现实，用司马南的眼珠子审视外出已久的老婆，接着又是与老司对立的严新和吃素。

茜茜：可惜你不是邓大佑的老婆。

老威：据说北京郊区某村的艺术家，有一天黄昏集体上街头手淫，结果 13 个人全被警方拘留了一夜，引起海内外舆论的骚动。这都是被名利心憋坏了，才出此下招。"耶稣被钉上十字架前，曾与 13 个门徒举行最后的晚餐，"艺术家们在局子里这样对警察解释说，"我们 13 个手淫者就是耶稣门徒转世，这是一场现代的欲望晚餐，我们中的有个人只脱裤子不手淫——他象征叛徒犹大。"

茜茜：邓大佑如果有一半这种心思，也不至于在农村小学熬这么多年。当着外人我又不好煽他耳光，只有接下他的手稿，盼着快快结束这丢人的午餐。两女孩边吃边用手朝鼻子扇风，嫌我老公臭。

老威：这么不给面子？

茜茜：他的确脏，脖根子一层油泥，身上那件香港回归纪念衫已成抹布，胸前的紫荆花同油菜花差不多。我领他回去洗澡，准备等他干净后再问问家里的情况，孩子由谁带着。可我刚开口，他就倒在床上打呼噜，摇都摇不醒。一直到晚上 10 点他抠着眼屎起床了，到处翻东西吃。我给他下了一碗面，他轰轰几口就下肚了，然后像伟人一样背手，反拿面碗，念念有词的散步。

老威：现在他正在盲流诗人蒋大器家散步呢。

茜茜：他一直都阴阳颠倒的，本来这算不了啥，可他通宵走来走去的。如果忽然刹步了，肯定顿悟出亘古的的秘密，例如“我们正跨在时间的裂缝上”。

老威：他在蒋大器家也唠叨过这句话。

茜茜：有天晚上，趁我睡着了，他跑到大街当中拦住巡警，也告诉了人家这个秘密，结果被请进了收容所。警察问职业，他说从事严新功法研究，这可不得了，邪教啊。他被关了几天，供出我这个同伙，就领着警察上门了。幸好我三证齐全，才没出事。这回我下了狠心出钱找民工把他扭送上火车。否则死缠下去，我没法干活。

老威：你把女儿丢给邓大佑，一个人长年在外头漂，这像个母亲么？你丈夫显然受了刺激。

茜茜：谁刺激谁呢？

老威：瞧你这一脸无辜。据说你曾当着邓大佑与情夫乱搞？

茜茜：你这张吃屎喝尿的嘴！好端端的一段情被你糟蹋成这样！

老威：你太骚了，自己丈夫来了，即使有外遇也回避一下嘛。

茜茜：政府都管不了的事，你起啥子哄？告诉你，我与他的夫妻关系早就名存实亡，就为了这个，我才离乡背井的。他吃了七年素，开头我顺着他，虽然我们都是农村小学的教书匠，营养差、缺乏吃素的环境。

老威：他信佛吧？或者是个环境保护者？

茜茜：他啥都不信，他是为了诗歌才吃素的。

老威：我读过邓大佑的诗，分辨不出荤素来。

茜茜：那你太马虎，他的诗的确干净，越写越短，最后短得像日本料理，两行，或者一行就是一首，比如：“马儿长草，跑进风的排骨”。他说这是经过减肥的诗，只有素食者能写。唉，自己的男人有这么远大的理想，我岂能不支持？你不晓得，中国不比国外，有很多素食馆，品种多，做工精，说不定素比荤营养成分更丰富。中国就没有吃素的店，偌大的北京也没有。庙里的素餐，都统统取

些晕名字，像豆腐乾做的回锅肉、炒肉丝等等。邓大佑是个彻底的人，那张嘴像个科研单位，每顿饭都要细细琢磨。我们在乡下，除五谷杂粮和蔬菜，就没别的可吃。一个地方的水土决定了肠胃，你不吃肉，肯定痨。痨得清口水朝上翻。红光满面的邓大佑吃素一个月，就菜青着脸；上了三个月，腰比我还细了。每当肠胃捣乱他就盘腿打坐，念念有词。核桃大的喉包和青筋呵！为了照顾他，我把女儿都送娘家了。他一门心思应付素食麻烦，性生活能力每况日下，最后连老年人都不如，一个月一次还赊账。有一回，我光着身子在床上等他，他摸过来，做了个骑马的动作就下去了，大热天还替我把被子盖上说当心受凉。我也是有七情六欲的女人，跟一个没人性，不晓得冷热的木头混日子，还不好意思出去说。

我第一次外出打工还很有报负，利用暑假到成都，想报考记者。几家报社都去应聘了，明明笔试口试都不错，却盘盘落选。经人点拨，我的自尊心受到打击：原来考记者也“以貌取人”，脸盘子不亮，才高八斗也白搭。爹妈给了我这付平淡的相貌，经过修饰打扮，虽然属于“耐看型”，但太委屈自己了。正垂头丧气要认命还乡，不料熟人捎来消息：邓大佑在家辟谷，差点出人命，现在县医院抢救！我连夜赶回去，邓大佑到底从休克中醒过来。

我守在病床前等待他好转，医生叮嘱要加强营养，可他连蛋、奶也不吃，营养从何来？喂和灌都试过，他直接就喷出来，插管子输入，他就一次次反刍。这条犟牛！我气哭了，说：“你不想活为啥还要搞个女儿摆起？你不管，我也不管了！”

他说：“我辟谷七天，除了清水，粒米未进，已有点灵魂出窍，感觉轻飘飘的，啥子都看穿了。这个人吃人的社会，胖子总是占优势，那些当官的个个都像肉球，滚来滚去占大伙的空间。我一看见肉，不，一想到肉，就气紧，就累赘，太挤了太挤了。女儿也是我和你挤出来的。”

跟这种东西，还有啥好说的。我心一横，决定告别过去背水一战去奋斗。先在成都租房当写手。94 年那阵，二渠道的书好发，读者就像一望无涯的猪头，见着花花绿绿的封面就哄抢。花两三天

时间，用剪刀加浆糊传出来的臭书，也能呼啦啦地卖两三万。引我入门的朋友说，这世道，只有码字挣钱不认脸蛋。初次接活儿，我非常老实，夜以继日苦干，成天窝在屋子里披头散发，面包啃得牙腔出血，就这么爬了一个半月格子，20 多万字，把人皮都熬脱一层，人家还嫌手脚慢，耽搁了工期。原说好 30 元 1 千字，但书商审稿罢，就开批斗会说你的读者群年龄为 17 岁至 87 岁，懂不懂？接着是构思不客观，细节不煽情，催泪弹远远不够。最后是工期拖长了，写得再好也抢不了头彩，所以要剁价。我气哭了，那色鬼却借安慰为名摸胸脯。莫办法，钱和协议都在人家那儿。天长日久，我吃亏吃出经验，速度就快了，一天硬写也一万多字，写疯了能出两万多字。94 至 96 年是二渠道黄金时代，活儿多得接不赢，我们就几个人牵成流水线。甲专门查资料，把参考书可偷可抄可改编的东西剪下来，按前后顺序编号；乙专门想结构，写过渡，连结上下文的段落；丙全盘贯通，润色定稿。真他妈邪，你越乱整，书越畅销，一旦有认真创作的念头，肯定就卖不动啦。最近流行的《上海宝贝》，就是乱整出来的，啥子屎盆子都朝脑门扣，什么“我今年 18，却有 81 岁的阴道”，女孩的阴道老成这样就成恐龙了……这就是卖点。

老威：《上海宝贝》好歹是创作，跟编编匠还是有区别。

茜茜：作家比写手前卫，这就是区别。我编过若干下三路的书，不敢署真名，怕丢脸。现在风向转了，没钱没胆找三陪，读《上海宝贝》过干瘾也不错。

老威：你眼红吧？

茜茜：也许。写手当久了，啥书都差不多。

老威：你编过哪些书？

茜茜：琼瑶、金庸、古龙、三毛、卡耐基、比尔·盖茨、《心灵鸡汤》续集、《猫王妙语》、《星运大全》；还有成功学、商战记实、官运、中美关系策略、卡通图书、歌迷金曲等等。《教父》火爆时，我们就传《教主》、《教皇》、《教母》、《教子》，三、四天就出一本，作者都是同一个马里奥·普佐。奥修火爆就传奥修，直接以他老人

家之名大编特编，直到弄烂为止。有本《奥修》大传就是我主笔，署名却是奥修亲随门徒，印度的穆罕默德·莫迪达斯。

老威：了不起，连宗教家的传记都能编。

茜茜：只要给钱，太空人的传记也编。每本奥修的书中都有生平，有的还列了年谱，再加上甘地的、泰戈尔的，反正印度人写东西都一个调：优美快活、有悟性、有神性。逼急了，我还抬了两篇泰戈尔的小说进去。我想中国人这么变着花样捧他，奥修会很高兴。

老威：你的水平是二渠道公认的，这些年一定发了吧？

茜茜：发个屁。漂在外头，开销特别大，竞争也激烈。现在住通县的写手，许多是鲁迅文学院毕业的，操练上来了，就会爬上我们的头。书商们还喜欢找风骚的娘们，我嘛，渐渐就退出历史舞台了。

老威：这想法不错，我看邓大佑虽然人有点恍惚，但心肠好，对你一腔热血。你就再见一面，选成都定居嘛。你利用老关系，继续编书，他给你查资料，轻轻松松地过生活咋样？

茜茜：你刚才还是个臭流氓，咋一下子变成党支部书记了？

老威：妇联主任。你虽然长相平平，但在书商界也浪得风流之名。早把邓大佑欠的那点老账赚回来了。该收心了。

茜茜：邓大佑还会闹事。

老威：听说他已开荤了。

茜茜：上次在收容所呆了几天，被里面的牢头把肥肉用筷子捅进嘴里。呕吐要挨打。青菜全被抢吃光，连饭也用捣烂的肥肉搅拌过。这一套，连正常的回民都扛不住，何况文弱书生？邓大佑出监后特迷恋肉食，胃口越好，他的罪恶感越重。他再次进京时，我搬家了，他就直接露宿在昌平街头，要找一个散文家，叫苇岸，也是素食者。

老威：苇岸已经死了。

茜茜：我晓得，苇岸瘦得同邓大佑差不多，我看是饿死的。癌症晚期时，医生和亲友劝他开荤，补充营养以抵抗病魔褎他屈从于

一片善心，倒在临终落下永远的遗憾。邓大佑将他引为知己。

老威：苇岸有孩子么？

茜茜：没有。我后悔跟他有了一个孩子。现在啥也顾不上。我不能见他，再纠缠几盘，我的业务真的没法做了。老威你发善心，为啥不把邓大佑领回家去？

52　藏书家冉云飞

采访缘起：冉云飞来自乌江中游的酉阳县，是土家族，一个边远少数民族的后代千里迢迢来到成都，做了蜀中才子，且藏书比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汉人都多，当然稀罕。

我与冉云飞来往多，晓得他善于自吹自擂，因此在这次采访中显得被动。他首先就谈到小时候的苦，大意是挨扳子多，受表扬少，我暗自醒悟他的自恋源于童年。

冉云飞爱收旧书，一次我将多余的擦便纸画些古怪符号，送他收藏，他也瞪着眼睛辩认了半天。他害怕被人告密，所以撰写《中国告密史》，殊不知告密也是一个人的隐私（法律是保护隐私权的），它比嫖妓、卖淫、颠覆国家、贪污受贿更无法公开。

诗人石光华把杀父、夺妻、断财路、揭老底列为人的四大罪，前三项冉云飞没能力做，于是借藏书之机，坏人名声。

老威：我单刀直入，你为什么喜欢读书？

冉云飞：小时家穷，时常“吃不饱，穿不暖”。后来在读忆苦思甜课文时，就觉得像在说自己。于是就骂粗话，改编成下流顺口溜：“吃屌，穿个卵；饿死你，我不管”。因此老师就让我在讲台上“表演”双手抬平打直举扫帚的“硬功”，以示惩罚，好在还没说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家乡落后，白天来电，晚上不来电。更日怪的是，自从上小学起，我受到的就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之类画饼充饥式的幸福美好生活的预告。但哪里实现了呢。

五岁那年，家中的堂屋被村里拿来当作村小的教室，来了一位叫廖太良的公办老师，我也跟着那些上学的孩子“哇啦哇啦”地乱叫，瞎起哄，因为我既不做作业，也不背课文，算不得正规学生。每到晌午，饿得实在不行，就去偷吃廖老师正在煮的白米饭，而我偷吃的米饭时常是半生不熟的，吃了就去跑毛坑，得了一个“子炮”的焯号。气愤不过的廖老师干脆就骂我是“造粪机”，我就回他为

“廖大娘”，以示羞辱。

母亲狠狠地教训了我。我就问，要啷个才吃得到白米饭，母亲说，要好好读书——母亲还不知道读书是没有用的。于是母亲就将自己几次淋着瓢泼大雨去挖的麻芋子拿去卖，得了两元钱，就给我报个名。气愤的廖老师自然不收我，就只好到离家五里地的完小念书，一读就还喜欢。再加上天天都梦想着吃白米饭，所以就一直读。我的境界明显比高玉宝差，高玉宝说，“要读书”。我只说，“要吃白米饭”。当然待遇也不能跟他比，譬如没人让我给他们做忆苦思甜报告。更重要的是，时代不同了，他生在旧社会，我生在新社会，我去向谁控诉？自己又饿得要命，只恨没生在旧社会，否则现在好歹可以给下一代作点报告。后来结识了莽汉诗人二毛，他有首诗叫在旧社会，完全是高级忆苦思甜报告：“在旧社会，人们身上的血只够跑百把米/在旧社会，女人身上长不出乳房。”狗日的二毛，他歹毒，比高玉宝控诉的旧社会还要坏一百倍。但他究竟不是高玉宝。我至今也没搞懂是啥原因，不把二毛弄去搞政治思想工作。我想我有向上级举报人才的义务，可是没人理我。

我吃白米饭的理想，后来才知道，古人早已说过，算不得我的发明。他们说，书中自有千钟粟。他们是古人，他们放的屁都要古雅些。因此你的问题应该是，我为什么喜欢吃白米饭？

老威：你很怪，收藏这么多书，大概有两万多册吧。又喜欢读书，但你对书的态度却很调侃？

冉云飞：有点夸张的人进了我的屋子就说，哇，你这么多书啊？我说这并没什么，就像你走进一个屠夫的家，看到他家里到处都摆满了亮晃晃的杀猪刀，总共有几百把，你奇怪吗？你会称是藏刀家，还是屠夫，也许你接着就会说，你看人家疱丁解牛一把刀就足以应付裕如了。我说，是的，钱钟书不是吗，学识渊博，但别人家里并不堆许多书；老威你不是吗？你目中无书，不也照样写大气磅礴，才华横溢的诗篇吗？一个杀猪的屠夫，摆那么多把刀干什么，还不是自己底气不足，手艺孬，猪杀的不利落，为自己壮胆压阵脚罢了。也就是说，屠夫没有值得你羡慕的资本和理由。你可以说，我没见

过这样形式主义的屠夫，但是我要说，是的，如同你或许没见过像我这样形式主义的读书人一样，因此经常有人问，你这么多书，读的完吗？我真是无言以对。的确，真正的屠夫有几个是形式主义者呢？所以，你应该怜悯我而不是采访我。

老威：你这么多书，横七竖八的，到处都是，写作时怎么查找？

冉云飞：老威，你很鬼。你在引诱我批评政府的知识分子政策，这我可不干，我一贯立场坚定，而且——正确。尽管我现在住房仍很隘湫——不是“挨球”（读音要准，这也是个立场问题）——但我相信曙光在前头。你说没有这词汇，是我生造的，应该是湫（jiao）隘，读湫（qiu）时就不与隘字组合。哎呀，老威，大事不好，看来你今天认真了？说实话，我的书这么横七竖八的，实在是迫不得已。但我马上给你换一个冠冕堂皇的说法：水至清则无鱼。但更实在的说法是，我就是喜欢混水摸鱼。我敢向毛主席保证，我一摸还十拿九稳，因此经常可以从书堆中“海底捞月”，并不影响革命工作，更不影响当臭老九。

老威：别贫嘴了，来点正经的。你是什么时候开始买书藏书的？

冉云飞：我刚才说的是“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守着一堆破书，还乐呵呵地跟你说怪话，和张大民差不多吧。我读高中的小县城，书籍很少，钱比书更少，因此从大学开始才买书。大学时，我享受是系上优等助学金，虽然不够吃饭，但至今感谢纳税人。我不爱听课，听不得有些老师在讲台上坑蒙拐骗，天天钻图书馆看些与中文系功课无关的东西，如很累人的康德、黑格尔，乃到大爆炸宇宙理论等等，自然得不到奖学金。我有一个坏习惯，一看书就喜欢在上面勾勾划划，有时还搞些眉批、旁批，往往都是些“搞球不懂，狗屁不通”之类，反映出我看书爱走极端。前一名句说明我知识浅薄，又看不得别人学问比我高深，实足心理有病，嫉妒成性；后一句说明我有痞子倾向，匪性难改，尽管现在已经被文化骗掉了大半。家里面寄的一点零花钱，除了帮助吃饭，添置一点衣物外，看到好书，也只好兴叹而已。于是就去勤工俭学，给系上低年级的学生分发报纸，每月可挣八元钱。别小看它，可买多少本书，我不

是统计学家，没算计过，但肯定不比现在一百元所购的书少。学校天天有演讲会，人人都委身于让人头大的哲学、美学，于是哲学美学书籍摆了我一床，直到把蚊帐挤破，不知有多少。真正搞懂的很少。

老威：那你的意思是说，你也只能算是“搞球不懂，狗屁不通”。

冉云飞：老威，你真是明察秋毫。

老威：你收的书说得好听一点，是品种繁多；说得不好听，就是杂乱无章。你好像并没有搞一般藏书家那样的专题收藏？

冉云飞：的确，只要是有意思的东西我都想收，举凡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军事、哲学、科学，以及其它不能归类的诸方面，靡不搜罗，无所不网。但也并不是无所选择，比如高等代数，英文之外的其它外文文种，我是不收的，我没有那些附庸风雅的人神经健全，完全搞不懂的东西，弄到屋里来堆起，实在是对自己智商的讽刺与无谓的考验。

一般说来，我不会像古代藏书家，譬如黄丕烈、陆沁源那样为获得一本好书，找朋友雅聚，或者焚香祝祷，或者专写藏书跋文以记载其来历。不是没有这雅兴，而是没有这时间。当然特殊情况下，我也会像他们那样玩乐一番的。事实上，每次看书我都有专门的书账和简约的藏书说明文字，以记录其来龙去脉，以志当时得书的心情，以什么样的价格从什么人手中获得。只不过少了许多繁文缛节。当然，也不能说我完全没有专题收藏，只是这种收藏都与我的研究和写作有关。比如几年前，我就曾打算花十年的时间，读完二十四史及其它诸多野史笔记，以便钩稽出其间的告密史料，撰写一本名为《中国告密史》的书。因而我至今收集的检举、揭发、诬告、诽谤、奏折、坦白书、悔过书、具保书、交心材料、间谍案例等。实物已达几十件之多。各色人等，无不联袂来到我的藏书里“演出”。比如前几天就还在浣花溪的四川文物市场，收到五十年代关于成都的“敌特”蔡文敏、田少卿等人一系列群众对他们的告发材料、坦白书、悔过书、具保书等完好的实物，同时还收到一整本记录完整的《灌县青龙乡土改笔记》（第一集，1951.11.31-1952.1.21），笔录

人为刘全任，记录之详细，举凡镇反，土改包括清算地主恶霸敌特这类的检举揭发材料应有尽有，大有档案文献之功效。另外，曾收到西南民族学院教育工会，吸收工会会员时让入会者范瑞玲写的“交心材料”及其档案实物。交心材料是很十足的中国特色，可名之曰“自告其密”，他国是很少有的这是法律系统中的“有罪类推”和“无罪推定”的较量与区别。告密史的研究绝非一般意义上的道德谴责，而是制度文化思想史的研究，是炮轰专制制度的有力弹药。

老威：我看到你墙上贴有有关教育的“毛主席语录”和奖给“学毛著积极分子”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奖状，好像你对“文革”的物品也在着意搜求。你收这些东西的动机何在？

冉云飞：现在的“文革”物品经过媒体的俗滥炒作，已成挣钱的一个热门行当，但并没有几个人像徐友渔这样训练有素的学者在进行认真研究。但我志不在此。我收的“文革”物品，大多与告密揭发、检讨和教育的材料有关，因为这些都是我的研究范围，你就可以看出我是个典型的实用主义收藏者，所谓藏而用之的人。因为我最近正在写作一部长达三十几万字的《教育要革命：中国教育的危机与批判》，可以说，它是自从有现代意义上的教育以来，最全面、最深刻、最猛烈的批判当今中国教育的书，对当今的奴化教育、精神专制，进行了生猛的抨击。

你刚才说的有关文革的教育资料，只不过是《教育要革命--中国教育的危机与批判》这本书要附的几十张有关教育的图片里，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已。这本书所附的图片中，将有各个年代。有特色的教材课本、学生与老师奖状、学生毕业证包括学位证、学生训诫（类同于学生手则）、老师的聘书、名校名师的罕见图片，使其在生猛批判现今教育弊端的同时，有极高的文献价值。

老威：除了一些研究性和实用性的收藏外，你有那些趣味的藏品？

冉云飞：有趣的当然不少，只有随举几例，否则说不胜说。先说英文藏书。比如我曾在二仙庵文物市场收到五种英文的黄色书。Erotica 有黄色、欲望的意思，其中有社会学者李银河在研究虐恋文化一书中，所附的一节《O 故事》（《Story of O》）的英文全本，还

有女性所写的黄色书籍精选本《女性所写的黄色书——从萨福到玛格丽特•阿特伍德》（《Erotica-Womens Wrting from Sappho to Margaret atwood》），这些书籍背后都有“诚品书店”的售书标志，大抵是从台湾或香港的书店里流传进来的。我既收到过曾攀上世界七座高峰的美国探险家迪肯•贝斯的《第七座高峰》（《Seven Smmit》）签名本赠书，也收到过•1925 在伦敦出版的英文毛边本（uncut）《中国园林》（《Chinese Gardens》），还收到过上百种美国《国家地理》、《纽约客》、《出版周刊》之类的杂志，甚至包括图文并茂的美国文学和历史教科书，如四册《美国文学精华》（《Highlights of American literature》）、《自由的遗产——美国简史》（《Heritage of freedom-A brief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等等，不胜枚举。

再说古典典籍。我曾收到清光绪年间，广德堂翻刻的顾嗣立秀野堂刻本《昌黎先生诗集注》四册，纸墨精良，雪白可人，字迹方整厚朴，铁划银钩，三色相套印刷。后因欲得 1929 年聚奎小学刊布的《白屋吴生诗集》，而易手给淘书斋老板蒋德森。易书之日，虽不忍，然亦无可奈何。但还不至像清代著名藏书家钱廉益民说，去书之日，如亡国之君挥泪对宫娥。老蒋将《白屋吴生诗集》两册定价 400 元，我欲讲价，他不肯，无论如何不卖，只要我用《昌黎先生诗集注》四册换。后来我将是书换回。四川许多近现代人物的书籍，我已收得不少，颇成气候。对吴先生的东西更是久有罗致之志，并取得一点成果，因想将来如有余裕之时，欲作《四川近现代文化流变》一书，以阐发四川文化如何在当今不如往昔之因由。再者，吴先生的孙子吴泰龙先生曾是我的数学老师，某虽不才，数学尤糟，但师恩总是难忘的。听家乡师范学校的退休教师王可夫先生讲，吴芳吉先生的大儿子吴汉骧，曾收得众多吴芳吉先生的旧物，但多半已在“文革”中抄家时毁坏，令人扼腕。所以对此书，我是必欲得之而后快。只好把自己的颈脖伸给老蒋，心甘情愿地让其“猛宰”。

最让我高兴的是，收到清代著名金石学家、封疆大吏吴大征写给另一位金石学家陈介祺的书信——《吴窸斋尺牍》线装五册（完本为七册），我曾两次撰文谈该书，一次为《卖文搜书》（收入四川

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拙著《阳光与玫瑰花的敌人》)，另一次为《成都书林记》（收入大象出版社出版的拙著《手抄本的流亡》）中写道：“其书写各体文字的高超能力，配以精美得无以复加的自制笺，简直是非比寻常的享受。就连为该书作跋并编辑《吴陈两家尺牍编年表》的明清史研究专家谢国桢先生在八十年代初期也说该书：‘久已编印行世，早已绝版。’（《文献》第 11 辑）”。像这样的书，一生得遇一次，已属有幸矣。

老威：我发觉说到古书的时候，你就故态复萌，古书的影子就在你身上频频闪现了，乐在其中。你曾经分别为两位西方文学大师里尔克、博尔赫斯，撰写过两本国内第一种研究他们的学术评传——《尖锐的秋天：里尔克》、《陷阱里的先锋：博尔赫斯》，又作过明代散文家张岱所著的一本小型百科全书《夜航船》的校点工作，这两种东西是怎样古怪地集于一身的？

冉云飞：说到古书，我收藏的许多好书还来不及给你细说，否则你的采访就会没完没了。说句实话，这两方面，我做得都并不完美，留下的遗憾不少。但我这人喜欢挑战，别人没做过的东西，我就喜欢；别人已做过的，我就喜欢走偏锋。如研究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对人的摧残伤害，我的研究就是从检讨和告密人手的，我比较喜欢出怪招。我不喜欢大家都争着去做同一件事，那就太抬举那件事了，比如全民经商或挣钱什么的。我的意思是说，挣钱也要找准自己的方式，就像打日本鬼子，不必都去肉搏，不得万不得已，不使这“绝招”。你说我将两种东西古怪地集于一身，我听得出来，你是在粉碎我，高级的说法叫做中西贯通，我自知无法做到，你小子损着呢。

老威：你曾得到过那些比较有名的人赠他人之书，或他们曾经收藏过的旧物？你自己的书也有流散之日，怎样安妥你这些“宝贝”？

冉云飞：我收到过别人签名或用过的书，较出名的人计有：诗人流沙河送其同事的诗集《故园别》（上有签名）；语言学家向楚收藏的顾实著《汉书艺文志讲疏》、章太炎翻译的线装两册《社会学》

（两书上均有其印章）；书法家李半黎收藏的《稚荃三十以前诗》（线装，上有其旁批）；学者谢桃坊（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为勉励他学生岳珍而送的，词学大师唐圭璋弟子王兆鹏所著的《张元千年谱》（上有其殷殷勉励学生语）；学者白敦仁（成都大学教授）送人之《陈与义年谱》（上有签名）；诗人钟鸣收藏的台版《郁达夫南洋随笔》（上有签名并盖章）；学者陈力（四川大学图书馆馆长）送徐亮工的《四川大学图书馆善本书目》（上有签名）；张大千结拜兄弟张目寒赠给川剧表演艺术家周企何的《蜀中纪游》（线装，封皮有毛笔签名并盖章。系藏书家李仁弟兄贻赠于我）；诗人吴芳吉于 1920 年在上海中国公学《新群》杂志当编辑时所购的《丁尼生诗选》《Tennysons short poems》，上有其印章和题署。为书法家徐无闻先生弟子向黄兄贻赠于我）；与张爱玲齐名的女作家苏青 1947 年 5 月 3 日赠送给陆品麟的《结婚十年》（上有其印章和签名，书后有受书者跋语，述得苏青赠书之由来）；学者李思莼（故前曾任四川文史馆馆员，系诗人戴望舒同学）收藏的《察荃斋诗集》（线装，上有其印章）等。

说到书籍之聚散，我曾在书老板蒋德森处看到一套线装《楞严鸿科》，永历朝刻本，分提纲、阿、弥、陀、佛五册。永历朝气数之短暂，自不必说，该书于每册后面均刻有“祝我大明万万年”之类的东西，相当我们曾经猛喊的“万岁！万万岁”，但实际情况如何，就毋须再说了。一个国家如此，书籍何尝不是这样呢？关于书籍，一个人的控制能力是有限的，否则上述各位均可称为爱书之人，自己珍爱却无法使子孙珍爱，他人珍惜，这是无可奈何的事，不必去想它。何况我现在正是火力充足，创造力极好的时候，还想继续收藏，慢慢摩娑研究。因此，曾有一书商至我家中欲出高价收购一套古书时，我跟他开玩笑说，找我买书，就相当于找虎要皮大衣，换成成语便是与虎谋皮。听得他哈哈大笑，声震屋瓦。

老威：你是否该讲的都讲了，还有没有要补充的.

冉云飞：该放的屁都放了。是我把你安排得这么被动，使你难以发挥。这只是个角色问题，改日我们互换过来。对你这样的无助和被动，我深感抱歉。

53　民间艺人任唤琴

采访缘起：1997 年 3 月 3 曰黄昏，春寒漫漫，我在成都白果林某大院的成楼，访问了民间艺人任唤琴。

任伯母很慈祥，很热情，使出功夫，把看家本领一一展示，还主动教了我两套供“玩耍”的魔术，可谓童心未泯；然而我知道，她很寂寞，随着现代娱乐方式的多样化，民间艺术的末日也就到了。

京剧、川剧作为民族特有戏种，尚需国家花大力气维持，那么比京剧和川剧更加边缘化的一系列民间艺术呢？

老威：据我了解，您这个民间艺术团过去经常在厂矿和学校演出，很受欢迎，现在情况怎么样？

任唤琴：我们已经一年多没演出了，我从艺几十年，这是第一次这么久没演出，手都生锈了。现在厂矿纷纷倒闭，下岗工人问题成堆，学校也闹着要“减轻学生负担”，所以，尽管我跑断腿，也联系不到演出。百般无奈，我只好在二环路外开了个茶馆，钱是赚不了，糊口还凑合。

老威：团里的其他演员呢？您的办公地点设在啥地方？

任唤琴：我们办公地点就设在家出，团长、联系人、出纳、会计都是我一个人，您看我手脚灵便，不像 70 多岁的人吧？这是因为我的心年较，长年喜欢跑江湖的缘故。我的演员都是临时性的，说明了，许多人过去就是与我一道走南闯北“扯火把”的搭档。一有演出（当然得看规模），我就挨个通知他们。我自己，魔术、风琴、唱歌、唱戏、报幕都拿得起。其它节目分文武场，文场有金钱板、口技、谐剧、评书、清音、三弦、二胡、板胡、笛子、扬琴；武场主要杂技和特技，如水火流星、吃火吐火、吃刀吐刀、睡钉板、车压活人等，保险看得你目瞪口呆。对于艺人来说，救场如救火，所以一接演出通知，大家都来得准时，把我的家挤得水泄不通。宰好我屋外还有个院子，演员就互相举着镜广，在院子里化妆，再把

演出服一穿，等着赶事先包好的大客车。在包车上我是不惜花钱的，这是艺术团的门面，所以演员们兴奋得像过节。真的，车能影响演员的精神面貌，使他们觉得自己的档次提高了。

老威：那演员们平时在干什么？他们有工作单位吗？

任唤琴：少数几个有工作单位，曲艺团、川剧团，效益不好，工资都发不出，听说许多文艺团体都放录像，租影碟，开始“多种经营”了。而多数演员长期没单位，也不想有单位了。虽然他们与我这个团的关系是“搭伙求财”，但我还是填发工作证给他们。艺人脚野，走州过府方便一些嘛，要不，窝在家里，吃饭解决不了，连艺也荒废了。话说到这儿，您肯定认为我这个团水分太大，可是您看我的证件齐全的，文化部门特批，似乎把弘扬传统文化的重任都放在一个老太婆的肩上了。看来，呆在城里不行，电视、录像、歌厅、三陪，耍的方法太多太烦，搞得年轻人心浮气躁，没档次，怎能品出民间艺术的味儿来？下一步，我还得走回头路，送演出下乡。过去，我们从成都坐火车硬座到福建，几天几夜也不困，一下车就连续作战，深入渔民中去联系，我们的火把扯了几千里，若不是怕少数民族消化不了四川土特产，我们新疆内蒙也敢去。对，下一次就从成都郊县开始。

老威：那么一大帮子人下乡？别说你们上了年纪，就是年轻人也吃不消。食宿怎么解决？农民肯出多高的票价？病了怎么办？这些都要考虑。

任唤琴：您咋这么婆婆妈妈，显得比我的岁数还大，现在的年轻人爱虚荣，比老年人更不能吃苦。既然下乡，我当然要精兵简政，最好是三个人，多不能超过五人。我的最佳搭档陈存住在三台县，我晚上就通知他。陈存比我大两岁，只要不醉酒，空心筋斗翻得像风车转。他的拿手好戏是吃火吐火，车压活人。这是硬气功，没有长年累月的修炼是不行的。开戏之前，这老陈头浑身少年英雄的装束，空翻亮相就能博得打雷般的掌声，然后，他一个大鹏展翅，从汽油桶里舀起一碗，待观众过目检查毕当众咕咚咕咚灌进嘴。再令一人点火，并把一串火球吞下肚，吐出来，又吞下去，又吐出来，

烈焰呼啦啦地从他口中喷射，这不是表演，这是玩命呢！演出之后，陈存必在当晚喝得烂醉如泥，他说这是洗肚子里的汽油。酒咋能洗汽油？我担心他的肚皮哪天会像火山爆发一样开花。还有车压活人。陈存年轻时与人打赌，曾经让三辆卡车从身上碾过去，他的师傅就是这样变成肉饼的，不过不是三辆，是六辆车碾他，最后一辆在他身上熄火了，车轮硬生生地陷进他的腰里，扑地一声，肠子就出来了。当然，现在的“车压活人”，最多是摩托，载满货的架子车，陈存说跟玩差不多。

老威：我倒很想认识只这位陈师傅！

任唤琴：他到我家时再通知您。俗话说，三人一台戏，我还有一位伴档是打金钱板的，50 多岁，是金钱板大师邹忠新的高徒。他一出台就笑声不断，既能延长时间，又能轻松气氛。当然，我的魔术一亮相，二人都得站魔台凑趣。

老威：三人一台戏？你们合作了多久？

任唤琴：我和陈存合作了三十多年，八十年代文场老白去世，小李才加入。记得“文革”期间，城里反封、资、修，演不成，但我和陈存又熬不住心痒痒，就叫上老白，各带上行头下乡，后来小镇子也不行，就干脆走山区。平武，出熊猫的地方，我们都去过。当然挣不了什么钱，那个时代的人也不讲赚钱，只要有好饭食款待，钱多钱少没关系，艺人久了不演，就像鸦片烟瘾发作一样。我是唱京戏出身，后又半路出家学魔术、曲艺，我随便朝农家大院一站，都能折腾个把小时，别人一鼓掌，我就不晓得东西南北了，陈存的德性同我差不多，老白主要弄乐器，另外，他还会科学，例如自制肥皂和盐巴，那年头，这可是缺俏货。他的肥皂是用烧碱、石膏、皂角等熬制，然后用木格子定型，放在馒头蒸笼里蒸。盐巴用啥熬的我忘了，最缺德的是兑好颜色水，灌进避孕套里，再一颗一颗扎成水灵灵的葡萄，配上塑料叶子，其它还有蜡制的小金鱼，小螃蟹等等。当演出只混饭不卖钱时，老白像个货郎，总能瞅准时机出售货物。肥皂八分钱一块，盐巴一毛钱一斤，葡萄两角钱一大串，金鱼、螃蟹一分钱一只。有时候，农民竟直接在他的跟前挤成团，把

演员给忘了。陈存气了，就挥着拳头不让老白卖。受压迫久了，老白私下最盼逢场。到镇上赶集。有一回，我们正在镇头扯火把，陈存把铜锣敲—圈，就划出一块空地，只见他思下外衣，亮出硬邦邦的肌肉，拱手喊声："乡里乡亲!"准备运功玩刀，不料前头发一阵喊，人群潮水般翻腾起来，原来县里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送戏下乡来了。我们逃跑不及，被清场的民兵抓住。老白的货郎包被没收，并出成"投机倒把分子"，游街示众。老白文弱，吓得发抖，还是陈存有胆量，提起铜锣挡在头里吼："我三代贫农!我三代贫农!!"把民兵镇住了。最后，我们被勒令写检查，承认误入歧途，中了封、资、修的毒。接着我们又被押到舞台下，罚站观摩立传队的演出，先是样板戏的片段。《沙家滨》里的"斗智"是"文革"中的保留节目，邢阿庆嫂长相不错，可嗓音太差了，我这正宗的京戏科班，喉晚虽痒，还克制得住。那陈存的耐性就不行，台上一跳忠字舞，他马上鼓起牛眼睛在台下跟着跳，他把《大海航行靠舵手》跳成了《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弄的动静比谁都大。在他的带动全体观众都站起来跳，民兵也跳，把枪横挎着。本来《大海航行靠蛇手》是散场歌，大家只拍手不跳的，可那天不知吹的那股风，台上真跳了，还举着红旗，胳膊肘向前冲刺，做成大轮船乘风破浪的样子。可陈存有内功，一唱一跳，竟把十几个人的宣传队全盖了，大伙丢了魂似地跟他学，将错就错地进入那个时代的革命太团圆。

老威：不愧学员本色，到哪儿都能将群众煽动起来。

任唤琴：是啊，我们不但收回了行头，还与宣传队员同吃了一顿饭。

老威：您有哪些拿手节目呢？

任唤琴：京戏唱段，当然主要是样板戏。在《斗智》里，我能同时唱阿庆嫂、胡传魁和刁德一，嗓音、眼神、派头都不一样；还有《白毛女》里，杨白劳和喜儿的对唱。如果您闭眼不看人，肯定认为是原版。就质量，样板戏都不错就错在除了样板戏群众什么也没有。另外，清音和魔术也受欢迎。我能从一只完好无缺的鸡蛋里，抽出一条横幅："向贫下中农学习致敬！"博得满堂彩。

老威：您说您是“科班”，哪么旧社会有京剧学校吗？

任唤琴：我说的“科班”是正式拜师学过艺的。从古至今，也没听说为那个戏种开设过“学校”，成都有个叫川剧学校倒挺新鲜的。过去，戏子属于三教九流，虽然梅兰芳、盖叫天有名气有地位，但也必须要依附于某种社会势力，无法独立卖艺。我家世代好戏，到了我五哥这儿，就干脆拜师，潜心学戏。待有了一定的知名度，他就自己撑头扯了个“任家班”，生、旦、净、末、丑齐全，开始跑江湖。我五哥是我师傅，1945 年，我才 12 岁，就随他沿长江而下，顺水演了很多城镇。任家班每年都要巡回演出一趟，不管烽火连天，只管自个唱得热闹。我小小年纪，就能唱《西厢记》、《铡美案》、《窦娥冤》全本。到了 15 岁，除了五哥，我就是班里的小台柱了。不幸这一年，五哥却客死在鄱阳湖畔的一个小县，是被当地恶霸活活打死的。五哥性情刚烈才华横溢，只因小事得罪了恶霸，就落得如此下场！班主一去，戏班也作鸟兽散，我孤苦零仃之际，遇上了老李，就嫁给了他。那时我刚变卖行头，办完丧事，伏在坟头痛哭。一位着长衫的教书先生扶我起来，他四川口音，比我大十几岁，我除了嫁他，啥办法也没有。这是命呵，不知不觉过了这么些年。

老威：解放后，您也没工作单位么？我记得中央首长里京戏迷不少，国家对京剧很重视。毛主席有一次看《白蛇传》，竟拍案而起，怒斥法海，入戏入得连裤子掉下来也没感觉。

任唤琴：50 年代我曾在川剧团工作过。1957 年我没当右派，但是被评为“小脚女人”，意思是跟不上形势。后来我就退职了，用退职费给我儿子治病。1960 年天灾人祸，我儿子营养不良，得了浮肿，我每天背他到牛市口，找一位民间老中医。这就样折腾了一年多，家里值钱的东西全变卖了。我男人饿得抗不住，就说：“算了吧，等你这样把孩子治好，大人早饿死了。”

这话虽狠了点，可也提醒了我，于是连夜背起行头，去找陈存。那年头，到处都饿死人，谁能头昏眼花地看您演出，戏又不能吃。还是老白刁，打听到某某大山深处有麻疯院，他把假证明都打好了，

说到那儿演出肯定能挣大钱：陈存搔了半天脑袋，想不出更好的主意，只好吹嘘“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现在提起这件事，我浑身还起鸡皮疙瘩。我们在林子里钻了大半天，才出现光明，首先看见的是许多墓碑。然后才是白色围墙，这儿属于军管，我们只好打着慰问演出的幌子，医院领导才出面接待。头一餐就是大白馒头、肉罐筒和野菌，把三个奄奄一息的饿鬼撑得红光满面。接着，我们打着红色横幅隔着铁丝网与病员见面。麻疯的外部症状是溃烂，先是指甲、头发、眉毛渐渐脱落，然后是肉，然后是骨头，最后才是五脏六腑变质、麻痹。所以，当我们在铁丝网这边搭台演出时，那边的欢叫和掌声都很怪。是一堆太特殊的观众，缺胳膊少腿，有的脸烂了半边，所谓眼泪就是一串串腐烂的黄水；有个女病员边看戏，边掏出小半个乳房奶一个麻疯孩子——那是个浑身脓血的小小老头。唉，真是太不幸了！

陈存表演水火流星，我表演了《苏三起解》和魔术，还教病员几套扑克游戏，供他们打发漫长的毁灭时光。一道铁丝网隔着两个世界，这边的观众是医生护士、解放军战士，他们也很久没看这么精彩的节目了，因此，再欢迎我们“再来一个”，而那边却是地狱。在我们演出的间隙，病员也出节目，非常缓慢的舞蹈，连下蹲都很吃力，但仍跳得极其认真；还有相声和快板，讽刺苏联的，这些老大哥一夜之间就翻脸卡我们的脖子，连麻疯病人都恨他们。当然也有歌颂医护人员的集体诗朗诵，热闹极了。

我们在医院呆了三天，顿顿好饭。最后，医院出车把我们送到几十里开外一个人烟稠密的小镇，人家一再叮嘱我们保密。这次，我们一人挣了一袋面粉和十个肉罐筒，还有够沿途充饥的馒头。高兴得做梦都笑。好了，这种故事三天三夜也讲不完。

老威：看来您是老江湖了，讲的东西都很有传奇色彩，从解放前到解放后，虽然您也极难摆脱时代的影响，但似乎与当时的社会关系不大，您一直不关心政治？

任唤琴：我怎么不关心政治？要混饭吃，就要根据当时的政治形势编一些节目，就像写文章，先是国际国内大好形势，然后才是

自己的东西。这样说吧，艺术分两种，一种是那朝那代都能吸引观众的，一种是当时演了当时就忘了的玩意，又要群众喜欢又想不被抓起来，就要二者兼备。挂羊头卖狗肉也是艺术。

老威：您不愧是团长，政策水平高。

任唤琴：吹吹拍拍没用，老了，不灵了。再这样下去，江湖艺人要绝种了。我的茶馆开张之日，我曾请了很有名的四川评书艺人来说书。我预付了他五百元，还找人到处贴海报，扯横幅。您不晓得，这位艺人火了几十年，书说得出神人化，特别是《杨家将》，过去一开场子，必座无虚席。我计划让他一天天说下去，把茶客吸引来，再插入另外的民间艺人表演。这样，既普及了艺术，又养活了一批老艺人。唉，国宝啊，许多人都有绝活，但是现在，年轻人都做生意，恨不得今天做明天就发大财，谁还在乎你，忙不过来。现在，我们自救也不行，《杨家将》的评书只打了一个星期，就只剩下两个听众，一个 77，一个 80，还有哮喘病，天气一冷就不敢出门。我能埋怨谁？人家说书人已尽了力，只两个听众也把惊堂木拍得山响。茶馆左右全是卡拉 OK，美容美发厅，晚上三陪小姐公然到街心去拉客。她们给我的茶馆取了个诨名叫“棺材铺”，意思是快进棺材的人才进来。

老威：这是一个浮躁的快餐式的时代，传统的艺术要站住脚，只有改革，用传统的形式来表现今天的生活内容，另外，厂矿和学校演不成，您可以组织人到夜总会演，现在许多消费场所都融吃和娱乐为一体，许多歌舞、曲艺团体都化整为零，争取串场挣钱。

任唤琴：如果只为了挣钱，还不如到街上摆摊。钱本是为了让人快活的，我何必要委屈自己，用不快活的方式挣钱呢？让我们学散打评书么？评书能散打，其它不一定能散打，要不打来打去，传统就打没了。没有传统，我们这种江湖艺人就没有魂了，没有血了，混了几十年，就是力了既失魂又失血么？骨气呢？当然骨气当不了饭吃。陈存在家教人练拳呢。我曾为他联系一家大型火锅楼，每晚出场费上百，长期演，那老头就是犟着不干。他说：“让我为吃喝玩乐的人助酒兴？太丢人！”没办法，拿“文革”的话说，这是一批封建残渣余孽。改革不了，天生的花岗岩脑壳。

54　流亡诗人海子邻居孙文

采访缘起：孙文做过海子的领居，就一如既往地朝艺术家堆里混，虽然自己什么也不写。

我是在圆明园画家村遇见过孙文的，他是贵州诗人马哲的朋友，曾一起替我挨门挨户向穷画家们推销吹箫的磁带，又一起用卖磁带的钱打酒喝，我还以为他是福缘门村的居民，直到深夜 10 点钟，他说要赶末路车回学校，我才知道他熟悉海子。

我们互相留了电话号码，接着，在 1994 年 10 月 15 日，有了这次谈话。那天，贵州诗人王强要请我的客，我和孙文都借故谢绝。

这令人惊讶，特别是在圆明园，艺术家们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地方。

又有四年多没见孙文了，他好吗？电话号码变没变？现在我和他的距离相当于和海子的距离。省份不见面，也同死了差不多。

老威：您是海子的邻居吧？

孙文：应该算。当时我住海子楼上，是整幢楼唯一与他有交往的人。海子相貌平平，但性格内向，对于沉迷于诗歌幻觉的他来说，邻居是不存在的，就是整幢褛也形同虚设。

老威：您写诗吗？

孙文：我不写诗，我是学工科的，后来做了海子的同事。我喜欢和艺术家交往，因为这种交往没负担，不带功利目的。你瞧，直到现在，我还经常同贵州的诗人、画家混，他们非常朴实，与海子有共同之处。你认识马哲吗，就是腰扎草绳子，朗诵起诗就斜着肩膀朝天上窜的那个。海子的个头与他一般大小，但性格两样，王子与乞丐吧。这是不恰当的比喻。

老威：您经常与海子一起玩？

孙文：也不经常，就是喝酒的时候在一块。我们都穷，只偶尔下馆子，多数还是买点下酒菜在家里喝。海子的房内非常简陋，就

桌子、床，还有个小收录机。有段时间，他墙上贴着女朋友的照片。其它全是诗稿。写着诗句的便条，整理就绪的手稿和到处堆放着的打印诗集。海子是从安徽农村考上大学，并迷上写诗的。在他的老家，也许几辈人，几百年也没出过一个诗人，因此和所有同样经历的孩子一样，他写诗也和读书一样刻苦。他渴望发表，渴望得到诗坛的承认。这是很感人的。他留校，分在校刊编辑室，应该算一份清闲的工作。可海子一天到晚都在忙。我没见过这样写诗的，亡命得像牛犁田一般趴在桌子上。自从 1985 年，他就半年一厚本诗，《土地》、《太阳》、《遗址》，全是天马行空，浑沌初开的事。你感觉这人不是用手用脑，而是煽着巨大的翅膀用鸟嘴在啄诗。昌平这地方，也没个玩的，也没个去处，可打印社还有几个。海子经常自己掏钱打印诗集，然后一大捆一大捆地朝外寄。现在的市场眼光，觉得不可思议，但 80 年代就极正常，各地的诗人都这么干。海子工资的一半，就用来干这个。另外还得拿出一部分寄回家里。只有天晓得他的日子怎么过的。当然偶尔也有稿费，但是太可怜了。80 年代，海子的知名度还比较低，现在连篇累牍吹他的评论家，过去根本就对他不屑一顾。那时候，大家的目光，好像都集中在“朦胧诗”、“第三代诗”或“口语诗”，海子与这些都不搭界，所以，哪怕谢冕这种比较全面的诗评权威，也从没有在文章中提过海子这个名字。海子平时沉默寡言，然而一喝酒，就滔滔不绝，他的乡音挺重，话说快了就令人不太明了其中的意思，好在我这个听众比较没个性，说啥都点头。海子就吹得更欢了，有时还站在床上对我打比方。只是有一次，我忍不住同他争起来。我是为他好，我认为当前出名的诗人都挺入世的，而他的诗却出世得非常远，方向有问题。这下惹祸了，他跳上跳下缠了我一晚上。

老威：您不太了解情况。其实在 80 年代，海子在四川还挺有名的，几乎所有的地下诗刊，如《现代主义同盟》、《汉诗》、《中国当代实验诗歌》都推出过他的作品，包括我当时办的文化馆刊物《巴国文风》，也头条登载过他的《龟王》、《初恋》等六篇寓言。外省诗人能在现代诗歌的圣地“延安”有此出息，也算绝无仅有。

孙文：民间刊物顶什么用？又没稿费。

老威：四川与其它地方不一样，这儿解放前有袍哥，这种黑道传统延续到 80 年代的诗人这儿，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文学江湖。在江湖上走动的人，是不屑于与正统文坛合作的。你若是"招安"，他没准哪天黑道性子发了，就会反出朝廷。事实上，80 年代的许多诗人，都满足于在地下诗刊发表作品。因为"江湖"比"朝廷"更有吸引力，更实在。流浪诗人马建、郁郁、万夏、李亚伟都曾在我家免费食宿多天，来的时候一拱手，报上大名，出示某江湖朋友开的路条，就安营扎寨了，走的时候还得把酒饯行，奉送路费，开路条给下一站好汉。可惜海子没赶上好时候。

孙文：海子也到过"延安"，可结局是什么？1988 年是他生命中的一个坎，这年，他怀揣几万行诗，绕了大半个中国，他这辈子从未走这么远，虽然在诗中，他已抵达了银河系，太阳诞生的瞬间。他歌颂过屈原，把自己看作是屈原在几千年后的化身，可是屈原是极其人世，极其政治化的，这是被报国无门所造就的诗人。而海子的国比屈原的国更大更虚无，也更不堪现实的打击。他在外"游历"几个月，回到昌平后，人都瘦变形了。我看得出来，他没找到知音。当然回想四川之行，他竟哭了起来。你说得不错，四川诗人有袍哥习气，你到哪儿，得一一拜码头。成都的小街小巷众多，比八阵图还复杂，海子没出过远门，在灰蒙蒙的环境里，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到自己神交已久的某某人，不料对方虽然推崇他的诗，却不会把赞词挂在嘴边；四川诗人自我感觉好，不会在乎任何人，因为诗坛的三大主要流派"整体主义"、"非非主义"、"莽汉主义"都出自四川。海子遭冷遇，或者被某个码头的舵爷上课都是意料中的事。可在作品中多次称王的海子受不了，他语言不通，举目无亲，既然不能像列宁同志说的那样，"凭国际歌找到同志和朋友"，那就只有坐在街沿上，面对异乡的街景流泪的份。几万行诗从离京开始就一直在他兜里，几个月了，从北到南，在诗人像农民起义一般纷纷揭竿而起的年代，竟没谁提出要看他那以东西方的历史渊源为背景的宏伟史诗。一位成都的非非诗人曾请海子喝酒，并趁着酒兴，当面夸他的史诗才能，称之为中国独一无二；海子闻之欣喜若狂，立即引为知音。不料几个月后，这人在小报上发表文章，把海子奚落得

一无是处。海子沮丧极了，他没想到人心如此险恶。可以说，此次旅行为他日后的自杀埋下了伏笔。

老威：您的意思说，四川应该为海子之死负一定责任？

孙文：向灵魂投毒是比较高级的谋杀，虽然在法律上不构成证据。前不久，你们四川的那个“鸟巢”学者，不是自称是死者的朋友及知情者，写几万字的悼念文章，挣稿费吗？其实他和海子八竿子打不着。不管你吹嘘现代诗的延安也罢，黑道江湖也罢，总之，我对四川人没一点好感，太势利太肉麻了。

老威：我也肉麻吗？

孙文：对。

老威：您好像在替海子出气。如果您是西川或骆一禾，那种与海子同宗同源的诗人，我就和您干了。除了通过两封信，我又没见过海子……罢了，难得您这么心疼他。

孙文：他死了五年多，谁会料到这么多不相干的人会冒出来捧他，掀起“海子热”。

有些小青年还奉他为鼻祖，到他的出生地去寻根，北大还举行过不少纪念活动。女大学生们，一提他的死，一提骆一禾、戈麦的死，就潸然泪下。还有死在前头的朱湘和老舍。我不管这种前仆后继的自杀传统光荣还是耻辱，我只知遭海子生前如果得到目前的十分之一的热闹，就不会自杀了。他想得通吗？与他同种路数的西川上了中央电视台？他才二十几岁，怎么可能看透爱情、荣誉这些东西？那次游历，他还专程去过西藏拉萨，那儿神圣而清澈的风光，与他的“大诗”相配。然而，海子却没留意种种圣迹，他愚蠢地爱上一位女诗人，人家已有孩子丈夫，从年龄上几乎可以做他母亲了。他撒着酒疯追到人家的卧室，结果被赶了出来。丢丑呵丢得不值，若遇上 90 年代的小报记者，早把这花边新闻炒得沸沸扬扬了。海子不能沾酒，一沾就失态，与平时的老实巴交形成对照。有一次，朋友招待他泡酒吧，他见有人唱通俗歌，就按捺不住要朗诵诗，还缠着老板要用诗稿付费。搞得朋友们都挺尴尬，只好把他硬拖出来。人年轻，当然不习惯孤独，不习惯穷，但许多人都在熬。写诗的前

几年，也没见海子有什么反常啊，可后来，他有幻觉了。这种幻觉一旦进去，就不容易退出来：几个朋友的高度评价，仿佛不断向烈火浇油。他的诗越写越大，越写越远，这虚幻中的激情使他抛弃现实。这方面，我承认他是想象力的大师，可这种想象力和凡人没关系，凡高超前，然而他的画是直接在每个人的眼前爆炸，你来不及思考，就被过分的光芒所刺痛。海子称凡高是他的“好哥哥”，凡高教会他想象却没教会他“承受苦难”。苦难是地里长出来的，海子才二十多岁，还来不及长出苦难，长出苦难的孪生姐妹——对人类无怨无悔的爱，他的想象力是空的。诗是要人读的啊，而读诗并不是人的第一生理需要。在诗中是神，在现实里，他却需要凡人的荣誉和爱情。昌平是不毛之地，又没名胜没名人，海子住这儿算最大的名人，所以，除了几张烂熟于心的面孔，没人专程赶来喝西北风。在寂寞之中，海子也练过气功，结果由于方法不当，练出了幻视和幻听。

老威：你见过海子的女朋友吗？

孙文：远远地瞅过几眼，好像是黄昏散步回屋，女孩走前面，他落后好几步，低头吊在后面。海子腼腆，女朋友一来，就照面也不打。当然，也可能是关系不太牢靠，他不愿意介绍。女孩在城里读书，他们平时见面也不容易，只有放假会到昌平呆几天。后来不知为什么，他们分手了。听说这女孩是一位评论家的表妹，崇拜海子，因为她的引荐，海子在内蒙的《草原》和《诗选刊》都发表过不少长诗，其中追念屈原的诗剧《遗址》很受读者喜爱。看来，真正欣赏他的还是蒙古人，其中有个叫阿古拉泰的，至今还在呼和浩特当编辑。

老威：这女孩是海子的知音吧，真可惜。

孙文：女孩的表兄也是海子的知音，前几年，也去世了。这冥冥之中，有一种捉弄人的力量，仿佛海子和他的知音都不属于这个时代，他们提前走了。这是另外一种人生。

老威：海子临走前你见过吗？

孙文：那天很早，他就来敲我的门，一声不吭坐在哪儿，然后

站起来告别。我说：“告什么别，你又不是不回来。”他说：“我要出远门了。”声音怪怪的。我本能地打了个寒战，可仍没意识到会发生什么，就问：“你想调回城里吧？”因为那段时间他老往城里跑。我听说芒克、杨炼和唐晓渡他们搞了个“幸存者俱乐部”，印了刊物，还搞过大型的诗歌朗诵会。北京是首都，什么都挺正规，包括这种民间性的自由组织。海子与芒克、多多、杨炼相比，只能算小字辈。但他还是定期大老远地跑去，参加作品讨论。有一次，大伙对他的几部长诗进行批评，口气武断了点。他嘴笨，辩驳不了，只好抱着他的命根子闷闷不乐地回昌平，失魂落魄了好几天。我感觉，这对他的打击比四川之行还大。那是个风起云涌的年代，诗人们有很多事情要做。除了四川的袍哥诗人锐气不减，北京的芒克、多多、林莽、一平、杨炼、田小青也写出了数量可观的长诗，比资历，比才气，比活动能力，谁又在谁之下呢？这很不好评判，至少那个时代在北京的评论家没作出评判。这显然动摇了海子的信念。他在诗中写道：“与其死去，不如活着！”而现在他凭什么活着？天下这么多自命不凡的诗人，何时才能出头？这是我以后才想明白的，而那天早上我却眼睁睁地看着他走。那是 1989 年 3 月 26 号，天气晴朗，海子身穿白衬衣，蓝裤子，肩挎一个军用书包，发也是新理的。我从没见他如此整洁过。我站在窗前，目送他在人流中穿行。

他太显小了，像个去春游的中学生。我不知道他已经将遗嘱留好了，除了整理好的 2 多万字的诗、散文、小说和日记，还有一张特别声明的纸：“我的死与任何人无关！”接下来的细节许多杂志都披露过，他搭车于当日下午抵山海关，并在最后一班归程车开走之后，独自在站台徘徊了几个小时，并沿着铁路朝郭家营方向走。天色渐暗之际，一列货车缓慢地过来。他让到一边，然后从列车的中段钻入，顿时被车轮碾成两截。

老威：你参与了海子遗物的整理吗？

孙文：我虽然是海子的邻居，但不是你们诗歌圈的人，因此无权接近海子的遗物。

我只是一个旁观者。后来，那场风波开始了，大伙都冲动起来，

忙着游行、上街，诗人之死就显得平淡了。当然，诗人们也自发组织了悼念活动，许多人还捐了款，但还有更重要的事等着大伙去做，况且，海子毕竟是小字辈，号召力远不及北岛、芒克。

老威：你参加过海子的悼念活动吗？

孙文：参加过一次，小型的，也就是校内几个同事。当时海子的母亲来了，一个农村老大娘，已经气糊涂了，见着我们就下跪磕头，我们急忙扶住，凑了一笔钱给她。唉，太惨了！海子本名查海生，家里世代务农，好不容易出了个大学生，北大毕业又分在京城工作，这一下，全家的精神寄托都成泡影了。这海子！临死也不想想家中亲人会怎样！

老威：海子的死对你有没有影响？

孙文：开始没感觉出来，因为凑热闹的场面太多。随着岁月的流逝，日子还得像从前那样一天一天地捱。这个时候，我就会想起楼下曾经住过一位叫查海生的诗人，小个子，大眼睛，两道浓眉。他留平头时，有点像日本的留学生。唉，这一切，仿佛发生在昨天。他说他要出远门，我习惯性认为他准会回来。现在，他啲房子已经住了另外一个人了，我不可能再串门去找他了，这种损失别人体会不到。海子不回来，昌平也就没意思，我不久就搬回城里了，离圆明园不远。

老威：去年顾城杀妻之后，也自杀了，顷刻间，海内外掀起了“顾城热”。有的文章把顾城之死和海子之死进行比较，认为……

孙文：我评价不了这种事。我同海子是邻居，天天见面，尚且不知道他要去死，我怎么可能了解顾城呢？他死在外国，风景如画的新西兰，比海子浪漫多了。可他干的事不太浪漫。他得到女人的爱太多，一旦别人不像过去那样百依百顺，他就受不了。如果把顾城得到的宠爱，得到的机遇分丁点给海子，他至今还欢天喜地地活着呢。就是死，也没有公平可言——我是俗人，只能说这种俗话。

55　嫖客唐东升

采访缘起：老唐是我 80 年代的文学朋友，而今做了书商，为了生意应酬，染上了嫖瘾。1995 年 8 月 1 日夜，我与一些熟人，被招待进成都高新区的一家夜总会，本想借机采访嫖客，不料迎头撞上老唐。我与老唐八年没见了，在这种场合重逢，哈哈一笑，都把对方当成了嫖客。这再好不过，访问顺利进行。老唐比我大两岁，生活中一贯好为人师，这一次我似乎又满足了他的虚荣心。

老威：这不是老唐么？没想到在这种场合撞见你。

唐东升：咋没想到？你不是也到这种场合来了吗？

老威：嘿嘿，你把我反问住了。是的是的，这两年我啥地方都有兴趣，像条猎狗，见洞就钻。你别误会，在我的印象中，你是个很正统的书生，模范丈夫。朋友们都私下里议论说，你的老婆挺有福气。

唐东升：你可千万别捅到我老婆哪儿去。

老威：怕了？

唐东升：有点。

老威：怕还嫖？

唐东升：入了夜总会的门，我就不是从前你在单位上见到的那个一板一眼的老唐了。现在，我下岗了，做图书批发生意，也算发了点小财。做生意嘛，免不了应酬。而今吃喝平常事，关系深的客户，还得招待人嫖。最先是人家招待我，要包间，要小姐，弄得我浑身起鸡皮疙瘩。你知道，我把家庭看得重，老婆跟我吃过不少苦，我就是为了让她过上好日子才经商的。可是换一种场合，我这人人称赞的美德就成了笑柄，一个男人，连陌生女人的屁股都没摸过，也太苍白了点。40 岁以前，我的确只与我老婆睡过觉。

老威：第一次要小姐的感觉怎样？

唐东升：一场虚惊，小姐一进来就与我挨得紧紧的，把我逼到

死角，说话都结巴了。小姐提议点歌，我唱不了卡拉 OK 那种节奏的歌，跳舞呢，当然更不会。真的枉为人生。看身边的人个个搂着小姐，啥动作都做，我怀疑是在做梦呢，若是十多年前，早被抓进牢里了，中国的变化也真大。我的朋友们都劝，老唐，你就把这儿当作自由市场买东西嘛，按质论价。我反驳说，什么买东西？这是大活人嘛。逗得嫖客和小姐都轰堂大笑。陪我的小姐说，没错，这是做生意。后来，朋友们为了我，都没开房间过夜，搞得我不好意思，觉得欠了人家的情。再后来，一帮朋友到都江堰的龙池风景区，那儿的小姐质优价廉，我一沾上手，就觉得另外一个自由天地打开了，什么家庭、责任、道德、传统，全他妈是反人性的。通过嫖，我也把自己的“丑恶面目”认清了。原来我前半生是在虚幻的道德约束中慢性自杀。

老威：你这是用自己的现在否定过去，其实哪一种生存方式更好，你也没想得清楚。

唐东升：你在玩哲学，而我是在体验。

老威：都谈不上，因为中国人缺乏宗教背景，哲学或体验就显得特别世俗。文化大革命只能算邪教，那时中国民众都将自己的性本能转移到偶像崇拜上，这是 49 年以来的极端理想主义的顶峰，它在消灭文化的同时也创造了消灭性病的旷世奇迹。而改革开放以来，民众的道德水准在物欲的刺激下，直线下滑到动物现实主义，似乎每个人都醒悟了，原来世上还有这么多好东西没享受！

唐东升：一点不错，爱领袖不如爱自己，这也是文革反思结论之一。如果人人都爱自己，社会就进步了，因为愚弄不了谁。以前通奸，破坏军婚都是挺严重的罪，现在去留自便。再加上有明的暗的三陪小姐，解决问题方便。有钱啥不能干，何必要惹麻烦？原先我以为小姐们都是因为贫困，因为种种难言之隐，被迫从事卖淫，后来才知道，这也是工作。我第一次嫖的是一位隆昌乡下姑娘，虽然做作，但还是尽职尽责，在旅游旺季，她一个月要接一百多位客。我问她为什么进成都干这个？她回答：我喜欢这个，我感激成都人民，他们让我发财，要不，我将一辈子窝在乡下。”她还说她喜欢

边干活边聊天，那样挺起兴。情绪一旦调动起来，既舒服了身体，又赚了钱，还深入了解了男性世界。做小姐的只要心细，就能从一百个男人中尝到一百种滋味，当然不会全是快活。不快活的时候也要强作欢颜。这样逆来顺受地搞几年，攒足钱，就可隐瞒历史，安装人工处女膜，嫁个好老公。我要用千锤百炼的本事把老公伺候舒服，让他天天都围着我转。国外不是讲究试婚么？当小姐就是试婚。

老威：这小姐的心眼不坏。

唐东升：岂止不坏，简直是贤妻良母的料，我敢说，做过三陪的一旦从良，温柔劲绝不下于纯情淑女。我和老婆的感情是邻里公认的，结婚前信誓旦旦就别提了，成家后也知冷知热，挑不出毛病。但这相敬如宾的夫妻关系，肯定有问题。我们的性生活是计划经济的产物，按部就班的公式。先摸哪儿，后摸哪儿，哪儿有块疤，哪儿有颗痣，我都滚瓜烂熟。稍微要创点新，也得提前商量。而且互相都知根知底，象长期周旋的两个间谍，一方翘屁股，另一方就能猜中这家伙将放那门子的屁。我心里把老婆叫"诰命夫人"，皇上赐了牌坊的。

老威：你就不能多读读《家庭医生》，夫妇共同改善性生活。当然，看些一级毛片，掉换性交姿式也很必要，这是科学，不是淫荡。

唐东升：哪能教老婆这些？万一她把种种招数反过来回敬老公怎么办？她身体比我好，我就怕她性心理觉醒。

老威：你是内外交困吧？40 多岁的人了，注意身子骨。

唐东升：我有伟哥，走私进来也得 200 元一颗。伟哥的发明是对人类私生活质量的提升，它的意义相当于人类首次发射宇宙飞船。它不象其它春药，强烈刺激器官，过度地消耗体能，而是调节人的身心，增强活力和自信，它的药效能维持一个星期或更长时间，没有副作用。

老威：你成了春药广告商了。那你的性能力靠药物支撑？

唐东升：笑话，今年我才见到伟哥。今年以前，我仍然炮炮中靶，从不临阵脱逃。注意在调情时少喝酒，有的小姐职业道德差些，

拼命灌客人酒，以此可以偷懒。享受生活得保持清醒，自由支配身体的每一部分，否则，就不叫享受生活。另外，接触前多搓搓自己的大腿根和脚心，向天空打几下空拳。这是在激励斗志的同时，向小姐示威。

老威：骇住对方了吗？

唐东升：活跃气氛而已。小姐见我这样，不是笑，就是做出一幅惊恐万状的样子，双臂紧夹护胸，如剥掉了羽毛的麻雀。当然，笑、恐慌、哭都能让我起兴，至少不像“诰命夫人”，在床中央坚如磐石。接着，我一上身小姐就陶醉得叫开了。叫春的水平也同身价有关，不能他妈的乱叫一气。几乎每个嫖客都喜欢让小姐吹箫，不是直通通地吹，而要卷舌头，发出啧啧的称赞声，吹得硬了，红红的枪管像要喷出火来，然后再歇一会儿，用冰镇矿泉水浸泡，吱的一声，铁匠在淬火呢，最后才是叮叮当当地打铁。让小姐在铁砧上翻，尽量做动作，多淬几次火。

老威：你太折磨人了。

唐东升：这是劳动，我做生意挣钱也不容易，消费就要优质服务。当然，碰见档次高的小姐，我也犯不着来这种“冰山烈火”。我在交配时，最怕别人赞美我的阳物，可有点文化的小姐一见，就大惊小怪地喊：“哎哟，先生！”接着就是“好大呀，我怕我受不了。”一听这类奉承，我就浑身酥麻，触电一般抖，没抽动几下就必射无疑。

老威：你在外面乱搞，你老婆就没察觉？

唐东升：我老婆是人精，一见我周围那些生意朋友，就能猜出所谓应酬是些什么内容。一味否认，抵赖肯定不行，久走夜路必撞鬼。比如老婆问：“今夜到哪儿谈生意？”你不能吱吱吾吾回答“在茶楼”“在某某馆子”“在某某家里”，否则她进一步追问，你就穷途末路了。你要大大方方地说：“在夜总会。”老婆又问：“请不请小姐？”你答：“大家都请，我也不能例外，放在一旁，当个摆设嘛。”“只是摆设？”老婆还不放心，“现在已经凌晨三点了。”你答：“哪怕五点我也要回家睡觉，我没在外过夜的习惯。”

老威：你经常撒谎累不累？

唐东升：我就这个命，瞒得了多久算多久，前天我把内裤穿反了，回家被老婆逮个正着，要死要活的，我只好斩钉切铁，称天气闷热，在夜总会的卫生间冲了个凉。事后我一头虚汗地想，真是一物降一物，老婆这么刁，我还要服她管，可见人结婚不仅仅是需要合理的异性搭配。而是需要一个家，一个能够管理自己的具体的"小政府"。绝对自由找不到，即使找到了，也没劲，因为偷鸡摸狗的乐趣没有了。有时我觉得"诰命夫人"也怪可怜的。

老威：你在这上面的开销够大的。

唐东升：只要不被扫黄警察抓住罚款，应该说还过得去。干哪行钻哪行，毛主席说，万事万物都有规律。扫黄运动和中国其它运动一样，抽风一般，这段时间抽得紧，就得避避风头，假如耐不住寂寞，你就宁愿多出点血，上星级大酒楼，最近公安局才在报上出了通告，住二星级以上的旅客，男女同宿，不查结婚证，这个方便之门开得大。不过，这是必然趋势，去年广汉的税务部门就想公开向三陪小姐征税，引起新闻轰动，终于没有结果。这一步，国家如果迈出了，三陪小姐作为一种职业就有了合法性，那下一步，就该发营业执照了。我在这儿预言，不出三五年，中国肯定出现"红灯区"。到时候，人们的家庭观念将经受一场八级地震。

老威：这不符合中国国情。

唐东升：什么国情？祖宗的规矩么？还不是要变。社会主义的颜色么？已经变了许多，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哪种国情更符合人性，你我心中都有数。过去我们认为，妓女是旧社会的毒瘤，必须铲除，几十年一轮回，现在又绕回来了。其实卖淫是一项极古老的职业，在唐朝，整个社会都注重文化修养，因此著名青楼招收雏妓，均要进行素质投资，让其在成年接客之前的几年中，学习琴棋书画，学习待人接物。从《唐宋传奇》里看，当时的高级艺妓往往同王孙贵族交住密切，其社会地位并不低贱。现在，我们应该将大唐精神发扬光大，不能落在其它国家，特别是东南亚国家的后面。等三陪小姐合法化后，就应该先办班，文化班、公共关系学班、生理、心理

卫生班、性病专科班，然后考试、拿文凭、发营业执照。当然，定期的性病检查是免不了的，这样，卖淫作为一种未来产业就会越来越正规，让客户放心。

老威：你这算是嫖客的理想主义吧？可这样一弄，成本就高了。一般工薪阶层是嫖不起“官娼”的，据我了解，嫖客中找野鸡的人数是夜总会消费者的四倍。野鸡喜欢出没在城乡结合部的小卡拉OK 厅，而根据地却在周边各县、各旅游点，在都江堰下面的一个镇上，歌厅就有 50 多家，以小姐众多，价格便宜吸引着八方骚客，几乎成了全镇支柱产业。那儿针插不进，扫不了黄，因为有地方保护主义。

唐东升：你说的镇子我去过，离都江堰不过十多公里。价格的确便宜，坐台费 50 元，打炮 50 元，除了在街头拉客的鸡，这儿算有村有店的最低价。去年冬天，我们十来人，开了辆中巴车去考察，还故意压价，连消费带打炮，一人只花 60 元。这算什么嫖，白送人肉给你呢。我们都要了两个小姐，各自领入炮房，他妈的里面一股刺鼻的霉味，墙面潺潺渗水，吓得我不敢上那滑腻腻的床。两位小姐倒挺乖，自己先脱了蹲在床上，体肥腿短，象两个大白猿。即使进了战场，不打肯定不行，要打，我的枪又卡壳了。两小姐扑上来又搓又啃，只好勉强弄了。退场后，见朋友们都哭丧着脸，一问，原来我的运气算好，房里还有床！而他们去的屋里只摆着一张污迹斑斑的破沙发，连遮屁股的布也没有。有人一来情绪就扭伤了腰。还有人隐隐约约感到隔壁有猪哼哼，就出来质问老板，不料老板笑眯眯地回答：“是猪圈，买不买腊肉？土猪肉腌的，不是饲料猪哟。”这是个沉痛教训，“便宜没好货”，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说实话扫黄我是赞成的，但要在扫野鸡和黑店的同时，保护正当营业的小姐。

老威：你得过性病么？

唐东升：三次淋病，一次尖锐湿疣。出入这种场所的人几乎都得过性病。淋病好治，打两针，几天就好了；尖锐湿疣是顽症，龟头长菜花，进医院，用激光烧了，又用小砂轮磨，可没过多久，菜

花又发芽了，并且比第一次的泛围还广。我只好出差到北京治病，花了上万块钱不说，又要瞒老婆，又要做生意，心理负担特别大。

老威：你可以到小诊所去治嘛，谁叫你摆阔？

唐东升：小诊所？想死呀。报上天天都在揭露私人诊所性病专科的骗局。一般人染上这花病，不好意思，只好偷偷找一家私人诊所了断，谁知越想尽快了断越了不断，钱花了几兜，病却好不了。我的观点是，什么都找大地方，华西医大、中医学院、省医院，然后才是市级医院，径直奔男性病专科，大大方方地陈述病情，快刀斩乱麻。

老威：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看来，你有整套的嫖经，瘾是戒不掉了。

唐东升：其实不搞也死不了人。同吸毒、赌博相比，这是最容易戒的。但我为啥要戒？我没有对不起老婆，我从未想过离婚另寻新欢。我只是软弱、管不住自己。话说回来，如果我真能管住自己，就做不成生意了，嫖和赌，有时就是生意的一部分，你不同这帮人打成一片，银子从天上掉下来？依我看，嫖，只要不是滥嫖，只要经济能力允许嫖，还能起到稳固家庭的作用。嫖了之后回家，总能回忆起自己的过去，老婆的种种好处，不就是要把体内多余的液体放出来么？而老婆不是接受液体的容器，而是一种习惯，你和她已经养成了互相依赖的习惯。你想想，明知是恶习都难以戒掉，更别提好的习惯啦。当一个嫖客象西门庆那样脱阳而死时，为你守灵的，肯定不是三陪小姐，而是老婆孩子。柳永写给那些妓女的艳词真的没劲。

老威：你已经炼成人精了，感到后悔不？

唐东升：对，假如我只有三十岁，我也会象宋朝的青楼女人一样，为柳永夭折而哭。

老威：哭个屁，老鳄鱼。

56　狱霸田洪

采访缘起：这是十年前的访谈资料，其间整理了好几次，或因为残忍，或因为恶心，或因为杂乱无绪而中断。2000 年 8 月 11 日，我想结束持续了太久的底层工作，所以鼓足勇气完稿。

1990 年 7 月 17 日下午 3 时，我在川东某市歌乐山中的一座收审所采访了 28 岁的田洪；大约一个月后，我又在市中区的某看守所再次采访了他，为了保持阅读上的连续性，我在整理时，做了一定的衔接与修补，这也是我在做其它谈话时的一贯方法。

某种档案是应该通过公布而永远保存，为了历史与社会的健康。再次声明，我做的不是新闻记者的工作。

老威：我觉得你不划算，本来按你的原罪判，扒窃三千块钱，最多三年，说不定还弄个劳教。可你在狱中行凶，打死了人，怪得了谁呢？

田洪：你觉得我还有救么？

老威：很难说。

田洪：我不是故意的，死者与我无怨无仇，哪个料得到他那么不经整？

那天早上，好伯伯（收审所的编外管理人员，一般都上了年纪，故被人犯们呼作“好伯伯”——老威注）开了锁，吆喝：“七班涨水！”我就应声推开铁栅门，拎贼进来。这是头肥猪，起码 180 斤，他一只手提一只鞋，弓着腰冲大家傻笑。这时满舍房二十多个光头贼，像少林寺的棍僧，分两排撑腰杆，打盘腿，绿眉绿眼地恨他。肥猪心虚了，双下巴抖得咔咔响。这叫“注目礼”，然后才是“下马威”，全房一齐吼：“贼！打死打死打死！！！”这种人造惊雷，肥猪哪听过？顿时懵了，膝盖一软，就扑地下跪磕头。我兜屁股一脚，他就顺着舍房中间的小路，一溜狗爬。四个蹄子翻得快惨了，脸眼就冲到最里头的墙角角，头抵着马桶，连叫“饶命”。

老威：监房里还留“小路”？

田洪：这是尺把宽的“界河”，把上面和下头隔开。上面是“领导层”，以老召为首，梁山好汉一般排定七个人，坐牢照样吃香喝辣，并且有人服侍。下头是毛贼，近二十条一堆，晚上打铺，上面七人的铺位宽度与下头二十条的一样。挤不下？就一头一尾地码人，各朝一个方面，腿微弯，屁股就刚好嵌合成不漏一丝缝的整体。如果哪个的狗脑壳伸出了界河，就要遭脚踢，这是“打楔子”。人肉的伸缩性大，所以每晚铺打完了，上面都要站在“界河”上弹墨线，直惨了，如果木匠锯子一路拉下去，绝不会伤着任何一顶头皮。

老威：你们这是在装沙丁鱼罐筒吧？

田洪：你说对了，人肉的味道蒸发上来，的确像臭鱼。所以，稍微会动脑筋的人，都要从毛贼堆里朝上奋斗。我奋斗了一个月，才从开水贼升为打手，专门管过手续和维持秩序。这手续人人必过，除非管理亲自出面打招呼。你想想，这传统的规矩我咋能破……

老威：谁定下的规矩？

田洪：我也不晓得。据老犯人说，自从盘古王开天地，神农尝五谷，牢里的规矩就有了。变了泥鳅你就只有在泥巴里翻，不朝上就朝下，不朝左就朝右，总之你要尽量做最大最粗的那根泥鳅，搅得其它泥鳅瞎撵着你转。在外人上人，在内鳅上鳅，社会层面不同嘛。

老威：这绕口令是什么意思？

田洪：简单地说，即使我发善心想饶肥猪，也不行，规矩是铁打的，贼的眼睛是雪亮的。所以我二话不说，先纵起给他上五份“贝母肘子”，然后打出“菜单”，叫他点菜。

老威：啥叫贝母肘子？啥叫菜单？

田洪：贝母肘子就是用手拐纵起砸贼的背壳。一般先要问：“贼，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懂几？”如果回答：“懂四（事）”，贝母肘子就要上得粑些，下面的菜也要来得温柔些。我一见肥猪吓破了胆，就晓得不是道上的，也就懒得问。菜单以川菜为主，将近 100 种，明写着是美味佳肴，其实全部为整人的手段。四川人客气，朋友见

面，老是请吃请喝，这种风俗引入牢里，就有了“点菜”一说。不知哪个烂秀才，还给菜单糊了个封皮，写上“民以食为天”几个大字，一翻面，才是正谱。分“家常菜类”和“工艺菜类”，计有贝母肘子、熊掌豆腐、油煎二面黄、猪拱嘴、猪下巴、润喉片、红烧牛鼻、磨豆腐、红烧里脊、锯子肉片、麻辣羊肉串、蹄花汤、炖团鱼、川味烟熏鸭、滚刀肉、大众排骨汤、宫爆肉丁、铁板回锅肉、麻婆豆腐、龟壳响皮汤、乌龟含情、松山缠丝兔……哎哟，我一口气背不下来。

老威：四川人也太幽默了，画饼充饥到这个地步。

田洪：啥子“画饼充饥”？全上真的。

老威：我不信。

田洪：你这种书呆子，我们房曾经进了一个，他自我介绍说是诗人。这太稀奇了，连老召都惊得从铺盖叠的虎皮交椅上站起来，提着裤子，围着他看了三圈。老召说：“诗人？写四言八句还是打油诗？虽说四川特产中有一样就是诗人，但是老子几十年都没亲眼见过。”诗人说：“我就是正儿八经的现代派诗人。”老召说：“你背几句来听听，把老子的心肝按摩舒服了，手续就过得温柔些。”诗人说：“你听不懂现代诗。”老召说：“那就古代诗。”诗人说：“古典诗太简单。”老召说：“你酸个鸡巴，老子就图个简单快活。”于是诗人运气提肛，挥起一只手用焦盐普通话朗诵：“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不料才酸完这两句，全房 20 多条烂贼打雷一般接上了火：“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反而把假诗人震懵了。

老召气得飞起一脚：“你妈卖逼！啥子破诗，三岁娃儿都会背，你拿这个来蒙老子！”诗人吓得惊抓抓地喊：“我还会背其它的！古典的现代的，随你挑！我能背 100 首以上……”但是已经没有机会了，老召说：“诗人辛苦，背诗背饿了，先给他上份猪拱嘴下酒。”我已守候多时，马上拿一双竹筷子夹他的上嘴唇，然后再夹下嘴唇。几个人把他按死在角角，由我和另外一个打手轮换夹了半个钟头，一份又青又肿的人造猪拱嘴就弄好了。诗人满身的口水、鼻涕、眼泪，嘴有半边砖头厚，除了哼哼，再也念不了诗。老召又说：“一

份猪拱嘴咋个够呢？下酒菜嘛，再上份川味烟熏鸭。”这时诗人已吃了润喉片，喉管被铁砂掌砍了个包，想叫声音出不来，只有让我们剐了裤子，划火柴烧阴毛。一燃一大卷，看看要伤着肉了，急忙抓熄，淋点水，又烧。还剥开包皮，将龟头熏了，让这份烟熏鸭从外到里都焦而黑，并且透出熟鸭皮一般的油亮。老召说："诗人生活讲究，所以菜也上得艺术点，不伤筋动骨。”

老威：怎样才叫伤筋动骨？

田洪：这次我判死，就伤筋动骨了。那肥猪 180 多斤，看上去像一座水塔，把上衣一扒，肥肉就直往下淌，他的胸毛还分叉。若在外面撞上，我都得闪远点，怕碰着黑道保镖了。在全舍房，就数打手容易出事，稍不留神，就整爆了。七班离值班室远，动静大点没关系，但要懂得啥子人上啥子菜。老召经常不直接发话，全由我拿捏火候，这样万一出事，他也好推。这次冤就冤在我错误地估计了肥猪，按堆头，他受几个“地震”都没问题，可他才吃了三份熊掌豆腐，脸就青了，身体顺墙朝下塌。我以为他装死狗，叫两毛贼架住，又上一份。他的眼皮一下子就上翻了。口里的白沫喷了出来，接着是鼻孔和耳门的血，止不住了。他爬在地板上乱抓，我们把他翻过来仰起，掐人中，喊报告。听说医院还没拢，就死在车上了。

老威：啥子熊掌豆腐，这么厉害？

田洪：其实就是武打里的“黑虎掏心”，让人贴着墙，一掌接一掌打他的胸口。我还捉摸这么大堆肉，非要地震几下才过瘾……

老威：啥叫“地震”？

田洪：让他变狗爬，再跃起抓住两人高的天窗铁条，收腹提腿朝下坐，踩塌那狗脊梁。我没想到肥猪有心脏病，乱整不得。

老威：你把牢房变成屠宰场了，这些警察知道么？

田洪：以前不知道，现在知道了。七班是打击牢头狱霸的重点房。这次坐上面的判了三个，老召没发话，只判了五年，我不服！他整了那么多人，以前的旧账就不算啦？连我都被整惨了。你看，我脑壳上这大圈血珍珠，像孙悟空的紧箍咒。我刚过手续没几天，劲还没缓过来，老召就说我乱用手纸，给我上磨子豆腐。幸好不是

小份，否则现在我就满口无牙，说话连风也关不住。

老威：你头上这圈肉疙瘩就是“磨子豆腐”？

田洪：对，这是大份。筷子头不断跺、跺，直到起一圈浸血的珍珠包，即用牙签一个个挑破，抹肥皂、盐巴止血。痛几天后，头箍烂成了溃疡，再挨个挤化脓的包。结疤了，就是永远的紧箍咒。小份磨子豆腐比这做工精细多了，也是用筷子头跺，门牙、尖牙和大牙，一颗颗地跺，哒哒哒好几个小时，牙血和口水牵着线直朝下坠，有时坠了一尺多长。这种整法开始不咋个疼，渐渐就加剧了，几天后，你会疼得受不了。一般牙疼吃点药，熬一熬就过去了；这种牙疼要持续到牙齿松动，摇摇欲坠。这脱牙的过程极其漫长，把人熬得啥都不想干了。恨不得一头撞死算了。

老威：亏你想得出来！

田洪：这不是我发明的，菜单上的东西，还不是烂贼东一份西一份凑出来的，咋能算在我一个身上？我也是受害者……

老威：你当受害者时，应该及时向政府反映情况。

田洪：监有监规，贼有贼道，政府听汇报，还不是先叫老召出去，况且房中的毛贼已经被驯乖了，当一次叛徒甫志高，以后的日子就难过了。

老威：反抗是人的天性，咋会这样？

田洪：反抗是野兽的天性，人的天性是忍耐。收审所是中转站，人人都晓得呆不久，何必惹事生非呢？封建社会，地主剥削农民几千年，抽筋剥皮、强占民女都玩过，还不是忍了过来？清朝逼着男人留女人的大辫子，大家也一忍几百年，难道几个月就忍不下去？其实菜点过了，你就昏天黑地做根懂事的泥鳅吧，灵醒一点，瞅准上头的心思……

老威：你就是灵醒过头了，才走到这一步。

田洪：打手是一个坎，可上可下，我栽了，我认，但我要一直上诉。就是死，也要把申诉信留几份给家里，黄泉路上太冷清，我非要把老召拉来做个伴，他的屁眼儿比我黑，关五年出来，还会祸

害人。

老威：法律讲证据，你是直接凶手。

田洪：他的证据已转监了。某某厂有个姓任的工会主席，犯盗窃罪，进来没几天，肋骨就被他弄断了两根。他模仿法官审案，高高在上地吆喝一声，任贼就被一顿“大众排骨汤”整了上来。由于任贼拒不交待问题，他就亲自把他的脑壳塞进大马桶“看金鱼”。那么臭，任贼居然吊起脑壳打瞌睡，把老召气个闭门，就把他的裤子扒开，一颗又一颗朝屁眼里塞花生米，塞一颗，还用筷子捅两下，把任贼舒服得满头大汗，脖子一回比一回伸得长，眼珠子都要爆出来了。这种整法，地下党都受不了。还有某某，吃过老召的“炖团鱼”，一盅接一盅开水，浇屁股，把两块大肉都烫蜕皮了。坐不得，偏要你坐，还要你端端正正。如果哼了动了，又另外“点菜”。我也是证据，我的样子长得像农民，所以手续过得狠，上了四菜一汤。一份松山缠丝兔，差点把人弄废了。你想，麻线从每根手指头密密匝匝地缠上来，一直绕到膀子，十来分钟，线就完全陷进肉里。我两条胳膊都失血得冰凉、麻痹，好久都没完全恢复。这是大份，小份是缠鸡巴，软时开始缠，然后搓硬，把人痛死。我敢说，随便把哪个毛贼脱光，都能看出点没点菜，但是，毛贼们都不敢出面。

老威：老召这么厉害？翻了天！

田洪：政府已经把老召转了房，号召大家揭发牢头狱霸，大会也开了，领导还讲了话。我们都被上了七十多斤的重镣。但这是中转站，人心散，即使检举，也是鸡毛蒜皮。哪个贼不清楚？这是下鬼门关，不死扒层皮，平平安安地出去了，还得烧柱高香。

老威：你不判死，也不会检举吧？

田洪：会，这是态度。骂人啦，政府已经处罚过的打架啦，等等。但菜单是传家宝，不会交。即使被查出来了，交了，也要多留几份底子。

老威：讲讲你在监房是怎样“奋斗”的？

田洪：我进房两个多月，从最底层的马桶贼开始，经过地板贼、洗衣贼、毛贼长到开水贼。又努力干了个把月，才正式跃龙门，跨

入打手。铺位虽不是上面，可已经是迎门的第一位，行头与老七差不多。如果上面再走一个，我就升为老七了。

老威：这等级是谁定的？

田洪：大社会，小监狱，当然是外头有啥，里头就有啥。马桶贼的天职就是倒大马桶，每次放风，铁栅一开，马桶就得先出门。除了一天两次倒桶，马桶贼的另一天职就是不分昼夜地站厕所，只要有上面的拉屎，就得两人肩并肩，组成围墙挡在前头。如遇习惯蹲便的，还得把他抬上半人高的大马桶，待他蹲稳了，才转身挺立以肩头充当厕所扶手。与社会上一样，只要干的工作下贱，你的地位肯定就下贱，马桶贼没铺位，无论天气冷热，两人都一左一右抱桶睡。不怕你笑，马桶贼拉屎从不揩屁股。

老威：没纸？

田洪：有纸也不准用。在房里，手纸也有等级。老召，最高级的香水餐巾纸，我想百万富翁也不会在屁眼儿上这样浪费；上面的，高级卷筒纸；打手、管事和闲人，草纸；众毛贼，包装纸、字纸及五花八门的纸；地板贼，废纸；轮到马桶贼，当然就不用纸了。

老威：你在每个等级都干过，可谓五毒俱全了。

田洪：马桶贼才干一周，我就擦地板了，随时有可能涨水，换一波贼你就成老贼了。我力气大，劳教过，所以会拿捏、舒背（按摩）。开水贼除了打开水，就干捶腿舒背的活儿。老召迟迟不升我，就因为我把他搞得舒服。有一回，我给他正捶得欢，墙外有女娃子说话的声音，嗲声嗲气挺性感，把他的鸡巴都听硬了。他让我给他搓，这下不可开交，上面七个人都脱了裤子让人搓。老召胀得不行，说就差那股向里戳的劲。我咬咬牙，豁了出去。我咬着他那玩意抽了几口，浆就卜地喷了，真他妈恶心，又不敢吐，只得硬吞了下去。老召坐起来，赏了我大半截红塔山。这是个信号，我晓得我熬到头了。因为在牢里，上面发烟也有讲究，一般性的立功，只赏烟屁股，吸两口就完事。如果把上面的马屁拍得顺，烟屁股就越赏越长，但最多不会超过半支。这次我得到大半截，意思是该升级了。

老威：你还感恩戴德？真他妈够卑鄙。

田洪：你也骂人？

老威：我听不下去了。但愿明天早晨醒来，我能忘记这一切。

田洪：我还指望你帮我寄几份申诉书呢。我一定把老召拉下黄泉！明年清明，你就等着烧两个人的纸吧。

57　八九反革命万宝成

采访缘起：在四川北部的一座监狱里，集中关押过 20 多名六四良心犯，其罪名都是“反革命宣传煽动”，而刑期却两年至十二年不等。

35 岁的万宝成出身红色家庭，在群体中不算突出。他是被特定的时代环境制造出来的“敌人”。

1993 年大年初三，大夥闲得无聊，就在一场大雪里袖手交流案情。我是有心人，专挑万宝成问，虽然此前我已对他“了如指掌”。

据传闻，“反革命”这个罪名要取消了，这意味着“平反”的历史已不复存在——欠账不还，赖账到底——这就是与经济接轨的中国特色的后极权主义。

老威：在这座监狱的六四反革命中，您的职位算最高吧？

万宝成：不错，坐牢之前，我是某市农业银行的副行长。

老威：是吗？真有点奇怪。您对政治兴趣很浓？

万宝成：谈不上。我在行业里出类拔萃，对党和国家各个时期的经济政策很熟悉，每次下发的文件我都要细细揣摸，《人民日报》社论与行业报刊更是每天必读，这叫不叫对政治感兴趣？

老威：你说呢？

万宝成：这叫工作习惯，也叫当官的基本功。跟着方针政策走，避免出格犯错误。至于政治嘛，不关老百姓的事，尽管运动一起，大家的热情高涨。弄出了问题，就懵懵懂懂被关了进来。在这儿的六四反革命中没有精英，没有体改委，更没有赵紫阳的智囊团，犯案前，大家不过是普通人；教师、大学生、工人、打工仔、副乡长、税务员、记者、社会青年，还有作家，还有一个技术高中的学生，人狱时未满 18 岁。李鹏发明了一个概括性的名词，叫“社会闲杂”，我看差不多，“人民”是抽象的，“社会闲杂”才是具体的。按理说，听党的话就该叫人民，不听党的话才堕落成社会闲杂，可在学潮中，

党有两个声音，把人听迷糊了。如果不发生六四，大家不过终日碌碌无为，上班下班，买菜做饭，生儿育女，恐怕一辈子也捞不上当政治犯的机会。

老威：您是不是觉得挺冤的？

万宝成：既然爱国爱成了政治犯，就没谁感到冤。不过，有点恍若隔世。说实话，啥叫颠覆国家？啥叫西方民主？过去我想都不会想这些，连在报纸上读到类似字眼，也会下意识地跳开；至于民主墙、魏京生，更像火星那么遥远。可一坐牢，生活中远与近的位置一下就颠倒了，现在，银行离我比火星还遥远。

老威：您是咋个犯案的？

万宝成：您没看过我的《判决书》？

老威：所有的《判决书》都大同小异。特别是反革命的《判决书》，更像文革大字报，“反动”啦，“气焰嚣张”啦，“阴谋推翻”啦，甚至还有“狂吠”之类的兽化字眼。涉及到犯罪情节，三言两语就完了。您好像是弄了一张传单？

万宝成：《六四目击记》。

老威：您“目击”过六四？当时您在北京？

万宝成：我到北京出差，有一笔贷款到期了。对方拖延，我就亲自去催还。本来可以派信贷员去，但考虑到当时正闹学潮，市面混乱，还是由领导出马慎重些。

老威：四川的贷款放这么远？

万宝成：他们在四川的公司撤了，收缩回北京。总之，我是5月底乘飞机去的，这可太不识时务，因为北京市面人心惶惶，那家公司里也只有值班的人，据说领导都到天安门爱国去了。我公务在身，无心凑热闹，就在翠微路附近找了家宾馆住下来。我的房间在二楼，窗户正对着十字路，每天都有市民和学生在窗外来来往往，黄昏时，就东一堆西一堆地聚会，互通消息。解放军快进城了，有人说三十万，有人说二十万，夜深人静，总能听见万寿路方向一阵又一阵机器轰鸣的声音。四川的位置还是太偏了，到了我们市，就

更偏，闹学潮，顶多是游行，反官倒反腐败的标语口号满天飞。与市委派的人对了半天话，大夥也就散了。可一进北京，气氛就紧张多了，大兵压境。人们还成群结队朝天安门去，这就是真革命，其它地方，走过场而已。小道消息越听越离谱，甚至有出动空降部队的传闻。我这种死脑筋，肯定不相信。我爸爸是老八路，对党忠心耿耿，我多少受了他的遗传，既然周围的人都疯了，我就闹中取静，自己关在房间里读业务书。就这样熬到六月三号晚上，街上的市民越聚越多，整个宾馆全空了，连服务员也上街。有人站在台阶上发表演说，要拦截军车，不准解放军进城去镇压学生。群情激昂，除了文化大革命，这种场面我还没碰见过。也许您不相信，这时我依然置身局外，早早就上床了。

夜里，外面的动静越来越大，戒严令已播了好多遍，可人们不管这一套，把街口都扎断了。我把窗户关上，刚一熄灯，就见玻璃上映出了火。

此时我没忘记自己是领导，不是来看热闹的，就服了一颗安眠药。

不晓得是不是做梦，总之我是听见了枪声。我这辈子简直想不到解放军会开枪射杀平民，装甲车会向着人群撞过来。文化革命的两大派武斗，也是群众之间打来打去，乌合之众，毛主席一声令下，大家都缴枪。出动正规军就不同了，他们的对手应该是美帝苏修蒋家王朝，不应该是爱国的老百姓。

第二天上午十点多钟，服务员敲门打扫房间，一进屋，就惊叫起来。

她说先生，亏您还睡得着！我起身问怎么啦。她指着窗户说，玻璃全碎了。原来有颗流弹射进来，把床对面的墙也钻了个大洞！

我庆幸自己命大，如果我昨晚趴在窗台看热闹，很可能就血肉模糊地躺在这儿了。据说有人在十几层楼上向下探了个头，就换了一弹，当场呜乎。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我还能当局外人么？

老威：热血冲上来了。

万宝成：胸闷得慌，可血还没上脑门。直到我又向窗外瞄了一

眼，就这一眼，政治犯当定了。

老威：您忘了您是行长？

万宝成：狗屁。路口全是扣着钢盔的野战部队，隔几分钟，就有一辆装甲车冲过街口。我刚好瞄见，一个解放军在喝令一个小伙子站住。小伙子一慌，拔腿就跑。解放军单臂顺过冲锋枪，哒哒哒地一梭子，小伙子一个前扑，就爬在地上不动了。这一幕，我想我的八路父亲也没见过。

我呆在那儿，还是服务员把我拉回床沿。她叮咛千万别胡乱瞅窗外。

当兵的杀红了眼，非常时期被流弹打了活该。

是的，子弹可不认您是不是党员，是不是副行长。我坐在桌边，拔出笔，摊开纸，就这样写了。我以前都是写总结、汇报和计划，就这一次，我把我亲眼见到的难忘的一幕写了下来。我写得文采飞扬，自己都感动得流泪了。我天真地想，政治与我无关，但共产党员应该诚实，一就是一，二就是二，长期做经济工作，我晓得哈叫眼见为实，耳听为虚。

我写了一千多字，工工正正地誊写在一张纸上，取名《六四目击记》。我偷偷找地方复印了一百张，在回程的火车上，沿途散发。虽然当时全国像兵营一样，随时可能被盘查，但我是经济领域的干部，不容易引起怀疑。回到家，我休息了好几天才去上班。生活照旧，表面啥也看不出来，可我心里有鬼。

过了一个多月，没啥动静。我想大约是群众对六四屠杀都有看法，敢怒不敢言，所以没人捡了传单去告密。唉，国家的事，哪个说得清是非？

我自己不顾死活地弄了《六四目击记》，可在学习北京平暴的中央文件时，作为领导，我还得带头表态，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由于银行没职工参加游行，我们还受到上级表扬，颁发了奖金。谎言重复一百遍就成了真理，所以，中央文件定性六四为反革命暴乱，大家通过学习，也就统一了认识。

后来我差点把干过的事忘记了，但警察不会忘记。终于有一天，

大约是 8 月份，行长约我谈工作。我进了他的办公室，里面除了他，还有两个陌生人。行长说，万宝成，把你干过的事老老实实向政府交待吧。我打了个寒战，本能地装糊涂；我干了啥事，行长您还不清楚？不料行长一闻此言，急得面红耳赤，说话也结巴了：我，我，我，你可不要血口喷人！后来我才晓得，国安警察早已顺藤摸瓜到我市，把我列为重点嫌疑人施行暗中监控。谁都不相信我会粘政治，批捕前，市委开会讨论时，第一书记还毫不客气地挡驾："不可能！万宝成同志出身于革命家庭，他父亲是老八路，跟我同一年的兵；而他本人 18 岁就入党，忠心耿耿，把经济工作干得红红火火。他是在我鼻子尖下长大的，他绝不会干反革命勾当！"其它领导也纷纷发言，替我担保，有人甚至说："这娃娃正是上升时期，你们莫又弄一柱冤、假、错案，毁了人家前途！"国安局的人被大家批得沉不住气，就把所有的证据都摊在会议桌上，包括笔迹的对比签定，住京宾馆服务员的证词，铁路沿线拾得的传单，等等。事实胜于雄辨，大家都哑了。在十分难堪的气氛中，政法书记签字批准了拘捕。

事已至此，我只能全部供认。幸好我没同案犯，案情也相当简单。但是我觉得自己无罪可认，因为我目击过的事实千真万确。这下可捅了马蜂窝，上至书记，下至行长，还有公安局的各级领导都纷纷出马，苦口婆心，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其共同目的，就是要我认罪，要我承认造谣，或者听信坏人挑唆，编造了这个诽谤解放军戒严部队的无耻谎言。这咋行？"我对审讯员说："我写的都是我亲眼所见，我以一个共产党干部的人格来担保！"审讯员说："你已被开除了党籍。"我说："还没接到通知。"审讯员说："落到这一步，还死脑筋！你认个罪，争取个态度吧。"我说："共产党员的态度就是诚实。"审讯员说："一派胡言。"我说："当时你又不在北京，你才是胡言，你根本没资格审这个案。"审讯员气坏了，说："万宝成，你以为你还是银行行长，有权有势？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是强大的！"我说："我又不是贪官，你何必吹胡子瞪眼？"他说："你是经济案就好了，有人会保你，将来还有翻身之日；你沾了政治，就彻底完蛋，懂不懂？你不认罪，你的老关系都不好为你活动。"我说："瞧你那副小人得势的样子！你社会经验倒丰富，就是文化

太低，不懂这政治上的罪，是不好轻易认的。我承认我造谣，就等于自己朝自己头上扣尿盆子。”

谁也说不倒我，最后，政府方面搬出我爸爸。这招太毒太损了，它彻底摧毁了我对现在这个党的多年的信任。我的案发后，爸爸气得浑身哆嗦，叫了一声“短命娃儿！”就栽倒了。中了风，经抢救，半个身子瘫痪，可脑子还清醒。公安局把他的轮椅推进审讯室外的放风院。我一见，就忍不住扑上去，抱住爸爸放声大哭。我家有两个姐姐，我是独子，又是行业尖子。他的骄傲，他晚年最后的希望和荣誉全在我身上。万宝成这个名字，也是 57 年宝成铁路通车时，他特意给刚诞生的我取的。表面意思是纪念宝成线通车，内里的意思却是愿我如铁路一生顺畅。

警察一见我哭，以为他们的策略奏效了，就乘机劝说：认了罪，啥事也没有。轻轻松松地陪一陪老人家，他的身体就逐渐恢复了。万行长为本市的经济发展与建设作出过很大的贡献，将功补过，定能得到政府和人民的谅解，从轻，甚至可能免除刑事处罚。在哪里摔跟头就从哪里爬起来，市委书记都说了，您是一时受蒙蔽，全国受蒙蔽的领导干部远不止您一个。我们欢迎您回到人民怀抱，还干您的老本行，于党于国于家，都能兼顾。

我爸爸边听边点头，还吃力地抬起手点着我说：“照组织说的办。”

我激动得大声说：“爸爸，您清楚您儿子是咋样的人！我从您身上学到的最优秀的品质，就是一是一，二是二，从不弄虚作假。共产党咋个能逼迫它的党员承认莫须有的罪呢？诚实犯法么？”

爸爸说：“党叫干啥就干啥，没二话可讲。”

我说：“那张传单写的是我亲眼所见。”

爸爸说：“该看的看，不该看的就不看。”

我反问：“我看了我不该看的？”

爸爸说：“看了，看了又咋的？反革命暴徒，都该死。我们好不容易，打下的红色江山，难道能这么丢掉？难道能让国民党、帝国主义卷土重来？你好好想想，屁股，是不是坐歪了？坐到敌人那

边去了？放松了世界观改造，放松了政治学习，危险啊！你好好想想，想清楚了，老老实实，接受处理，不管是啥结果，回家来，还是，还是我的儿子。”

见爸爸满头大汗，我不忍心再争辩下去。那拨警察如释重负，竟要当我爸爸的面录口供。我提醒说：“这不合法律程序。”

老威：您没熬到底吧？

万宝成：我只能承认我的行为使党和国家的威望蒙受了损失。至于“捏造事实，传播谣言”之说，纯粹是对我人格的诽谤。萧斌犯“造谣罪”，判了十年，也许是因为他夸大了天安门伤亡的人数，我又没说“血流成河”。不行。这个官司绝对没完，将来六四平反，我还要反告他们，古代有“只准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的成语，而现在呢，你连看州官放火也不行，更莫说点灯了。

老威：您被判了几年？

万宝成：四年，《判决书》上还注明我有认罪的态度，从轻。真是胡扯，清清白白的一段历史就被弄脏了。唉，坐牢前，我还以为反革命就像小说里写的，一小撮，尽干坏事，梦想资本主义复辟。不料进来溜一圈，真相大白，所谓“政治犯”都是再普通不过的人。多数人对政治的认识还停留在《红岩》阶段，写诗、写文章，不自觉悲壮起来。举一个例子，这儿曾集中关过 20 多个六四反革命，刑期 2 年到 12 年不等，文化程度也参差不齐。90 年初的一天早晨，天上突然坠下一只鸽子。是我最先发现的，它在上面就有些摇摇晃晃，醉酒似的，拉了几秒钟弧线，然后从一大群鸽子中栽下来，在墙上弹了一下，才落到院子里，大夥从号中一涌而出。小心翼翼地拾起。幸好昨夜下了一场雪，这小东西才没被摔死，但腿和翅膀都折了。这下有事做了，20 多个政治犯的爱心轮番奉献，削了极小的竹片，给它上夹板，还裹了一层药棉。小扬到伙房去弄米，嚼了喂，鸽子咕咕摇头不吃，小扬一急，就与老候一起，把竹棍横栏着嘴壳，一点一点地灌。我与老雷还在墙角挖蚯蚓，捏烂了喂。到最后，鸽子粮应有尽有，碎玉米、绿豆、炒黄豆，小东西吃不完，就给耗子做了好事。大夥排了号，两人一组当鸽护士，一天一换。平

时上工，鸽子就藏在上铺蚊帐里，垫几张报纸，散点食，它就吃喝拉撒都在铺里。因为六四政治犯待遇要特殊些，所以狱方一般不查号。如此养了一周多，鸽子伤愈了，咕咕冲大夥叫，完全是要告别的意思。大家心里挺酸的，羡慕鸽子，每个人都对它说了不少祝福的话。

鸽子在地上兜着圈扇翅膀，谁咕咕两声，它就冲到谁的面前，真是太有灵性了。小扬把它捧起来，再也舍不得放手。老雷说："让它自由吧。"多数人不吭声，老雷又说："我想利用这只鸽子，把我们追求自由的心声传递出去。"

这说到大夥心坎上去了。于是我就执笔写了张字条："我们是四川某某监狱的 23 名六四政治犯，推翻专制，实现民主是我们的信念，希望外界予以关注。谢谢。"

我们把字条绑在鸽腿上，全体人员在院里肃立，举行告别礼。老雷从怀中捧出那东西，手微微地颤动。这一刻，再平凡的东西也升华了。革命鸽，信念鸽，大家用心血浇出来的远方民主鸽，被一双手抛向天空。它在我们头上低低地盘旋了一圈，然后陡地拔高，向两重高墙外俯冲下去了。

当时大家忘乎所以，谁也没觉得鸽子俯冲得不对。晚上躺在床上，还七嘴八舌，开起信鸽讨论会。我根据方向，觉得它是朝东飞的，"天空是直线，现在它可能到了十堰或襄阳。"小扬说："湖北佬养的东西不会这么通人性，我觉得是台湾信鸽协会托这边的人放的。"老李说："你乾脆说是台湾李登辉托放的吧。"小扬说："那有啥不可能？！"老雷边说：

"此为天意，为啥它别的地方不栽，独独栽到政治犯的院子里？可见是希望的信使。"我说："关在这倒霉的地方，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有点盼头，牢也好坐些。"大夥见我沮丧，立即群起安慰我："老万，坚强些。坐牢是我们的光荣，付出的代价今后都要专制政权偿还！"

老威：这鸽子被赋予的意义太多了，可惜海天茫茫，谁知道它会咋样？

万宝成：也许它会飞回来吧。

老威：痴人说梦。你们这群人，唉，真有点像小说里的人物。

万宝成：梦还没说完呢。第二天大早，我们院子就被占领了，一个班的武警荷枪实弹冲进号子，挨铺搜查，抄了个底朝天。所有带字的东西，包括诗歌、政论、家信、读书心得、散文全被一网打尽。监狱政委亲自出面训话，追查“鸽子事件”的来龙去脉……

老威：什么？！鸽子被武警打下来了？你们小心一点嘛。

万宝成：鸽子是监狱里一位警察鸽迷养的，已经失踪很久，主人还以为……唉，不料死而复生，鸽子不但突然回家，而且还立了一功。

老威：原来是一只告密的贼鸽子。

万宝成：希望破灭得太意外了。我们几个人都被关了小间。从这以后，集体被强制解散，我们被分别插入刑事犯小组里，实行十几比一的监视改造，真是度日如年啊。

老威：您出去后准备干啥呢？

万宝成：经济工作是干不了了，况且，政府也不乐意我这种人发财。

经历了这么多事，我今后只有投身民运事业，不懂，我就学习，就多向老民运战士请教。虽然讲出来，我的反革命历史也与“鸽子事件”一样荒诞，但是，我是被我党一步一步逼到死角的。命中该我做铺路石，就豁出去了。

58　书商万人敌

采访缘起：40 岁的万人敌是我 80 年代的故交，做了多年诗歌美梦，终于壮志未酬。转而适应经济形势，改行做书商。不料一炮而红，再二炮、三炮，成了百万富翁。可万人敌天生的贱骨头，狂吃狂喝、偷鸡摸狗如昨。所有光荣退伍的文学青年都这样，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结大概要支配他们一辈子。这是 1999 年国庆节夜晚，对于万人敌他们，天天都是华灯初上的节日。

万人敌：早晓得你到了北京，就朝周忠陵家打电话，没人。从唐朝一直打到民国幺年，都没人。我怀疑你是躲起来了，不想与生意人打交道。

老威：说话咋这么酸？你是打过电话，可都是在酒桌上打的，一大堆人，灌得醉醺醺的，这时，某个客户突然问："老威的情况怎么样？下海了？

出国了？还是疯了？这么多年也不见他的动静。"于是你说："你等着，我把他叫来。"口气像我的领导。北京这么大，我从西边赶到东边，打的也得一两个钟头。我来你们早走了。

万人敌：约好了，我们就会等你。

老威：趴在桌子底下等我吧，我不过就是个拉关系的话题。

万人敌：老威你还是这幺明察秋毫？糊涂一点，人与人嘛，能互相成为话题都不错了。80 年代写诗的哥们，有几个能经常挂在咱嘴巴上？虽然，话不一定是好话，江湖传言嘛，荤的素的都有。94 年那阵，传你疯了，在福利院追着护理人员唱情歌，结果被打了一顿；还传你随地大小便，一把一把抓屎吃；最恶心的是传你虐待其它病人，让他们跪着舔你的鸡巴，简直比法西斯还没人性。哥们听得心酸极了，愤怒极了，还在酒桌上约好，等春暖花开时，一帮旧人浩浩荡荡去探你，租架飞机去，在福利院房顶上迫降！我们要把票子装进迫击炮，去轰县长，去轰院长和委员长……虽然这个

伟大计划撒泡尿就成了泡影，但能够让我们动这个念的就你老威一人。

老威：我疯了大伙都高兴？

万人敌：从心理上扯平了。万人敌下海，海子自杀，老威发疯，只有某某、某某在坚持写作。

老威：我脑子非常好用，谢谢关照。

万人敌：你是气我，还是瞧不起我？

老威：瞧不起你？这不是跟我自己过不去幺？你有钱，有房子、有车，但这些都是靠本事挣的，既没偷也没抢更没骗。我觉得这倒干净，至少比 90 年代的绝大多数文人干净。老哥们，我不希望你穷，80 年代你流浪，腰无分文，凭着一手好诗就能到处投宿，远方飞翔着大鱼大肉，你啃完一个鸡翅膀又继续上路了。而现在，你，没本钱流浪了。你天性堕落，稍不留意就露出了无赖的嘴脸，绝对在“民间立场”和“知识分子写作”里混不出头，再没钱，你就彻底完蛋。

万人敌：好马不吃回头草，我现在是著名书商。前途一派光明。二渠道是战场，这十来年，败下阵多少人？但我们几个哥们都稳住了。但不可能永远稳住，说不定哪天一个选题做砸了，就伤元气。人有走背字的时候，做什么砸什么，最后连书会也不敢去，怕批发商揪住你要钱。97 年，老宋做十七、八本书，没一本卖得动，就狂嫖了一回，准备从 20 层的大楼上跳下去。我和朱胖子好歹把他拉住。我说：“你腰包里还有多少钱？”他说：“还有两万。”

我说：“那就打麻将，输光了再跳楼。”他说：“不行，这是我岳母的养老金，我已输掉一半，剩下的再不还，禽兽都不如。”我说：“你以为你比禽兽高级？百万家产赔光，还倒欠下 50 万。”他说：“下辈子还。”我说：“把无赖做到底咋样？”他摇头。我说：“真他妈虚伪。”老宋跳脚说：“你妈逼，赌就赌。”结果赌了一夜，他居然赢了一千块。我说：“好兆头，你走出背字了。”朱大胖子也说：“背水一战。”老宋的一股尿劲终于胀起来，这次他想都不想，稀里糊涂地做了本《大预言》。这书十年来出过好几盘了，从来没

红火过。老宋自己执剪刀，唏里喳拉地疯剪一晚上，然后颠来倒去地粘贴，复印，做样书，把我和朱胖子吓出一身冷汗，以为这屁儿虫必死无疑。朱胖子说："你还不如直接把他推下楼痛快。"我说："他岳母的养老金我还。"老宋一屁股烂账，他交了书号费，就把房产折子抱到印刷厂，压在厂长手里印书。3 万册！我的妈！中邪了。我们以为他将在书会上当众自杀，可没料到，这本破书真火了，呼拉呼拉地卖，呼拉呼地加印，票子如排山倒海涌过来。老宋了清所有的账，还赚了 40 多万。狗日的，肯定向书里发了功，把读者弄晕彩了。这一夜翻本的东西见着我和朱胖子，就又抱又啃，连叫"恩人"。然后约了十几个狐朋狗友，到磨子桥吃宵夜。我们从晚上十点开始大吃大喝，从街头到街尾，每个馆子都进了一遍。海鲜、川菜、火锅、冷淡杯、麻辣烫、广东点心，翻来覆去就这些东西。老宋说："今晚只准灌啤酒，看哪个的肚皮最装得。"

老威：磨子桥一带少说也几十家馆子吧，你们都去了？

万人敌：都去了。有的只叫了菜，动筷子拨几下，拔腿就走。

老威：这抽的那门筋？乡镇企业家进城了。

万人敌：就抽筋，逑啃了？美好时光啊，我们 80 年代盼的不就是这个幺？《水浒传》里最有名的格言，就是："大秤分金银，大碗吃酒肉。"今天，几千年来劳动人民为之奋斗的目标，终于实现了。年轻时候写诗，贯穿的就是酒色二字，至于卤鸭子、红烧鱼、回锅肉、猪耳朵，不过是下酒的菜；而白酒、红酒、国酒、洋酒、跟斗酒，不过是下色的菜，酒壮色胆，舌头壮鸡巴胆。现在都有了。我们在乱吃乱日乱写诗，这一身肥肉就是快活的诗！

老威：有完没完？

万人敌：与小姐有完，与哥们没完。那晚我们啥子佐料都不要，就一帮哥们干胀，剐掉商人外衣，回到彻头彻脑的农民大肚汉。怀旧啊。老威，记得不？89 年春节，我和老乐、老麦，每个人抱十瓶沱牌到你家，那阵沱牌才卖一块五一瓶，而现在，我一千五一瓶的酒都喝过。没有十多年前的沱牌好喝，肯定没有。要不就是舌头不行了，人兑了太多的水。老宋说，反正这钱都是白捡的，胀完算

述。天快亮时，我们进了最后一家早餐店，一上菜就恶心，都趴在桌边干呕，清口水垂起一尺长，就是呕不出来。肚皮快撑裂开了，马疯子提议晨跑，可才跑一站路，都累成人渣了。各人打的回家。老宋躺了一会儿，感觉不行，就进医院灌肠。我聪明，拢家就吞了三包黄连上清丸，一天中泻了八次，差点虚脱了。我估计傻吃的人都有下包袱的绝招。

老威：所以我哪敢奉陪你们。

万人敌：都是做生意请客练出来的。我晓得，写东西不能吃得太饱，否则就缺乏激情。伊沙说“饿死诗人”是对的，但是伊沙本人却肥头大耳，不像写好诗的。于坚属于蠢头蠢脑的那种肥法，据说他是大师？也许吧，不过他诗中的人造猪油太多了。韩东倒瘦，是江南才子唐伯虎的那种瘦法，如果在古代，他就成天练小诗为秋香题扇子去了。我亲眼见过他为某女诗人题的扇子诗:“这么多年，你的体重不增不减。”

老威：你还读诗？

万人敌：有时凑到眼皮子底下，就忍不住要溜一眼。人都是这种德性，当年我们嫌朦胧诗太老，占了席位，现在我们已经过了北岛他们当年的岁数，还不是死占茅坑不走人。

老威：你杂种没指桑骂槐吧？

万人敌：我在指桑夸槐！人活一口气，一部中国历史就是老的死霸茅坑，憋坏新人的历史。最近，我准备自己花钱出诗集，配大幅照片。没人吹，我就悬赏，一千元一千字，看批评家上不上。反正这年头，诗人给人的印象就是脱光裤子打老虎，又不要脸又不要命。

老威：你是钱挣够了，又想回归诗歌？

万人敌：你说到我的心坎上去了。不过一入二渠道，三、五年是脱不了身的，因为总有还没收回来的账。除非你做了特别轰动的选题，大家提前抱款，等着提你的书。就算你想得开，老账不要了，提前退休，可闲一段时间，不小心又碰上好选题，做不做？几年前顾城自杀，轰动一时，传媒热炒，大家都抢素材。我当时找到一位

老诗人，想买内幕材料。我张口出 5 万块，把他骇坏了，连问几声“什么”，嘴皮都在抖。接着就翻箱倒柜，忙了一个通宵。情书啦、照片啦、日记啦、诗和剪报啦，甚至纸条都不放过。我都看不下去，一再声明“够了够了”，可他还在翻，还在兢兢业业地出卖自己。最后，他犹豫了几秒钟，拿出了一件东西，你猜是啥子？居然是一件女内衣！他说：“这是我与××的定情信物，你拍不拍？”我他妈一下就被震了，这老诗人参加过抗美援朝，在官方诗坛也算个响当当的人物，怎么能被 5 万钱把一辈子的隐私买断呢？后来这本书我没出。

老威：你也有仁慈的时候？

万人敌：怕沾晦气。

老威：你不太彻底。其实世道完全变了，隐私不值钱了。在街上随便买份报纸，几乎都有某某明星打官司、控告侵犯隐私权之类。私生子啦，绯闻男友啦，早年的三陪经历啦，三级艳史啦，甚至父母离异、身心创伤、恋父情结都闹上法庭，请法官公断，动不动就要求赔偿几十万。嘿，你这方面的书还做得少么？茜茜与你关系密切，她说至少为你传过七、八本。

万人敌：她与所有的书商都关系密切，不过最密切的还数老家。有段时间，他把她的稿子和感情都买断了。恶棍你晓得，专搞丑女的那个，只要听说某个地方出了丑得稀奇的人物，这东西肯定日夜兼程地冲去验证，然后上床。去年他专程到昌平搞茜茜，却遭到严词拒绝，茜茜说她已是老家的人了。

老威：这么专一？看来她适合写言情类的书。

万人敌：琼瑶、席绢、黄爱东西的书她都照着搞过好几本。最近出了一本《绝对隐私》风格的书，有点像茜茜策划的。请的是女诗人，谈的是初恋，文字和故事都雅而美。王小妮、海男，好像还有伊蕾。翟永明的那篇，标题我还记得：《十三岁，我的身体背叛了我的心》，有点像《还珠格格》里的对白。现代派女诗人从西尔维娅·普拉斯式的疯狂女权向纯情回归，也算一种新动向。

老威：世纪末怀旧又不是女诗人的专利，40 岁是个坎，无论

男女，一翻过去都不对劲。你呢？听说这两天茜茜瞄准你了？

万人敌：正常业务往来。再说人长得难看又不是她的过错。我这人天生喜欢笑，茜茜老是问我笑什么，我不能告诉她的腮帮子大，没颈项，喜剧色彩太浓了。茜茜身边还有两女孩，人漂亮，可好吃懒做。我想把三个都娶过来当偏房，不乱搞，没事就四个人坐在床上打麻将。到那时，我一定问茜茜："一个女人咋能够没脖子？"

老威：你是越活越无聊了。

万人敌：人骨子里都无聊，只不过有人能用理性将无聊感觉硬抗过去，使自己显得有奔头。我的精神一直落魄，大把票子能麻痹器官，但麻痹不了先天的东西。恶棍发了横财，据说在办护照，要投资移民加拿大，到两眼一抹黑的风景区去寻找安全感。他完了，已经开始怕革命，怕马克思的重新分配社会财富了，而我们的大儿童马哥，成了中国最大的伟哥用户。老威，不要硬撑了，还是来给我当写手，图个一时快活。

老威：我很快活。

万人敌：没钱没名，快活个屁。成天扛着根破箫，也没见吹出个名堂。

老威：我活该。

万人敌：好，算我多嘴。今晚喝酒吧？还是老哥们，发书淡季，都磨皮擦痒。我租房的外面，有家湖北餐馆，平常一大堆人都在那儿吃喝，味道太绝了。我的起居习惯还同 80 年代差不多，房内像兵营，躺一片人，臭是臭了点，但气旺财旺。如果有谁带女的来，我马上让铺。

老威：你很少回四川吧？

万人敌：我还是不习惯过家庭生活。老威，晚上狂耍一盘嘛，宋二娃要来赌酒，老子非把他的嚣张气焰压下去。

老威：芒克三天前打过电话，说你与宋二娃已赌过了。

万人敌：还不尽兴。

老威：都脱裤子了。

万人敌：宋二娃就这德性，灌到一定程度就脱，把端菜的小姐吓惨了，他还追出去赔礼道歉。后来，朱胖子把他的裤腿点火烧了一只，他穿上后，还到处找缺了的裤腿。我有 20 多年酒龄，从来没失过态。

老威：芒克说你们在比赛撕票子？

万人敌：都让宋二娃闹的。他骂我是地主，买了房子买车，买了车买楼，买了楼又挖空心思出租吃利息。现在那楼成了豆腐渣工程，利息没吃着反而背包袱，这不是花大钱买大罪受么？真他妈哪壶不开提哪壶，都是钱害的。

于是我们都骂钱，像骂个婊子，我们把钱和婊子的祖宗八十八代都日了。可到头来，还是离不开。我提醒说："文学搞得好好的，说是挣一把票子就赶紧上岸的。"宋二娃马上就接上火："你上我就上。"我火更大："龟孙子不上！"宋二娃说："把票子撕了！"我说："都拿出来摆在桌上！"我发誓我没醉，我一张一张地撕，先撕成两半，然后是四半，然后是八半，直到成了纸渣，我才又撕新的。我真的恨啊，又不晓得恨啥子，这世道，一拳头打出去是空的，但一收回拳头，总觉得一种无形的高压榨得人扁了，晃来晃去，四面八方都有人在监视你，等着你蚀本、垮杆、跳楼的那天，谁会挡你呢？我可能撕了很久，把大家的眼睛都撕绿了，我撕一下骂一声："我叫你贪财！"我起码骂了几百声："我叫你贪财！"宋二娃就没老子儒雅，他三下五除二，乱扯一气。

有一沓捆好的票子太厚了，他龇牙裂嘴地掰，没掰开，就用牙乱咬。狗日的一口钢牙，居然把那沓钱硬生生啃缺一只角，起劲嚼，当饼干吞下去了。我没啥可撕的了，连单据、发票、出书合同都粉碎，我一个念头想出家。最后我拿碗砸手机，被馆子经理抱住。我要捶他，朱胖子一汤盆扣在我头上。宋二娃早撕完了，又钻进桌子底下摸钱渣渣再撕。

老威：没人拦你们？

万人敌：大家都想撕。撕完钱就反上梁山。可笑吧，张嘴又是打家劫舍的文学幻想，唉，本来一只卤鸭子就够吃了，我何必要十

只呢？

老威：一个鸭脚板就够了。而一群鸭子最好永远在天上飞。

万人敌：不可能。今天你只要一个鸭脚板，明天你连一个鸭趾甲也得不到。

老威：为啥？

万人敌：人多鸭少，还是塞进肚皮保险？

59　床下作家汪建辉

采访缘起：汪家两口子都好客，并酷爱写作。记得在孩子出生的前几天，他们的作品产量竟出奇地高，又是小说，又是散文，书评，哲学论文，分明在提前完成定额。

汪建辉在当父亲前创作的最后一篇小说是《我们——集体主义环境下的写作》，于是有了子的名字——汪壹众。“汪壹众”也是汪建辉发表评论文章时用的笔名，这是否在暗示女承父业，或者前赴后继？太悲壮了。

“老汪不出名，上帝就瞎了狗眼。”这是我在 1997 年 12 月 12 日下午，到成都光华村汪家探望时，所发的咒语。楼外冷雨泥泞，30 岁的《成都商报》编辑汪建辉正抱着孩子苦笑。这胖子，使我想起曾住在附近杜甫草堂的瘦子诗人杜甫，穷困潦倒得出名。上帝有狗眼么？

老威：老汪，好久没见面了，心态还好吗？又写了什么小说？

汪建辉：我好几个月没摸笔了，老婆生孩子，房子又小，没法请保姆，我只有自己做保姆。

老威：你会弄饭吗？

汪建辉：除了写作，其它都不算什么学问。饭么，不过就是一瓢水，几把米的事。

老威：这可不能马虎，你老婆坐月子，需要营养。

汪建辉：我老婆一直夸我炒的菜香。

老威：你家的菜可是世界上最难吃的。记得三年前，你邀我来做客，你亲自下厨，弄了一盘四季豆回锅肉和一斗碗猪血鸡蛋汤。四季豆和回锅肉都不太熟，我只好蘸猪血下馒头，一下子就饱了。后来你把四季豆回锅大肉喂狗，那条“卡夫卡”刚吃了几片就开始吐白沫。

汪建辉：你记错了，是“孙悟空”而不是“卡夫卡”。孙悟空

有造反精神，像我老婆；而卡夫卡象我，有文化，有理性，喜欢直坐在沙发上思考问题。

老威：怎么没见它们俩？

汪建辉：送到岳母家了。孩子与狗誓不两立，嫉妒能使动物疯狂。

老威：你买个笼子不就完了？

汪建辉：放在哪儿？你看这屁股大的地盘，双人床只能悬在半空中，以前我俩口子睡觉都得爬上爬下。你见过在床底下写东西的作家吗？几年来，我已趴在床底下写了上百万字。现在，老婆坐月子，不能爬高，就只有把过去供狗思考、散步、锻炼和休息的沙发腾出来当床。

老威：你绝对是世界上第一个在床底下创作的作家。我能在你的床底下打个电话吗？

汪建辉：请吧。

老威：上面怎么还有响动？

汪建辉：我妈昨天刚从安徽乡下赶来，这下我可以松口气了。要不这样熬下去，掉肉很快。

老威：你还是个红光满面的大胖子。

汪建辉：这么多年，我脸上的红光始终不退，走在街上，许多人都会忍不住多看我几眼，议论“那胖子是个有福气的家伙！”算命先生也拉我看相，认定我最近会鸿运当头。于是我就觉得生活有希望，有盼头，整天哼着歌，混了一年又一年，可好事一件也没碰上。

老威：你有孩子了，这不是喜事吗？

汪建辉：对于老婆是喜事，她早就想要孩子，几年没要，她就养了两条狗。可是我，没满 30 岁，还想挽起袖子，拼命写几年，这一下，我的计划又得重新安排。

老威：你的孩子叫什么名儿？

汪建辉：汪壹众。

老威：男孩儿？

汪建辉：女孩儿。

老威：女孩儿怎么取这个名字？

汪建辉：刚怀上就取了，我们俩决定，无论生男生女都用这名字。

老威：你这家伙有点怪。可是从外表又看不出哪点儿怪。你的小说，许多人看不懂，或者根本就看不完。学者李亚东，那么有耐性的人，在家里闭门发毒誓要看完你的《情结人》，可还是以惨败告终。你为什么要写呢？

汪建辉：要读完我的小说是徒劳的，因为它根本没有结束的时候。当然，任何东西在形式上都有结尾，但在精神上，它却是无边无际的。你可以颠过来，倒过去；或者从头到尾，从尾到头；或者从中间向两头读。这种阅读的状态也是我的创作状态。我不会编故事，因为我的记忆力太差，也从不培养自己对日常生活的记忆力。昨天发生的事，今天我就忘得干干净净，我一点不感觉遗憾，因为日常生活总是在无意义地重复，记住你今天还活着就足够了。至于昨天下雨，今天晒太阳，明天还有个女的出车祸，同去年或者前年的同类事也差不多。

老威：这和你在报社工作有关吧？老是和新闻、版面打交道，每天都在重复、消磨生命，你把去年的“新闻”拿到今年，改改时间和地点，登出去，谁也不会发现什么；你把别的报刊文章拿到本报，换换标题，也照用不误。中国大多数记者只有对琐碎事物的记忆。你不认为这种“记忆”是另一种形式的健忘吗？

汪建辉：报纸也是一种消费品，同手纸一样，甚至还不如手纸。我喜欢蹲厕所的时候读报，往往手纸还没用，报就看完了。幸好我是划版编辑，与内容无关。

老威：你也做过读书版的编辑。

汪建辉：原来我怀有雄心壮志，准备大干一番，借读书版提高一下报纸的档次。因为一张 20 版的大报，应该照顾各种胃口的读者，成都也是文化人聚集的都市嘛。可是三个月刚过，我就下课了。

报纸太阳春白雪了不行，比如我好不容易组织了一版评《现代化的陷阱》一书的文章，有副主编马上就在编务会里批评说："太高雅了，好像街上修自行车的都在读《现代化的陷阱》！"

老威：这本书挺热门嘛。

汪建辉：当报纸记者是不用读书的，在报社阅览室，根本就没几本上档次的文化书藉，即使有，大家也不读。大家读报倒很热情，都是功利心挺强的那种读法，看能不能从别的地方搞点东西下来，改头换面混稿费。在报社呆久了会成另一种文盲，还好，我回到了技术岗位。

老威：你绝对是个好编辑，似乎每个内行都在夸你划的版。

汪建辉：一想到要在报社干一辈子，就感到万念俱灰。我一直在梦想，通过写作，成名，并改变目前的环境。但我不能把这种"妄想"在单位内表露，我谦虚、忍让、和大家搞得一团和气，可私下又为自己这种"现实主义"羞愧。梦想和现实的冲突，在每个人身上都存在，只不过有的要强一点，有的要弱一点。我也许要弱一点，小说作为对"弱"的补充，往往体现为一种非常激化的情绪。我多次冥想自杀。我小说的主人公甚至不是具体的人，而象征着与平庸现实的尖锐对立，如《人间的思路》里的路思和路德的尖锐对立。最后，路思死了，我这样写道："路思陷入了黑暗的迷惑中，……他仿佛看到了一幅巨大的棺材。侍女死了，少女死了，爱他的人都死了。而他却仍然活着。……路思张着双臂，迈动着双脚向前走去，脚下空空的，没有任何实体，他感觉身子有些轻飘，象一只展动着双翅的鸟，在飞，一直向天国飞去。"这一段，你还懂吧？

老威：字面是懂了，但我不明白，爱路思的人都死了，他为什么就非要自杀？这世道，谁爱谁？连夫妻都是现实主义结合。

汪建辉：你这畜牲连梦也不做吗？

老威：不做。老汪，你别生气。当然你这么好的人也不会生气。我实在不明白，你是怎样把办报和写作调和起来的？

汪建辉：我一再说，我的记忆力太差。晚上 8 点到凌晨 3 点，我脑子非常清醒，因此工作到 3 点后回家睡到上午 10 点多起床，

做完家务，下午写。头脑清醒的时候是不能写作的，只有当眼前的影物糊涂起来，我才提笔，梦游一般打字。昏沉沉中，只有一个字眼，或者一段话牵着我向深处去，在《情结人》里，“打回敌人老家去”一句在小说里出现了许多次。我写的是战争，也许是关于战争的精神寓言，所以“打回敌人老家去”就成了某种咒语老在笔端回旋。它是不是一句歌词？我不敢肯定，但它与我的童年有关。它是不是一句电影对白，一个命令呢？我也不敢肯定。所以，这篇小说的主人公或许就是这句“打回敌人老家去”。

老威：这是用音乐去结构的小说吧？比如古典的回旋曲或交响乐，主题旋律都要在乐段中反复出现，并烘托出不同的色调对比。

汪建辉：我没有想到这个，但文字肯定是有它自身的节奏的。不瞒你说。我对我的作品也只能整体把握。当我写完之后，再重读全篇，有的细部段落我也陌生。我很羡慕普鲁斯特 30 岁以前享尽荣华富贵，30 岁以后就从上流社会的峰巅跌下来，一个人密封在活棺材里创作不朽名著，在追忆逝水年华中，他甚至对阳光和新鲜空气过敏。

老威：你以为你达到了普鲁斯特小说的纯度吗？

汪建辉：你的语气有点不对头。我很着重一个人的说话语气，它能反映人的社会角色。

老威：你还没有回答问题。

汪建辉：你这个问题本身就是陷阱，我回答“是”或“不是”都愚蠢。

老威：蠢就蠢点嘛，你正是因为不太聪明才有比较多的朋友。老汪，你经常向国内外杂志投稿吧？命中率高不高？

汪建辉：我基本是在文学圈以外，所以命中率极低。我研究过几家大杂志，它们似乎都有自己固定的作者群，新人不经过操作，就要凭空挤进去，不太可能。

老威：我觉得你的小说很先锋，从句式、行文到表达的意思，应该比格非、孙甘露、朱文、韩东他们高出一筹。有段时间，杂志上费解的东西不少，就探索的意义，你应该占一席之地。

汪建辉：《大家》主编李巍也曾这么认为，前不久，他们给我寄了 20 本《大家》，同时寄来一封热情洋溢的铅印约稿信。这信大概是遍寄给全国各地主力作者的。不过，其中的意思我不太明白。

老威：难道还有比你的小说更不明白的东西？

汪建辉：我读一段你听听："我们所设想的一种新的文体，正是建立在这些探索的基础上。它汲取现代语言学和语言哲学及在其影响下发展的文化学、人类学、现代历史学、现代美学等等学科的认识方法和'解读'模式；以诗性的、富于色彩的语言，广泛、自由地运用小说的描写与叙述、散文的铺陈，诗的直觉、理性与穿透力、批评的分析……，一切文学创作，批评的技巧与法则，乃至种种非文学话语的因素；广泛运用包括各门自然科学的一切学科领域的成果；以文学趣味和文学审美价值为核心，同时尽可能多地包容各种语言功能；它是开放的、多向度的、风格多样的，具有极自由的结构——横向、纵向的切入和点、线、面的任意展开以及多重交织的可能——因而也是最具创造性空间又最具冒险性的文体；它关注各种"形而下"的事物，同时直面存在。'以先锋派的技巧处理日常的知识'。它是诚实的具体的有用的（王尔德：文学是无用的。）并因此是更具诗性的。它吸取了多媒体的……"

老威：行啦，打住吧。这"文告"像一只有学问的乌鸦起草的，我耳内一片呱呱呱。《大家》鼓励的先锋实验的第一份产品大概就是这封约稿信吧，你应该好好存放，将来卖给《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

汪建辉：你别太损了。其实李巍挺热情，我把一篇小说寄给他不久，就给他家里打电话，他在那边回答："小说已读了，很有创新，虽然我不敢判断这种大胆的实验是成功还是失败，但是，我会和有关的同志交换读后感。你放心吧。我已决定重点推出你的作品。"我当时欣喜若狂，马上奔走相告了几位好友。大伙嚷着要请客，我也就万分陶醉地与众友先吃为快。我像过蜜月一般傻等了好些时候，还不见刊物和稿费寄来，就到街上书报亭去翻看《大家》，里面没有我的作品。我想，可能是下期，熬到下期，还是没有！我仍存了

一线希望，可能是下下期。老婆提醒我：要不要打个电话问问？于是我将听筒拿起来，但号刚拨到一半，又放下了。文人毕竟有面子啊，这样显得功利心太重了。可不打电话，功利心更重。作品是文人的命根子，李巍经常与作家打交道，说不定比我更性急的人他也能理解。我还找精通《周易》的占卜专业户李疯子打了一卦，得“未济”，爻辞大意是“小狐狸过河，打湿了尾巴。”李疯子连连摇头，急得我扳住他脑壳，不准摇，我说：“虽然打湿了尾巴，有点挫折，但毕竟过了河嘛。”……就这样，我自相矛盾地又磨了一个月，心情由过蜜月一般的新郎官蜕变成守空房的旧寡妇，终于，我按捺不住，打了个电话，李巍正好在家。主编大人热情如昔，但他显然忘了自己竭力称赞过的那篇小说。他替我着急说：“我真的没收到！如果我收到的话，我肯定会马上给你回音的！向……”我以为他要说“向毛主席保证”，可他说的是：“向邮局讨个说法，一定！怎么能这样不负责？太可惜了，小汪，您别着急，您有底稿吧，复印一份再寄给我，我保证……”

老威：老汪，原谅我，这种故事其实挺心酸的，然而我还是忍不住笑。你别往心里去。

汪建辉：世上竟有比我更健忘的人，一点脾气也没有。一个作家曾说过，健忘使人类充满开拓未来，向往新生活的勃勃生机。哪怕发生大灾难，人类死掉百分之九十九，剩下的百分之一在掩埋了同志的尸体，清理完废墟后，照样在明媚的阳光下，吃喝玩乐，勾心斗角地活下去，繁衍下去——记忆和健忘都既是人的优点又是人的缺陷，世界因此而丰富多彩。

老威：你的确想得开，至少比你小说里的人物想得开。

汪建辉：他们都死了，我却活着。

老威：你当然要活着，你还要等女儿长大，把她培养成一个哲学家。“汪壹众”的意思就是她一个人面对群众，这是领袖还是哲学家？

汪建辉：听你这话，我的心里有点凉。

老威：我也凉。那就翻盘影碟出来看。就是上次那盘演南斯拉

夫波黑内战的。其中有个是铁托同志的战友，已在地下兵工厂里造了 40 多年枪炮，90 年代钻到地面来，还在喊“打倒法西斯！”我觉得他有点象你，披头、大圆脸、红光满面。区别是他造枪炮，你造小说。

60　余秋雨读者王多元

采访缘起：王多元先生隐于闹世，同许多传统的成都人一样，有坐茶馆、睡懒觉的嗜好。我搞不清他到底以什么维生，只觉得此翁言谈举止之间，有一股颇为荒唐的忧愤之气。

老王在余秋雨初出茅庐之时，曾预言“此戏子必然红遍海峡两岸”，我不以为然。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日，澳门回归，大名人余教授继续在外游山玩水，兼思想问题，我却在阵阵穿堂风中，与王多元鬼混于白果林附近的烂茶馆。众茶客抗不住寒，早散了，四十多岁的王二杆子却于凉椅之上，脱袜亮出香港脚，边搓边接受我的访问，丝毫没有瑟缩之态，足见其文化内劲充沛。

脚是臭的，话还是香的，虽然话中挟裹着毒刺。我迄今认为，让高人王多元来批余秋雨，有点浪费资源，但世纪末的文坛如斯，只好委屈他了。

老威：余秋雨是戏子？你批得太过分了，已超出学术争论的范围。我觉得，你应该好好检点自己的心态，别瞅着人家出了大名，就一肚子火。

王多元：我就一肚子火，咋样？其实你对余秋雨也一肚子火，可你小子虚伪，不敢发出来，这样憋久了，就会变态。不，我不是指生理，而是指文化上、精神上。中国知识分子习惯于憋，明明心怀不满已到破口大骂的份，偏偏先要挤出外交家的客套笑脸，然后咬文嚼字地偷袭对方，以博取智者的美名。

老威：你这是文革遗风，那时候，大字报、大辩论，大伙都不憋，结果就打派仗。

王多元：文革爆发的社会原因恰恰是群众憋过了头。罢了，我不与你讨论文革，我想强调，只有余秋雨这样的戏子才不憋，才在任何时代条件下部活得如鱼得水。据说七零年代，他非常活跃地跻身于四人帮在上海的理论写作班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摇旗呐喊，效了犬马之劳；而八零年代，他不露痕迹地摇身一变为中国文化史学者，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入载英国剑桥的《世界名人录》；到了九零年代，他在巴金先生主编的《收获》杂志上开“文化苦旅”专栏，一炮而红，至今如日中天，被媒体炒作为“余秋雨现象”。据我所知，在长达三十年的截然不同的历史环境下，都能立于不败之地的文化角色，属凤毛麟角。按传统的说法，余秋雨是开了天眼的，他知道怎样利用天时地利人和，使自己永远处于醒目的位置。京戏名角出场时，都先在聚光灯下摆个姿式谓之亮相，以吸引观众的注意。余秋雨身为上海戏剧学院院长和教授，其妻又是黄梅戏的名角，当然对舞台效果有非常独到和精深的研究。

老威：他的职业、家庭与文章有啥关系呢？况且，你不能用揭老底的方式损人。你想想，在八亿人民八个戏的文化专制年代，有表达个人思想的空间么？我主编过《沉沦的圣殿》，采访过不少七零年代地下文学的写作和传播者，固然可歌可泣，但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冒险方式，你不能强求人人都去冒险、去反叛，那就太不民主了。文化人要活得不那么窝囊，必须融入他所处的时代，成为一块煤、一把铲子，一部大合唱中的帮腔。你要余秋雨怎么办？能够被吸收进钦定的左派写作班子，在那时是多高的一种荣誉！不仅文人羡慕，连全国人民都眼红！

王多元：他的个性在哪儿呢？

老威：没个性，“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嘛。

王多元：戏子的最高境界就是无个性。性格演员就是演啥像啥。梅兰芳创立了梅派京戏，他最拿手的是《霸王别姬》，这是个艺术形象，与现实中的梅兰芳毫无关系。舞台上的虞姬美艳绝伦，在丈夫兵败，穷途末路时，边舞剑边与霸王合歌：“力拔山兮气盖世”，尔后挥泪自刎殉情；现实中的梅兰芳却从没动过自杀的念头，他在新旧社会都是个极有影响的名角，与达官贵人为伍，盛宴华堂，红透大江南北。舞台的悲剧为他奠定了现实中的喜剧基础。余秋雨是散文世界里的“梅派传人”，在他九零年代的代表作《文化苦旅》

开篇的（道士塔）里，有如下的台词：

“这是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王道士只是这出悲剧中错步上前的小丑。一位年轻诗人写道，那天傍晚，当冒险家斯坦因装满箱子的一队牛车正要启程，他回头看了一眼西天凄艳的晚霞，那里，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滴血。”

这不是叙事散文，而是一段正气凛然的戏剧朗诵，一个身着中山装的声音洪亮的演员，指着舞台深处的历史布景控诉道。我们的读者最受不了的就是这个，他们被一股源自历史腹心的虚无的爱国情绪所牢牢控制，他们被煽起来了。而在此之前，每年都有数以百万计的游客到敦煌游览，留连忘返，莫高窟四周都是浩大的戈壁，日出日落，似乎只有我们的余教授从凄艳的晚霞中，看到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流血。——这就是《文化苦旅》命名的真意所在了。

在文化风景名胜地，普通人玩就玩了，而背着文化十字架的“苦旅者”却望着沙漠沉思。他戴着金丝眼镜，面色红润，是个善于保养的江浙人。中国一半以上的巨商出在江浙一带，而蔑视金钱的余教授内心起伏澎湃，他进入了角色，在大自然的戏台上，整个民族的伤口通过他的笔尖淌出鲜血。

写进书里的演出是永恒的，还有什么比这更过瘾？时光不可能倒流，于是，近百年前的那个靠乞讨维生的文盲王道士被名教授余秋雨钉在审判席上，永世不得翻身了。这是剧情的需要，在文化英雄的脚下，肯定匍伏着败类。然而，假如处在同一种生存环境中，余教授和崇拜他的读者们，会做得比王道士更好么？那时没有大学，连小学也不普及，莫高窟周围几十里外才有人烟，同伴们都逃光了，只有王道士凭着单纯的信仰，守着破庙，饥寒交迫地捱日子。一个饿得发疯、寂寞得要吃人的老道士，你凭什么要他守注偶然发现的整个民族的宝藏？

老威：中国传统注重气节，总不能为了填肚子就啥都卖吧？

王多元：填肚子是为了活下去，只要活着，就有许多事可做，我觉得余秋雨没有资格拿王道士开刀，在文革中，他并未出现生存危机，只是为了出人头地，就可以投靠那样无耻的写作班底，以此

类推，一旦真要命，他啥不卖？中国被廉价收购的何止一个敦煌？八国联军打进来，慈禧老佛爷屁颠屁颠西逃，连北京城都白留给人家了。被余秋雨的戏文煽起来的广大读者们，谁有资格谴责王道士？在敦煌劫难前后几十年中，比这可怕百倍的悲剧一个接一个，这难道与我们的祖先、祖先的祖先没有关系？我们的血管里淌着怎样卑贱的液体！八年抗战，做伪军的起码几百万；反右，文革分派，互相揭发、同室操戈的起码几千万，为什么至今就没有汉奸学、反右学、文革学，三年自然灾害学？一个习惯于遗忘的民族终于通过文化市场选出余秋雨这么一个煽情代表，他满面热泪地诉说，本来属于我们自己的世界最伟大的宝藏被外国人抢走了，记住这耻辱呀！

老威：八十年代，我读过作家方方的一篇小说，讲的是一个与普通人无异的患者，越远的事，他记得越清楚，越近反到越糊涂，身边的事简直漠然不知。这可以作为余秋雨《文化苦旅》系列的另一种导读指南。

王多元：不对，余教授对身边的事应该了如指掌，否则戏演给谁看？

老威：余秋雨以著名学府院长的身份，国内外八方游览风景名胜，所到之处，恐怕都有上档次的接待，快活死了！还吹自己在“文化苦旅”呢。不晓得他的差旅费报不报销？按国内一般老百姓的平均收入，一年出省旅游一次都很勉强，更别提连续跑多处风景区。要是大伙都效法余教授去“苦旅”，只有借助公费。反正花国家的。

王多元：现代人比古代人胖个二、三十斤属于正常。余教授的“苦旅”有减肥的功效也不错。

老威：那中国的权威文学杂志《收获》也有减肥的冲动么？它为余秋雨开了近两年的专栏。

王多元：《收获》编辑们的市场感觉挺棒，但余文的轰动不仅仅是炒作的成功，在这种现象背后，还是有普遍的种族潜意识。几十年来，我们的国家靠政治运动旋转，在运动中，人人都是演员，先是被动的演员，后来就响应号召主动出击了，因为这样才能保证立场鲜明，不滑到敌人那边去。余秋雨的成功在于他无意间投合了

这种运动造就的集体表演欲，那种熟悉的民族主义语码能够将任何一个初中以上文化程度者导向一种幻觉，换句话说，多数读者通过余文的字正腔圆，接受了催眠的训练，开始某种心理表演——这同《中国可以说不》的戏剧化效果是一样的，民族感情成了可以被二渠道书商所操作，并赚取上千万利润的东西。

文化产品最基本的要素是语言，而《收获》在开余秋雨专栏的时候，首先考虑的却是引导社会或文化倾向的意义，戏子的骗术在文化的腹心开场，知识分子的现实责任感、良知以及对真实的承受力，部在相同的旗号下被瓦解了。—— 一切都可以是谎话，只有语言是骗不了人的，当一个暴君用武断的语气来谈民主、自由和博爱时，民主本身就成了他的手段，他暗伏着杀机的恩赐，而余教授的语言是否为这种互否传统的延续呢？

加勒比海诗人沃尔科特说："你要改变你的语言，首先得改变你的生活。"文革结束——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我们的物质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精神生活呢？文化传统呢？是否就由《收获》、《读书》及余秋雨、金庸这样一些传媒化的现象来决定？那种专制的、戏剧的、夸大的、迎合集体的语言已成为深入骨髓的习惯，不经过脱胎换骨的煎熬，余秋雨不可能改变，这个名扬四海的"学者"还不会说话，说另一种真实的、客观的、个人的，准确描述事物的话，一种知识分子观察这个时代的行话。

老威：你对说话的要求已达到相当的高度，以这个标准，九十年代的热点人物差不多是文盲。我记得两年前，北京大学的某个新锐教授曾发起评选本世纪十大中国作家的活动，金庸竟名录第四。这也许代表了世纪末群众对文化的某种生理要求。与此相关的看法是"批评失语的九十年代"，你认为呢？

王多元：我对读者和批评家的低能有思想准备，而对北京大学烂到如此地步却茫然失措。直到读了余秋雨的《苏东坡的突围》，才感到市场和平庸是这十年的主要特征，北京大学也不能突围。

老威：《苏东坡的突围》影响相当大，我想听听你的看法。

王多元：这是《文化苦旅》续篇《山居笔记》中的代表作，按

通常的炒作方式，也在《收获》连载过，据作者自己说，反响更加强烈。此文评述了宋朝诗人苏东坡因遭受在朝小人们的诬陷，下了“乌台诗狱”，受尽灵与肉的折磨，终被流放到湖北黄州的经历。这段著名的历史，曾是古今中国文人们用之不竭的作品素材，借古讽今者有之，借古引出个人命运者更有之，而玩味苏东坡，把诗人的才智与苦难转换成一种解乏闲话的，更大有人在。而余教授另辟蹊径，称苏氏的黄州流放为“一次永载史册的文化突围。黄州，注定要与这位伤痕累累的突围者进行一场继往开来的对话。”

每当读到这种从历史苦难中升华出来的豪言壮语，我都忍不住笑，类似的台词还有：“长途押解，播如一路示众，可惜当时几乎没有什么传播媒介，沿途百姓不认识这就是苏东坡。贫瘠愚昧的国土上，绳子捆扎着一个世界级的伟大诗人，一步步行进。苏东坡在示众，整个民族在丢人。”

是皇帝要流放诗人，是苏东坡政敌要治他的罪，与整个民族有何关系？民族、朝廷、百姓本来就不是一回事。写《神曲》的但丁被他的政敌流放到异国十四年，我们不能说意大利丢了十四年的人吧？楚怀王流放了屈原，难道楚国的老百姓都是昏君的后盾？朝廷本是一言堂，每做决定，无论好坏，都不会公民投票，况且，愚昧也是一种人权，饥寒交迫的百姓有权利不认识诗人苏东坡，有权利不买“世界级伟大诗人”的账，因为诗人的级别是由余教授这种闲适的上等人定的，而老百姓只认政绩，只认太守苏轼是否好官，订了哪些繁荣经济的条款。

余教授生于一九四六年，写《苏东坡的突围》时约四十七岁左右，而苏轼流放黄州时，恰为四十四岁至四十八岁，这是暗示还是巧合？余教授说，《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等千古杰作马上就要产生，把读者们搞得蹦蹦心跳，以为余教授就是苏东坡再世了——古与今，两个时而混淆、时而分开的影子在自省，在受难中大彻大悟，今人在绑古人的票，并且不由分说，蒙冤受辱的苏东坡的确让戏子余秋雨提高了境界，并藉此狠赚一笔。余秋雨是在香港中文大学的山间居舍创作此文的，这也是一种很摩登的精神流放，坐飞机从上海流放到香港专事写作，安静是有了，寂寞也来了，只

有窗外翻卷的海潮做伴。环境如此幽雅的大宅子，在寸土寸金的香港，少说也值几千万港元。余教授苦旅至此，又按到台北《中国时报》打来的越洋采访电话，谈到《文化苦旅》在岛上行情看涨，幸福得精神越发孤独了。此时，苏东坡来了，成了电话热线里的佐料，把两岸男女情感胃口调得越发一致，余教授写道："心里立即替苏东坡高兴，他的作品是中国文人的通用电码，一点就着，哪怕是半山深夜，海山阻隔，素昧平生。"

苏东坡当然高兴，因为他能替一千多年后的余教授拉拢记者小姐，是通用电码，是不用付工资的公关部经理。接着，还要做导游，带余教授去黄州流放，最后被逼着突围。这种武断地对待古人、古事的行文风格，得益于文革的培养，令人想起批林批孔批《水浒》的往事。《苏东坡的突围》是一篇不伦不类的戏文，它在一批幸福得苦难起来的文人中引起共鸣，游山玩水是苦旅，住在风景区里创作是流放；海鲜撑坏了肚子令人"乡关何处"，如果一个深夜长屁引起脱肛呢，会不会又是时间老人的叹息加祖国在危急中？

在《山居笔记》的"台湾版后记"中，余教授终于有了一次实质性的"苦旅"，他要到台湾去访问，却因手续繁琐滞留在香港，他写道："车水马龙间，我比匍匐在泰山绝顶、塞北荒原还要艰难，这次几乎把我耗到了生命尽头的攀援是以这样的对话结束的。"

唉，上等人的灾难呵，要去彼岸名利场搏击，却因区区手续问题陷入绝境！这样赫赫有名的作家，在国内至少市长级待遇，为啥就没有个跟班或机构代办手续？太不叫话，让人才这样受累，人家又不可能把"名人"二字刻在脑门上！

老威：他妈这种绝境我愿遭遇一百次！

王多元：没出息。人家还是绝处逢生，去了台湾，把两岸"三通"的紧迫感留给我们。

老威：今天你把余秋雨砍得血淋淋的，痛快。你就等着教授先生接招，或者打官司吧。

王多元：公众人物占尽名利，皮厚脸黑，应该有对打击的承受力。每个公民都有对社会道德形象质疑的权利，所以，余秋雨只是

个代码，我揭露的是这个代码背后的伪道德传统。戏子怎么啦？做戏又不算坏事。在超时空的法庭上，余秋雨是古人古事的公诉人，我是律师。可惜我是无名鼠辈，精彩的辩护段子没人愿听。

61　盲流艺人王六顺

采访缘起：王六顺，按民间的说法，这是取“六六大顺”的意思，32 岁，大庆人氏。此公喜欢挎一相机，在京城文化艺术圈中穿梭，天长日久的熏陶，使之成为一个上不去下不来的人物。

王六顺照了许多上好的人头，其中的神品，第一数我，第二数老周。影像本是虚幻之物，但老王的确用这虚幻之物搞得我俩兴奋莫名，平添了几分自恋。

王六顺好激动，说话经常不上档次，但嗓门亮，能把一首首烂歌唱得情意绵绵，像石油里泡出来的校园歌手。只有在我这把箫的引诱下，他方露出叫驴本色，令听众猛吃一惊。我也猛吃一惊，原来我竟同一头驴子厮混了个把月！

2001 年开春，我在京逗留月余，其间亲密接触了无数思想精英，可文化水平却在直线下降。3 月 24 日午后，离京前夕，与王六顺等人共谋录制《喊魂》，方恍然明白什么是“自恋使人愚蠢”。王六顺，亲爱的盲流，鸦片烟，马屁精，不学无术，乱插嘴的鹅，让我变成蠢货的就是你吗？

老威：你又喝高了。

王六顺：我就半杯啤酒的量，今天为了和你做《喊魂》，豁出去灌了一两多二锅头。这劳动人民的酒劲大，一下子就把我撂倒了，再被你的箫声一勾，我差点吐。

老威：你是一半喊魂，一半喊酒。

王六顺：还有一半叫老娘，整个身体烂泥一样往下淌，受不了。这是一种气场，你一唤“顺”，我满头满脸轰隆一下就湿了，不知是汗还是泪。你看咱王六顺多崇高，都这样了，还绷起一根筋做艺术。我是扛到最后才失去知觉的，你呢？

老威：我多坚持了半个钟头，弄另外一段。都成行尸走肉了，老梁还不断用鼓、用琴刺激我，赵的声音也越来越响，我不知道我

与她的声音纠缠了多久，总之，我在现场睡着了，箫还抵着嘴唇，一副挺敬业的外表。

王六顺：我俩都沾酒醉。

老威：别把我和你扯在一块。魂喊成这样，怪酒没用，还是挖挖自己的思想根源：浅薄、滥情、文化低，就凭一幅天生的驴嗓子在世上混。

王六顺：我浅薄？！我文化低？！咱老王好歹做过文化局的干部，哪像你，考四次大学都落榜，第五次走后门，靠姐们推荐去上了，还被开除。嘿，甭以为出了一厚本《底层》就成他妈的学者了。这几天，我借捧场之机，早把你的底牌摸清：

骰子摇来摇去，响动再大也不过幺二三，气粗个啥呀？

老威：你与赌徒老周勾结紧密，当然把我的点子摸清了，现在轮到我摸你的。

王六顺：你随便摸。

老威：不敢。先从这张旧照下手吧。

王六顺：这是离开大庆时拍的，不算旧照，翻黄效果是我有意弄的，咋样，历史一下子就倒退迷了吧？这条铁路，还是王铁人时代建的，如今成了文物，枕木都长青苔了。那天傍晚，我拎个相机打这儿路过，麻雀在肩头飞，突然，荒凉中冒出个道岔工，蓝帽子、蓝工装、解放牌胶鞋，手提马灯，像王铁人他家的农村亲戚。嘿，闹鬼了，我双眼一亮，觉得历史转折的重大关头降临，于是花言巧语换下这老哥的时装，穿戴登场——一幅不朽之作刹那诞生了，吓人一大跳吧，老威？

老威：不错，土得好，连放屁都充满油泥味。

王六顺：马灯，憨笑，大肉脸，是不是老王家亲戚？

老威：不是，倒像刚学会腐败的村干部。如果你将来出摄影集，我建议用这张伪旧照做封面，配上小黑字："我要沿着这条铁路走下去，到省城，到北京，到红太阳升起的地方。我天黑不住店，刮风不躲闪，我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马灯。"

王六顺：这话不腐败，不过，就这么定。咱到京城来，就是为了活出人味儿，所以无论咋的都不能沿着这铁路再走回去，我讨厌石油，伊拉克、拉登、阿富汗，中东石油里面出暴君。

老威：家里人呢？

王六顺：老婆离了，就剩儿子让我牵挂，没办法，自由和家庭如同忠孝，不能两全。

老威：外面的人对大庆的了解，至今仍是铁人王进喜的豪言壮语："石油工人一声吼，大地也要抖三抖。"我上小学时，课本上就有这两句。后来时过境迁，这面工业战线的红旗同革命时期的许多文物一样，眨眼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对于今日的新新人类，大庆同外国差不多。

王六顺：那我是外国人？

老威：毛和邓，还有现在的江，一朝天子一朝臣吧，几十年一过，给人的感觉还不如美国、俄国、欧洲近。听你的口气，还是有点恋旧？

王六顺：王铁人有两张风靡一时的照片，一张是井架上操杆的工作照，工装、鸭舌帽，标准的工人阶级当家做主的自豪微笑，四人帮，或者反四人帮的一部文革后期电影，名字我忘了，就是根据这张照片进行主角造型的；还有一张是老王在大冷天赤手空拳跳下被冻住的泥浆坑，拼老命浑搅。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因此带动了无数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朝下跳，据说这是为赶时间出油献礼……感人么？不瞒你，咱老六就是在类似一个接一个的感人场面里长大成人的。成人的标志是啥呢？是用自己的脑子，而不是国家的脑子想问题，所以，那个时代大庆人也同全国人民一样，都住在简陋的幼儿园里，性功能是成熟了，会生儿育女了，但还跟孩子似的，被政治的阿姨一逗一吓，不是哭就是笑。我对摄影的兴趣肯定与王铁人的照片有关，那时照相机太珍贵，平常百姓家遇上太重大的事，诸如结婚、祝寿、老友重逢、全家福大团圆等，才盛装上相馆来一张纪念。我想铁人家再有名，也不至于配相机，钻井队更不可能在干活儿时捧个相机，直到惊天动地的一瞬间，咔嚓。那么照片咋出

的？肯定就是采访记者领了树典型的任务下去，经过精心设计拍摄的。包括大寨陈永贵，老农民当副总理，他的发迹也靠记者拍的剧照，高举锄头修梯田，缠头毛巾和土袄都是新崭崭的，谁敢怀疑他们的表演？反革命。老威，出门造个坑朝下跳吧，多蹦达几回，我的王铁人就是你了。

老威：我愿意做你的戏子，反正我最好的照片是你拍的。

王六顺：我不搞造型，我的长处是抓拍。

老威：你抓拍男人，对女人嘛，你专攻造型。这墙上，侧着身子的，戴苏联红军帽的，脸藏在竹帘后的。扬下巴的这张挺别扭，你费了不少苦心去掰她的脸吧？

王六顺：像册里还有，上不了像册的，就全堆在床下，要饱眼福，你一天一夜翻不完，天下女人都好这壶。

老威：这种造型照，影楼水平吧，高一点，奶油小生肖全的水平。你的才华不在这儿，老王。一个色迷迷的死憋的单身汉，见着文化女性，眼睛里都喷火，自然影响审美。如果进一步引诱上床，恐怕连审美期待也没有了。

王六顺：咋话题越来越下流，老威同志？告诉你，我对摄影是非常严肃的，那是一种特高级的境界。

老威：太自恋了吧。

王六顺：还是这语气！当然我马上驳不倒你，这屋里的女人照不够震撼，但我经历过震撼，你信不信？

老威：你记录了么？

王六顺：记录了，但没留下来。有次拍一位摇滚女孩，浅黑色的皮肤，卷毛，据说是从青海大草原来的，崇拜诗人昌耀。第一次见面我就被镇住了，她即兴摇滚了两首昌耀的诗，其中有“我们的婆母依旧要腌制过冬的咸菜，我们的胎儿依旧要在血光中临盆”之类。

老威：这是昌耀的早期作品，晚期更耀更精彩些……。

王六顺：当然，晚期他得癌，不愿窝囊地死去，就跳楼自杀了，

这比任何诗都精彩。老一辈的中国文人，最讲究逆来顺受，很少这么有尊严的。那女孩人不大，开口就唱这个，我能不对她产生好感吗？哪怕她不会王洛宾，不会青海的《花儿》也不碍事，艺术这东西，就一种感觉，我想都没多想，就为她拍了很多张照片。我的手快，没找到感觉时，就喜欢机械地按快门，照片不能修改，不像油画。当然好的油画也不能修改，这就是说，艺术是浪费出来的。我拎一像机到北京，就是打定主意浪费来了，哪天把过去积蓄的老本挥霍光，我就成名了。我知道这女孩身上能出好东西，没被污染的东西，但要快，抓紧时机，赶在她成名成家之前。一旦她学会跟风媚俗，挑逗大众，就不值几个钱了。我不是她情夫，虽然关系偶尔暧昧，也不能昼夜把镜头瞄准这种变数很大的货色。

老威：别绕弯儿，你和她咋了？

王六顺：拍照片。有家时尚杂志的美编盯上了她，对于边远地区来闯天下的女孩，这可是绽露头角的良机。她借了很多套花花绿绿的时装，自己找个背静的公园，有水有树有假山的那种地方约我。艳阳高照，还有啥说的，高一张低一张地浪费呗。

拍了一上午，没有兴奋点，她载歌载舞地挺开朗，我却越来越压抑，为了避免不欢而散，我提议就地用午餐。我边啃面包边盯她，他妈的，这脸描得太花了，你演给谁看呢？你干吗要用衣服一层又一层地包裹自己呢？！连腿都弄得香喷喷的，像商店里卖的假腿，没一点肉味！这就是模特，还没嘴里的面包有味道。我肚子里就这样骂了一阵，突然来了情绪，一把将她抡起来，二话不说就拍。我像一头狼，一会儿扯掉她的袖子、裤腿，一会儿扒下她的衣领，“露一点！再露一点！”我大呼小叫，“肩头，半边奶！”她还没反应，我又扑过去撕衣服，“别动，我要干了！”这就叫“状态”，老兄。我在她身上耗了多少胶卷，等的就是这最后一卷，相当于最后的晚餐。我神了，被钉上十字架了。“他妈的绝对封面！”我边拍边吼，神经末稍一颤，下面就出湿漉漉的感觉。“绝对封面！”我起码叫了几百声“绝对封面”，从镜头里射出的那股气，那股精，绝对把女孩也搞兴奋了，她哪见过这种抢劫风格的摄影。于是我俩很配合，后来不用我动手，她自己就做动作、扒衣服，还哎哎地叫。她的每

一步都恰到好处，都美到荒诞的地步。游人全被我们惊动了，先是一个几个，后来我充血的眼里黑压压一片，保安也来了，警察也来了，警察的帽子后头，练气功的老头老太太在收拾家伙，准备逃跑，这一切，全都进入了我的视线，成了背景。我疯狂地按快门，在假山上下跑，俯冲着拍，冲锋着拍，驴打滚、跪、躺、单臂前伸、撩开裙子朝上、脚丫子遮镜头、入裆……我做了无数惊险动作，按了几百下快门还止不住，女孩都累瘫在草地上，一动不动了，我还在抽风，直到一根变形的捅破天的大警棍横在眼前，我还叫："绝对封面！"我抠开后盖，哗地一声拉出胶卷，举在头顶看效果，耳边却炸一声惊叫："王六顺！你干啥呢？！"我愣住了，但已晚了。这是一场谋杀，"绝对封面"毁于一旦，特别是隔在镜头和女孩之间的警棍，弄不好，要进入摄影史。完了，周围被我们刺激起来的人民群众，执意请我们去派出所的保安和警察，完了；还有不干白不干的封面女孩和单身汉王六顺，全完了。

老威：精彩精彩。

王六顺：关键时刻我咋就早泄哩？

老威：泄得好，这一泄，把摄影史刷新了。你想想，世界上一流照片多如牛毛，每张后面似乎都藏有煽情故事，你这一张，全盖，就一曝光的胶卷与传说中的抽风摄影师。

王六顺：京城名嘴冯小哲也这么说。但我不可能扛一废胶卷到处参展，并在展出现场重复一百遍这故事吧？

老威：俗。你刚才还超越常识呢，一泡尿又落入俗套了。

王六顺：客气啦！这是艺术家鑫的口头禅，好事坏事全"客气啦"，命中注定留不下传世之作，也客气啦。寻我的开心，老威？太客气啦。

老威：我的确开心。还有啥更客气的事？

王六顺：没有。

老威：鑫揭发你拍过法轮功。

王六顺：我还拍过李洪志，你信不信？

老威：无风不起浪嘛。

王六顺：那天没风，但也起了大浪，怪谁呢？孩子和她姥姥从大庆来，嚷着要瞻仰天安门，我只好陪着去。天气真好，我挎着相机，给孩子和她姥姥拍照。背景都是最大众化的，天安门城楼、纪念碑、人民大会堂，从文革到现在，几辈人都兴这么拍，我也翻不出啥新来，只要她们高兴就行。其实我知道，自从李洪志在海外发表《忍无可忍》的元旦文告之后，广场特别敏感，坐出租车，司机也会告诉你，别在那儿停留太久，更别东瞅西溜，手也尽量别朝怀里伸，当心出事。特别是我这种长相不伦不类的东西，一出场就引人注目，我来北京这么久，一直回避那地方，太革命太历史太传奇太他妈的客气啦……。

老威：据说广场上平均四块地砖就站一个警察？

王六顺：我当时没看出来，我只顾享受天伦之乐。因为是周末下午，人还不少，孩子摆姿势摆疯了，我呢，完全被她牵着鼻子跑。唉，我要是永远被她牵着，那天就不会出事了，可偏偏在我拍女儿的时候，镜头里嵌进“法轮大法”四个字。我抬起头，前方喧闹起来，人头像从地砖里拱出，层层朝纪念碑方向涌动。我分明看见有人奋力高举“法轮大法”、“最后圆满”两条横幅，我的肩头被从四面八方扑过去的便衣撞了很多次。我突然一哆嗦，不由自主地向前钻。我已听不见女儿的惊叫，她姥姥拉扯我，我一下子就甩开她了，两眼发直地猛跑。我人高腿长，刹时就超前冲到离法轮功几米远，警察吹哨，呼喊，挥警棍，人们抱头鼠窜，我却与他们逆向而进。我已经不是老六，如果是现在坐你面前的正常的老六，肯定挟起女儿，再拽上她姥姥就逃。我他妈太不负责了，端着像机，像扫射子弹一样嚓嚓嚓地拍，我伸、拉、全景、特写，变换着角度，嘴里还念念有词：“绝对历史！他妈的，绝对时代！”嘿，老威，来电了，我的心就在像机里，嘣嘣嘣的，那阳光，哗！一下来一大片！太时代了，那光像绸子一样，一闪一闪的，警察在我的镜头里抓法轮功，有个老太太跌下地，还爬起来笑，警察拦腰一抱她就走了。“法轮大法”的横幅躺在地下，被践踏着，还有钢盔，在镜头里像玳瑁，一束光打下来，那来自宇宙的力度！关键的几秒钟，人的一生，有

时就这几秒钟管用，没文化，没思考，咱老六来电了，干！

老威：我都听得来电了，一鸣惊人啊。

你也忘了故事发生在啥地方？说来话长，我当时的高烧也就发了几秒钟。刚拍完一卷，还没盖镜头，斜刺里就杀出三位便衣，为首的一个一把擒住我的手腕，厉声喝令："交出来！"我又一哆嗦，这回不是来电，而是被吓的。四周全是警察，十几个法轮功分子已被拽往不远处的大面包车。"你交不交？！"便衣又吼，那声音太狠，你我这种人从来想象不出那种狠法。我瘫了，急忙认罪："我错了，我拉胶卷……""不是胶卷，是像机！拿过来！"他们开抢。我只好拱手相送。那可是七千多块钱啊，有啥法子？宁愿钱吃亏，不愿人遭罪嘛。我以为交出像机就没事了。"跟我们走。"警察又命令。

老威：你关了几天？

王六顺：我溜了。

老威：在便衣的眼皮底？你可真有两下。

王六顺：警察架着我没走几步，身后又骚动了，"法轮功在那儿！"有几个声音同时喊。警察们立即丢下我，扭身去抓新一轮敌人，我随着惯性一回头，卫士们已同几个老弱病残者斗成一团。又一辆警车开过来，法轮功被押上去，其中一位还突然转体，正面向外，对大家挥手致意。"这镜头太有价值了，"我想，"可惜没法拍了。"这时孩子她们找来了，"还不快跑。"她姥姥说，我才彻底清醒过来，溜了。

老威：胶卷没收，像机该要回来嘛。

王六顺：我不是法轮功，我不想坐牢。

老威：警察是有意吞你像机吧？

王六顺：也没辙。我刚才说了，咱老王注定留不下传世之作，咋样，还开心吗？

老威：没法开心。

王六顺：我是容易一下子被点着的那种人，事后，还是后怕。我害怕死，害怕血腥和暴力，但又有一种莫名的冲动，比如一听说

哪里出了车祸，就热血沸腾地想去看，不是一般的围观，而是把头埋到车轮下面，近距离盯住血，盯住破碎的肢体、脑浆和骨头渣子，甚至想舔一舔，认认那种味。然后，许多天，总是梦着那情景，那漂亮的女孩之死，感到怕，感到被压得喘不过气。我不认为法轮功怎样高明，但还是被那种极端的碰撞镇住了。我看见过一幅自焚的照片，人已烧焦得面目全非，可还盘着腿，双拳抱在胸腹，太不可思议了，是什么支撑着这个法轮功分子以如此方式“圆满”？我弄不懂，我没有缘分拍这种高级的状态，引诱人去接近、去记录的状态。

老威：我有个诗人朋友叫阿曲强巴，搞过民运，坐过牢，现在推销阴宅，就是墓地。

他经常在与朋友酒酣耳热之际，向大活人推销墓地。他说这世界的大趋势是死人越来越多，土地越来越少，所以只有阴宅是永远看涨的股票，稳赚不赔。

王六顺：你的意思？

老威：你要认识死亡，就跟他倒阴宅去。

王六顺：我千里迢迢从大庆赶到北京，就为了干这个？

老威：北京的开销挺大，拍照片开销就更大。你要艺术和挣钱都兼顾的话……。

王六顺：咱老王能挣钱，在大庆，还开过夜总会。我一旦热爱上摇滚，就把崔健请到大庆演唱，那可是石油城破天荒的头等盛事，轰动得一塌糊涂。咋样，够劲吧？

不是呼风唤雨的地头蛇，能干成这个？嘿，没意思，生意做得顶破天，也没有艺术家那种，那种自我感觉。比如老崔，平常人挺温和，可在音乐中，总在与啥看不见的东西较劲，虽然歌词明明白白，但肯定有另一种东西，我说不上来，我为他赔了四十万，也值。

老威：咋会赔呢？崔健应该火爆嘛。

王六顺：当然火爆。开演之前，我做梦都激动，我要改写大庆自王铁人以来的精神史，制造了传奇还能趁机赚一把，你说谁撞上

这类好事不晕彩？唉，怪只怪我对工人阶级的热情估计不足，演唱会那晚，票只卖出去几百张，然而石油工人的后代们像陈胜吴广那样揭竿而起，呐喊着从四面八方涌来，把会场围了个水泄不通。演出还没开始，混票和翻墙进去的就占大半，等到台上乐器一响，崔健那万众熟悉的破喉咙出头一声，人民就急了。大庆这地盘，下岗职工多如牛毛，生存都成问题，哪有闲钱听摇滚？再说老毛时期，上面下来的慰问团一泼接一泼，歌舞都免费，老崔不免费，不是瞧不起大伙吗？110、交通、消防、武警全调来，拉成几道防线，管屁用，上万人一齐喊“崔健！一二三!!”撞大门，没几个回合，门就倒了。大伙像破城的义军，欢呼着进入，整个场子满满的，开了锅。我这演唱会功臣一下子就被卷入漩涡中央，胡乱扑腾才稳住阵脚，鞋被踩掉一只。早知这样，还不如统统发招待券。唉，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场面真可怕。

老威：后来呢？

王六顺：我赔了血本，与崔健成了朋友。再后来，就回到刚才那张“旧照”，咱老王拎着像机单身闯北京来了。感谢上帝派崔健砸了我的饭碗，看来以后有啥造化，也得由他老人家说了算。

62　圆明园过客王孙

采访缘起：1994 年 10 月 9 日，北京阴霾密布，已能感觉到些许寒意了。临近中午，我特意穿过半片皇城，去拜访中外闻名的圆明园画家村。

在福缘门村头，撞见第一个到处溜哒的村民王孙，他自称“过客”，既不画画，也不写诗，这恰好适合做我的访谈对象。此前我读过不少关于画家村的文章，似乎缺乏这种过客式的旁观态度。

王孙爽快地与我侃侃而谈，并表示他“将因此而青史留名”。

天晓得。

老威：你是圆明园画家村的“村民”吗？

王孙：我既不画画，也不写诗，只是流浪艺人，因此算不上“村民”，只能算匆匆过客。海外《倾向》杂志曾报道，作者贝岭认为这个村最早起源于 1983 年成立的圆明园诗社，那时候，许多诗人，包括一些老《今天》，经常在圆明园聚会，朗诵诗歌，它的最早的居民应该是黑大春，行吟诗人，代表作就是《圆明园酒鬼》。当然，类似的传说美丽而迷人，可真正吸引我去福缘门（圆明园村址）的是美国文化批评家考利写的一本风靡一时的书，叫《流放者的归来》，里面描述的格林威治村，是 20 年代令人神往的圣地。先是几位落魄的艺术家相约到那儿过共产主义群居生活，渐渐名声传开了，全美国、全世界的艺术疯子、艺术骗子和公子哥儿都去朝圣。自然，格林威治村的永垂青史在于村里出过不少文学艺术大家，包括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我想，圆明园画家村的源头应该是格林威治村，至少给我个人的第一感觉是这样。于是，我从香港坐火车直奔北京，临行前对朋友们开玩笑：“我穿过浩浩无边的文化沙漠到麦加朝圣去啦”麦加你知道，沙特阿拉伯的首都，穆斯林圣城，据说，先知穆罕默德降生在哪儿。

老威：你这种联想很妙，不过，格林威治和圆明园还是不一样，

我指的不是国家特色，而是 20 年代和 90 年代的文化环境的差异。20 年代那种适合艺术家生存的浪漫环境已经被洗劫过很多遍，当今世界是商人和政客的黄金时期，所以圆明园村在时尚潮流中显得不合时宜。

王孙：不错，福缘门和东村都不像这个年代的产物，时间仿佛在这儿停滞了。清一色的郊区农民的简陋平房、墙内还有更为简陋的小院。冬天也没暖气，你很早就被冻醒了，于是，裹上棉袄缩着脖子袖着双手到小卖部打酒，你会碰见不少和你同样装束同样心情的人。偶尔还会见着癞狗在墙角交配，你能想象在北京郊区，全国人民向往的首都还有这种风景？

老威：也没个管理制度？也没个户口登记？

王孙：你干脆说那儿是抗日根据地，还查路条呢。反正我在福绿门住了几个月，没人问我的来历。说是“村”，也没村头也没村尾，连树也基本没有。空房多的是，出钱租一间住下来就成，抗过了满目荒凉的第一印象，你会发现“风景独好”，首先房价便宜，穷艺术家租得起，其次紧邻圆明园，离北京大学也挺近，似乎又有历史，又有文化，交通也方便，从商品经济的角度看，这么多优势肯定能把外国画商和记者吸引来。

老威：你不卖画，住在哪儿干什么？

王孙：看热闹，偶尔也卖唱。由于村里多半是画家，所以诗人在其中显得突出。主要是贵州诗人，祖师爷黄翔带着老婆在这儿住了一阵，然后是有经济头脑的王强兄弟，开饭店，开小卖部，把黔驴家乡的木雕面具贩运过来卖，发了点小财就办《大骚动》，一个山区诗人和画家杂交的民刊。人们普遍认为现代画家疯狂，性欲生猛，可是一旦遭遇了诗人，特别是自大狂黄翔带出来的贵州诗人，再疯的画家都会变成正人君子。《大骚动》里的诗人笔名“山匪、村夫、寡妇、马贼、乳无房、性无错”等。而福缘门开辟的诗歌厅也与这些笔名很配，声嘶力竭的朗诵，常常惊吓路人，以为里面发生了凶案。我也去演唱过，但底气差远了。总之，诗人在一段时间占尽了圆明园的风光，但实惠却让画家们捡了，卖掉画和由海外画

商付定金包画的都不少。

老威：但更多的画家什么也卖不掉。据我所知，画家一旦扔下画笔，投身观念艺术，就能和诗人竞赛谁更疯。好了，我们还是绕开这些话题，谈谈村里的日常生活。

王孙：那儿没有日常生活，要么无聊，要么辉煌，当然，无聊的日子很漫长，懒觉可以 3 天 3 夜地睡，没人唤你。开始的时候，大家不常争论艺术的话题，画画挺亡命，后来，就没什么可争的。除了喝酒，也没什么可画的。村里穷鬼居多，冬天是忍饥受冻的日子，你在村头转悠，遇见什么人，千万别像中国农村那样，习惯性地问："吃饭没？"否则，这人马上就会如战士报到一般响亮地回答你："没吃！"你走哪儿他跟哪儿，还将在沿途给你招来一连串的食客。刚进村时，我就触了回地雷，结果有 10 张嘴跟我进饺子馆，一人一斤饺子，外加 30 瓶啤酒，大家一扫而光，还直"勉强"。第二天开门，又有十几张嘴在外面恭候我……这场面让我怀旧，我还以为 80 年代的人才混饭呢。

老威：请描述给你留下深刻印象的一天。

王孙：第一天印象最深刻。我刚到北京，还没来得及去圆明园，就被接站的朋友领去参观在团结湖公园举办的"本世纪诗集版车展开幕式"，名流如云，但是筹办人马高明却是个酒鬼，因此大伙跟着沾光，全天都免费供应啤酒。圆明园画家村也来了大帮不速之客，连展厅也不进，就搭张桌子在外面狂饮啤酒。其中有个矮个子，频频起立，拧着啤酒杯到处找人碰，遇见我，也打雷般地连吼"久仰！""诗人马贼"，朋友介绍说，但见此人浑身上下涂满花花绿绿的绘画颜料，腰间扎一草绳，一顶旧军帽反戴，帽前写"超越！超越！！"帽后写"突围！突围！！"8 个大字赫然醒目，吓坏了那些绅士淑女。马贼见大伙都躲他，竟在园子里骂街耍酒疯："我是马贼！他妈的，贵州诗人牛逼！"幸好马高明赶到，像一尊满脸烧疙瘩的佛爷，把小马贼堵回座位。

马贼四周全是落魄画家，脸色灰得像大便纸。一会儿，两个洋鬼子插进来，亮了名片，是美国广播公司的记者。马贼立即借花献

佛，请老外喝啤酒，还满不在乎地与他们约定明天在村里接受采访的时间。“这是新入伙的”他指着我说，“××非非诗人”我刚要更正，短命诗人海子的生前好友孙理波忙拦住我。还趁机为马贼捧场道：“老马是圆明园的村长。”

我偷看表，已是下午 1 点，参观者稀稀落落，肚子提醒我该吃午饭了，可马贼一伙都没起身的意思。诗人西川与我耳语道：“马高明在公园外请客，他让我通知你悄悄撤退，莫惊动他们。”我问为什么？西川说：“一旦打草惊蛇，这伙子就全跟去了，老马又没开公共食堂。”于是我借故告辞，与马贼约好次日在村里见。画家们醉眼惺松地挽留着，马贼不无遗憾道：“这年头，不容易敞开喝免费啤酒呀。”“啤酒不能当饭。”我委婉地劝道。“谁说啤酒不能当饭？”一个皱巴巴的画家反驳：“我们要一直喝到下午，展览结束为止，这样晚饭也省了”。

马贼领导般赞许地点点头，与我握手道别：“明天大早，我组织人马在福缘门村头隆重欢迎你，马孙。”

“我叫王孙”。

“王孙？太贵族了吧？”马贼瞪我一眼说：“好，好，马孙就马孙，马生马生，马贼所生。”

老威：这疯子！你没扇他一个大嘴巴？

王孙：没有，我反而觉得他挺可爱的，他占占便宜，充充大，却显露出真情。

老威：你能这样想，说明你也是个不同寻常的人。你的口头表达很棒。你将来肯定能成为作家，至少，你是个故事能手。

王孙：如果你的意思是编故事就是作家的话，那我什么也不是。这辈子我经历过一些，过若干年，我在回忆中把经历过的“经历”一遍，讲给别人听。当然许多细节忘了，或许我讲的不及那段生活的 1%，但这 1%的东西给我留下了永远的印痕。

老威：对不起，我不该打断你，请你继续讲吧。

王孙：次日上午，我给朋友打传呼，由他领路乘公共汽车到终

点站圆明园，村里除了一只癞狗什么要没有，大约画画的都习惯睡懒觉。我在一面土墙上看见一个红箭头，下写“五匹狼画室由此去。”巷口拐了个弯，进一个院子就到了。

院里有好几间房，五匹狼合租了其中的大套间，画室、客厅、卧室都在里面。我们破门而入时，他们还没起床。所谓床，是两面墙之间的大地铺。马贼率先从窝里钻出来，穿衣裤、扎草绳子，然后走到外间，逮住茶缸灌了一口凉水，咕咕几下，卜地地喷出门外，还捅一根指头进嘴“刷牙”，接着又灌喷了一口水，举袖口擦把脸完事。

其他人也起床了，铺里胡乱堆着被子，马贼边泡方便面边说；“怎么就你一个人来？其实别客气，你再来 5 个人，我们这铺也挤得下。”

我急忙谢绝他的盛情，申明自己租房的愿望。马贼不以为然：“能省就省两个。六匹狼在一窝，我朗诵诗你给我伴唱。”忙碌的社交活动就这样拉开序幕，马贼戴着他的“超越”帽，率领狼群挨次拜访画家居所，让我无数次即兴表演三弦说唱。马贼从来不懂敲门，他面对紧闭房门勇往直前，脚和肩头一直上，进去之后发觉真没人时，才大模大样地撤退。据说马贼帮助过不少穷困潦倒的艺术家，还替诗人廖胡子推销过地下朗诵磁带。

在圆明园真正的村长伊灵家里，我们终于得到了啤酒招待，并且还有少量怪味胡豆，为了答谢盛情，马贼一把抓下帽子，为主人朗诵他刚写的分行情书，他的朗诵方式是弯曲一只膝盖，让肩头倾斜下去，而后猛然顶向半空，手势的弧度也大得像拳击练习。他这样上窜下跳了一刻钟，我只好鼓着腮帮子为他伴唱，舌头弹起个大血泡。伊灵是温和的人，据说画卖得具有国际声誉，他在叫好之余，习惯性要为我慷慨解囊。我急忙谢绝，马贼遗憾地咂着嘴。

就这样折腾到黄昏，我过意不去，就招待“五匹狼”吃饺子，一人一斤。租下房子后，“五匹狼”执意要用他们的画来装饰我的斗室，我感觉自己住在山洞里。晚上 10 点钟，王强送来两条大鱼，马贼等人高兴疯了，就四处搞酒。那是这一生过的不多的几个美好

的夜晚之一。十几个醉汉围歼鱼肉，尽情胡闹，像一群“文革”期间的顽童。记得有人还建议翻墙进圆明园，众人响应，直到书生孙理波提醒公园夜里有大狼狗方作罢。

马贼一直不停地朗诵，似乎把他这辈子学的诗全朗诵完了。画家们不善于用声带，只好拍桌子，跺脚，互相斗殴。鼻青脸肿依然觉得开心无比。马贼一再说:“可惜黄翔不在。黄翔永远没有年龄”。

我的嗓子哑了一个多星期。随身带的二胡、三弦、笛子全都被砸了，我整个成了个废人。但我情愿被这个梦想的村落废掉。这些艺术家，这些真诚的人，都是这个精神沙漠化社会的弱者，我们被市场、被现实主义观众一步步地围追到这儿，我们开心极了。

而明天，明天我们会分手吗？当你一个人在路上走的进修，许多人会在你的心里走吗？

老威：“肉体消失了，灵魂继续走。”

63　作曲家王西麟

采访缘起：作曲家王西麟的名字，我是在 2001 年 2 月听说的。那时《中国底层访谈录》刚出，在北京开书评会，因此认识了前来弹唱助兴的梁和平、赵莉、何勇等人。由于梁和平的生动刻画，王西麟三个字在脑子里扎下了根。

老梁是这样说的——

官方也知道王西麟在海内外的影响，北京市文化局 97 年就与他签了合同，按其中规定，两年后筹钱推出他的系列交响乐演奏会。可好不容易熬到了 3 年半以后的 2000 年 12 月 5 日上午，官方却突然下达了'取消音乐会'的通知。这时候，排练已进行一个多星期，瑞典的首席小提琴家 Igeduss 正飞抵北京，也就是说，好不容易筹来的钱已花出去一大把。

气焰嚣张的老王顿时六神无主，像一头悲愤的熊瞎子扑入我家门，老远就连叫："坏了坏了，和平，坏了！"我给他倒水，请他坐下，他偏要站着讲。原来是上月 24 日闯的祸，那是音乐会排练的第一天。早上九点，指挥谭利华为了表达对作曲家的敬意，就即兴请衣冠楚楚的老王对北交几十号演奏员讲几句话。老王稍示客套，就登台以洪亮的嗓门向音乐大厅宣告："20 世纪过去了，20 世纪发生了许多大事，有两次世界大战，科技伟大的进步。但我认为，在人类发展史上，20 世纪最大的事情就是——共产主义被人类苦苦追求，最后又被无情地抛弃！"

一言既出，万马齐喑，可我们的老王还在彬彬有礼地向发呆的大伙鞠躬呢。我埋怨他一大把年纪还管不住嘴，把最好的机会给葬送了："您的交响乐何时才能让更多的国人听到！"

于是老王开始小孩一般检讨，什么"熬夜创作，头痛难忍"啦；"有人告密"啦。"可关键的关键，"他突然一脸严肃道，"我忘了在最后补上一句'中国除外'！"

……

2004 年大年初四，我终于在梁和平家中听到 3 年前被禁演的《第四交响乐》，又名《世纪悲情》，以及《黑衣人》《铸剑》等作品，还聆听了王西麟声震屋瓦的民歌个唱和即兴演讲，身心为之倾倒。

于是在芦苇、梁和平等心热者的极力怂恿下，我果真在 2004 年 1 月 31 日下午至 2 月 11 日（星期三），六入王西麟偏僻、狭窄的家进行采访。此前，在饭馆里喝过一次酒，也算非正式摸底访问。

王西麟今年 67 岁，性若赤子，喜怒无常态。他在对话中频频泪下，继而弹琴示唱时过境迁的曲子，以刺激几近淡漠的记忆。他自揭伤疤，坦承了在社教运动中的“告密行径”，并深表忏悔。这种毁容的勇气，在几代知识分子中都是罕见的。但我要说，正由于此，才有了王西麟晚期堪称“声音证词”的交响乐。

老威：说起来很惭愧，我与同时代的绝大多数文人一样，长期对本土的交响乐只略知皮毛。小时候，经常在革命故事影片的末尾，看到“中央交响乐团，指挥：李德伦”的字幕；二十几岁做诗人，为了凑寻根文学的热闹，也听过瞿小松、谭盾和郭文景；可印象最深的还是《黄河大合唱》，“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之类，有意无意听过上百遍，耳朵都起茧子了。至于您，不好意思，我在上前年才晓得名字——经过梁和平和余杰的嘴巴。梁和平说：“王西麟是中国唯一把握了交响乐灵魂的大师。”将我骇了一跳。

王西麟：你应该听，必须听交响乐！你应该听，必须听肖斯塔科维奇！潘德列斯基！拉赫玛尼诺夫！柴可夫斯基！多么伟大的音乐，多么深沉的痛苦！中国思想文化界却没有耳朵，不听，不懂，这真是最大的缺憾！

老威：我听过拉赫玛尼诺夫——那希那希那索法索咪……沉郁的曲调，铁锤一般缓慢起落的波涛，您的《第四交响乐》有伏尔加河的影子。本来我当时就该听，可惜，一直拖到三年后的前几天，我才在梁和平家里听到了。

王西麟：怎么样？

老威：非常厉害，令人瞠目结舌！后来又把您的碟子拿回去与芦苇一起再听，渐渐觉得您的音乐完全在演绎你的经历，是一部特殊的个人证词。

王西麟：太对了，我的音乐没有柔情，没有布尔乔亚，它是一个漆黑一团的大湖，什么都从周围朝里面灌，眼泪、血、泥巴、叹息、惨叫，都朝里面灌，你说它能不重不深么？生存或者死亡，哈姆雷特说过，这是一切伟大艺术的源头，其次才是爱和恨。可许多娘娘腔的艺术家说，爱就是一切，有了爱就有了一切。放他娘的狗臭屁，当你活都活不了，哪来的爱？六四开枪，死伤那么多人，你说一千句爱也顶不回一颗子弹。动物也会爱，猩猩，大象，甚至狗，都会母爱和性爱，您能说他们的叫声是音乐、画或者诗？

老威：我从《第四交响乐》中听出一种乡下的哭腔。

王西麟：那是我 60 年代发配到山西雁北地区搜集到的一种哭坟的调子，以后又把上党梆子融进了这种悲调，我在第三、第四里也用了，原调是“可怜我那兄弟呀”！年轻的女声，背后配有原始的唢呐。到了第四，哭腔延长了，整整 9 分钟，眼泪模糊成一片灰鞯暮恿鳎翻滚的脑袋，没有脸，没有耳朵，看不见任何表情，只有 9 分钟无尽的泪！八把大贝斯，一直低下去，不能再低了，沉得不能再沉了。这是什么？这就是地方戏和民歌。几千年就这么一段，一首歌儿，哎呀呀，这三个字，人类几千年也没变。可突然之间，大鼓，哐哐，砸下去！把贝斯声带出的泪全砸掉！政治，老毛，运动的绞肉机咔咔响，您被抛进黑屋里，双眼蒙布，喳喳、巴巴、剥剥、各各，这些老鼠般的声音，议论，告密，怒斥，揭发，咆哮，打倒！用脚往死踹！鞭子抽，啪啪，打得你无路可逃！吐唾沫，呸呸！你的脸粘满浓痰，埋下脑袋，头发里全是浓痰。来不及擦，呸呸！通通！拳头又来了，揍你的有男人，也有漂亮姑娘，昨天还做你的学生，今天脸蛋就叫革命运动搞扭曲了，满口脏话。哗啦！最会打人的是一拳捅在软肋上，半天喘不过气，遍地花！

数不清的脚踢你，暗箭把你射成刺猬了，朋友的，学生的，同志们的！你趴在粪坑边，一刹那经历了悲剧、喜剧、丑剧、神剧、

肥皂剧！垮了，尊严垮了，我就写屁股颂……

老威：你的音乐是控诉？

王西麟：不仅是控诉，还要复仇，像《黑衣人》，一个不放过。

老威：在想象里？

王西麟：在精神上。记得有一部苏联电影，“解冻”后拍的，一个孩子问在斯大林时期当过狱警的爸爸：“您在集中营时，从背后向犯人开过枪吗？”爸爸避而不答，孩子就再三再四地扭住问，最后这个爸爸受不了了，就跳楼自杀了。还有《悲惨世界》里的沙威警长，忠于职守，不愧为专制政权的一条好狗，结局也是受不了而跳河。而中国呢？中华民族呢？这些人在街上，在饭馆里，在小轿车内，他们或许整过人，告过密，为了往上爬，把别人踩得死去活来。那些杀张志新的人，杀遇罗克的人，如今却活得理直气壮，没有孩子站出来问他们过去干了什么？整过谁？乌纱帽和钱袋沾没沾血？这些住洋房，开洋车，功成名就的好父亲呀，想到过忏悔吗？像托尔斯泰在《复活》里写的……

老威：那您是怎么“复活”的？王老师，我们从头说起好吗？

王西麟：我 1949 年就参军了，从 12 岁到 20 岁，一直生活在革命军队温暖的大家庭里，受大同志无微不至的爱护。我对共产党的感情本来根深蒂固，因为我的音乐基础是部队打下的，组织上见我是棵好苗，就把我从西北军区调出来，送到北京，进中央军委军乐指挥专科学校的教师预备学校，直到考上贺绿汀任院长的上海音乐学院，才算离开部队。

老威：一帆风顺嘛。

王西麟：57 年进高校，我依旧不脱黄军装，并积极投入反右运动，很快就当选为学生会和共青团的干部，还代表上音参加上海市社会主义建设青年积极分子大会。我鄙视白专道路，仗着身体壮，力气大，将音乐大学当作劳动大学，挖河泥，挑担子，垒炉子，炼钢铁，什么都一马当先。那是一种着了魔的时代风气，炼钢炉就竖在操场，连宿舍的铁窗子都撬去炼。可以说，我在三年级前，基本没练功课，校内像个大工地，也没音乐气氛。直到 60 年下来调整、

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不搞大跃进了，教学才恢复正常。

老威：缺了那么多课，咋办呢？

王西麟：我当时有大梦初醒的感觉，因为所谓的白专尖子，几乎都是为了音乐而考进学院的资产阶级，音乐世家出身，转眼之间，人家在国际上比赛得奖，拿奖牌，又成了为国争光的香饽饽，比如洪腾，殷承忠。而我，再怎么紧跟时代，也是土包子，大老粗，被漂亮的公子、小姐们瞧不起。况且，我学医的哥哥精神失常，饿死在兰州，我姐姐当了右派，因不服上诉，升格为现行反革命，我也马上不“根正苗红”了。心里窝火，只好暗下决心学技术，与政治互相疏远。开始是独自摸索，听资料，尝试，毕业前的一年，碰见留过苏的瞿维，对我悉心传授，专业进步，成绩一下子就名列前茅。

老威：据说你创作了《四重奏》？

王西麟：当时没有作曲的主科老师，我学习的主要途径是上音图书馆，我分期分批，大约啃了 30 多部四重奏文献，比如米雅柯夫斯基，肖斯塔科维奇，格里格，菲里宾科等。作了大量笔记，积累了较多手段。于是在 1961 年暑假，悄悄躲进琴房，开始潜心作曲了。挥汗如雨 40 多天，我到底完成了三乐章 25 分钟的《四重奏》，并由丁善德院长的小女儿，女子四重奏组的丁芷诺安排了排练并逐段录音，这在校内有了影响。

老威：可谓三年寒窗，一举成名吧。

王西麟：作为学生和学校，这都是了不起的成就，但是在毕业鉴定会上，我却成了反面角色，遭到同学们的一致批制。正如我几年前鄙视白专，反击右派那样，大伙指出：“王西麟辜负了党的培养，一心走白专道路，已滑到危险边缘。”特别是过去同为积极分子的学生干部 Z 君，竟拍着桌子斥责：“你快成为右派了！”骇了我一大跳。

老威：您果然从左滑右了？

王西麟：没有，只能算从不务正业里摆脱了出来，懂得了交响乐是西方工业文明的产物，而非下乡采风的产物。马克思讲共产主

义的基础，是研究了从圈地运动到大工业社会的 600 年历史，600 年资本积累，而非老毛号召的 15 年超英赶美。交响乐和民歌的差别，是数百年文化和历史上的，而非阶级歧视。挑着粪桶，砍着树，赶着牛车能奔共产主义吗？当然，那是一个在村里打转的农民共产主义。

老威：您思想这么超前？

王西麟：几十年后才认识提高，成为右了；而当时，不过年少气盛，觉得受了压制。毕业分配到中央广播乐团，“天之骄子”的心态又复萌，觉得自己所学的与广播民族乐团不配套。我以不熟悉民乐为由，在招待所赖着，不服从组织调遣去“民族乐团”，僵持了半个月，领导只好仍然改派我去“管弦乐团”。

老威：有啥不一样么？

王西麟：离群众文化远一点，就离交响乐近一点。我为了进管弦乐团，要尽快完成我的第一交响乐，使用钢琴创作是理所当然，可领导为了杀我的傲气，根本不予理睬。有一次，我偶然发现有一台旧琴堆放在杂屋间，一时冲动，就招呼了几位年轻人，合力将这废弃的琴请出来，准备搬到我的工作室，修理一番后使用。不料轰隆轰隆刚推到走廊中途，就惊动了一位芝麻官员，他挺身拦住：“领导批准了吗？”我答没有，钢琴又被惊天动地的推回原处。这一来，我给团里的印象糟透了，并为此被遣送至号称“13 号基地”的中央广播局发射场劳动反省一个月。

1962 年秋，老毛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紧接着，以“城市五反，农村四清”为宗旨的社教运动开始了。同历次运动一样，先在中央一级机关试点。1963 年秋，中央广播局召开动员大会，公开号召群众批评领导，叫作“领导干部下楼洗澡”。

老威：据说这“洗澡”典故也源于老毛。臭名昭著的延安“抢救”运动误杀误关了许多国统区投奔革命的功臣，闹得人人自危，鸡犬不宁，连军心也动摇了。老毛见这样下去，江山有可能坐不成，于是紧急叫停，斥责了特务头子康生。而自己也亲自跑到 359 旅，向被整得奄奄一息的人们行军礼。并且说，同志们不原谅，我的手

就不放下来。他还说，我是来下楼洗澡的，同志们把水烧烫点，千万莫客气。这流氓天子如此发话，臣民们当然得热泪盈眶，掌声如雷了。

王西麟：这种政治套路 57 年也用，叫引蛇出洞，然后一棍打昏。在社教中，中央文件大约是这么说的：平时高高在上的干部，现在要主动到群众中，接受批评，把思想里的脏东西洗掉。如果主动，虚心呢，就洗“温水澡”；如果不主动，甚至抵触，就洗热水或烫水澡，让他在大批判中受点精神烫伤。这种钓你上钩的诱饵，中国人民在 1957 年见多了，就成耳边风。在一次次动员会上，女同志们都麻木不仁地织毛衣，只有我这种血气方刚的傻瓜才心潮起伏呢。

终于，我在小组讨论中跳了出来。其实我的初衷同众多右派一样，是要推动乐团工作，让自己的音乐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一句行话即“为国为民，助党整风”。

当时上面提倡“民族化、群众化、广播电视化”的三化方针，对此，我首先宣读了毛主席 1940 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的著名阐述:“我们一定要继承和借鉴一切外国的和古代的优秀文化……”然后借题发挥:“民族化与这一论述不吻合,交响乐也无法群众化，而广播电视化根本就文理不通，与芭蕾舞团提芭蕾化，木偶剧团提木偶化一样可笑。”我强调说:“三化方针等于是无思想内容，无思想前提，无思想方向的三无方针。”

开始我还挺注意语言分寸，渐渐，我的神经兴奋起来，口若悬河两个多小时。“业务不过关，就改吃政治饭，凭什么管人？”我当时就这么说。我还提到由周恩来亲自安排来工作的印尼华侨林克昌四兄弟受排挤的情况，人家毕业于巴黎音乐学院，是著名的指挥家和小提琴家，却几乎在 L 副团长的手下呆不下去了。

还说了些什么记不住了，总之，我是在领导再三动员下才帮助他们洗澡的。筒子楼里挤满了人，L 副团长和几个干部亲自赶过来做记录，我却不明白这意味着什么。

老威：这叫整黑材料，恐怕那个时代出生的三岁小孩都知道。

您可真够执着的了。

王西麟：就这一根筋的脾气，从当兵、反右、炼钢铁、下乡都冲锋在前，党叫干啥就干啥。和平年代没枪，我就把扁担和锄头当枪，把粪桶、马车当反帝反修的坦克。可后来，交响乐成了我的命，政治上不那么正确了，一根筋就酿成了悲剧。

老威：领导找您了？

王西麟：好几天，上面没任何动静，但谣言蜂起，传的是以我为首的反党小集团。我心里七上八下，想找人澄清，可同志们纷纷躲避，一个筒子楼，都绕着走。某一天，我在外面碰见首席长笛张海波，就一起上了僻静的馆子，泡了一晚上啤酒。我发愁说："唉，太没意思了，动员提意见，结果又……"

像头上罩着黑布"熬鹰"，上面觉得火候够了，才约我谈话。在去的路上，我已经垮了，如果那时组织上肯原谅，我肯定会嚎啕大哭，感激一辈子。进了办公室，团长坐在那儿，用恨铁不成钢的眼光盯了我好久，然后慈父一般叹口气。说实话，团长是延安干部，有阅历，人不错，还是拉大提琴出身，虽然他目前代表组织，但看样子不想把我一棍子打死。

终于，团长说话了，语言委婉："西麟同志哇，你那两个多小时的发言，可真犯下了严重的错误！你怎么不私下找我谈谈心，作为长辈，我还是可以提醒你哪些话该讲哪些话不该讲嘛。而现在，性质变了哇，你的发言相当于 1957 年右派向党进攻的继续！三化是中央根据全国人民的愿望制定的，乐团不搞三化，难道要按你的方针走？"

我听得头皮发麻，泪水在眼眶打转。团长又说："又红又专的阳关道你不走，偏要白专！眼里无组织，无群众，象公鸡一样傲！先是乱搬钢琴，影响极坏，组织上为了教育你，调你去 13 号劳动改造一个月，却不见丝毫成效。你到底吃了那付迷魂药，谁也看不上？唉。"

一肚子苦水倒不出来，我好几次要表白，团长都打手势阻止了。只听得他话锋一转道："虽然你与党闹对立，严重伤害了同志们的

无产阶级感情，但只要老实认错，组织仍向你敞开温暖的怀抱。西麟同志哇，你出身于一个国民党官僚家庭，可 12 岁参加革命部队后，组织上没有嫌弃你，还培养你学文化，学艺术，批准你入共青团，送你上音乐学院。知道吗？培养一个大学生需要 3000 个农民辛勤劳动 5 年！而你却反对为党，为政治，为人民群众，为你的衣食父母服务，你的良心真被狗吃了吗？”

我顿觉五雷轰顶，无地自容。团长讲了一个多小时，最后，声情并茂地指出：“必须深挖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成名成家，并发展到反党邪路的思想和阶级根源，争取党和人民的谅解，否则就自取灭亡。”他还低声启发我：“和你一样，我在延安时也犯过错误，两次涂改发票，贪污了一点钱，可通过改造和挽救，又重新被信任，为党工作这么多年。你看见了，我现在不也是很好吗？”

人落到这地步，是根稻草也要抓住，因为 1957 年右派们下放和劳改的下场我都目睹了。于是，我痛哭流涕地保证要深刻检讨。

接下来的日日夜夜，我用比作曲更强烈十倍的激情“创作”组织上需要的检讨。回顾人生道路，我王西麟自 12 岁进部队文工团，学文化和音乐，沐浴在阶级友爱中。每天 30 公里以上的急行军，双脚起血泡，是大同志替我挑泡，端热水烫脚；当满身惹满了虱子，是大同志逼我脱下脏衣裤，又烫又洗；行军累得走不动，是大同志抢过背包。以后告别部队考入上音，又在反右运动中冲锋陷阵，下乡下厂积极劳动，曾被评为出席全市代表大会的先进人物……可如今，我忘恩负义，“三千个劳动人民以 5 年的血汗供养了我”，可我却堕落成思想变质，追求成名成家，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右倾机会主义或其他什么主义的浑身发臭的坏蛋。

鼻涕、泪水淌了一大堆，我从来还没有以如此恶毒的语言诬蔑、咒骂自己，我诚心诚意地觉得煽自己几百个大嘴巴，不，扣自己几百个屎盆子也不过分。我的精神早就在恐惧中跪下了，天哪，比爹比娘还亲的党！只要你放我一马，不送我去劳改，我愿意舔你的屁股！同那个时代所有的文人一样，争先恐后地写屁颂，屎颂，屁股颂！

就这样，我昼夜兼程完成了厚厚一本自我检讨书，双手交给团领导，盼望着能过关。

老威：我爸爸是中学教师，在文革的一扫三反运动中，自己交代的罪状多达一百多条，连家庭出身地主，两岁时被长工背过也算一条。

王西麟：我可是向党交心啊。在全团 100 多号人都参加的共青团扩大会议上，我泪流满面地宣读了两个半小时，地点是 120 多平方米的人称"大播"的大乐队录音排练厅，空间高达 20 米，几乎可装火箭了。

老威：这是我听到的最大的室内批判现场。

王西麟：舞台占全厅的三分之一，有合唱台和坐位架；为了确保录音质量，地板上都铺满了一层隔音的厚橡胶皮。这种地方，无论是搞音乐还是搞政治，回音效果都极好。半年中，我被全团斗争 10 多次，每次都在正中的乒乓球台右侧，与左侧的主持人隔台相望。而四周群众围绕，有的还登上排练架，由高处俯视，令我觉得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检讨读到最后，我头昏眼花，嗓子丝丝地窜着火苗，大厅内静得出奇，我还以为大伙被感动了呢。可突然……

老威：断电了？

王西麟：有人发言了。我定睛一认，原来是来自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中国竹笛，本团政治秘书牛君。他的嗓音笛子一般尖而脆，刺得人心惊肉跳："假检讨！！敲响了阶级斗争的警钟！同志们，要坚定立场，打退漏网大右派王西麟的猖狂进攻……"

笛子的高音刚落，广播局党组派来指导斗争的赵政委就定调了："王西麟的父亲毕业于蒋介石任校长的黄埔军校，曾当过伪县长；姐姐先划右派，后升格为反革命，送新疆劳改；而他本人隐瞒反动家庭出身混入部队后，不思悔改，剥削阶级的世界观和艺术观恶性膨胀，终于发展到跳出来攻击党。同志们，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刚结束，毛主席指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个子矮矮的赵政委身披象征高干级别的黄呢子大衣，语调低缓，

却令在场的每一个人都不寒而栗："大家要深刻认识这次斗争的性质，掂量一下自己充当了什么角色……"

我如一团臭泥瘫在那儿。"团结起来，打退王西麟的猖狂进攻！"团委书记高呼口号，森林般的拳头举起来，我完蛋了。

老威：不是讲好要挽救你吗？怎么转眼之间就升级了？

王西麟：我当时 26 岁，哪想得透！后来才明白，这完全是政治斗争的需要。老毛在 1963 和 1964 年，发表了两个针对文艺界的批示，批判 17 年的"死人专政，洋人专政"，以及匈牙利的裴多菲俱乐部，揭开了文革的序幕。而我这种响应号召，帮"下楼领导洗澡"的热血傻瓜，正好被抓了典型，成了大时代下的小小祭品。

老威：团长没再找您吗？

王西麟：大约两三个月，没任何人敢私下接触我，通知开会，也从门缝塞纸条。其实所谓反动家庭的老底，军队党委在 1955 年的肃反运动中早有正式结论："12 参军，对家庭历史是逐渐知道的并已交待。参军后工作积极肯干，受其家庭影响不深……"

老威：组织上应该很清楚，一个 12 岁的小孩怎么懂得隐瞒成分混入革命？

王西麟：我也这样辩解过，但团长的回答是："相信组织是经过了解的。"至于怎么了解，找谁了解，你永远没有权利问。正如一个人永远没有权利看自己的档案袋，里面或许装着互相矛盾的两种材料，要拉拢，就适当透露一点红材料；要弄倒，那就有大量的黑材料。

老威：面对一个空气一般无所不在的组织，您只能听天由命。

王西麟：如果我当时明白，就像女同志那样开会织毛衣，或者唱唱赞歌。总之，从 1963 年秋天到 1964 年 4 月的大批判中，我成了全团社教运动的最集中的靶子，以我为首，还挖出了一个反党小集团，其中包括首席长笛张海波，首席圆号陈英南，首席双簧管陈大康，首席贝斯魏宝正，都是一流的技术尖子。

老威：是你交待的吗？

王西麟：别咬文嚼字了，是我出卖了他们，因为相信党。经过两三个月的批斗，人人都发过言，但组织并不满足这种疲软下去的战果。于是在“第二战役”打响前，团长在同一间办公室再次召见我，他的手势，眼神，包括唉的一声都和从前一样。我是多敏感的小伙子呀，在没人跟自己说一句话的死水潭里憋了近 100 天，恶梦不断，神志恍惚，突然有个人，而且是慈父般的领导，用这种温暖的姿态对你，鼻子怎能不发酸呢。

团长说：“西麟同志哇，经过这一段的开会学习，你大概深受教育了吧？不要怪同志们态度不好，虚心一点，组织上对这场运动是有数的！你的错误再严重，能比得上末代皇帝溥仪和国民党战犯吗？他们都能改好，你为什么改不好呢？”

这话意味着通过考察，组织还是把我当自己人，我的眼泪决堤一般下来了。

团长按老套话锋一转：“西麟同志哇，上次你只检讨了个人的问题，现在，组织上希望你扩大一点范围，把你和那几个人的关系也说清楚。至于哪几个人，在这儿我不点名，就看你的态度了。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组织已经充分地调查过了。你们平常如何议论领导，如何发泄不满，什么‘怀才不遇’啦，说三道四啦，组织都掌握了。你呢，只需要一条一条地列出来，时间、地点，哪些人，我们再与掌握的材料核实，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你要老老实实地负责任。”

见我迟疑不决，团长又说：“党不仅要挽救你，还要挽救其他犯过错误的同志。你不要认为对不起谁，因为同志关系也是有阶级性，有原则的！向党靠拢帮助同志，你不要错失良机。运动以后，你们还是好同志，大家都是好同志嘛！”

别无选择，就我 10 多年的受教育经历，只能相信“态度越好，处理越宽大”的组织承诺。象打了吗啡，接着的几天里，我在病态的亢奋中挖空心思地坦白。我交待了 100 多条罪状，全是什么时候我和什么人说过什么，他的反应如何；哪一天，我看见谁跟谁在议论谁；有一次，我想就团里排挤华侨专家的事发言，什么人偷偷踩

了我一脚；谁在筒子楼与谁碰见，说“江胡刘柳（四个领导）不调走，乐团搞不好；还有 58 年处理的到底是什么人”等等。

老威：鸡毛蒜皮。

王西麟：很恐怖，问题很巨大！当我在全团大会上一宣读《第二次交待——关于反党小集团》，排练厅炸了锅。

老威：反党帽子是您自己戴上的？

王西麟：我自己，因为团长暗示越彻底越好过关。我不敢抬头，只一条接一条往下念，周围紧张极了，每个人都是一颗手榴弹，而弦扣在我的嘴上，吐出一个人名，耳边就轰隆一下，一片哗然。渐渐环绕我的嗡嗡声越来越大，似乎都在猜“下一个轮到谁”或“到底咬没咬我”。当我念到“某一天中午，××和我站在筒子楼过道上议论领导”时，群众席上竟有人紧张得神经失控，大叫一声：“有我没有？！”我回答没有，那人才一下子瘫下去。

宣读了 3 个多小时，我算松了口气，场子里却沸腾起来，一反往常开会那一本正经的肃静。大伙发言踊跃，几乎争先恐后，不仅骂我咒我揭发我，而且还撕破脸皮互相咬。反党集团的网越扯越大，终于多达十几个人。如果没有领导在场掌握全局，肯定会打起来。我惊呆了，直到宣布散会，“伪君子”“漏网右派”“该千刀万刮”的骂声还不绝于耳。

互相揭发的时尚就这样如战火一般蔓延开来，会又开了几次，闹成一锅粥，而人们在会下的主要工作就是搜集材料，准备打垮他人的炮弹。

经过大起大落的拉锯战，我的脑子出了毛病，白天的批斗会延续到梦里，而群众却换成了革命电影和话剧中的国民党、地主、还乡团，面目狰狞。我死去多年的父亲化作黑影在人海里飘。我在半夜一连串地怪叫，连午睡也叫。12 平方米的屋，我却把窗帘拉死，生怕光透进来，因为外头红旗招展，我害怕突然逮捕。每天清晨，喇叭里一响“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我就腾地跳下床，抱脑袋哆嗦……这种“恐红症”困绕我 20 多年，导致我在许多公众场合情绪突然失控，直到今天，我一看见墙上的伟人像就

起鸡皮疙瘩。

老威：您去治疗过吗？

王西麟：1966 年春天，我就被送往疗养院，精神病诊断书我还保存着。我的右派姐姐升格为现行反革命，戴手铐送新疆劳改时，其症状与我类似：梦呓，哆嗦，头发大片脱落。不过，女同志发梦癫的动静肯定不如男的。

老威：经过这样的折腾，您对组织应该绝望了吧？

王西麟：你别忘了，我 12 岁就参加革命，是党培养出来的音乐人材呀。所以，当社教的高潮过去，团长第三次召见我时，我还是感激涕零。

团长说："西麟同志哇，你前面的交待都很好，态度端正，认识也深刻，这些，在作出对你的处理时，组织会考虑的。现在，希望你向党交心，从思想深处挖一挖自己的阴暗心理，找一找阶级根源！相信组织会把你的家庭问题与你个人区别对待的。"

老威：这不明摆着挖坑让你跳吗？

王西麟：当局者迷，是坑我也得跳。于是我写道："自从第一次开会叫检讨，我就吓得发抖，害怕别人提起我的国民党父亲和右派反革命的姐姐；经过赵政委的上纲上线，我的古怪反动思想更多了—— 一切影片、戏剧中的国民党、地主、反动派们的儿子都是我！我睡不着觉，连隔壁敲门都怕，以为是公安人员抓我进监狱。我是狗少爷，我是狗崽子，我半夜起床，跑到人民大会堂，我意识到自己不该呆在这人民代表呆的地方，不该来演出。我把毛主席和刘主席的大像看成了我的父亲，我害怕极了。我害怕自己成为向党进攻的困兽！"

我把几十次批斗中人们罗织的罪名都写成了自己的"阴暗心理"，我通篇写了上百个"害怕"。我含泪坦白："我害怕看见人，我害怕看见红颜色，我害怕听见《东方红》，我害怕看见领袖像！"

几天后，我照组织安排，将几十页"阴暗心理"当众宣读。大厅里静极了，犹如旷日持久的激战转眼间烟消云散，念完就散会。之后的两个月照样没动静，我似乎被遗忘了。

老威：这么斗来斗去，人们也疲倦了吧。

王西麟：不知道，反正我是被抽空了。这期间的 64 年春节，我居然恢复作曲，为大半年前完成的《云南音诗》之最后乐章《火把节》写了配器。

老威：我刚听过，不愧为一曲热烈欢腾的民族颂歌。

王西麟：20 多年后它获得了中国首届交响乐评比的一等奖，并且代表国家在全世界 30 多个城市演奏了几百场。

老威：你居然能在极度压抑的环境下写出极度奔放的交响大赋？

王西麟：如果不能这样，你现在就只能在疯人院里碰见我了，我持续紧张大半年了。1964 年 4 月初的一天，团委书记××在大会上宣布了将我“开除团籍”的处分决议；次日，团长通知，我被下放到山西省的雁北专区，另行分配工作。而作为“反党小集团”的其他成员，也被下放到甘肃天水和浙江新昌等地。

老威：这样的处理也算“保守治疗”吧。

王西麟：虽然从天之骄子一下跌到了底，但我还没有绝望。团长也鼓励我“好好改造，以后还有前途”。我收拾行李，上了火车，还像军人那样，学雷锋，抢着替列车员扫地。到了雁北地区文工团，我从打杂干起，搬道具，装车卸车，打扫舞台。《首战平型关》的话剧中，我也演个群众，就是呼口号，摇三角旗的那种。送戏下乡，搭舞台，扫院子、厕所，拉排子车，烧洗脚水，都我做。我要彻底改造臭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后来，我以比当地高出许多的水平，歌颂战天斗地，好人好事，写出了很轰动的《臧寨大合唱》，革命作家马蜂写过《雁门关外一杆旗》，竖的就是臧寨。我搞了好几个乐章——《铁杆社员赞》《支部领导好》《雁门关外新面貌》《三面红旗迎风飘》。

这可是本地区有史以来场面最大的音乐作品，合唱 20 多人，加上乐队 30 多人，我亲自指挥，气势弄得非常宏伟。开演时地委领导都到场，印象大好。宣传部长陈××还公开表扬，要我“别背包袱，改造后大有前途”。

老威：有这么动人？唱两句听听。

王西麟：玩笑玩笑。我弹弹钢琴，这样才能记起来。对，丁铃在这儿写过《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我受了启发，一开头就是“滔滔的桑干河”，浑厚的男声，不得了。以后我又主动去工厂、农村、军区进行音乐普及，弄的全是“雁门关外有人家/塞上江南美如画/玉米水稻全能种/水库养鱼又发电”之类。

当时许多被下放的臭老九和我一样，摇身一变，组成四清工作团，开赴农村蹲点。我在阳高县罗文皂村 8 个月，与老乡同吃同住同劳动，查农村干部的贪污问题。不坦白交待就不放生产队会计回家过年，结果他终于和我当年一样，彻底投降。但稍后一核实，全是谎言。

老威：太糟蹋人了。

王西麟：可政治天气说变就变，文革开始了，我的问题档案被公布出来，一下子，我又成了批斗目标。下放后洗心革面的“辉煌成绩”也变成罪状，因为曾被走资派的宣传部长表扬过，《臧寨大合唱》也是大毒草。

全团斗我一人，与在北京一模一样。接着是戴高帽、挂黑牌、游街。漏网右派、反党分子、隐瞒成分的阶级异己分子……一句话，这几年白改造了。政治指导员孙广礼，一个老粗，天天守着我交待问题。为了取得组织的信任，尽早过关，我故伎重演，写了一沓检讨。我充分发挥音乐想象力，套用《和声学》里的“调性轴心图表”，不仅重新交待了“历史问题”，而且精心绘制了一张人际关系的《转调图》。我是 C 大调，即中心主调；围绕我的四周，按关系的亲疏，从里到外，分一级关系调，二、三关系调和远关系调。比如副团长郝瑞峰，《臧寨大合唱》的合作者段连海，一级关系调，或 D 大调、E 大调；乐队成员××、××，崇拜、同情我，二级，F 小或 G 大调；家里，三级；一般演员，点头打招呼，远关系调，也用 A 小、B 小标明.

老威：你能将这图画出来么？

王西麟：好，我画。真他妈算个创举。

老威：这交响乐里的道道，真跟监狱一样，一圈套一圈，铁桶一般，无任何漏网之鱼。

王西麟：我就这样把自己给搞臭了，大字报铺天盖地，全是骂我的。我的著名的“三怕”又被翻出来，直到死硬了才明白，组织是靠不住的，党的政策是不给出路。

我再次被下放，烧锅炉，强迫干体力活，一身驴打滚的政治阎王债。1968 年清理阶级队伍，深入斗、批、改，工宣队进驻文工团，我就和走资派们一块，抓起来斗了，扔进小仓库，打地铺，窗子全钉死。这儿过去是日本营房，现在集中关押全地区的地富反坏、牛鬼蛇神。

后来又换了好几处关押地。由于有了血的教训，我终于幡然悔悟，走到了人民的反面，拒不交待任何问题。不管万人大会，坐喷气式，还是私下帮助，我都硬扛着，甚至把以前的交待材料全部推翻。

在“从肉体触及灵魂”的清队学习班里，打人是家常便饭。有两个难友不堪折磨，就自杀了。所谓“喷气式飞机”，就是弯腰 90 度以下，双臂向后抬高，站在平地或凳子上，脖子还挂大黑牌。团里有个曹玉柱，本来根正苗红，可私下议论林副主席“经常打喷嚏，身体不好”，被他的徒弟揭发，就打成现行反革命。老曹是舞美灯光师，经常因陋就简，把废茶壶、铝锅或其它破铜烂铁装上灯泡，安在舞台周围射布景。挨斗时，他浑身就叮叮当当地挂满此类小发明。

在城里大会小会斗厌了，牛鬼蛇神们就被麻绳连成一串，随团去附近几个县，十几个生产队巡回“送戏下乡”。舞台一搭好，我们就和当地的地富反坏分子一块挨斗，先念毛主席语录，“你不打，它就不倒”那一段，然后呼口号，喊“低头认罪”，于是黑压压一片坏蛋全在台下“喷气式”。台上的革命节目一演完，我们的腰也快折了。

白天除了赶路和下地，田间地头，想斗就随时吼“押上来”。有时晚上没找好场地，就寻间大屋，满炕坐着人，让我弯在炕下，

交代“三个怕”。我已经坦白了几百次，早遗臭万年了，可大伙等不及开口，就拳脚齐下。还有浓痰和耳光，整得我抱头搂腰，遍地滚。男女老幼都极其亢奋，就像参加现在电视里的娱乐节目。

随着斗、批、改进入高潮，人们的打人技术也趋成熟，公开上台挨斗还没什么，最怕的是一个接一个往屋里叫。人们严阵以待，五个手指宽的小板凳摆在中央，你一进来就站上去，搞“喷气式”。有人早就候在旁边，闪电般出拳，打你亮出来的两肋。哐当倒栽盅，半晌喘不过气，脑门发出金属的声响，哇哇淌汗。还有跳起来砍后颈窝，双锋贯耳，捣后腰，踢后膝盖窝，这些都是武侠小说里的招数；还有跪钉板，打屁股，揪耳朵，抠鼻子……中国人真有发明创造的精神呀，我的牙齿被“狗吃屎”磕掉了，耳朵也几乎叫扇聋了。

有天夜里，11 点钟，我刚睡下就被叫起来。这时院子里黑糊糊的，周围很静，一出门，眼睛就被黑布蒙住，麻绳倒捆双手，口塞毛巾。我像被绑架的人质，被推着拽着往前。我感觉穿过院子，在野地里转了一大圈。突然，我被踹下一个大坑，大约有两米多深，满脚的虚土。我以为要活埋，就又窜又撞，却最终发出绝望的哀鸣。过了一会儿上面有撒尿声，我被扯上来，口舌干燥，好像心里都填满了泥。

又转了一圈，感觉被弄回来，进了后院的小仓库。这儿已腾空作临时刑讯室。我被贴墙抵直了，毛巾从嘴里抠出，有人左手扶墙，右手罩住我的后脑，把脸按扁在墙面。鼻子一酸，就如乒乓球一般炸开了。一个声音（我听出是本团的赵宝钦）问：“材料室的小箱子是不是你偷的？”

我的心里一松，因为八竿子打不着。我回答“没偷”，裤子就被扒下，鞭子嗖嗖的，抽得屁股蛋子钻心疼。腰以下血透了！凭声响，我辨出打鞭的人是刘慎贤，原是中南海警备师吹小号的。由于政治身份过硬，在文革中鞭打过不少人。

折腾了两个多小时放回去，才知道睡旁边的倪云翔和郝瑞峰都被打过。早起劳动，裤子粘牢两瓣，换不下来，我就冲到工宣队办公室，喊毛主席语录：“要文斗不要武斗！”以示抗议。

老威：没想过逃跑吗？

王西麟：想了好几年。雁北地区，昼热似火，夜冷如刀，革命群众坐马拉车，而我们这些牛鬼蛇神，走着路，背着黑牌子，还扛着乐器和行李，一村到一村，四五个小时，苦极了。刚抬一下脑袋，就有人吆喝："想逃么？当心狗腿！"稍后有谣传，要把所有坏蛋送正式的专政机关。于是，我偷偷买了大茶缸和翻毛皮靴，和另外两人密谋脱逃。可没料到，骨节眼上我妈来了。这小脚老太太已 70 多岁，我姐送劳改后，《人民日报》发表"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吃闲饭"的社论，街道居委会就借此上门动员，要把她从兰州市里撵往农村。孤老太太没办法，就坐火车转汽车寻儿子避祸来了。

我妈带了 20 斤面，一个粗瓷碗，还有衣服、肥皂、毛巾。她本想住下不走，但不可能。工宣队拦住她说："你的儿子是反革命，正关押审查。"老太太还不明白："我儿子 12 岁就参军，怎么就反了？"

我被批准出街给我妈找了旅店。可怜的老人，行李还没完全解开，第 2 天就要回去了。是我让她走的，现在一提都心酸……恢复自由后，我每年都回家探亲。老太太替我姐带两个孩子，前夫一个，后夫一个。我每月给她寄 15 元钱。

我姐劳改释放，按规定只能在兰州郊区的农村落户，接受群众管制。她在村里挨斗，逃回家，派出所和居委会又找上门，揪她时还把我妈拉去陪斗，喊"打倒王庆凤！"满街撵着用砖头扔。有一次我刚进屋，正和妈坐在炕上吃饭，哗啦一声砖头就进来了。我从遍炕碎玻璃中捡起砖头，找派出所所长："我是革命干部，打死了我妈谁负责？"

探亲假一个月，但每次十来天就呆不下去了。我多次找兰州军区的老战友，都说我家复杂，他们不敢管。姐姐的村子我也去过，一提"管制分子王庆凤的弟弟"，人家的笑脸就沉下去了。连一个普通的民警都敢戳我的鼻尖；"王西麟，你化作灰我也认识！"

我妈是 1978 年 1 月 13 日去世的。肺心病，气管炎，耳背。当时没钱住院，我就请了兰州军区的老首长，还有一个朋友叫谌薇薇，

后来也是右派，我第一次听肖邦就是她演奏的，他们到医院发话，才让我妈住院了。谌薇薇 1955 年曾送了我 40 元，当时真是一笔大数。

我家像一过道，纵深 10 米，宽两三米，妈在这贫民窟里住久了，生性节俭。走廊住了三天，搬进病房，一直到抢救，一直到死，她重复得最多的话是："回家吧，我们住不起医院。"

老威：这世道叫人窒息……

王西麟：我雇了辆大卡车，把妈放在一块门板上，就送火化了。带孩子，做饭，缝头巾挣钱，我妈太辛劳了！82 岁，双手都做变形了，枯树皮似的，我让人把这手拍了一大胶卷。现在，我姐的手比我妈还老，一个疯婆子，嘴巴唠唠叨叨，她爱用手抹桌子，一两个小时动作不变。我想和她聊聊，可啥也不清楚。太可怕了，前几天还来电话，说挨打了；又说甘肃省的组织部长看上她了，要娶她做太太，会派民警来保护她，编得有鼻子有眼。我说你都 70 多了，人家会要吗？她回答当然啦，他还知道你是作曲家呢……可能是遗传，连我的外侄女都不喜欢说话，三、四十岁还怕见生人……有什么办法，这一家子就我是清醒的。

老威：这所有的不幸都是您的音乐资源吧。

王西麟：在劫难中，我一直渴望温暖。比如有一次挨斗，坐喷气式，口干舌燥。回到住处时，有个贫农老太娘递过来一碗水，进嘴还有碱味，但我永远难忘，作曲时老想着这一碗水。可我得到的温暖太少了。

老威：其实你是敏感而脆弱的。

王西麟：外面看却很强壮，大个子，大嗓门。我一次次向时代求爱，不，求饶，却一次次扑空！他们不需要！交响乐，苦难，他们不需要！我曾一次次要求平反，我浪费了很多时间！什么党是母亲，我看连丑婆娘都不如，搞不得亲不得，嫌你嘴大！

老威：您使我想起了梵高……

王西麟：我不梵高！我被下放了 14 年，关押、拷打！践踏、蹂躏、遗弃、猪狗不如！生活被废掉，就因为那两小时忠心耿耿的

发言。而此前在上音，高等学府，反右，大跃进，下乡挑粪，对西方 20 世纪音乐一无所知。斯特拉文斯基，颓废没落；理查·斯特劳斯，反动；肖斯塔科维奇，洪水猛兽！我们落后了 50 年，直到 80 年代，国门开了，大量的东西涌进来，才感到听不够学不够。

老威：梵高是被生命的铁拳揍成天才的，一降生，磨难就开始了。爱情、事业、朋友，他没有一次满足，他被逼疯了，满耳幻听，他把这种声音画了出来。您和他的区别是您开头很满足：12 岁参军，叫人羡慕；读上音，分配在中央级音乐单位，年少时才华横溢，创作《四重奏》及紧扣主旋律的《云南音诗》，更叫人嫉妒啊。可您为什么要自毁前程？您已经在一个很高的台阶上，具备做御用音乐家的条件和技术！我注意到，在任何历史时期，您都能轻而易举地弄出时代最强音，《臧寨》不提了，文革环境那么糟，您边烧锅炉边创作"胸怀最红最红的太阳/走在文革的康庄大道上"，还有"太行山高有高哎/两岸红旗迎风摆/革命造反派不畏强暴哎……"还揉进了"上党梆子"，民间上千年的曲艺元素。王老师，您本来能做官方的宠儿，像吕骥、贺敬之，音乐的门都没摸着，却官至部级；还有王酩，据说谱过不少文革歌曲；胡松华，一首《赞歌》，就成著名艺术家，享用了几十年。甚至对你有恩的贺绿汀、李德伦，也具有延安传统。说句难听的话，在新中国，音乐家等同于戏子，极少有拒绝拥抱新时代的。王老师，您的技术比所有的当红戏子都高呀，为啥在毛、邓、江几朝天子的手里都受排挤和迫害？临近晚年，还因交响乐不赚钱被北京歌舞团解聘？您去讲课，每小时 10 元，不及明星出场费的百分之一……

王西麟：但是我写了几十部作品！我写了《第三》《第四》，正在写《第五》！像肖斯塔科维奇是斯大林时代的声音见证，我的创作也是……末日审判用得着……它们是永恒的！

老威：我读过海外的相关报道，您的交响乐在西方 20 多个国家演奏过，您被称为大师级作曲家。但对于商业社会里的中国人，这既高雅又遥远，除非您跟张艺谋合作搞《英雄》。

王西麟：狗屎！

老威：您在这个赢家通吃的环境大骂狗屎，和您几十年前在社

教运动中攻击领导一样不识时务。时代变了，您这种不开窍的性格还不变，所以党和人民不认可。

王西麟：人们听不见我的苦难，交响乐的演出要场地，要资金。

老威：您为什么不圆滑一点呢？

王西麟：我想圆滑，我想拍马屁，但是我的喉咙太粗，一哭，别人感到很恐怖。六四大屠杀，还有其他数不清的大屠杀，吼叫、惨叫和哀叫，满面泪水的无声的叫，多棒的旋律啊，我要全写出来！我要把它们献给统治者，我要追着拍马屁，问他们要不要？我一巴掌下去，不把他个马屁给拍肿了！

潘德列斯基写了《为广岛受难者的挽歌》，我要写这个民族的系列挽歌，屈原、嵇康、王实味，一切冤死者的挽歌。我要打倒封建，为毛主义死难者立声音纪念碑……但是，老威，没人理解，我半夜醒来都哭啊，没人理解……

老威：从灵魂上，您和梵高一样，挨揍的次数太多了，终于被栽培成专制的敌人。蒋彦永，一个已退休安度晚年的军医，去年因为揭穿谎言，公布萨斯真相而成为民族英雄。如果在民众可以监督所谓"公仆"的一个正常制度下，他也许永远默默无闻；还有丁子霖，人大副教授，如果不是六四之夜儿子被枪杀，她也许会象众多知识分子那样，继续享受体制的好处，做教书育人的好公民，也就不会数十年如一日地搜集死难者证词，发起天安门母亲运动，成为党的危险敌人了。

王老师，我从这么多年的采访中意识到，这个时代几乎所有的堪称优秀的公民，作家、艺术家、学者、科学家，甚至民间艺人，不管他人生的动机多么纯洁，多么想远离政治和阴谋，可只要其品行端正，天良未泯，厌恶谎言，最终都受尽了磨难，自绝于党和人民。

然而这正如希腊诗人埃里蒂斯的诗句："过去和现在/付出的永远是值得的"

应被访谈者要求，在此说明：这只是其人生的一个横断面，或者一个艺术的发端，大大没完。

64　流浪汉王响

采访缘起：王响 40 岁，长得天圆地方，非一般意义上的流浪汉。

他无职业，无家室之累，向往古代汉人的浪荡生活，因此至今保持着一种走路的心态。我于 1998 年 12 月 31 日在白果林我父母家采访了他。我似乎一直在等这么个人，作为这本底层访谈的结尾。

诗人马松已经成家立业了，可在一次酩酊大醉时，竟搂着一条垃圾桶里钻出的野狗痛哭——自由的野狗啊，到底谁可怜呢？

这事可以做王响的注脚。

老威：你流浪了这么些年，是为了什么？

王响：为了走路。

老威：走路？这有啥好说的？流浪汉当然要走路。

王响：人生只有三种姿式，躺、坐、走。其中走路最有意思。

老威：站算不算一种姿式？

王响：站只是过渡，准备走或准备坐。

老威：好吧，我猜你是在保持一种“在路上”的心态，可开始流浪的时候，你不一定只为了“在路上”。你是为了一种理想，一个现实的目标，例如成名成家之类。单纯的功利目的，或许幼稚、可笑，然而它非常青春、美好。你我都是这样走过来的。

王响：你的确老了，老威。

老威：我操你妈！

王响：怎么？戳中痛处了？时间就是永不愈合的伤口。你还象在《黑道》里一样，没人知道你的真实年龄？

老威：我 40 岁，还能对付许多女人，但生理上只需要一个女人。我还没学会宽容、理解。记得十年前，我大吼大叫地朗诵诗歌，两个多小时也不觉得累……

王响：我们都来老一回吧，一起提前怀旧吧。我 83 岁，你 81 岁，与我们相好过的女人全都住进坟墓里了，即使没住进坟墓的，也老得不叫话了。你我儿孙满堂，德高望众。可有啥意思？大家巴不得离我们远一点，因为你的口水一天到晚淌个不停，让人忍无可忍。

老威：你的哮喘也叫人非常绝望。

王响：差不多。那么我们怎样让年轻人忘记你的口水和我的哮喘呢？

老威：一个人呆着。

王响：不行，人老一，一个人呆着，还不如自杀。

老威：自杀败坏名声，后代也跟着受连累。

王响：对，你这老头还不糊涂。

老威：那就锻炼身体，争取长寿。

王响：为保命而拼命折腾？折腾完了还不是死？

老威：那就朝年轻人堆里挤，让他们以我为核心？

王响：成为年轻人和中年人的核心？哪不累死，听说有位将军接见外宾时，一激动，连流尿了也不晓得。

老威：你太糟蹋老年人了，其实我觉得许多老年人比年轻人可爱。

王响：可爱在啥地方？

老威：好像，这些老头，特别慈祥，特别善于倾听。

王响：还有呢？

老威：特别会说话。

王响：应该说特别健康，平和而健康。他们讲故事的语调……

老威：我晓得了，你老了，就成了一个卖流浪故事的家伙。

王响：我没多少流浪故事。你刚才猜对了，我的确想保持一种“在路上”的心态，我不想提前到站，因为女人和家庭在给我稳定、和谐的归宿感的同时，也在暗示道路的终结，人生的终结。我有目

的吗？对，我开头有现实的功利目的，我最崇拜作家是高尔基。他的《人间三部曲》至今是我的座右铭。最早诱惑我流浪的就是做一名高尔基那样的作家，走遍人间的每一个角落，他在伏尔加河上的一条客船上当小工，整日洗盘子，累得死去活来，但却结识了一位相貌凶恶、内心善良的胖厨师，这个厨师为了保护他，竟把两个堂倌的脑袋揪住，发疯地互相撞。就这么一个野蛮人，却喜欢听高尔基读英雄加里波弟的传奇小说。当听到加里波第被抓住，打入死牢，等待行刑判决时，厨师的泪珠子一个劲地掉，终于忍不住痛哭失声……在中国，这样的苦难还少吗？为什么中国人天生缺乏这种具有历史厚重感的苦难？于是我在很小的时候，就渴望象高尔基那样离家上路。伏尔加河，伏尔加河，这条我从未见过的遥远的异国河流，在我的脑海里，比长江、黄河要深远得多，因为高尔基曾经站在岸边，目睹一船船苦役犯在远行西伯利亚之际，与父母妻儿诀别的情景。天空、河流、岸和人们都是铅灰的，一阵阵告别的深长的歌声与撕心裂肺的嚎哭交织着，与镣链的叮当声交织着……我也在寻找我灵魂里的伏尔加河，这是最初的文学目的。中国绝大多数文人一辈子只有最初的目的，他们为了震惊世界，挖空心思地虚构，挖空心思地博览群书。写呀写呀，他们那些伟大的情感和道德感，或者这种东西的反面，都是编写出来的，挖空心思地设计出来的。在这些书里，只能读到以文字为目的的故事或非故事，而摸不到文字皮肤里的血管。他们总是热衷于讨论“中国作家为什么没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问题，讨论来讨论去，幻觉越大越愤愤不平，于是组成作家代表团到国际讲坛上去毛遂自荐：“中国作家已不止一人有资格获诺贝尔奖……主要是语言的隔阂，翻译的不过关。”

老威：没想到你的文学情结这么重。

王响：这是我流浪的初衷，就好像我的初恋。高尔基就是我的初恋，他救了一个苦孩子，为这个没有教养的社会底层的苦孩子树立了一个高大的目标。成了作家，我就可以不受欺负，而在成为作家之前，必须流浪。文革开始时，我才 8 岁，我爸是个普通中学教师，就因为把陶铸的散文《松树的风格》教得特别好，就成为黑帮分子，挂上黑牌遭批斗。我小学只读了两年，当出身地主的爸爸倒

霉时，我们在出身城市贫民的妈妈怀里找到了安慰。我小小年纪就晓得努力表现，背《毛主席语录》，背《老三篇》，并在大街上拦住大人背。有两位医院的护士背错了语录就拨拉开我们，逃之夭夭，我们一直追到医院，并且以几个战斗兵团的名义贴了大字报，逼得人家公开哭鼻子检讨。

我觉得自己很争光彩，与爸爸划清了界限。不料有一天，老师率领全体小学生，倾巢出校门，到川剧团开批判坏分子的大会。几千人把剧场挤得爆了，可还有不少人企图进来。我们小学生被提早安排在剧场二楼，高瞻远瞩，把被好多盏射灯照得雪亮的戏台看得清清楚楚。坏分子被押着，鱼贯上场，“打倒！”“砸烂！”的口号震得天摇地动，我也憋红着脸，举着小拳头投入这怒海狂潮。十只垂头丧气的死老虎排成一溜，把戏台站满了，我以为都齐了，可口号还在呼啸着，突然，第十一名坏分子被几个红袖章拽上台，她反抗着，几次都企图扭身而去，但幕前幕后，台上台下，都站着收拾她的人，群众怒吼着：“老实点！”“狗日的！”“整死！”她终于被制服了，双臂反剪着，专政者揪住她的头发，使她的脸仰起亮相。我愣住了，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而周围的同学已经叫开了：“那不是王响他妈妈么？！”“王响的妈是坏分子！”“王响的妈乱搞男女关系！”我蔫了，真想钻到椅子底下去，可台上专政者又领呼口号了：“打倒投机倒把犯廖××！”我的泪水一下子涌了出来！可小拳头还是迟疑地举了起来，嘴角抽动着。

我的小学教师是个年轻姑娘，她不仅没安慰我，还一脸愤怒地质问我：“王响，你妈为啥要投机倒把？”我回答不上来，接着又听见“哼”的一声。这叫什么老师？他妈的，现在提起来我都想强奸了她。后来我才知道我妈的罪状就是把亲戚给的六尺布票卖了钱，正在私下交易时，被盯稍已久的市管会人员当场拿获。那年头，这就叫“投机倒把”。

虽然我明白妈妈是因为要养活我们才这样做，然而我觉得再也没脸上学。就离家出走。

老威：这是你最早的流浪？

王响：对。兜里揣了一块钱，那是我一分、两分，积了大半年的成果。还有两本连环画，《西游记》和《在人间》，《人间三部曲》之二。我爬汽车，到过四川北部的三台、盐亭、中江。我曾经去河里帮人背沙背卵石，供修筑公路，一天能挣三毛钱。那时候的三毛钱，很管用。我还到烟厂为烟叶上焦油，一口黑糊糊的大锅，围着十几个打零工的孩子，都左手拿烟叶，右手持碗从锅里舀粘稠的浆汤浇下去，晚上就睡烟草堆。我唯一的娱乐就是看随身的两本连环画。别的孩子的梦想都是当解放军，开飞机，开大炮，只有我，迷上了连环画里的高尔基。稍微长大些后，我又到农村给当知青的哥哥煮饭。在哥哥的薰陶下，读了一本文革前出版的《高尔基中短篇小说集》，其中《伊则尔吉老婆子》里，有两篇寓言故事，一是《鹰之歌》，另外一篇名字忘了，但印象深刻，是一个叫丹柯的英雄青年从胸内抓出自己燃烧的心脏，当火炬高举着，率领在森林里迷路的人们走了出来。这两篇浪漫主义作品令我激动了一年多，觉得献身文学是非常崇高的事。这期间，我又从哥哥那里出逃了两次，到处爬车。

老威：你一再提到高尔基，难道除了这个无产阶级作家，其它作品就没有给你影响？

王响：知青里流传着许多手抄本小说，我哥一窜队，我就偷着看。《第二次握手》、《在社会档案里》、《塔里的女人》我都看得废寝忘食。我看《少女之心》是 72 年回成都的时候。由于我哥的犯禁小说我基本上都看了，所以语文功底比一般上完小学的孩子扎实，我小学只读了一年，停学五年，就直接上了初中。刚入课堂，我省略号不知道打几点，我总是打整整一排省略号，因为我总是觉得文章写不完，有很多意思没包括进去。好了，扯远了。嗯，我是上初中读到《少女之心》的，它是隔壁一个失学少年借给我的，它的另一个名字叫《曼娜回忆录》。我躺在床上，放下帐子，看得上气不接下气，即舒服又意犹未尽。现在看来，这不过是一本性爱教科书，可那诗情画意中的幽会与交合令人一阵阵地颤栗！接下来的几天，我都莫名其妙地亢奋，下意识地乜视班上的漂亮女生，她们也和曼娜一样成熟了。从这本禁书中，我第一次知道了性爱除了其它书中

描写的拥抱、接吻与正面交合外，还有那么美妙、繁复的前戏和事后的满足，还有男在下、女在上的游戏。

老威：这时你还记得高尔基和其它作家给予你的道德教育吗？

王响：全被扫得干干净净。要知道，我还是个 14 岁的孩子啊。

老威：这很危险。

王响：对。它诱使我在同女生的交往中，有了强烈的性联想。不过，没有几天就开始“扫黄”了，那时的“扫黄”就是收缴手抄本。小说，文革前的诗歌和爱情歌曲，俄罗斯爱情民歌，港台歌曲，都在收缴之例。借给我《曼娜回忆录》的那个失学少年被抓了。游了街，脖子上挂着黑牌，上写“传播《少女之心》犯”，他被送去劳教了。我担惊受怕了几天，就外出流窜了，我怕他把我咬出来。

老威：我看你是属兔子的，撞见危险的信号就逃，你的流浪习性就是这样养成的？

王响：差不多。似乎每次逃跑都在改变我的人生。

老威：有没有不逃的时候？

王响：有逃不掉的时候。比如文革后期，我传抄、张贴《总理遗嘱》，被莫名其妙关了两年。这事我给你说起过。别人传抄、张贴东西都有社会目的，就我这傻瓜，天生养成了这么个传播“谣言”的习惯。那年我 18 岁，刚刚够格就进去了。我还到过劳改监狱，那儿关了许多反革命，还有一个是国民党《扫荡报》的记者，已劳改了几十年，反动弯子还没转过来。我就是在里面跟一个老和尚学会吹箫的，他说他教了十几个徒弟，只有我敢在吹法上欺师灭祖，因此能成大器。虽然至今我不晓得自己成大器没有，可我的确靠这管箫在流浪途中混了不少饭钱。我到大使馆去吹过，也出过黑磁带，也险些成为一个著名酒吧的职业吹手，只因我有一次带了十几个朋友去白玩白喝，老板发牢骚，我才罢吹的。你看，我又扯远了。我这是典型的流浪汉，走到哪儿黑在哪儿歇，说话也一样。我在牢里除了劳动，就是吹箫；除了吹箫，就是在操场内兜圈子，越走越快，一天要走好几十圈；自由是一种发自内心的东西，你尽管走，一直走下去，就感觉不到是在监狱里。而吹箫是练丹田之气的，我坐牢

两年，筋骨和内气都练了，并且随心所欲地想象比在外面还要深远，这是一种最为愉快的流浪方式。比如我的和尚师傅说：“丝不如竹，竹不如肉。”我问：“为啥不如肉？”师傅答：“肉就是整个身体。你只有把整个身体当成一管箫，才能练好这根竹箫。”我又问：“肉箫和竹箫的区别呢？”师傅答：“竹箫是一气到底，肉箫则分吟、唱、啸。我再问：“何为吟？”师傅答：“古有《吟之十二法》，深吟、浅吟、显吟、暗吟……以此类推，有《唱之十二法》与《啸之十二法》。”这种对话你们门外汉或许不明白，但它已使我的脚迹上溯到历史之外。你记得“响遏行云”这个成语吧？它讲的就是一个名扬天下的大歌星慕名去深山拜隐者为师的故事。这个隐者在大歌星跪了三天三夜之后，点头收其为徒，可又只教他爬山、砍柴，把他当作苦力使唤。他忍气吞声了三年，总以为师傅能突发慈悲，教他一些出奇制胜的技法。然而，这徒有虚名的隐者象哑巴一样，三年不吭一声。大歌星悲怨交集，再也不愿忍受这种野人般的学艺生涯，终于不辞而别。他飞奔下山，连翻几道坡，也不觉得气紧，就加快步子，他太想念过去被万众崇拜的世俗活法了。

正当他已翻过十几道山梁，脚力稍缓时，倏然，当顶炸响了一个巨雷，他下意识地抬头，见晴空灿烂，而雷声还在滚滚而来，四山回应，连天边的白云也被遏制不动了。他恍然大悟，转身就朝回跑，当重归师门时，他的师傅已经杳无踪迹。

“师傅，我错了！”他大喊道，泪如雨下。而回答他的是一个比雷声更空洞的声音：“去吧，为师已教过你了。”

老威：你的经历的确不凡，你坐现代的牢，却通过你的和尚师傅流浪到了古代，甚至古代之外。在这一生中，你的吹箫师傅对你影响最大吧？

王响：我再也没见过他，一恍 20 多年了！有时，我真有点怀疑自己的经历，这老和尚存在过吗？是否是我的一种幻觉？但我的箫声还在。现在我给你讲一个比我师傅实在的人。这人是 57 年反右时判的刑，反革命罪，无期徒刑。由于坐牢坐成老资格，再加上懂点医，就成了队里的卫生员。你可能不清楚，牢里的油晕很缺乏，

更别说大鱼大肉了。按规定，一个星期吃两回肉，有时是辣椒回锅肉，一人一瓢，当然辣椒占大半；有时是莲花白炒肉，肉就只有屈指可数的几小砣。我讲的这人姓杨，当时 65 岁。每次吃肉时，他都厚着老脸，让犯人组长给他多分肥一点的，而后，他端起肉钵回到卫生室，关上门，点燃酒精灯，把挑选出的肥肉片或肥肉砣放在灯火上炼油。他只能炼出很少的一点油，他把这辛辛苦苦得来的猪油一滴滴刮进一个瓶子，才端起碗，把剩下的油渣和菜吃掉，还舔碗。

老威：这人也够深谋远虑的，万一断了肉，他还有油解痨。

王响：你错了，他把这三个月才能攒满的一小瓶化猪油（大约三两多吧）捎给他母亲，几十年都这样。当时他妈快满 90 岁了，只有他这么一个儿子。

老威：这是圣人啊！

王响：不错，“三尺之外，必有圣贤”，这是孔夫子说的吧？

老威：没印象。唉，你在牢里收获可真大，出来之后能适应吗？

王响：相当于从传统回到现代。以后，我又当过汽车司机，去的地方越多，文学的情结越淡。

老威：这就怪了，经历是搞文学的本钱啊。不过，我听了这么久，也没听到一个完整的流浪汉故事。

王响：走之前和走之后有故事。在路上的故事肯定有，但比走路精彩的不多。我这个人，也许开始流浪的时候，有很明确的功利目的，可当我豪情满怀地走在正道上，路旁突然窜出一条疯狗，咬我屁股一口就跑；我的天性受不得气，就去撵这条狗，欲除掉而后快。然而，过了一会儿，狗不见了，我却找不到回去的道，只有照一种惯性走下去。不料路旁又窜出一条疯狗……如此一而再，再而三地重演狗咬人，人追狗的戏，我离自己最初的正道越来越远。

老威：这就是你的流浪故事？

王响：对，那狗就是命运吧。

诗人廖亦武惹祸与《南方周末》大地震

沈励志

1、《南方周末》地震

二零零一年“六四”前夕，中国当代新闻史上最黑暗的一幕终于降临：在大陆民众中覆盖面最广，影响力最大，以大胆揭露社会真相和坚守民间立场而着称于世的大型周报《南方周末》爆发政治地震，几乎全军覆没。广东省委省政府以“经济损失巨大”为由，一再向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新闻出版署请示汇报，并开展了一系列私下斡旋。讨价还价的结果，总算保住了这块“报业第一金字招牌”，然而，遵照中共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常委李岚清的指令，《南方周末》主编一名，副主编二名，副刊部、新闻部主任各一名被撤职处分。另有待证实的消息称，该报部门以上的负责人均遭撤换，此外还有一批记者被除名。

因为前所未有的换血（去年初，《南方周末》创办主编江艺平也因类似的问题被撤职），编辑部人人自危，陷入混乱。年仅二十七岁的新主编仓促上任，召开数次编务会议，均无法确立日后的新闻方向。但从五月三十一日出版的报纸看，《南方周末》已由原来的二十四版缩减为二十版，所谓“负面报导”销声匿迹，而以江氏“三个代表”定音的阳光新闻一统天下。这表明独裁政权一旦恼羞成怒，就可以踢开任何形式的社会监督，践踏自己制定的宪法，彻底扼煞言论与出版自由。

2、中宣部的红头文件

根据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正式下达的红头文件，《南方周末》遭此横祸的罪状有：

①严重违反新闻纪律，在二零零一年四月十九日写作版上，整版发表了四川著名民运分子廖亦武（化名老威）与《中国青年报》

资深记者卢跃刚的《关于〈中国底层访谈录〉的对话》，该文透露出“六四”情绪，对党和社会充满敌意，并公然吹捧已被明令查禁的反动书籍，借所谓“底层人”之口，编造谣言，诬蔑和歪曲社会主义历史和现实，别有用心地提出“无权势者无历史”；

②在同期头版、二版、三版，推出《张君案检讨》，以探讨重大犯罪的社会原因为由，为犯罪分子开脱罪责。妄图一笔抹煞湖南省委和公安干警在破获罪案，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中的功绩，并且认为张君等人铤而走险、危害社会是无路可走，是环境造成，是“他们被推到社会边缘”。此文发表后，造成极大的混乱，许多党员干部和群众致信有关部门，对《南方周末》在中央统一部署的“严打斗争”中的立场提出批评，认为社会主义的舆论阵地应该弘扬正义，痛斥邪恶，这是大是大非问题；

③在同期解密版上,整版发表歪曲历史，引起思想混乱的文章：《青春墓地埋葬重庆文革武斗》，为造反派鸣冤叫屈。

文件认为，三篇有严重政治问题的长文在同一期报纸均作为重点发表，肯定经过精心策划。特别是前两篇，都披着学术外衣，不约而同地大谈“底层”“边缘”。仿佛每个被抛到“边缘”“底层”的人（而且这种人占社会的绝大多数），都可能成为第二个，第三个张君，杀人越货，危害一方，最终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作为“文本证明”，同一期写作版还节选了《中国底层访谈录》中的《人贩子钱贵宝》，钱贵宝与张君一样是农民，一样因贫穷，因生存环境的恶劣，及其它社会原因而被迫犯罪。

3、言论管制的日常细节

《南方周末》东窗事发，互联网，以及民间私下的评论与猜测甚多，但在公开的媒体上，却不见一个字的报导。这种掩耳盗铃的治乱方略，同毛时代的下放与大批判，邓时代的反自由化运动大相径庭，因为丧失了精神领域的权威，以及民主、人权、言论自由的世界性潮流对国门的冲击，江时代“独裁气短”，只能采取黑箱指令，俗称“卸掉关节”。在大陆媒体呆过的人都知道，每个星期，甚至每天，均会接到来自上面的五花八门的指令或者批评，很多时

候是打给主编的一个电话。称自己是省里的，市里的，或者中央的，然后指出某年某月某日某版，发在什么位置的文章，有时为新闻、消息，甚至某一句话的提法，有悖于中央精神，有政治错误，不利于社会稳定等等。主编洗耳恭听后，旋即将在会上传达，提醒大家小心避开雷区，以免集体下课。除了这种黑社会式的直截了当的遥控、恫吓，中央和地方也通过传统的下文，有时一个星期下达的多种文件里，不能报导的禁区多达几十上百处，比如工人下岗，街头闹事，黑社会报复，教会活动，某国企的内部情况，某本书的宣传，某个名字，某些敏感的引起人们情绪波动的字眼等等。今年元旦，李洪志发表文告，其中有最后“圆满”的提法，于是“圆满”一词一度被明令禁用。

要实施这种日常细节化的新闻、出版管制，从中央到省市的宣传出版管理机构均设有党性极强的读报员，每天专门逐字逐句地检查，然后圈点有问题的文字上报，像《南方周末》这种发行上二百万，黄金时期甚至突破三百万的大报，从下至上，每天至少有几百老布尔什维克在进行文字过滤，因此每年接到的“黄牌警告”不计其数，部门主任至主编所作的“深刻检讨”也不计其数。好在广东近十年一直是中国大陆新闻最开放的省份，是对外的窗口和引资的招牌，《南方周末》一再利用省里和中央某种微妙的人事关系，得以发展，可花在勾兑关系上的“黑箱资金”却一直是未知数。

除了上述管制细节，媒体负责人也经常应召进市、省或北京开会，听取对新闻出版违禁事件的处理结果。去年青海人民出版社“非法出版”法轮功读物和北京的改革出版社“非法出版《新官场秘籍》，都属轰动一时的新闻。为了配合中央部署，对前者的处置有关人员判刑并处罚金，出版社停业整顿允许正面见报；而对后者更为严厉的处置作者、书商判刑并处罚金，出版社社长、总编、责任编辑撤职查办，取缔出版社则不准媒体泄露一字。

类似的兴师动众，今年四月份也有过。以出版世界当代名著而声誉日隆的广西漓江出版社，因推出学者何清涟的专着《我们仰望星空》而被停业整顿，险遭灭顶之灾；湖北的《今日名流》因发表了社会贤达李慎之、戴煌、方方等十人联名关注河南一冤案的公开

信而被取缔，《书屋》等一批人文社科杂志被严重警告。需要提醒读者注意的是，这一系列文化打压均属秋后算账，法轮功读物与《新官场秘籍》更是几年前的旧书，当时法轮功正风行，谁也没想到它日后会成“邪教”。

戴晴等学者认为，《南方周末》此次换血，标志着独裁者的言论钳制进入了更加精密的时期，这种暂时保留媒体外壳，更换内部关节的控制方法，将被推广成一种秘而不宣的日常行政手段。笔者曾与《南方周末》一位资深编辑交谈，他说，“《南方周末》在国内的影响，相当于《纽约时报》在美洲大陆，我们擅长对社会敏感问题进行追踪报导，并且有深度，有代表性。一个新闻工作者如果有起码的良知，不与丑恶同流合污，必然会得罪一批权势者，他们自以为掌握了对历史和现实的生杀大权。”他还说:“这只是一个借口，因为上面整肃《南方周末》的动机由来已久。如果这次侥幸过关，肯定会有下一次。况且他们找的借口也比较勉强，我们怎么知道老威（廖亦武）是民运分子？他头上又没刻字，六四过去这么多年，当局还是如此敏感，只能说明政权的虚弱。”他还透露，由于读者好评如潮，违禁的三篇文章曾被报社内部评为当月好新闻，有关编辑还拿了奖金。

4、百分之一的新闻真实

因置身事中，这位编辑的话有一定情绪色彩。如果我们把目光放开，就会看到世界末日的硝烟滚滚而来：法轮功天安门自焚，石家庄大爆炸，张君案，成克杰、胡长清巨贪案，厦门赖昌星走私案，沈阳政府与黑社会勾结案，四川资阳、宜宾黑社会火并，网路犯罪，乃至最近的《天安门文件》中文版在海外推出，江泽民上台的合法性受到质疑，等等。中国真是个新闻大国，《南方周末》的报导，说实话，还不及每天发生的轰动级新闻的百分之一，可就这百分之一的敏感的真实，说不定就会成为专制大堤上的一道裂缝，将逐渐深入，并在某一天引发洪水泛滥。作为对《天安门文件》海外版的应对，中共除要求地方厅级以上，部队师级以上干部轮流观看官方内部纪录片《六四大事纪》，以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外，江泽

民还重点宣布“反五毒”，即台独、疆独、藏独、法轮功和民运，其中民运、法轮功又是“重中之重”。

舆论的放与收一旦上升为江山社稷是否稳固的高度，《南方周末》的命运就注定了。据中宣部文件透露，此次事件的始作俑者为四川省新闻出版局。他们在发现本省的民运分子上报的同时，又接到成都市国家安全局的敌情通报，于是性质不同的两个机构先联手查验省内文化市场，搜缴《中国底层访谈录》并集中销毁，然后上报北京，状告《南方周末》与出版《底层》一书的长江文艺出版社。于是，中宣部与新闻出版署在半个月内三次下文两家违禁单位，并在全国范围严查并销毁《底层》。两家单位的负责人还被招到北京，深刻检讨严重错误。在《南方周末》换血之际，出版社还等待着上面的最后文件，除销毁禁书带来的巨额经济损失外，停业整顿在所难免。出版社某编辑说：“只要不全面换人砸饭碗就谢天谢地了。”

看来，告密者的“斗争技巧”已相当圆熟，一上手就抓住了“民运分子廖亦武（化名老威）这一关键字，触痛了被《天安门文件》闹得寝食不安的中共最高权势者的神经。

5、廖亦武其人其事

廖亦武，诗人，八十年代名噪一时，是所谓新诗潮的主要代表之一，因在八九年六四□晨创作、朗诵、录制抗议惨案的长诗《大屠杀》，以及创作和组织拍摄电视片《安魂》，而被中共当局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刑四年。出狱后妻离子散，生活无着，曾一度沦落到社会最底层，靠在酒吧吹箫卖艺渡日。廖亦武在一份自传里写道：“由一个诗人坠入犯人，又由一个犯人坠入这个社会的沉默的大多数。他们是人生的失败者，所以他们的声音、智慧、叙述历史的方式，甚至血泪都被取消了，在这一点上，政治、文化、经济精英们，诗人、作家、学者们与当权者达成了默契或共谋，‘赢家通吃’不仅仅是商业法则，也成了其他领域的法则。廖亦武所做的工作就是按照他所特有的方式蛮干，搜集底层见证，并把这些东西一点点汇集，最终瓦解权势者的法则。”

从字面上看，廖亦武的文化角色已经由呐喊的诗人转化成底层

见证者，“我是个人行为，与民运组织没关系。”他写道。却忘了自己因坐牢而被打上了民运分子的烙印。况且，廖亦武从来不是个逆来顺受的人，当安全部门老是找他麻烦，扼断其谋生的岗位与渠道时，他就只有不计后果地抗争。从一九九五年开始，他多次参与要求政府平反六四、推进民主的请愿；而在一九九八年六四发出的《致美国总统克林顿的公开信》，则为他在民运与西方舆论界赢得了广泛的名声，文中写道：“克林顿先生，当您在这个月下旬抵达具有千年沧桑的天安门广场的时候，您是否敢于像 35 年前的甘乃迪总统那样，宣布您也是北京人？是证人？死者？或政治囚犯？

“如果您仅仅为大国间的交易而来，那么，当我某一天站在白宫前的时候，我将宣布我是美国人，是反对派，是出卖理想的克林顿的牺牲品。”

一九九九年六四，天安门惨案十周年，廖亦武不顾安全部门的再三威胁，接受了自由亚洲电台的采访，并朗诵了写于十年前六四□晨的长诗《大屠杀》，作为对沈冤多年的亡灵的悼念。这个朗诵作为特别节目，在六四前后播放了两周，六四当天，重复播放了四次，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以上是廖亦武与民运有关的大概事迹。此外，他还数次以个人名义对警察的迫害提出抗议，难怪他要感叹：“在中国，我几乎是与警察打交道最多的文人了。”

6、以文犯禁之路

廖亦武是地下出版的老手，八十年代就因出地下诗刊，一再与公安部门打交道，有“记录在案”的前科，出狱后，故态复萌，出过《知识分子》两期和一本《古拉格情歌》，此外，还出有黑磁带与黑光盘，主演过黑电影。他同朋友谈到：“我终生追求的是言论与出版自由，能够钻空子，冷不防正式一回当然过瘾，如果铁板一块，没缝隙可钻，就只有把稿子收回来，自己印，免费发出去，图个阿 Q 的精神胜利法。”

带着钻空子的想法，一九九九至二零零一年，廖亦武先后与不明底细的书商或出版社合作，正式出版了《沉沦的圣殿——中国二

十世纪七十年代地下诗歌遗照》《漂泊——边缘人采访录》以及《中国底层访谈录》。三本书均被查禁，并且都有安全部门的直接插手。

《沉沦的圣殿》问世于一九九九年五月，首版一万五千本，悄悄发放到市场，尽管出版姿态低调，但事隔一个多月，仍被国家新闻出版署全面查禁。在一党专制的国度，查禁一本书本不算新鲜事，避过风头，大家或许就忘了，可偏偏此书给读者留下的印象难以磨灭，乃至于同年十月，被全国最大的民营书店席殊书屋（有三十多个连锁店，近二十万读书俱乐部会员分布于各地）的首届书评会推为"中国一九九九年度十大好书"之一。由于这一殊荣经读者投票，七十多名思想文化界的专家集体推荐，因此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反响，一致认为"迄今为止，这是研究朦胧诗和地下文学最权威的著述"。廖亦武为了完成这本书，单枪匹马作了大量的搜集、采访、整理，因此其中关于收藏家赵一凡，关于郭沫若之子郭世英，关于白洋淀地下文学的传播，关于《今天》及民主墙时期的资料，等等，都是首次在国内公诸于世。编者执意要还原历史，所以在书中，令人震骇地多次出现徐文立、刘青、刘念春、魏京生、周舵、芒克、北岛、赵南、李南、周眉英、陈迈平、马德升等民运或异议人物的名字、大量史料、及民主墙时期的民刊和照片。廖亦武认为，他并不是要有意犯禁，为当局的政敌树碑立传，而是尊重历史原貌，"这是编历史类书籍的常识，否则没法弄。"

《沉沦的圣殿》为当局所不容，当在"情理"之中，出版单位新疆青少年出版社的社长、总编均遭撤职，而将"反动书籍"评为"十大好书之一"的席殊书屋也险遭灭顶之灾。又是这个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常委李岚清批示：将《沉沦的圣殿》这样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东西评为"十大好书"，是预谋的，背后有势力支撑的集团行为，必须严查严办。

席殊书屋的网站停办，面临吊销执照的危机，席殊以全体员工的名义向上面一再书面汇报、检讨，并且将读者、专家的选票与结果一一展示，证明这一事件纯属偶然。最后，某席殊之幕后人物出面，找到曾经是江泽民上司的较为开明的汪道涵，方通过私下渠道平息了事态，然而席殊总部已搬迁，决定缩小规模，长达两月的担

惊受怕，已使席殊经济损失达数千万人民币，元气尽伤，至今心有余悸。而作为主编的廖亦武，被中宣部列为不准出书的重点物件，先后三次被北京和四川的公安机关传讯审查。

一九九九年九月，廖亦武同二渠道书商合作，化名老威，借用他人身份证件，再次出版了《漂泊——边缘人采访录》，这是《底层》的节选本，学者任不寐认为："这不仅是生活状况的底层，而且是话语权利的底层，是被这个时代的作家所遗忘的'另一个中国'。"

《漂泊》刚出就引起关注，书评如潮，三个月中再版五次，各地报刊更是竟相连载。但好景不长，国安局和新闻出版署联合调查了出版单位中国戏剧出版社，旋即，《漂泊》被全国禁售，印刷此书的书商被通缉，印厂被封，书版被毁，存书被没收。

面临取缔的危险，戏剧出版社被迫赖帐，竟谎称《漂泊》是盗版书，并在《新闻出版报》上注销"严正声明"，方侥幸过关。然而"正版书"又在何处？书商在外流亡了几个月，连喊冤枉："没想到国家出版社也耍无赖！"

读者更想不到的是,在"底层采访"过程中，尽管廖亦武隐匿其身世，却一直受到特别关注。一九九九年二月二十七日，廖亦武结婚大喜的日子，警察竟以"非法采访"的名义拘留了他，并没收了他的大部份手稿。廖亦武这些年所遭遇的困境，是绝大多数海内外文人难以想象的，他在一篇文章里写道："没有任何安全感，不可以相信任何人，像一条狗，咬死一块骨头就不松口，哪怕人们撵你，诅咒你，用棍棒痛击你，也要与骨头同归于尽……

"写了这么多年，我撑不下去了，有时兜里只有几块钱，连门都不敢出。想越境逃跑，却不知道为何逃跑。我到语言不通的地方能干什么呢？继续写《活下去》？当然用不着把写好的稿子东塞西藏了，用不着面对警察死撑到底了，因为谁能懂？……

"时刻记住谁也救不了谁，你在孤军奋战。中国没有哈维尔，没有索尔仁尼琴，既使有，也早被消灭了。因为没有朋友，没有珍惜他们思想与才华的人，大家内心都害怕，仅管也写些颇具正义感

与良知的文章，却在个人行为上，心照不宣地恪守某种官方尺度。连西方来的文化、艺术大师接见的也是中国作协安排的可靠文人，虽然在形式探索上，这些文人可能属于先锋派……

“地下文学传统自生自灭，因为国际汉学界被官方当红的文人所垄断，连马悦然也喝了蒙汗药，着魔似地推荐所谓乡土作家。他哪知道中国早没有沈从文时代的乡土了，连农民都堕落了，撒谎、卖人、连眼皮都不眨……。”

7、一部书的奇迹

这种类似控诉的文字虽然令人心颤，但事实却证明了廖亦武作为文化游击战士的机智和顽强，因为二零零一年一月，他化名老威再次出版了《中国底层访谈录》六十人本，上下册，四十多万字，虽然这仍不是七十余人的全本，但在独裁大国已堪称奇迹了。

近几年，我总是在北京的一些地摊上，看见若干港台版禁书的盗版，其中有《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中国太子党》、《魏京生论民主》、《叫父亲太沉重》、《秦城春秋》、《江泽民和他的幕僚们》、《王丹回忆录》、《徐文立狱中家书》，等等，品种繁多，价格几元至几十元不等。高行健一获诺贝尔奖，成都马上就有《灵山》盗版，三十元一本，后来印得太多，就降到八元，甚至五元也能到手。据说盗版书商一旦查获，肯定判重刑，直至枪毙，然而为什么盗版，特别是“反动书”的盗版屡禁不止？

这完全是利益的驱动，如同贩毒，风险再大，也有人铤而走险，并且前赴后继。廖亦武认为，同盗版相比，他的书风险小得多，看来，自由思想在中国大陆唯有同金钱结盟，才能得到最广泛的传播。

《中国底层访谈录》辗转了十几家出版社，均无人敢接招。长江文艺社当时的心理同盗版商颇相似：这肯定是各阶层读者都能进入的长畅书，风险大，利润就高。

出版社选择春节前夕出书以降低风险，所作的宣传也仅仅限于在地方报刊发些书讯。但《底层》这样不可多得的“抓人”的书，一旦投放市场，必定会引起社会反响。在《南方周末》事件之前，

已有《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北京青年报》《中国新闻周刊》《中国图书商报》《文化时报》《当代》《中华文学选刊》《读书》《母语》《天涯》《北京晚报》等 50 多家媒体重点评介《底层》，地方杂志擅自节选书中篇章或连载的，更不计其数，一时间，“关注底层”成了热门话题。3 月 4 日，北京国林风图书中心召开了《底层》读书讲评会，钱理群、沈昌文、白烨、丁东、雷颐、摩罗、余杰、任不寐、徐晓、岳建一、李辉等 30 余位文学、社会学、历史学、生物学、新闻学专家、教授和学者到会并作了发言，首都 20 多家新闻媒体现场采访，数百名读者旁听并踊跃提问。

主持人为冯小哲，大名鼎鼎的被禁思想杂志《方法》主编，他一再提醒大家为《底层》多披几层“学术外衣”，但知识分子们压抑多年的愤懑，均借《底层》朝外喷射。著名文学评论家白烨说：“我们现在的新闻没法看，新闻联播三分之二是领导人开会，去哪儿考查，全是些没有的废话。也不调查一下我们的真实感受。国内报纸也基本上是关注怎样过好小日子，各种各样的说法，却很难看到我国真实的一面。所以，老威这本书，已超出一本书的意义，非常值得读者，特别是新闻工作者去阅读，并体会作者的写作态度，把真真实实的新闻，真真实实的社会现实告诉我们，因为作为公民，我们有知情权……。”北京大学生物教授姚仁杰说：“我觉得这本书的意义还在于，不管你怎么封杀，民间的声音是压不完的，人是杀不绝的，总还有后继者，为什么？因为像书里描写的那样，生活是残酷的，不人道的，把所有的一切全给你剥夺光，但是，人们依旧活过来了，耻辱地活过来了，还要说话，舌头还没被割掉……。”

据参加过书评会的某记者描述：“局面越到后来越不好控制，大家抢着发言，矛头对准官方，把主办单位吓坏了。后来大伙见天色已晚，又移师京郊的大觉寺，以尽其兴，这时作者老威才出来与大家见面，吹箫、呼啸，并朗诵了纪念亡灵的诗。全场鸦雀无声，继而肃然起敬，继而挥泪与鼓掌，很多人都上台讲话，由衷地赞赏老威。这个光头的流浪汉，不知所措，就与摇滚乐手何勇合作了一首《阳关三叠》，老威吹罢两叠，然后柱箫长吟，余音回绕，泪水把嗓子都堵住了。”

8、知识分子的根本权利

在中共心脏地带举行异端色彩如此鲜明的活动，居然没出问题！这的确令许多人后怕，有人认为是法轮功帮了忙。但一周之后，情报还是抵达了有关部门。于是新闻出版署派出稽查大队，把位于北京大学附近的国林风总店搜了个遍，并勒令停业检查，上交所有参加会议者的名单及发言记录。“今后举办任何活动，”稍后下达的文件道，“都必须报经主管部门批准。”

追查尚未结束，全面销毁《底层》的指令则已下达，接踵而至的就是 2001 年 4 月 19 日的《南方周末》事件。

一个作家公开出版的所有著作均遭查禁，这在当代出版史上也属罕见，所幸的是，官方应对类似“文化事故”的措施总处于置后，这就给自由思想进入市场，以打破意识形态的一党垄断提供了空间。廖亦武认为：哪怕存在一丝缝隙，也要尝试钻过去，渐渐，缝隙就越来越宽。“我们应该把更多的真相告诉更多的人，本名不能用了，就用化名；化名也禁了，再想其他法子。知识分子最根本的权利就是言论，因种种危险而自动放弃话语权利，就取消了自己作为人活在世上的理由。”

六四之后，曾经改良心切的知识界对一党专制彻底绝望了，流亡海外，隐匿书斋，投身商海，拒绝合作，但苦闷的心结一直纠缠着。这些年，我们经历了若干《东方》《方法》等精英刊物的停办事件，书的查禁也成为屡见不鲜的景观。有多少人为此付出过代价？其中的操作细节又如何？我想，恐怕不亚于一部文化战争史。可惜，随着时间的无限推移与淡化，这将成为永远的谜团。

现实使我们失去了哈维尔式的乐观和理想。因为禁书在海外的出版也相当困难，那些精明的商人们，一直等待着廉价收购。而大陆符合官方口味的热门书（虽然有些先锋技艺上的争议）也是汉学界竞相翻译、“研究中国文学”的热门书，对于中国和前东欧、苏联，海外在文化和艺术上显然采取了双重标准。

在这里，我对在夹缝中出版禁书的单位和个人表达敬意，不管出于什么目的，异端因之而面世；我还对《南方周末》等媒体表达

敬意，仅管付出了代价，但对抗的资讯得以大面积传播，并且不会由此划上句号。

禁书永存。

2001 年 6 月于中国北京

（未完待续）